中國當代著名的詩人和藝術家及各界嘉賓在香港歡聚一堂，舉辦詩歌音樂晚會
紀念《今天》文學雜誌創刊三十周年

1 9 7 8 - 2 0 0 8

今天的昨天與明天

——詩歌音樂晚會

顧　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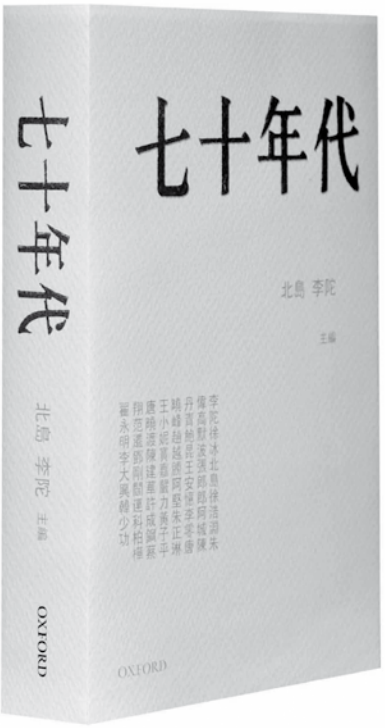
韓少功　余華　阿城　汪暉　賈樟柯　李陀　李零　高名潞　徐小平　駱英　胡舒立　李歐梵　王德威
小思　也斯　梁文道　鍾玲　鄭培凱　鄧永鏘　張頌仁　詹德隆　李慶生　陳偉光　潘耀明
王家衛　林奕華　侯孝賢　張大春　朱天文　朱天心　唐諾　龍應台　初安民　是永駿　萬之

時間：　2008年12月12日　晚上八時
地點：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利希慎音樂廳

特邀詩人：　芒克、北島、多多、舒婷、嚴力、翟永明、韓東、歐陽江河、西川、柏樺、宋琳、朱朱、廖偉棠、鄭單衣
特邀歌唱家：　范競馬
視覺策劃：　朱德華、麥安

主辦：　《今天》雜誌社
牛津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協辦：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漢雅軒畫廊

八十年代開花，
九十年代結果，
甚麼事都醞釀於七十年代



筆寫下的，斧子也砍不掉

北島 李陀主編
30位著名中國作家
600頁回憶文字
80幀雙色相片
封面題字：徐冰作品
已經出版

HK$108
978 0 19 800 562 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今天文學雜誌

2008年冬季號　總83期

七十年代專號2

ISSN 0803-0391
出版：今天文學雜誌

社長　歐陽江河
主編　北　島

編輯部主任　蕭海生
社長助理　李彥華
特約編輯　李　陀　歐陽江河
　　翟永明　徐　曉
小説編輯　南　方　韓　東
詩歌編輯　宋　琳　廖偉棠
散文編輯　王　渝　王瑞芸
評論編輯　劉　禾
藝術編輯　朱　朱
藝術顧問　高名潞
封面設計　李曉軍
網絡版主編　王　瑞
網絡版編輯　李大興　陳　謙　胡仄佳
網站管理　白寶明
發行經理　孫　瑋

編輯部地址
5D, Block 7, Woodland Crest,
Sheung Shui, N. T.,
Hong Kong
Website: www.jintian.net

《今天》顧問委員會

John Ashbury
Margaret Atwood
Russell Banks
Breyten Breytenbach
J.M.Coetzee
Robert Coover
韓少功 (Han Shaogong)
黃永玉 (Huang Yongyu)
Maxine Hong Kingston
Wolfgang Kubin
馬悦然 (Göran Malmqvist)
Michael Palmer
Wole Soyinka
Jonathan Spence
Gary Snyder
Tomas Tranströmer
John Updike
Eliot Weinberger
周氏兄弟 (Zhou Brothers)

美國發行總代理
P. O. Box 2364,
Davis, CA 95617, U.S.A.
Fax (866) 334 2471

新加坡代理
Mediaexodus LLP
Woodlands Central Branch Post Office,
P O Box 192, Singapore 917310

日本訂戶代理：內山書店
〒101日本東芒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1-15

香港發行總代理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三字樓

今天文學雜誌 2008 年冬季號 (總83期)
Today Literary Magazine Winter 2008 Number 83 in Total
Published by *Today Literary Magazine*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50元　新台幣200元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

目　錄

七十年代 專號 2

李陀　編者按　1
徐冰　愚昧作為一種養料　9
北島　斷　章　25
陳丹青　幸虧年輕　42
朱偉　下鄉第一年　63
高默波　起　程　73
張郎郎　寧靜的地平綫　84
阿城　聽敵台　126
朱正琳　讓思想衝破牢籠　133
鮑昆　黎明前的躍動　155
許成鋼　探討，整肅與命運　170
陳建華　夢想與回憶　196
王小妮　七十年代記憶片斷　209
唐曉渡　一九七六：初戀敗絮　227
寶嘉　鷦鷯巢於這一枝　244
翟永明　青春無奈　257

今天畫頁

朱朱　**從里芬斯塔爾說起**　280
——劉野訪談錄

七十年代 專號編者按

李陀

中學畢業即到工廠做工，一九八〇年調北京市作家協會做駐會作家。八二年前後停止小説寫作並轉向文學和電影批評。八六至八九任《北京文學》副主編。八九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學、柏克萊大學、杜克大學、密西根大學等校做訪問學者。八八至九一年主編《中國尋根小説選》、《中國實驗小説選》、《中國新寫實小説選》分別在香港和台灣出版。九九至〇五年主編《大眾文化研究譯叢》及《當代大眾文化批評叢書》。二〇〇〇至〇四年與陳燕谷共同主編理論刊物《視界》。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客座研究員。

秋季號和冬季號收錄了三十篇記憶文字，內容很集中，都是對「七十年代」的追憶和回顧。對很多人來説，那一段歲月雖然不過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時間不算很長，可是感覺上，已經是屬於上個世紀的一個非常遙遠的年代了。在那些年代裏究竟發生了些甚麼事，有如影像早已漫漶不清的老照片，只留下了一點依稀的影子，難以辨認，也難以追尋。但是，我們相信，凡是讀過此書的讀者都會發現，原來那一段生活和歷史並沒有在忘卻的深淵裏淹沒，它們竟然在本書的一篇篇的文字裏復活，栩栩如生，鮮活如昨。

我們相信，這是一本會讓很多人不但為其中的回憶文字感動，而且多半會受到震動的書。

問題是，我們為甚麼要編輯這本書？為甚麼要鈎沉那一段歷史，讓它復活？近年「懷舊」風氣盛行，各種懷舊的影視和書籍出了不少，這本《七十年代》也要湊這個熱鬧嗎？

作為這本書的編者，在此書出版之際我們很願意也覺得有必要作一些説明。

首先要說明的是，編輯這本書與懷舊無關，我們是想借重這些文字來强調歷史記憶的重要。

記憶在日常生活裏的重要性似乎用不着說。人怎麼知道自己「活」着？那是由於他/她都活在記憶裏——人的「此刻」總是在此刻中消失，活着的感覺、尊嚴和意義，其實都只有在「此刻」之後過去的記憶裏才能明白和證明。在這個意義上，記憶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我們不能不記憶，我們每個人每分每秒都不能離開或者停止記憶，就像一個人每分每秒都不能停止呼吸。

但是，歷史記憶就複雜多了。千古興亡任憑說，歷史記憶常讓人覺得虛幻縹緲。其實一點不虛，由於和現實有着實實在在的關係，它更像一個戰場，或者有如一個正在被爭奪的殖民地。我們不但經常看到一種歷史記憶會排斥、驅逐另一種歷史記憶，不但有虛假的歷史敍述取代真實的歷史敍述，甚至還會有對歷史記憶的直接控制和壟斷，當然，也就有了反控制和反壟斷。為甚麼我們在閱讀歷史著述的時候，經常碰到對同樣的歷史會有兩個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敍述？為甚麼某種公認是無可懷疑的歷史事實會忽然被「翻案」，然後流行一個似乎同樣無可懷疑的另外的故事？為甚麼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在不同的歷史記憶裏會有着天差地別的形容和描述？為甚麼某一種歷史記憶會得到呵護和保護，而另一種記憶就被壓抑或者放逐？歷史記憶領域從來就不平靜，無論是要喚醒一個歷史記憶，還是要認真對待和堅持一種歷史記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很多時候，那需要特殊的品質和勇氣。

然而，歷史記憶今天還面臨着更嚴重的問題：不是記憶和記憶的鬥爭裏哪一個佔了上風，也不是其中哪一個被排斥和被驅逐，而是歷史記憶本身正在被貶值，被無意義化，被遊戲化，被無厘頭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變成茶餘飯後的一種消遣，可有可無。當然，圖書館裏還收藏有大量歷史著作，出版社每年還出版不少歷史書籍，書店裏也還不斷有新的歷史著述上架，但與此同時，歷史研究正在被壓縮到「學科」的小象牙塔裏，嚴肅的歷史寫作正

在被對歷史的「戲說」和胡說所取代。歷史和今天現實的人、現實的生活之間的聯繫，已經非常脆弱，細若游絲。我們似乎正在進入一個失去歷史記憶的時代，一個沒有歷史記憶也可以活下去的時代。現實好像要證明，人的記憶似乎沒有必要和歷史聯繫，人的記憶只能是功能性的，房子車子票子，事無鉅細，錙銖必較，沒有昨天，沒有過去。

對這樣一個不在乎有沒有昨天的時代，我們應該怎麼應對？我們能說些甚麼？又能做些甚麼？當然，可以從理論層面去討論，琢磨、思考這樣的時代如果真正全面來臨，「人」有了甚麼變化？「人」的概念和實質是不是都應該重新去認識？也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作研究，分析這樣一個文化潮流的源頭和流向，弄清它的來龍去脈，預測它未來的流向和分佈。但是，能不能有一個辦法，讓今天的人從直觀和經驗層面去思考這類問題，比如，直接面對昨天，接受歷史記憶的挑戰，再看看這挑戰會有甚麼結果？

於是我們就編輯了這本《七十年代》。

我們想在這本書裏，讓昨天在文字中生動地復活，讓昨天在閱讀中展現，讓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對話。

我們相信，讀過本書的讀者，不論對作者們在這些回憶文字中流露的思想和觀點有甚麼看法，一定會有很多人，都為在其中展開的「昨天」的畫面是這樣陌生而感到震驚。我們還相信，這樣的震驚也一定會帶來對歷史記憶的重要性的重新估量，想一想剛剛過去的昨天為甚麼會變得這樣陌生，想一想歷史記憶對我們今天有甚麼樣的意義。

編輯這本書，還有第二個應該向讀者說明的問題：為甚麼選擇七十年代？

在很多人的記憶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並不是一個很顯眼的年代，儘管在這十年裏也有很多大事發生，其中有些大事都有足以讓世界歷史的天平發生傾斜的重量。但是，前有六十年代，後有八十年代，這兩個時期似乎給人更深刻的印象，特別對中國人來說，那

是兩個都可以用「暴風驟雨」或者「天翻地覆」來形容的年代，而七十年代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兩團狂飈相繼捲來時候的一小段間歇，一個沉重的喘息。這個十年，頭一段和六十年代的狂飈之尾相接，末一段又可以感受八十年代狂飈的來臨，無論如何，它好像不能構成一段獨立的歷史。這十年顯得很匆忙，又顯得很短暫，有如兩場大戲之間的過場，有如歷史發展中一個夾縫。

既然如此，為甚麼還要選擇七十年代？

這當然有不少理由，其中有一個是我們願意在這裏特別强調的。那就是七十年代和一個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有特別的關係——這是這樣一代人：他們是在七十年代長大的，雖然在年齡上多少有些差異，但是兩個狂飈之間這個短暫的十年，正是這些人度過自己少年或者青年時代的十年。讀過本書的讀者一定會有這樣的感觸，這一代人在青少年時期所遇到的成長環境實在太特殊了，他們的成長經驗也太特殊了。的確是非常特殊。回顧歷史，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經歷過自己的成長和成熟，但是如本書裏的人物那樣，從懵懵懂懂的少年時期就一步跨入一個罕有的歷史夾縫當中，並且在如此沉重的歷史擠壓裏倔强生長和成熟起來的人，大概是少而又少。然而，正是這一代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後，不但長大成人，而且成為二十世紀末以來中國社會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還引起很多爭議，其走向和命運一直為人特別關注的知識群體。

在每一個時代，知識分子都是思想的生產和傳播的主要承擔者，在大變革時期尤其如此。進入八十年代，充滿解放感的中國知識界空前活躍，思想如飄忽的風，忽而從四面八方襲來，忽而又向四面八方散去；不同年齡層，不同社會背景，不同政治經驗，一個個彼此或相似或相異的知識群體突然一齊湧現。這些群體沒有一個在思想上自甘寂寞，沒有一個不是在新觀念的追索上充滿激情。但是，今天回頭再看，由於成長於七十年代的一代人所構成的知識群體是其中最年輕的一群，因此他們的歷史記憶更為特殊，其中隱含的意義也不同一般。

本書把主題定位於「七十年代」，就是通過一次集體性的大型歷史回顧，來有意地突出這個群體。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演繹他們的成長經驗，還有從這經驗裏浮現和呈現的歷史環境。讀者一定會注意到，在這些故事和經驗的追述裏，我們並不能看到一個統一的、書中的作者都認可的「七十年代」圖畫。相反，在這些文字裏，或隱或顯展示出來的思想傾向和政治態度，是有很多差別的，甚至是相反的，對立的。這些差別，有的，明顯是在當年就已經存在；有的，則是在今天追憶的時候才形成的。在編輯此書的時候，我們很重視這些差別，並且不作任何編輯地保留了這些差別，讓這些回憶文字盡可能「原汁原味」。這是因為，一來我們要尊重每個人的記憶，這些記憶一旦變成文字，就像諺語說的，「筆寫下的，斧子也砍不掉」。那不但是這些文字主人的個人檔案，也是歷史檔案，它們的文字品格和歷史的真實性，都自有後人去評說。另一方面，這些差異還是寶貴的研究資料。留意九十年代以來思想界變遷的人都知道，這十年裏一個引人注意的的事，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發生了很大的分化。這種分化引起了長時間的至今也沒有平息的十分激烈的爭論和討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分裂和分化與現實的政治、經濟變革之間的內在聯繫，知識分子自身的歷史和現狀，也成了這些討論的一個重點。我們希望本書的這些文字不但為討論提供新的材料，更希望以此來推動這個重要的討論。

由此我們還想談及另一個話題。

近幾十年在中國發生的巨大變革雖然已經有了種種解釋和論說，但是缺少對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的專門的研究，特別是「知識分子史」這樣一個角度的研究。希望《七十年代》的出版是一個推動，讓更多的人注意從這樣一個視角，去回顧和評價知識分子在世紀之交這一段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貢獻和問題。也許正是在這樣一個視野裏，本書中的人物 (也是本書的作者)，還有他們的成長經歷，他們和大變革的歷史關係，他們在思想、知識上的創造、界限和局限，才能得到更好的認識和說明。

比如說，可以把這一代人和同一時期的西方知識分子作一下比

較。在歐美，七十年代在表面上和中國情況有些相似，似乎都是一個過渡時期：「五月風暴」和反戰運動都剛成為過去，以「列根—戴卓爾主義」為標記的朝代還沒有來臨，還有，於六十年代一直站在造反前沿的「嬰兒潮」一代，似乎也已經筋疲力盡。然而，在這表面相似之後的故事其實完全不同。待到了八十年代展開的時候，人們發現在歐美文化界盤踞要津的當代知識分子們突然換了一副新面目，波希米亞精神已化作了煙塵，不再有四處嚎叫的金斯伯格 (Allen Ginsberg)，不再有特里林 (Lionel Trilling) 驕傲的獨立姿態，更別說到街頭賣報紙的薩特 (J-P. Sartre)。新一代是依附於學院的埋頭做學問的教授，是依附於實驗室或公司沒日沒夜賣命的白領職工，是所謂「技術專家治國型知識分子」。西方知識界的這個變化雖然早有徵兆，但還是讓人覺得突然，不免引起種種疑問和反思，以致美國學界開始討論這樣的問題：誰是最後的知識分子，今天到底還有沒有知識分子？對比之下，本書中的人物在八十年代的命運就很不一樣。雖然這些人後來也先後變成了學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藝術家，但是七十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長經歷，無疑在他們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讓他們的態度、作風、思想都有一種不受秩序拘束，不願意依附權力的品質。大概正是這些特點讓這個群體在中國發生劇烈變革的時代發揮了其他知識群體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沒有他們，無論是「思想解放」，無論是「新啓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發生，或者發生了，也是另外一個樣子。

在這樣一篇短短的序言裏，我們不可能對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國和歐美知識分子的變化發展作具體的比較，也不可能對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為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檢討。但是，在編輯和閱讀本書中的這些回憶文字的時候，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感想：在今天，是不是出現了這樣一種迫切性，就是無論知識界自身，還是知識界以外的人，大家都應該來關心一下知識分子問題：到底甚麼樣的人才算知識分子？到底我們需要甚麼樣的知識分子？當然這不是甚麼新話題，過去已經有過很多討論，也有過非常重要

的論述，例如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關於「有機知識分子」的理論。只是，今天再來關心這個討論，我們首先還是要從自己的現實問題出發。如果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在八十年代和西方同行形成强烈的對比，很諷刺的是，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也出現了「學院知識分子」、「專家知識分子」的群體 (一個多少讓人覺得尷尬的事實是，本書中的主人公裏，有不少也成為了這些新群體的成員)，而且，隨着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這個群體的數量在急劇地增加，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很可能 (或者已經) 成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主體。這當然不是沒有引起注意。最近無論在報刊上，還是在網絡上，都有不少對這個群體的議論和批評，在這些言論背後，其實還是一個問題：我們到底需要甚麼樣的知識分子？我們在期待甚麼樣的知識分子？

學院和專家類型的知識分子如此增長、集聚和凸現，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史上的一次大變，但並不是唯一的新變化。從知識分子史的角度看，需要關注和思考的新現象和新問題還有不少。近二十年報刊網絡等新舊媒體的急速擴張所造就的一個龐大的媒體和新聞從業人員，就是足以影響歷史進展的一件大事。不過十幾年的光景，這個群體已經非常龐大，而且還在繼續擴大，很難估計在將來這個群體將龐大到甚麼程度。不過數量還在其次，關鍵是，既然這個群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領域，都有着現實和潛在的巨大影響，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角色該如何定義，如何估量。從傳統意義上說，他們當然是知識分子，但是，就這個群體和國家、市場的關係而言 (其中很多人已經是文化和娛樂界的明星)，他們真是知識分子嗎？如果不是，他們是甚麼？如果是，他們又應該如何認同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盡知識分子的責任？這些問題並不容易回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有明確的答案，更不用說形成共識。何況，這類問題還有很多。

在某種意義上，《七十年代》這本書已經參與了這些提問和討論，儘管此書只是一本回憶文字的集合。以歷史記憶進入這類思考

和討論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讓我們的討論有一個歷史的維度，有歷史的縱深。當然，本書提供的歷史記憶是很有限的，甚至也可以說是相當狹窄的，因為涉及知識分子的歷史太廣了，其中有的，已經形成某種記錄，但還有更多的，至今還沉睡在記憶之海的海底，有待搜尋，有待打撈。

最後要說明的一點是，參與本書寫作的作者，主要都來自知識界和文化界，這一方面是由於一本書需要一個立意，一個主題；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有些不得已。這個不得已使本書有着難以避免的嚴重的缺陷。既然編輯此書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想强調歷史記憶的重要，那麼，有能力也有權利參與這記憶的決不應該只限於那些擁有發言權的社會階層，「昨天」不能為哪一個群體獨佔。在「昨天」成長和生活過的人千千萬萬，裏面既有文化人和知識分子，還有廣大的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其中一定有很多人願意拿起筆來寫作，讓昨天在記憶裏復活，讓今天和昨天對話。如果我們能這樣做，相信在文字中呈現的思想和畫面很可能和本書十分不同，也許那是一個很不同的「七十年代」，也許他們的歷史記憶使我們對昨天有完全不一樣的認識。

開始編輯此書的時候，我們曾經設想過擴大作者的範圍，也做過一些努力，但是很快發現能力有限。不過，我們仍然沒有死心，就在此書出版之際，我們還有一種期望，假如能獲得一種支持，讓我們有能力放大這書的規模，編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那就有可能夢想成真。

還應該說一下，本書的文章分別在《今天》二〇〇八年秋季號和冬季號上作為「七十年代專刊」發表，並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完整的繁體字版、明年將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簡體字版，以盡可能讓更多的讀者見到此書。至於我們編輯這本書的種種想法是否能够得到清晰的表達，那只能全交給讀者去評判了。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愚昧作為一種養料

· 徐冰 ·

一九五五年生於重慶，長在北京。七七年入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八一年畢業留校任教。九〇年移居美國。二〇〇七年回國就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作品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倫敦大英博物館、法國盧浮宮博物館、紐約現代美術館等藝術機構展出。九九年獲得美國文化界最高獎—麥克阿瑟天才獎。〇三年獲得第十四屆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〇四年獲得首屆威爾士國際視覺藝術獎 (Artes Mundi)。〇六年獲全美版畫家協會 「版畫藝術終身成就獎」。被《美國藝術》雜誌評為十五名國際藝術界年度最受注目人物。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談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談我愚昧的歷史。比起「無名」、《今天》和「星星」這幫人，我真是覺悟得太晚了。事實上，我在心裏對這些人一直帶着一種很深的敬意。因為一談到學畫的歷史，我總習慣把那時期的我與這些人做比較，越發不明白，自己當時怎麼就那麼不開竅。北島、克平他們在西單民主牆，在美術館外搞革命時，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畫石膏的興奮中。現在想來，不可思議的是，我那時只是一個行為上關注新事件的人；從北大三角地、西單民主牆、北海公園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宮的四月影會、到高行健的人藝小劇場，我都親歷過，但只是一個觀看者。「四五」運動，別人在天安門廣場抄詩、宣講，我卻在人堆裏畫速寫，我以為這是藝術家應該做的事。比如黃鎮 (注：老紅軍，長征途中畫了大量寫生，成為中國革命史料珍貴文獻，曾任中國駐法大使、文化部長。) 參加長征，我沒覺得有甚麼特別，可他在長征途中畫了大量寫生，記錄了事情的過程，我就覺得這人了不起，他活的比別人多了一個角色。我對這些事件的旁觀身份的「在場」，就像我對待那時美院的講座一樣，每個都不漏掉。

記得有一次我去「觀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詩歌朗誦會。

我擠在討論的人群中，我離被圍堵的「青年領袖」越來越近。由於當時不認識他們，記不清到底是誰了，好像長的有點像黃銳。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論。我尷尬，低頭看自己，原來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務處不知從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綠底白字，景泰藍磨製，在那時真是一件稀罕的寶物。我們在校內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門就摘掉。我意識到那天出門時忘了摘，我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裏在談甚麼。

這個對視的瞬間，可以說是那時兩類學畫青年——有機會獲得正統訓練的與在野畫家之間的默許。我即得意於自己成為美院的學生，在崇高的畫室裏研習歐洲經典石膏，又羨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領袖。但我也相信，他們一定也會在革命之餘，找來石膏畫一畫，也曾試着獲得學院的機會。應該說這兩條路綫 (覺悟和愚昧) 在當時都具有積極的內容。

現在看來，我走的基本是一條愚昧路綫，這與我的環境有關。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個個都如此。他們還不如我，一定沒有去過民主牆。這是一個北大子弟的圈子，這些孩子老實本份有情可原，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是家裏沒問題的；不是走資派，就是反動學術權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時就「自絕於人民」的，有些人上輩是地主、資本家甚麼的，或者就是有海外關係的特務。所以，我的同學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媽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經病的(在那個年代，家裏老大是姐姐的，成神經病的特別多，真怪了！也許是姐姐懂事早壓力大的原因)。這些同學後來出國的多，我在異國街頭遇到過四個老同學；紐約三個，曼徹斯特一個。這四人中，有兩個是爸爸自殺的，另兩個的大姐至今還在精神病院。(謝天謝地，我家人的神經基因比較健全，挺過來了。)

我們這些家庭有問題的孩子，籠罩在天生給革命事業造成麻煩的愧疚中。家裏是這樣只能認了，偏偏我們的老師也屬這一類。北大附中的老師，不少是反右時差點被劃成右派的年輕教員，犯了錯誤，被貶到附中教書。這些老師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學問，愛思

索，認真較勁兒。聰明加上教訓，使得他們潛意識中，總有要向正確路綫靠攏的警覺與習慣。這一點，很容易被我們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結果是，老師和同學比着看誰更正確。血源的污點誰也沒辦法，能做的就是比別人更努力、更有奉獻精神，以證明自己是個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紅五類」或當時還沒有被打倒的幹部子弟的那種瀟灑，我們之中沒有一個玩世不恭的，這成了我們的性格。

插　隊

七二年鄧小平復職，一小部分人恢復上高中。由於北大附中需要一個會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鄧的路綫是想恢復前北大校長陸平搞的三級火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但沒過多久，說鄧搞復辟，又被打下去。高中畢業時，北大附中、清華附中、一二三中的紅衛兵給團中央寫信，要求與工農劃等號，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此信發在《光明日報》上 (後來才知道這是團中央某人授意的)，形成了最後一個上山下鄉的小高潮。我們選擇了北京最窮的縣、最窮的公社去插隊。由於感激學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時更加倍為學校工作，長期熬夜，身體已經很差了——失眠、頭疼、低燒。只好把戰友們送走了，自己在家養病。半年後似乎沒事了，辦了手續，去找那些同學。我被分到收糧溝村，兩男三女，算是村裏的知青戶。

這地方是塞北山區，很窮。那年村裏沒收成，就把國家給知青的安家費給分了，把豬場的房子給我們住。這房子很舊，到處都是老鼠洞，外面一颳風，土就從洞中吹起來。房子被豬圈包圍着，兩個大鍋燒飯和熬豬食共用。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燒飯後的一點兒炭灰，取出來放在一個泥盆裏。每次取水需要先費力氣在水缸裏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時我出工前還臨一頁《曹全碑》，毛筆和紙會凍在一起。

我是四月份到的，冬天還沒過，這房子冷的沒法住，我和另一個男知青小任搬到孫書記家。他家只有一個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頭，小任挨着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孫、老孫媳婦、大兒子、二兒子、大閨女、二閨女，炕尾是個弱智的啞巴。這地方窮，很少有外面的姑娘願意來這裏；近親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這地方要我看，有點像母系社會，家庭以女性為主軸，一家需要兩個男人來維持，不是為別的，就是因為窮的關係。明面上是共產黨的一夫一妻制，但實際上有些家庭是；一個女人除了一個丈夫外，還有另一個男人。女人管着兩個男勞力的工本，這是公開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給光棍介紹對象，女主人就會在村裏罵上一天：「哪個沒良心的，我死了還有我女兒……」，好心人被罵的實在覺得冤枉，就會出來對罵一陣。如果誰家自留地丟了個瓜甚麼的，也會用這招把偷瓜的找出來。

村裏有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我好長時間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在一個光棍家住了一個冬天，才知道了村裏好多事。收糧溝村雖然窮，但從名字上能看出，總比「沙梁子」「耗眼梁」這些村子還强點兒。收糧溝過去有個地主，土改時被民兵弄到山溝用石頭砸死了，土地、房子和女人就被貧下中農給分了，四個奶奶分給四個光棍。搞不懂的是，這幾個奶奶和貧下中農過得也挺好，很難想像他們曾是地主的老婆。那年頭，電影隊一年才出現一次，可在那禁欲的年代，這山溝裏在性上倒是有些隨意：一個孩子越長越像鄰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親戚。

我後來跟朋友提起這些事，會被追問：「那你們知青呢？」我說：「我們是先進知青點，正常得很。」一般人都不信。現在想想，先進知青點反倒有點不正常，幾個十八九歲的人，在深山，完全像一家人過日子。中間是堂屋，左右兩間用兩個布簾隔開，我和小任在一邊，三個女生在另一邊。有時有人出門或回家探親，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邊的時候。早起，各自從門簾裏出來，共用一盆水洗臉，再商量今天吃甚麼。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但絕無生理上的夫妻關係。

我十八九歲那陣子，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窮山出美女，這村裏最窮的一戶是周家。老周是個二流子。老周媳婦是個謙卑的女人；個子有點高，臉上皺紋比得上皺紋紙，但能看出年輕時是個美女。整天就看周家忙乎，拆牆改院門，因為他家的豬從來就沒養大過，所以家窮。按當地的說法，豬死是院門開得不對。老周的大女兒二勤子是整個公社出了名的美女。我們三個女生中，有一個在縣文工團拉手風琴，她每次回來都說：「整個文工團也沒有一個比得上二勤子的」。二勤子確實好看，要我說，這好看是因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二勤子說話愛笑，又有點憨，從不給人不舒服的感覺，幹活又特麻利，後面拖一根齊腰的辮子，這算是她的一個裝飾。一年四季，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杏黃底帶碎花，天熱了，把裏面棉花取出來，就成了一件夾衣，內外衣一體。天冷了，再把棉花放回去。

二勤子家正對學校小操場。有一次有點晚了，我斜穿小操場回住處，有人在陰影處叫我「小徐」，村裏人都這麼稱呼。我一看，是二勤子坐在她家院門圍欄上，光着上身，兩個乳房有點明顯。我不知所措，隨口應了聲：「哎，二勤子」，保持合適的速度，從小操場穿了過去。第二天，二勤子見到我說：「我昨晚上把衣服給拆洗了，天暖了。」每逢這時節，她在等衣服晾乾時，家裏也有人，她在哪兒呆着都不方便。

後來知青紛紛回城了。一天二勤子來找我，說：「小徐，你幫我做一件事行不？你常去公社，下次去你能不能幫我把辮子拿到公社給賣了？我跟我爹說好了，我想把辮子剪了。」我說：「剪了可惜了。」她說：「我想剪了。」我說：「你怎麼不讓你哥幫你。」她說：「我不信他，我信你。」幾天後，她就拿來一條又黑又粗的辮子，打開來給我看。我第二天正好要去公社辦刊物，書包裏裝着大辮子，沉甸甸的，頭髮原來是一種很重的東西。我忘了這條辮子賣了多少錢，總之我把錢用包辮子的紙包好、帶回村交給她。這點錢對她太重要了，是她唯一的個人副業。

男知青幹一天記十分工，屬壯勞力，幹活兒一定要跟上隊長，因為隊長也記十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糧錢掙出來。我最怕的活兒，是蹲在地裏薅箍子，等於是讓你蹲着走一天，真是鐵鉗火燒般的「鍛煉」。農村的日子確實艱苦，但當時一點不覺得，就是奔這個來的。

我當時做得更過份，和別人比兩樣東西；一是看誰不抽菸，因為去之前都發誓：到農村不抽菸。最後，全公社一百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個在插隊期間一口菸都沒抽過。二是看誰回家探親間隔的時間長。我都是等着有全國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經常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知青點，我有點滿足這種對自己的約束力。只剩下我自己時，就不怎麼做飯，把糧食拿到誰家去搭個夥。豬場在村口，從自留地過往的人，給我兩片生菜葉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趕着羊群經過，照樣是呼啦啦的一陣塵土飛揚，我從中竟聞到濃烈的羊膻味兒，香的很！看來是饞得够嗆了。我有時會找點辣椒放在嘴裏，由於刺激分泌出口水來，挺過癮的，這張嘴也是需要刺激的。

那一帶的村子都藏在山窩裏，據說當年日本人經過都沒發現，可這裏有些話和日語是一樣的。後來我學過一陣日語，日語管車叫“Guluma”，收糧溝人也叫“Guluma”(軲轆馬)，這類字還不少。我估摸是唐代的用法，傳到日本，漢語後來變化了，而山裏人不知道。這裏的大姓是「郤」(que)，字典裏標音為 xi，注為古姓。

這裏偏僻，古風遺存。我第一次看到「黃金萬兩」，「招財進寶」寫成一個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著作中，而是在書記家的櫃子上，當時被震驚的程度，可不是能從書本上得到的。遇上紅白喜事，老鄉們的另一面——「觀念」的部分，就會表現出來。辦喪事，他們會用紙扎糊各種各樣的東西來，完全是民間版的「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紙樣，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帆。後來他們知道我會書法，又有墨汁，就讓我來做。後來研究文字才知道，這叫「鬼畫符」，是一種能與陰間溝通的文字。我在村裏的重要性主要顯示在；每當有人結婚，總是請我去佈置洞房，不

是因為我那時就會做裝置，而是因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傳統說法叫「全人」。這種人鋪被子，將來生的孩子多，男女雙全。我在收糧溝接觸到這些被歸為「民俗學」的東西，有一股鬼氣，附着在我身上，影響着日後的創作。

下面再說點和藝術有關的事。可以說，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藝術「理論」學習和藝術理想的建立，是在收糧溝對面山坡上完成的。山上有一片杏樹，是村裏的一點副業。看杏林容易得罪人，隊裏就把我派去。那年夏天這山坡成了我的天堂。首先，每天連一個杏都不吃——獲得自我克制力的滿足。再者是專心享受自然的變化。我每天帶着畫箱，帶着書上山，可還沒幾天，就沒甚麼書好帶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選》。毛的精彩篇章過去背過，熟到完全感覺不到內容的程度。

可那天在杏樹下，讀《毛選》的感動和收穫，是我讀書經驗中少有的，至今記憶猶新。一段精彩的有關文藝的論述，是從一篇與藝術無關的文章中讀到的：

>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今天重讀，真不明白那天對這段話怎麼那麼有感覺，也許是由於這段話與當時文藝環境的反差。我的激動中混雜着覺悟與憤慨；毛主席把這種關係說得這麼清楚、這麼有道理，現在的美術工作者怎麼搞的嘛！坐在杏樹下，我看幾句，想一會兒，環視群山，第一次感覺到藝術事業的胸襟、崇高和明亮的道理。那天的收穫，被埋

藏在一個業餘畫家的心裏，並佔據了一塊很重要的位置。

北大在郊區，身邊的人與美術圈沒甚麼關係，我很晚才通過母親辦公室同事的介紹，認識了油畫家李宗津先生，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過的、唯一的專業畫家。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園厚牆深窗的老樓，他拿出過去的小幅油畫寫生給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畫魅力。李先生覺得我能看進去，又拿出兩張大些的畫，有一張「北海寫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過的。在他那裏的時間，像是一個沒有文革這回事的、單獨的時空段，它與外面熱鬧的美術創作無關，是秘密的，只在那種古老教堂的地下室，只在牧師與小修士之間才有的。

在農村晚飯後，我常去老鄉家畫頭像。畫好了，把原作拍張照片送給他們。那批頭像有點王式廓的風格，我手邊有一本《王式廓素描選》。他善畫農民肖像。由於範本與所畫對象極為吻合，我的這批畫畫得不錯。只是由於燈光昏暗 (一盞燈掛在兩屋之間)，大部分畫面都比較黑。

每次回京，我帶着畫去看李先生。有一次，他家小屋裏掛着一張巨幅油畫，頂天立地。原來這是他的代表作《飛奪瀘定橋》，從歷史博物館取回來修改。他鼓勵我多畫肖像畫。可那次回村後，上年紀的人都不讓我畫了。後來才知道，我回京這段時間，四爺死了，走前剛畫過他，說是被畫走了。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畫遍了，我後來以畫風景為主。

去李先生那裏加起來不過三次，最後一次去，怎麼敲門也沒人應。後來問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幾天自殺了。原來，他一直帶着右派帽子。過去在中央美院，反右後被貶到電影學院舞美系。文革期間不讓這類人畫畫，最近鬆動些，可以畫畫了，卻又得了癌症。他受不了這種命運的捉弄，把那張代表作修改了一遍就自殺了。那時受蘇聯的影響，流行畫色彩小風景。每次畫我都會想到李先生的那幾幅小油畫；那些逆光的、濕露露的石階，我怎麼也畫不出那種感覺。

當時有個說法「知識青年需要農村，農村需要知識青年。」如

何發揮知識的作用，是需要動用智慧和知識的。知青中，有的早起去各家收糞便，做沼氣實驗；有的翻書，研製科學飼料。這很像報紙上先進知青的事迹，難怪，後來我們也成了先進知青。

我能幹的就是出黑板報。村裏上工集合處，有一塊泥抹的小黑板，黑色退的差不多沒了，我原先以為是山牆上補的塊牆皮呢。有一天我心血來潮，用墨刷了一遍，隨便找了篇東西抄上去，重點是顯示我的美工才能。完成後，煞是光彩奪目 (當時還沒搶眼球的說法)，從老遠的山上，就能看見這鮮亮的黑方塊，周邊更顯貧瘠蒼涼。後來，收糧溝一個知青出的黑板報，被人們「傳頌」了好一陣。有一次我買糧回來，就聽說：「北京有人來看咱村的黑板報了，說知青文藝宣傳搞得好。」我後來跟公社的人打聽，才知道來者是劉春華，他畫了《毛主席去安源》，是當時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長或副局長。

後來，黑板報發展成了一本叫《爛漫山花》的油印刊物。這本刊物是我們發動當地農民和知青搞文藝創作的結晶。我的角色還是美工，兼刻臘紙，文字內容沒我的事，同學中筆桿子多的很。我的全部興趣就在於「字體」——《人民日報》、《文匯報》這類大報的字體動向；社論與文藝版字體、字號的區別。我當時就有個野心，有朝一日，編一本《中國美術字彙編》。實際上，中國的字體使用，是有很强的政治含意的，文革期間更是如此。可我當時並沒有這種認識，完全是做形式分類——宋體、老宋、仿宋、黑宋、扁宋、斜宋的收筆處是否挑起，還有挑起的角度、筆劃疏密的安排，橫豎粗細的比例。我當時的目標是用臘紙刻印技術，達到《解放軍文藝》的水平。在一個小山溝裏，幾個年輕人，一手伸進褲襠揑虱子，一手刻臘紙，抄寫那些高度形式主義的豪邁篇章。《爛漫山花》前後出過八期。創刊號一出來，就被送到「全國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覽」中。現在，這本刊物，被視為我早期的作品，在西方美術館中展出。不是因為「批林批孔」的成果，而是作為臘紙刻印技術的精美製作。

一個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段真正全神貫注的時期。我的這一時期被提前用掉了，用在這不問內容只管傾心製作的油印刊物上了。

後來我做了不少與文字有關的作品，有些人驚訝：「徐冰的書法功底這麼好！」其實不然，只不過我對漢字的肩架結構有很多經驗，那是文革練出來的。

美　院

說實話，當時我非要去插隊，除了覺得投身到廣闊天地挺浪漫，還有個私念，就是作為知青，將來上美院的可能性比留在城裏街道工廠更大。上中央美院是我從小的夢想。

由於《爛漫山花》，縣文化館知道有個知青畫得不錯，就把我調去搞工農兵美術創作，這是我第一次和當時流行的創作群體沾邊。我創作了一幅北京幾個紅衛兵去西藏的畫，後來發在《北京日報》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作品。

正是由於這幅畫，上美院的一波三折開始了。為準備當年的全國美展，這幅畫成了需要提高的重點。那時提倡專業與業餘創作相結合，我被調到中國美術館與專業作者一起改畫。有一天在上廁所的路上，聽人說到「美院招生」四個字，我一下子膽子變得大起來，走上前對那人說：「我能上美院嗎？我是先進知青，我在這裏改畫。」 意思是我已經畫的不錯了。此人是美院的吳小昌老師。他和我聊了幾句，說：「徐冰，你還年輕，先好好在農村勞動。」我很失望，轉念一想，他怎麼知道我叫徐冰，一定是美展辦已經介紹了我的情況。當時幾所重點藝術院校都屬「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江青是校長。招生是學校先做各方調查，看哪兒有表現好又畫的好的年輕人，再把名額分下去。從廁所回來的路上我就有預感：為了招我，美院肯定會把一個名額分到延慶縣來招我。

那年招生開始了，北大、清華、醫學院、外院的老師都到延慶招生，找我談過話。我母親打來電話叮囑我，不管甚麼學校都要

上，我卻沒聽，一心等着美院來招我。我知道，如果學別的專業，這輩子當畫家的理想就徹底破滅了。招生結束，別人都有了着落，而美院的人遲遲未到，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一天，在路邊草篷裏避雨，有幾個北京人說招生的事，我心裏一激動，美院終於來了！細問才知道是電影學院招攝影專業的。看來美院是沒戲了，學攝影多少沾點邊，我把畫給他們看，他們當場就定了，我的材料被送到縣招辦。正準備去電影學院，美院的人終於來了，雙方磋商，還是把我讓給了美院。後來北影孟老師對我說：「你已經畫得很好了，電影學院不需要畫得這麼好。」後來同隊的小任頂了這個空缺，他後來成了國家第一御用攝影師，從鄧、趙、胡、江、胡以來的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活動，都是由他掌機拍攝。

好事多磨。由於山洪郵路斷了，等我收到美院通知書，考試日期已過了好幾天。收到通知書時我正在地裏幹活，連住處都沒回，放下鋤頭就往北京的方向走。走到出了山，搭上工宣隊的車，直奔美院。我身穿紅色跨欄背心，手握草帽，一副典型的知青形象。主管招生的軍代表說：「還以為你們公社把你留下當中學美術老師了。考試都結束了，怎麼辦？你自己考吧。」他讓我先寫篇文章，我又累又急，哪兒還寫得了文章？我說：「我先考創作吧，晚上回家我把文章寫出來，明天帶來。」他同意了。我自己關在一間教室「考試」，旁邊教室老師們關於錄取誰的討論，都能聽見。當時《毛選》五卷剛出版，我畫了一個坐在坑頭讀《毛選》的知青，邊上有盞小油燈，題目叫「心裏明」之類的。晚上回到家實在太累了，我給筆桿子同學小陳打了電話，請他幫我寫篇文章，明天早晨就要。老同學够意思，第二天一早，一篇整齊的稿子交到我手裏。那天又在戶外畫了張色彩寫生，考試就算結束了。和軍代表告別時，我請求看一下其他考生的畫。他把我帶到一間教室，每位考生一個牆面，一看我心裏就踏實了。我畫的那些王式廓風格的農民頭像，外加幾本《爛漫山花》，份量擺在那兒，我相信美院老師是懂行的。

我又回到收糧溝——這個古樸的、有泥土味的、浸透民間智慧與詼諧的地方、這個適合我生理節奏的生活之地。最後再「享受」一下辛苦，因為我知道我要走了，我開始珍惜在村裏的每一天。半年過去了，仍未收到錄取通知書。在此期間，中國發生了很多大事。文革結束了，高考恢復了。我私自去美院查看是怎麼回事。校園有不少大字報，其中有一張是在校工農兵學員寫的，是拒收這批新學員而重新招生的呼籲。我心裏又涼了。

沒過幾天，錄取通知書卻來了，我終於成了中央美院的學生，我將成為一名專業畫家。我迅速地收拾好東西，扛着一大堆行李，力大無比。村裏一大幫人送我到公路上。走前五爺專門找到我，說了好幾遍：「小徐，你在咱村裏是秀才，到那大地方，就有高人了，山外有山。」這太像俗套文學或電視劇的語言了，但我聽得眼淚都快出來了，心想，我真的可以走了，收糧溝人已經把我當村裏人了。

美院師生經過激烈爭論，還是把我們這批人當做七七級新生接收了。我的大學同學與中學同學截然不同，過去個個家裏都有問題，現在的同學「根正苗紅」，我像是成功混入革命隊伍的人。這些同學樸實平淡，人都不錯，我們和諧向上。

當時是入學後才分專業。我填寫志願書，堅決要求學油畫，不學版畫和國畫。理由是：國畫不國際，版畫大眾不喜歡。其實院裏早就定了，我被分到版畫系。事實上，中國版畫在藝術領域裏是很强的。那時幾位老先生還在世，李樺先生教我們木刻技法，上課時他常坐在我對面，我刻一刀他點一下頭，這種感覺現在想起來也是一種幸福。好像有氣場，把兩代人的節奏給接上了。

中國社會正萬物復蘇，而我把自己關在畫室，在徐悲鴻學生的親自指導下畫歐洲石膏像，我已相當滿足了。我比別人用功得多，對着石膏像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新陳代謝似乎全停止了。別人都說我刻苦，但我覺得坐在畫室比起蹲在地裏薅箍子，根本不存在辛苦這回事。

美院一年級第二學期，最後一段素描課是長期作業，畫大衛。美院恢復畫西方石膏像和人體模特，是新時期藝術教育標誌性的事件。畫大衛對每個學生來說也是「標誌性」的。兩周的課結束了，接着是放寒假。我那個假期沒回家，請過去學畫的朋友過來一起畫，也算是分享美院畫室和往日情誼。

我寒假繼續畫同一張作業，是出於一個「學術」的考慮；我們講寫實，但在美院畫了一陣子後，我發現很少有人真正達到了寫「實」。即使是長期作業，結果呈現的不是被描繪的那個對象，而是這張紙本身。目標是完成的只是一張能够體現最帥的排綫法和「分塊面」技術的畫面，早就忘了這張畫的目的。我決定，把這張大衛無休止地畫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甚麼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對象，而不只是筆觸。一個寒假下來，我看到了一個從紙上凸顯出來的真實的大衛石膏像，額前那組著名的頭髮觸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伸出新的「技術」問題——石膏結構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與這些老石膏表面髒的顏色之間關係的處理。(這些石膏自徐悲鴻從法國帶回來，被各院校多次的翻製，看上去已經不是石膏了，表面的質感比真人還要豐富和微妙。) 我在鉛筆和紙僅有的關係之間，解決每一步遇到的問題，一毫米一毫米往前走。

快開學了，靳尚誼先生來察看教室，看到這張大衛，看了好長時間，一句話都沒說走了，弄的我有點緊張。不久，美院傳出這樣的說法，靳先生說：「徐冰這張大衛是美院建院以來畫的最好的」。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後來中國寫實技術提高很快，大衛像有畫得更好的。

這張作業解決的問題，頂得上我過去畫的幾百張素描。素描訓練不是讓你學會畫像一個東西，而是通過這種訓練，讓你從一個粗糙的人變為一個精緻的人，一個訓練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體與局部的關係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一根鉛筆、一張紙，只是一種便捷的方式，而絕不是獲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齊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兩隻辣椒看得那麼有意思，這和他幾十年

的木工活是分不開的，這是他的「素描」訓練。

我後來與世界各地不少美術館合作，他們都把我視為一個挑剔的完美主義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與設計之間一厘米的誤差，出現這種情況是一定要重來的，這和畫素描在分寸間的計較是一樣的。

大衛的事情之後，學校開始考慮應該讓徐冰轉到油畫系去，他造型的深入能力不畫油畫浪費了。可當教務處長向我暗示時，我竟然沒聽懂其用意，我說：「在版畫系這個班，大家一起畫畫挺好，就這樣吧。」既然我的專業思想已經穩定，他也就不再提起了。現在看來，沒轉成專業是我的命，否則我也許是楊飛雲第二。

老美院在王府井，我不喜歡那兒的喧鬧，去百貨大樓轉一圈，我就頭痛。當時除了「素描問題」的寄托外，情感依然留在收糧溝。不知道怎麼回事，特別想那地方，每當想到村邊那條土路、那個磨盤、那些草垛，心都會跳。這種對收糧溝的依戀，完全應該用在某個女孩子身上。我確實很晚才有第一個女朋友，有一次老師在講評創作時說：「徐冰對農村的感情就是一種愛情，很好。」

我那時最有感覺的藝術家，是法國的米勒和中國的古元；都和農民有關。看他們的畫，就像對某種土特產上了癮一樣。古元木刻中的農民簡直就是收糧溝的老鄉，透着骨子裏的中國人的感覺。王式廓的農民「畫」的好，但比起古元的，他的農民有點像在話劇中的。我那時就對藝術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認命的態度。有一種東西是誰都沒有辦法的，就像郭蘭英的嗓音中，有那麼一種山西大姐的醋味，怎麼能學呢。而她成為一代大師，只是因為比別人多了這麼一點點。

這種對農村的「痴情」，也反映在我那時的木刻中。從第一次「木刻技法」課後，我刻了有一百多張掌心大小的木刻，我試圖把所見過的中外木刻刀法都試一遍。沒想到這些小品練習，成了我最早對藝術圈有影響的東西。這些小畫平易真摯，現在有時回去翻看，會被自己當時那種單純所感動 (世事讓人變得不單純了，就搞現

代藝術唄。) 當時大家喜歡這些小畫，也許是因為經過文革，太需要找回一點真實的情感。這些小畫與「傷痕美術」不同，它們不控訴，而是珍惜過去了的生活中留下的，那些平淡美好的東西。這些小畫給藝術圈的第一印象如此之深，致使後來不少人大惑不解，他怎麼會搞出《天書》來？一個本來很有希望的年輕人，誤入歧途，可惜了。

古元追隨毛《講話》的文藝思想，我效仿古元，而「星星」的王克平已經在研究法國荒誕派的手法了，差哪兒去了。克平出手就相當高，把美院的人給震傻了。美院請他們幾位來座談。那時，他們是異數的，而我們是複數的；和大多數是一樣的。我和「我們」確實是相當愚昧的，但愚昧的經驗值得注意，這是所有中國大陸人的共同經驗。多數人的經驗更具有普遍性和闡釋性，是必須面對的，否則我們就甚麼都沒有了。

毛澤東的方法和文化，把整個民族帶進一個史無前例的試驗中，代價是巨大的，導致了一場災難。每個人都成為試驗的一個分子，這篇文字講的、就是試驗中一個分子的故事。發生過的都發生了，我們被折磨後就跑得遠遠的，或回頭調侃一番，都於事無補。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東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層讓人反感甚至憎惡的東西，但必須穿過這層「憎惡」，找到一點有價值的內容。這就像對待看上去庸俗的美國文化，身負崇高藝術理想的人，必須忍受這種惡俗，穿透它，才能摸到這個文化中有價值的部分。除個別先知先覺者外，我們這代人思維的來源與方法的核心，是那個年代的。從環境中，從父母和周圍的人在這個環境中接人待物的分寸中，從毛的思想方法中，我們獲得了變異又不失精髓的、傳統智慧的方法，並成為我們的世界觀和性格的一部分。這東西深藏且頑固，以至於後來的任何理論都要讓它三分。八十年代，大量西方理論的湧入、討論、理解、吸收，對我來說，又只是一輪形式上的「在場」。思維中已被佔領的部分，很難再被別的甚麼東西擠走。在紐約有人問我：「你來自於這麼保守的國家，怎麼搞這麼前衛的東西？」(大部分時間他們弄不懂你

思維的來路) 我說：「你們是波易斯教出來的，我是毛澤東教出來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寫這篇文字時，我正在肯尼亞山實施我的《木、林、森》計劃。這個計劃，是一個將錢從富裕地區自動流到貧困地區；為種樹之用的、自循環系統的試驗。它的可能性根據在於：一、利用當今網絡科技的拍賣、購物、轉賬、空中教學等系統的免費功能，達到最低成本消耗 (請上www.forestproject.net)；二、所有與此項目運轉有關的部分都獲得利益；三、地區之間的經濟落差 (兩美元在紐約只是一張地鐵票，而在肯尼亞可種出十棵樹)。這個項目最能說明我今天在做甚麼，以及它們與我成長背景的關係。我的創作越來越不像標準的藝術，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創造性的，想法是準確、結實的，對人的思維是有啓發的，再加上一條：對社會是有益的。我知道，在我的創作中，社會主義背景藝術家的基因，無法掩飾地總要暴露出來。隨着年齡增大，沒有精力再去掩飾屬於你的真實的部分。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歡，也沒有辦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

我坐在非常殖民風格的花園旅館裏，但我的眼光卻和其他旅遊者不同，因為我與比肯尼亞人還窮的人群一起擔心過、生活過。這使我對納盧比街頭像垃圾場般的日用品市場，馬賽義人中世紀般的牧羊生活景象，不那麼好奇和敏感，從而，使我可以越過這些絕好的藝術和繪畫效果圖景的誘惑，抓到與人群生存更有關係的部分。

從這個邏輯講，可以說，這個《木．林．森》計劃的理論和技術準備，從七十年代就開始了。

我說：藝術是宿命的，就是誠實的，所以它是值錢的。

2008年7月於肯尼亞納盧比

斷　章

·北島·

一九四九年生於北京，做過建築工人、編輯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於七八年在北京創辦文學雜誌《今天》，一直擔任主編至今。自八七年起，在歐美多所大學教書或任駐校作家，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講座教授。其作品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獲得多種國際文學獎及榮譽。近年出版的中文書包括詩集《零度以上的風景》、《開鎖》和散文隨筆集《藍房子》、《午夜之門》、《時間的玫瑰》和《青燈》等。

一

一九七〇年春，我從河北蔚縣工地回北京休假，與同班同學曹一凡、史康成相約去頤和園。那年春天來得早，陽光四溢，連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們並肩騎車，攔住馬路，三十二路公共汽車鳴長笛，轟然駛過，揚起一陣煙塵。

曹一凡是同學也是鄰居。在「上山下鄉運動」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謂「老泡」，指的是泡病號留在城裏的人，為數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擋各種壓力的堅韌神經外，還得深諳病理知識及造假技術。幸好有他們留守，幾個月後我隨工地遷到北京遠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讀書寫作聽音樂，被鄰居龐家大嫂稱為「三劍客」。

北京近乎空城，頤和園更是人煙稀少。進正門，穿樂壽堂，玉蘭花含苞欲放，木牌寫着「折花者罰款五十元」。在排雲殿碼頭租船，繞過石舫，向後湖劃去。一路説笑。後湖更靜，唱俄羅斯民歌，召來陣陣回聲。我們收起槳，讓船漂蕩。

史康成站在船頭，挺胸昂首朗誦：「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太陽就是舵手/請

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停頓片刻，他繼續下去：「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餘煙嘆息着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我為之一動，問作者是誰。郭路生，史康成説。朗讀賀敬之和郭小川的詩，除琅琅上口，跟我們沒甚麼關係，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愛是因為革命加聲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聲音了。在工地幹活吼一嗓子：「人應該這樣生，路應該這樣行——」，師傅們議論：這幫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給急的。而郭路生的詩如輕撥琴弦，一下觸動了某根神經。

退船上岸，來到諧趣園，一個中年男人坐在遊廊吹口琴，如醉如痴，專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剛才的詩句。郭路生是誰？我問。

不知道，聽説在山西杏花村插隊，史康成聳聳肩説。

原來是我們中的一個，真不可思議。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從那充滿詩意的春日開始的。當時幾乎人人寫舊體詩，陳詞濫調，而郭路生的詩別開生面，為我的生活打開一扇意外的窗戶。

二

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某日中午，差五分十二點，我照例趕到食堂內的廣播站，劈啪打開各種開關，先奏《東方紅》。唱片播放次數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鑼也有殘破之音。接近尾聲，我調低樂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區東方紅煉油廠工地廣播站現在開始播音。揑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圓，參照的是中央台新聞聯播的標準。讀罷社論，再讀工地通訊員報道，滿篇錯別字，語速時快時慢，像錄音機快進或丟轉，好在沒人細聽，眾生喧嘩——現在是午餐時間。十二點二十五分，另一播音員「阿驢」來接班。廣播一點鐘在《國際歌》聲中結束。

在食堂窗口買好飯菜，我來到大幕後的舞台，這是工地知青午

餐的去處。說是與工人師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幾十號人睡大通鋪，「同吃」就難了，除了話題，還有飯菜差異：知青工資低，可都是單身漢，專點兩毛以上的甲級菜；而師傅拉家帶口，只買五分一毛的丙級菜。

頭天晚上，在食堂召開全體職工大會，就在這大幕前，由書記傳達中央文件。傳達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領導秘密碰頭，跟政治局開會差不多；下一撥是黨員幹部，出門個個黑着臉；最後輪到我們工人階級，等於向全世界宣佈：九月十三日，林副統帥乘飛機逃往蘇聯途中摔死了。

說到政治學習，「雷打不動」，從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組為單位。幹了一天活，先搶佔有利地形，打盹養神捲「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論，還甚麼都學，從《水滸》到《反杜林論》，這可難為大字不識的老師傅。而知青們來了精神，讀了報紙讀文件。那些專有名詞在煙霧中沉浮。孟慶君師傅啐了唾沫開罵：杜林這小子真他媽不是東西，膽敢反對毛主席，先斃了再說。班長劉和榮一聽樂了：小孟，學了半天你都沒鬧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國當教授，連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諢，政治學習成了娛樂。副班長周增爾 (外號「比鷄多耳」) 乾咳一聲，宣佈散會。政治學習至少有一條好處：普及了國際地理知識——前天地拉那，昨天金邊，如今又是哪兒？對了，溫都爾汗。

我端飯盆來到幕後，席地而坐。林副統帥的幽靈引導午餐話題，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綫等假設。我開口說話，單蹦的詞彙成語流，滔滔不絕，一發不可收拾。我說到革命與權力的悖論，說到馬克思的「懷疑一切」，說到我們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勝用胳膊肘捅我，這才看到眾人眼中的惶惑，他們紛紛起身告辭。轉眼間後台空了，就剩下我倆。安智勝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組幹活，志趣相投，都長着反骨。那年頭，友情往往取決於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們默默穿過大幕，下階梯，到水池邊涮碗。

回工棚取鐵鍬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達的激動中，再次

被文革中反復出現的主題所困擾：中國向何處去？我們以往讀書爭論，有過懷疑有過動搖，但從未有過這種危機感——如臨深淵，無路可退。徹夜未眠，如大夢初醒——中國向何處去？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向何處去？

阿開 (我在工地的外號)，安智勝打破沉默說。你得多個心眼兒。別那麼實誠，剛才那番話要是有人彙報，就完蛋了。

我試圖回想剛才說過的話，卻無法集中思想。時代，一個多麼重的詞，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可我們曾在這時代的巔峰。一種被遺棄的感覺——我們突然成了時代的孤兒。就在那一刻，我聽見來自內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三

一九七三年一個春夜，我和史保嘉來到永定門火車站，同行的有原清華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莊，探望在那兒插隊的趙京興和陶洛誦。趙京興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學，低我一級；陶洛誦是史保嘉師大女附中的同學。一九六九年，趙京興因寫哲學書稿被打成「反革命」，與女友陶洛誦一起鋃鐺入獄，半年前先後獲釋。

為籌措路費，我把手錶送委托行賣了——好像我們去時間以外旅行。等車時，在一家小飯館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詩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聲聲。

我們搭乘的是零點開出的慢車，吱嘎搖晃，幾乎每個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長途車抵安新縣城，與宋海泉分手，再搭漁船，中午到邸莊。那是個百十來戶的小村，四面環水，村北頭一排磚房是知青宿舍，他們住盡頭兩間，門前有塊自留地，種瓜種豆。

陶洛誦尖叫着，和保嘉又摟又抱。趙京興矜持笑着，眼睛眯縫，在黑框眼鏡後閃光。從老鄉那兒買來豬肉鷄蛋，一起生火做飯，香氣四溢。我們在昏暗的燈光下舉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

悅，劫後的慶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對晦暗時局的擔憂。短波收音機播放外國古典音樂，飄忽不定，夾雜着怪怪的中文福音佈道。在中國北方的水域，四個年輕人，一盞孤燈，從國家到監獄，從哲學到詩歌，一直聊到破曉時分。

白洋淀的廣闊空間，似乎就是為展示時間的流動——四季更迭，鋪陳特有的顏色。不少北京知青到這兒落戶，尋找自由與安寧。其實白洋淀非避亂世之地。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和同學來搞教育調查，正趕上武鬥，被圍在縣城招待所多日，槍林彈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們硬着頭皮參加武鬥死難者的追悼會。

當年學校組織批判趙京興，流傳着陶洛誦的情書中的一句話：「少女面前站着十八歲的哲學家……」讓我們驚羨不已。趙京興內向，話不多，意志堅定。陶洛誦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潑，口無遮攔，永遠是聚會的中心。在邸莊三天，我們常棹船出游。日落時分，湖水被層層染紅，直到暮色四起，皓月當空。

一天下午，我和趙京興單獨在一起，他隨手翻開《戰爭與和平》第四卷開篇，想聽聽我的看法。那是作者關於戰敗後彼得堡生活的議論，有這樣一段話 (就我記憶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現實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還是老樣子，透過這種生活方式，要費很大的勁才能意識到俄國老百姓處境的危險與困難……」

見我一臉茫然，他說：在托爾斯泰看來，歷史不僅僅是關於王公貴族的記載。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歷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說的也是中國當下的歷史嗎？我問。

歷史和權力意志有關，在歷史書寫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誇大了。又有誰真正關心過平民百姓呢？看看我們周圍的農民吧，他們生老病死，都與文字的歷史無關。他說。

離開邸莊，我們到大淀頭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學當體育老師。進村跟孩子一打聽，全都認識，前簇後擁把我們帶到小學

校。芒克剛跟學生打完籃球，汗津津的，把我們帶到他的住處。小屋低矮昏暗，但乾淨利索，炕邊小桌上放着硬皮筆記本，那是他的詩稿。

芒克解纜搖櫓，身輕如燕，背後是搖蕩的天空。剛解凍不久，風中略帶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帶進詩歌：「那冷酷而偉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着我們生活的荒涼。」一九七三年是芒克詩歌的高峰期。他為自己二十三歲生日寫下獻辭：「年輕、漂亮、會思想。」

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下旬某個清晨，我寫完中篇小說《波動》最後一句，長舒了口氣。隔壁師傅們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噹敲着飯盆去食堂。我拉開暗室窗簾，一縷稀薄的陽光漏進來，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個多月前，工地宣傳組孟幹事找我，要我脱產為工地搞攝影宣傳展，我不動聲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為構思中的中篇小說發愁。首先是幾十號人睡通鋪，等大家入睡才開始讀書寫作，打開自製台燈——泡沫磚燈座，草帽燈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為了多掙幾塊錢，師傅們特別喜歡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賊死，把讀書寫作的精力都耗盡了。

說來這還是我那「愛好者」牌捷克相機帶來的好運：給師傅們拍全家福標準像遺照，外加免費洗照片，名聲在外。我一邊跟孟幹事討價還價，一邊盤算小說佈局：首先嘛，要專門建一間暗室，用黑紅雙層布料做窗簾，從門內安插銷——道理很簡單，膠片相紙極度敏感，有人誤入，革命成果將毀於一旦。孟幹事連連點頭稱是。

暗室建成了，與一排集體宿舍的木板房毗鄰，兩米見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獨門獨戶。搬進去，拉上窗簾，倒插門，環顧左右。我掐掐大腿，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國的國王。

由於整天拉着窗簾，無晝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關

在暗室裏。在稿紙周圍，是我設計並請師傅製作的放大機，以及盛各種藥液的盆盆罐罐，我從黑暗中沖洗照片也沖洗小說，像煉金術士。工地頭頭腦腦視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當開門，他們對現代技術嘖嘖稱奇。我再拍標準照「賄賂」他們，用布紋紙修版外加虛光輪廓，個個光鮮得像蘋果鴨梨，樂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華，那幾天在附近幹活，常來串門。他知道我正寫小說，我索性把部分章節給他看。他不僅跟上我寫作的速度，還出謀劃策，甚至干預原創。他認為女主人公蕭凌的名字不好，有消蝕靈魂的意思，必須更換。

這暗室好像是專為《波動》設計的，有着舞台佈景的封閉結構、多聲部的獨白形式和晦暗的敍述語調。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憊不堪，卻處於高度亢奮狀態。

把手稿裝訂成冊，首先想到的是趙一凡。自一九七一年相識起，我們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傷殘癱瘓，而那大腦袋裝滿奇思異想。他和家人同住大雜院，在後院角落，他另有一間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書桌旁坐定，從書包掏出手稿。一凡驚異地揚起眉毛，用尖細的嗓音問：完成了？我點點頭。他用兩隻大手翻着稿紙，翻到最後一頁，抬起頭，滿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這兒。見我面有難色，他接着說，你知道，我的公開身份是街道團支部書記，這裏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麼都不踏實，特別是他那過於自信的口氣，更讓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趕到他家，藉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視我，大腦門上沁出汗珠，攤開雙手，無奈地嘆了口氣。

五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剛下過一場雪，道路泥濘。我騎車沿朝內大街往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大樓東側南拐，到前拐棒胡同十一

號下車。前院坑窪處，自行車擋底板照例哐啷一響。穿過一條長夾道，來到僻靜後院，驀然抬頭，門上交叉貼着封條，上有北京公安局紅色公章。突然間冒出四五個居委會老頭老太太，圍住我，如章魚般抓住自行車。他們盤問我的姓名和單位，和趙一凡的關係。我信口胡編，趁他們稍一鬆懈，突破重圍，翻身跳上自行車跑了。

回家驚魂未定。人遇危難，總是先抱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裏反倒踏實了。讓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蘇製翻拍機 (必是當時最先進的複製技術)，如果《波動》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裏，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關上十年八年。我仔細計算翻拍所需的時間：手稿在他家放了兩夜，按其過人精力及操作技術，應綽綽有餘。但心存僥幸的是，既然手稿歸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傳組解除我「首席攝影師」職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組監督勞動。攝影宣傳展無疾而終。孟幹事宣佈決定時，低頭看自己的指甲，一絲冷笑，似乎總算解開暗室之謎。

我灰頭土臉，捲鋪蓋搬回鐵工班宿舍。陳泉問我出甚麼事了。他是來自農村的扳金工，是我的鐵哥兒們。可很難說清來龍去脈。陳泉嘆了口氣說：我知道你好這個——讀呀寫呀，可這都啥年頭啦？別往槍口上撞。我嫌煩，往外揮揮手，他哼着黃色小調走出門。

我每天繼續打鐵。在鐵砧上，閻師傅的小錘叮噹指引，而我的十四磅大錘忽快忽慢，落點不準。他心裏準在納悶，但不聞不問。保衛組的人整天在鐵工班轉悠，跟師傅搭話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於轉移書信手稿，跟朋友告別，做好入獄準備。我去找彭剛，他是地下先鋒畫家，家住北京火車站附近。聽說我的處境，二話沒說，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塊錢，到新僑飯店西餐廳，為我臨別壯行。他小我六七歲，已有兩次被關押的經驗。席間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對付審訊。皮肉之苦不算甚麼，他說，關鍵一條，絕對不能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新僑飯店門口分手，風乍

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嘆了口氣，黯然走開。

那年我二十六歲，頭一次知道恐懼的滋味：它無所不在，淺則觸及肌膚——不寒而慄；深可進入骨髓——隱隱作痛。那是沒有盡頭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頭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結局的到來，無論好壞。夜裏輾轉反側，即使入睡，也會被經過的汽車驚醒，傾聽是否停在樓下。車燈反光在天花板旋轉，悄然消失，而我眼睜睜到天亮。

幾個月後，危險似乎過去了。危險意識是動物本能，不可言傳，但畢竟有迹可尋：保衛組的人出現頻率少了，見面偶爾也打招呼；政局有鬆動迹象：電影院上映羅馬尼亞電影；女孩們穿戴發生微妙變化，從制服領口露出鮮艷的內衣。

我決定動手修改《波動》。首先是對初稿不滿，不甘心處於未完成狀態。再說受過驚嚇，膽兒反倒大起來。在家寫作，父母跟着擔驚受怕，嘮叨個沒完。我跟黃鋭訴苦，他說他大妹黃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間空房。

我走後門開了一周病假，扛着折疊床，乘長途車來到遠郊的昌平縣城。黃昏時分，按地址找到一個大雜院，跟門口的男孩打聽。他剛好認識黃玲，為我領路，穿過晾曬衣服被單的迷宮，直抵深處。黃玲和新婚的丈夫剛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飯。隔幾戶人家，他們另有一間小屋，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紙箱。支好折疊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遠，總算找到「世外桃源」。

沒有窗簾，很早就被陽光吵醒。在桌上攤開稿紙，我翻開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電影劇本《卡薩布蘭卡》。這本小書借來多日，愛不釋手，對我的修改極有參考價值，特別是對話，那是小說中最難的部分。

我剛寫下一行，有人敲門，幾個居委會模樣的人隔窗張望。我把稿紙和書倒扣過來，開門，用肩膀擋住他們的視綫。領頭的中年女人乾巴巴說：「我們來查衛生。」無奈，只好讓開。她們在屋裏轉了一圈，東摸摸西動動，最後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紙上。那女人

問我來這兒幹甚麼，答曰養病，順便讀讀書。她撫摸稿紙一角，猶豫片刻，還是沒翻過來。問不出所以然，她們只好悻悻走了。

剛要寫第二行，昨晚領路的男孩輕敲玻璃窗。他進屋神色慌張，悄悄告訴我：剛才，我聽她們說，說你一定在寫黃色小說。他們正去派出所報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動，摸摸他的頭說：我是來養病的，沒事兒。還得謝謝你了，你真好！他臉紅了。給黃玲留下字條。五分鐘後，我扛着折疊床穿過院子，倉皇逃竄。

六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死訊投下巨大的陰影，小道消息滿天飛，從報上排名順序和字裏行間，人們解讀背後的含義。自三月底起，大小花圈隨人流湧入廣場，置放在紀念碑四周，堆積如山。松牆扎滿白色紙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鐵從始發站蘋果園出發，直奔天安門廣場。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渾身直起雞皮疙瘩。看到那些張貼的詩詞，我一度產生衝動，想把自己的詩也貼出來，卻感到格格不入。

四月四日清明節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動達到高潮。那天上午，我從家乘十四路公共汽車到六部口，隨着人流沿長安街一路往東，抵達廣場。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種隱身與匿名的快感，與他人分享溫暖的快感，以集體之名逃避個人選擇的快感。我想起列寧的話：「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在花圈白花的偽裝下，廣場有一種神秘的節日氣氛。我東轉轉西看看。有人站在高處演講，大家鼓掌歡呼，然後共謀一般，掩護他們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飯，又趕回天安門廣場。趁着夜色，人們膽子越來越大。晚九點左右，我轉悠到紀念碑東南角，在層層緊箍的人群中，突然聽到有人高聲朗讀一篇檄文：「……江青扭轉批林批孔運動的大方向，企圖把鬥爭的矛頭對準敬愛的周總理…… 」他讀一句

停頓一下，再由周圍幾個人同聲重複，從裏到外漣漪般擴散出來。公開點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詩詞走得更遠了，讓我激動得發抖，不能自己。在蒼茫暮色中，我堅信，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快要到來了。

四月五日星期一，我上班時心神不寧，下班回家見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態的發展：當天下午，憤怒的人群不僅衝擊人大會堂，還推翻汽車、火燒廣場工人指揮部小樓。當晚，鎮壓的消息，通過各種非官方渠道傳播，據説用棍棒打死無數人，廣場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騎車來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頭緊鎖，卻平靜地説，他是來道別的，把女朋友托付給我們。他決定獨自去天安門廣場靜坐，以示抗議。那等於去找死。可在那關頭，誰也無權勸阻他。他走後，我深感內疚：為甚麼不與他共赴國難？我承認自己內心的怯懦，為此羞慚，但也找到自我辯護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須寫下更多的詩，並盡早完成《波動》的修改。

由於戒嚴，史康成根本無法進入廣場，從死亡綫上回來了，回到人間，回到女朋友和我們身邊。兩個月後，我改好《波動》第二稿。

七

一九七六年八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學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買來厚厚的精裝筆記本和小楷毛筆，回家找出刮鬍刀片。打開筆記本扉頁，在徐金波指導下，我右手握刀片，遲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劃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於傷口不深，僅沁出幾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劃一刀，血湧出來，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筆蘸着血在扉頁上寫下：「珊珊，我親愛的妹妹」，淚水奪眶而出。

大約十天前，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親，她已調回人民銀行總行醫務室上班，父親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

協幹校勞動，當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樹造林，他們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飯後來了個客人，叫姜慧，她嬌小可愛，丈夫是高幹子弟。她寫了一部長篇政治小說，涉及文革中黨內權力鬥爭，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說實話，那小說寫得很粗糙，但話題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傳。

九點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辭。我陪她下樓，到大院門口，看門的張大爺從傳達室出來，說你們家長途電話。姜慧陪我進了傳達室。拿起聽筒，先是刺耳的電流聲，電話接綫員彼此呼叫。原來是湖北襄樊南障縣的長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廠打來的。終於傳來一個小伙子的聲音，姓李，也是人民銀行總行的子弟。他的聲音忽近忽遠，斷斷續續：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裏游泳……失踪了，你們別急，全廠的人都在尋找……你們還是派人來一趟吧……

我緊握聽筒，聽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轟響。傳達室的燈在搖晃。姜慧關切的目光和遙遠的聲音。我不知所措，緊緊抓住她的手囁嚅着，待冷靜下來，示意她先走。

回家臉色蒼白，母親問我出了甚麼事，我搪塞過去。騎車到電報大樓，給父親和弟弟分別打電話。跟父親只說珊珊生病了，讓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話，我說「珊珊被淹了」，避開「死」這個字眼。

再回到家母親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發問：到底出了甚麼事？我說沒事，讓她先睡。我在外屋飯桌前枯坐，腦海一片空白。我們兄妹感情最深，但近來因自身困擾，我很少給她回信。

凌晨三點四十二分，山搖地動，牆上鏡框紛紛落地，傢具嘎嘎作響。從外面傳來房屋倒塌的轟響和呼救聲。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絲快意。鄰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攙扶着母親，和人們一起湧到樓下。大院滿是驚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聽說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帶。

父親和弟弟上午趕回，親朋好友也聞訊而來，相聚在亂哄哄的

大院中。這時收到珊珊的來信，是三天前寫的。她在信中說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別熱，要我們多保重。

大家最後商定，先瞞着母親，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親去襄樊。我和父親一起上樓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駝着背，幾乎是爬行，我緊跟在後，跌跌撞撞，真想與爭吵多年的父親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場。

由於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亂，車廂擁擠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珊珊帶幾個女孩去蠻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庫泄洪，水流湍急，一對小姐妹被捲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渦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帶她游向岸邊，用全身力氣把她托上岸，由於體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捲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屍體。她就這樣獻出自己的生命，年僅二十三歲。

在堆滿冰塊的空房間，我握住她那有顆黑痣的左手，失聲痛哭。第二天火化時，我把她二十歲生日時寫的獻詩放進棺木。我終日如游魂飄蕩，從宿舍到辦公室，從她出沒的小路到出事地點。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拋進河中。

在她的日記本上，我找到她寫下的一行詩：「藍天中一條小路。」是啊，自由與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時時感到輪下的誘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顧父母，還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為了珊珊也為了我自己。我承擔着兩個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盡了，徐金波幫我擠壓傷口，讓更多的血流出來。我在紀念冊的扉頁上寫道：珊珊，我親愛的妹妹，我將追隨你那自由的靈魂，為了人的尊嚴，為了一個值得獻身的目標，我要和你一樣勇敢，決不回頭…… (大意)

八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嚴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

母一起住計委大院，父親是高級工程師，母親是復興醫院護士長。嚴力住在附近，常來常往。我們正抽菸聊天，芒克的母親進屋說，下午四點有重要廣播。

那是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隕石雨，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還能再有甚麼大事？我們不約而同想到了一起，誰也沒點破。

下午四時，從家家戶戶的窗口傳出哀樂，接着是播音員低沉的聲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毛澤東，今日零時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歲……」

我們對視了幾秒鐘，會意一笑，但笑得有點怪，有點變形，好像被一拳打歪——這一時刻讓人猝不及防。芒克順手從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鍋頭」，到廚房取來三個酒盅。斟滿，三人默默乾杯，再斟滿，我們的笑容變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尷尬的瞬間。「這回有戲了，」芒克低聲說。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戶亮了。我騎得很慢，並不急於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機相呼應，哀樂與悼詞在空中迴盪。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熱，有一股燒樹葉的味道。並行騎車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紗，表情麻木，很難猜透他們在想甚麼。

第二天早上，各單位和街道居委會搭建靈堂，組織追悼會，出門必戴黑紗。我正為珊珊服喪，這倒不難。再說我長期泡病號，很少出門，在家重讀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

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天安門舉行官方追悼會，電視台電台現場直播。我們全樓僅我家有一台九吋黑白電視，成了文化中心。午飯後，樓下賀媽媽 (曹一凡的母親) 和李大夫等老鄰居陸續落座，一邊安慰痛不欲生的母親，一邊等着看電視直播。我避開她們，獨自退到窗口，在離電視機最遠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鳥般精確的方位感：我背後正南約五公里是電報大樓，再沿長安街向東約三公里即天安門廣場。

從電視鏡頭看去，天安門廣場一片肅殺，悼念的人們由黑白兩色組成，國家領導人一字排開，表情呆滯，但想必各懷鬼胎。下午三時，由華國鋒主持追悼會。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宣佈：「全體起立，默哀三分鐘……」我母親和老鄰居們慌忙站起來。我遲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來，低下頭。我到底為誰起立默哀？自己也說不清，是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隨過的人，為了獻出自己年輕生命的珊珊，還是為了一個即將逝去的時代？

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下了場少見的大雪，幾乎所有細節都被白色覆蓋了。在三里屯使館區北頭有條小河，叫亮馬河，過了小木橋，是一無名小村，再沿彎曲的小路上坡，拐進一農家小院，西房即陸煥興的家。他是北京汽車廠分廠的技術員。妻子叫申麗靈，歌聲就像她名字一樣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東老家，多年來一直上訪，如今終於有了一綫希望。

地處城鄉之間的兩不管地區 (現稱城鄉結合部)，這裏成了嚴密統治的盲點。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們幾乎每周都來這裏聚會，喝酒唱歌，談天說地。每個月底，大家紛紛趕來換「月票」，陸煥興是此中高手，從未出過差錯。

這裏成了《今天》的誕生地。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張鵬志、孫俊世、陳家明、芒克、黃銳和我陸續到齊，加上陸煥興一共七個。直到開工前最後一分鐘，黃銳終於找來一台油印機，又舊又破，顯然經過文革的洗禮。油印機是國家統一控制的設備，能找到已算很幸運了。大家立即動手幹活——刻蠟版，印刷、摺頁，忙得團團轉。

那是轉變之年。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成為政治鬆動的重要信號。

上訪者雲集北京，有數十萬人，他們開始在西單的灰色磚牆張貼大小字報，從個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訴求。十月十七日，貴州詩人黃翔帶人在北京王府井張貼詩作，包括橫幅標語「拆毀長城，疏通運河」，「對毛澤東要三七開」。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市委為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平反。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三次會議。十二月初，鄧小平通過加拿大《環球報》記者，向人們傳遞一個重要口信「民主牆是個好東西。」

一九七八年九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黃鋭家的小院吃過晚飯，圍着大楊樹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説到局勢的變化，格外興奮。咱們辦個文學刊物怎麼樣？我提議説。芒克和黃鋭齊聲響應。在沉沉暮色中，我們的臉驟然被酒精照亮。

我們三天兩頭開會，商量辦刊方針，編寫稿件，籌集印刷設備和紙張。紙張不成問題。芒克是造紙廠工人，黃鋭在工廠宣傳科打雜，每天下班用大衣書包「順」出來。張鵬志在院裏蓋了間小窩棚，成了開編輯會的去處。我們經常爭得面紅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張鵬志不停播放那幾張舊唱片，特別是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那旋律激盪着我們的心。

從十二月二十日起，我們幹了三天兩夜。拉上窗口小布簾，在昏暗的燈光下，大家從早到晚連軸轉，誰累了就倒頭睡一會兒。陸煥興為大家做飯，一天三頓炸醬麵。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積雪，沿小河邊一字排開拉屎，眺望對岸使館區的燈火。河上的髒冰反射着烏光。亮馬河如同界河，把我們和另一個世界分開。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幹到晚上十點半終於完工，地上床上堆滿紙頁，散發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醬麵，倒了胃口，大家決定下館子好好慶祝一下。騎車來到東四十條的飯館 (全城少有的幾家夜間飯館之一)，圍小桌坐定，除了飯菜，還要了瓶二鍋頭，大家為《今天》的誕生默默乾杯。

我們邊吃邊商量下一步計劃。首先要把《今天》貼遍全北京，

包括政府部門 (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機構 (社會科學院、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和《詩刊》) 和公共空間 (天安門、西單民主牆)，還有高等院校 (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確定好張貼路綫，接着討論由誰去張貼。陸煥興、芒克和我——三個工人兩個單身，我們自告奮勇，決定第二天上午出發。

從夜間飯館出來，大家微醺。告別時難免有些衝動，互相擁抱時有人落了淚，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時才能歡聚一堂。你們真他媽沒出息，掉甚麼眼淚？陸煥興朝地上啐了口唾沫，罵咧咧的。

騎車回家路上，跟朋友一個個分手。我騎得搖搖晃晃，不成直綫，加上馬路上結冰，險些摔倒。街上空無一人。繁星，樹影，路燈的光暈，翹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太陽就是舵手/請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我想起頭一次聽到的郭路生的詩句，眼中充滿淚水。迎向死亡的感覺真美。青春真美。

二〇〇八年十月

幸虧年輕
——回想七十年代

·陳丹青·

一九五三年生於上海。七〇年至七八年輾轉贛南蘇北農村落戶，期間自習繪畫。七八年入中央美術學院，八〇年畢業。八二年至九九年定居紐約，自由職業。二〇〇〇年至〇六年任教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現居北京，自由職業。作品《西藏組畫》等，業餘寫作，出版《紐約瑣記》、《多餘的素材》、《退步集》等。

一九七六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區「美術攝影辦公室」——文革期間各省唯一的美術機構——借去畫畫，同行者另有南京藝術學院老師陳德曦和王孟奇。九月一日到拉薩，我們落宿幸福東路十二號二樓，短暫的高原適應後，天天散在街頭畫速寫。

九月九日午後，我們正收拾畫具，負責安排活動的「美影辦」主任屠思華上樓進屋，並不看着我們，說：「這樣子，下午不出去了。四點鐘電台有重要廣播。」旋即離開。

我們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靜。那麼，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一九七六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樣一種感覺，那是怎樣的一年。元月周恩來歿，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準確，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薩陽光猛烈，我記得屋裏的靜，三個人刻意扯些別的話題，閃避目光，不敢對視，抑制嘴角的痙攣，只怕猝不及防，笑出來——「**那一瞬間，他沒有能够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現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這樣描寫阿卡諦維奇偷情後被妻子發現的一瞬。**不合時宜的表情**！文革翌

年家裏接到一封報喪的信，是父親有位老同學幹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遞給父親時，也曾忽然發笑，其時十四歲——一九七六年我滿二十三歲，已知事關重大，然而九月九日下午我們竭力抑制的正是托爾斯泰捕捉的那種笑，雖則理由大異，但何其危險：笑是可怕的證據，門雖關着，三個彼此信賴的人，可是一笑之後怎樣收場？說甚麼？說甚麼都不宜。

確鑿的經驗無法確鑿描寫，我確鑿記得那天下午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恐懼。四點鐘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樂、回放，那些年城鄉遍佈高音喇叭。幾天後，拉薩廣場龐大的葬禮，萬人默哀，所有警報汽笛齊聲鳴響。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國舉喪，我佇立街頭，從風中肅然辨聽遠近四外的機械哀鳴，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後，此刻我斗膽寫出當年的真實，就是：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

此後我不再目擊千百人顛撲號叫的壯觀。葬禮中陸續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畫成的大油畫便是一組痛哭的臉。這萬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憂患、大解脱，或者，僅只因為恐懼，因恐懼而趁勢放聲一哭。我確知人民哀傷，我同樣確信，那時，許多人，包括中南海諸公，都在暗暗等待終結的一刻，只是沒人知道此後中國將會上演甚麼劇情……當我混在擠擠挨挨的葬禮行列中用力低垂頭顱，周圍數百人的號哭一陣陣如爆炸般轟鳴，怎麼辦？那些年我為種種理由感傷泣涕，可現在只剩幾個人便輪到我上前鞠躬，眼中還是沒有淚，怎麼辦，我絕非無動於衷，但此刻必須痛哭！瘋狂搜索悲酸的記憶，忽然想起「美影辦」資料中一幅老照片，是當納粹佔領巴黎，有位街頭觀看的法國紳士被屈辱扭歪胖臉，老淚溢出……一陣眼熱，下腭趁勢抽搐，幾秒鐘後，我成功地哭起來。

演員。羅拔•狄•尼羅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劇的黑幫教父，他的手下潛入劇場悄聲通知：警長已被擊殺。正為咏嘆調感動而淚流滿面的狄•尼羅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時繼續痛哭。我又曾讀到

于是之的自白，他說，每當在《茶館》第三幕規定情境流下淚來，他就心中默念：「沒演砸、沒演砸」。我豈是演員，大葬禮那天的急不擇淚絕對不是表演、不是假裝，當然，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澤東。

這篇文字被指定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實，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之後，在中國，「七十年代」已告終結。此後數年，全國上下的百般騷動不過是為八十年代開始了種種鋪墊和預演。

******

人憶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實難。記憶是內心的「視像」，封存無為；回想，則近於「思考」，不安份，試圖有為了；一旦轉成文字，被人讀，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愛讀各種回憶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讀過的最平實的回憶文字竟是上下卷《吳法憲回憶錄》，一五一十，充滿細節——那不是在回憶，而是如獲罪的共產黨人，「老實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場景若不寫出，誰能想像呢：先是他與黃、李、丘幾位被帶進人民大會堂，一排籐椅，每把籐椅後站一位「彪形大漢」，不久周恩來、葉劍英等老總魚貫進入，宣佈停止各人職務：「給你們每人找了一個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吳法憲寫道：

> 周恩來又對我說「你把空軍搞成這個樣子，你不要出問題啊，會給出路的。」我明白周恩來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殺……周恩來說：「你去吧」，然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緊緊握手，讓楊俊生把我帶了下去。

這一幕哪像是現代政治？幫派才如此處理人事，地點在國家殿堂：「緊緊握手」！然後吳法憲開始了不斷變更地點的漫長囚禁。

黨政人物的回憶，千般機密，牽動億萬人，而億萬人渾然不知。一九七一林彪事敗，我正從江西回滬，賴着，混着，忽一日，與數百名無業青年被居委會叫到靜安區體育館聆聽傳達。氣氛先已蹊蹺，文件又短，念完，靜默良久，居委會頭目帶領鼓掌，全場這才漸次響起由疏而密的集體掌聲。散場後我們路過街頭某處宣傳櫥窗，群相圍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圖片：那是江青上一年為林副主席拍攝的彩色照片，罕見地露出統帥的禿頂，逆光，神情專注，捧着毛選。

那年月沒有任何電影海報或商業廣告，所有公開的圖片都是黨政首腦。眾人湊近細看，一聲不響，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變，尤甚於幾年後毛的死亡：毛總會死的，可誰曾想林彪謀亂，且是這種死法。後來內部傳閱飛機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統帥被燒焦的頭顱和肉體，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眾記憶中的最後圖像。

我是依賴「觀看」的動物。倘若不給我「看見」，記憶失去依憑。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遺迹幾乎消逝盡淨，到處變樣了。標誌性宏大建築如天安門城樓、人民大會堂，都還在，「四五」、「六四」全在這裏發生，但周圍新樓阻斷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觀——「祖國大地」也被大肆猥褻、踐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戶的窮鄉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錢，總不至拆毀吧。常聽說老知青結隊回到曾經流放的省區，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徑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腳、村口，這才可能給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電影、圖畫，無一給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實，直到九十年代初終於看了那部文革中被聲討的意大利紀錄片《中國》(*Chung Kuo – Cina*, 1972)。導演，老共產黨員安東尼奧尼， 二〇〇四年被請到中國，重申自己當年的委屈。我也現在明白，為甚麼西方左翼尊敬欣賞紅色中國，可是他們來過，走了，在中國的生存者，是我們——我盯着看，很久難以接受這就是記憶中的七十年

代，但每一影像對我說，承認吧，你就在這如蟻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處空曠貧瘠，城市，鄉村，因為荒敗，居然尚稱潔淨，簡直優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鏡頭所及，村民爭相走避，同時回看鏡頭。我找不到詞語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國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習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視這幅員遼闊的前現代國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鄉村小學生在操場上列成方陣玩跑步接力賽，大太陽照着，貧窮而頑强，如我落戶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韌。

這一幕，確曾捕捉了整代人的無知與生命力。《中國》是我迄今所見唯一逼真紀錄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國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觀看的大量官方紀錄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實：毛、林、周，江青，紅衛兵，批鬥會，誓師大會，還有龐大的黨代會……影像比文字無情，無情才能真實：年代久遠，這些電影不再能够行使黨政宣傳而儼然轉成歷史的證據，而時間改變同一影像，改變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門廣場千萬人仰望領袖，歡呼雀躍——一九六六年，中國的七十年代其實從那時開始——我們，十幾歲的孩子，以為理所當然。如今平靜目睹這光天白日的瘋狂，我們長大了。人需要年齡。現在我瞧着周恩來的臉，這才讀出他的表情，明白他雖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慮。黎明曙色中，當身穿軍裝的毛澤東被團團簇擁走下金水橋，斷然步入沸騰的廣場人群，這一刻，鏡頭搖晃模糊，我也能讀到這個曾叫做毛潤之的人——僅僅作為一個人——正懷抱心中的決絕和龐大陰謀，決定揮霍億萬人性，闖開這歷史的彌天大禍。

鏡頭沒有偏見，但當年我們讀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紀錄片，那是七十年代絕無僅有目睹外國人的機會。各國首腦照例被周恩來陪伴着進入那間書房，毛攤在他的沙發上，困難地轉側臉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長，我們年年月月在所有圖像中逾萬次看這張臉，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級明星——很久以後，我們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張玉鳳——但這類電影一律關閉領袖與賓客的對話，只有配音解說，還有音樂，與七十年代猛烈叫囂的革命音樂不同，這種配樂親和、優美，我喜歡聽，至今沒有

文獻告訴我音樂作者是誰。

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我總會閃過一念：他還要活多久？

進到那間書房的國家元首都死了：戴高樂、尼克松、鐵托、金日成……布托死於絞刑，齊奧賽斯庫被好幾條槍掃射斃命，馬柯斯暗殺政敵後，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異邦。那年，八億人民從電影屏幕目擊毛在寓所的過道中與客人拍照時，捉起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親吻。夫人身邊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裝扮：蓄長髮，穿着腰身緊窄領口誇張的白襯衫，雖然他是亞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記憶中與我同齡的外國少年。

******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裝，因為件數少，終年穿着，洗到發白。如今男人們學會穿西裝了，偶然看見零星來自鄉鎮的老人、窮漢、乞丐，一身中山裝，輾轉塵埃，甚至還戴着那時的幹部帽，破舊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學聽趙元任女兒說，海外華僑最是記得一九七二年中國首次出席聯合國會議，美國電視播出喬冠華率團走下飛機，一律黑色中山裝：「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京城好幾處豪華餐館僱來導引賓客車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風中，倒是個個穿着筆挺的中山裝：那已成了僕役和下人的體面。

除非縣幹部，七十年代的鄉民裝束大致仍是民國款式的遺風：文革初大串聯，上海街頭走過成群的北方紅衛兵，來自魯、冀、晋、豫，黑粗布棉襖，圓口棉鞋；江南農夫則如魯迅茅盾小説改編的電影中那樣穿着傳統短褂，農婦們一身青布衫褲，藍圍裙，入冬，個個裹着綉滿彩花的頭巾；贛南山民是如清末圖畫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寶領、盤扣、窄袖，只是潰爛污濁，不成形狀——現在成衣批量傾銷，電視中瞧見汶川震區鄉下孩子的衣裝，個個無異於城裏人，而九十年代從江西鄉下走出的女孩呂燕，早已被法國人捧為著名時裝模特了。

那時的成衣業十分有限，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裝

經已流行「的確涼」，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與混紡織品，冬衣，則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絨衣出現高領——深秋風寒，在坡地或穀場，農家老少圍攏來，顯然從未見過細密編織的絨衣，他們輪番撫摸，喃喃地說：「多軟，多暖和！這麼好的東西！」山民們甚至連鞋襪也沒有，為了禦寒，不過是單衣外再穿一件同樣破爛的單衣，攔腰捆着草繩，雙手擎一枚小爐，爐中是溫熱的灰燼。我不記得哪位山民穿過中山裝，也不記得在農家見過像樣的棉被，多半絮花纍纍，經年的破爛，不辨顏色。

我所在寧都縣是老紅區，村中有老農見過項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圍剿戰事均在縣內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豬，」老人們回憶：「大躍進，老樹全砍了，現在連個獐子都找不見。」三十年代他們也這般赤貧麼？很久後我才讀到在蘇維埃地區發生甚麼：數萬人被認作「AB」團成員，在我落戶的區域被砍殺，被活埋。一九三四年，成千上萬贛南紅區的壯丁跟隨長征，一路死傷，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於都縣農民黃永勝，還有興國縣人吳法憲。

貧賤、暴力，已成遺傳：從三十年代的蘇維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鬥，游村，便是毒打。村長張萬策那張臉，畜生般野蠻而溫順，對我說，文革時他被公社派來的土紅衛兵吊在屋梁上徹夜痛打，不給吃飯，不給喝水。我們驚訝，貧農幹部被吊打？張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隨即解開腰上的布條，纏繞雙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勢，同時朗聲暴笑。

歇晌了，也是萬策老叔，重重嘆一口氣，綻開慘笑，猙獰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給地主做，三餐乾飯，盡吃，現在誰都吃不飽啊！」他環顧村人，快樂地吼道：是不是啊?!

******

我在贛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學會吃辣，劇烈的辣。農忙時節，田間的飯菜是每人帶一小瓶熗熟的辣椒，拌着粗鹽，連同密集的辣

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農事多是失敗的，直到我離開那裏，仍然只會栽種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會蔓延，飼料是我們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邊兑了水，然後撒向菜園——不知是因為年輕還是饑餓，我們似乎每時每刻低頭覓食，彷彿豬狗。贛南沙土適合種植山芋和花生，收穫時，每個人掰斷連根帶泥的果實，大口啃着，生吃，滿嘴辛澀的甘甜。鄰家的貓被狗咬斷一隻耳朵，橫在牆角，翌日死了。不記得誰剝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沖洗。溪流清澈湍急，一隻剝了皮的貓，腦袋、爪子已被斬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獸屍出沒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飛速奔臨的草狗叼上溪岸，遲來的狗們，一擁而上。

仲夏搶收與冬末春節，一年兩次，村民得以飽餐。嗚呼！我至今不再嘗到那來自泥土的鮮美：新割的稻米、池裏的活魚、才從菜園割取的菜蔬——洗過，碧青，熱鍋水沸，爐膛山柴爆響，烈焰熊熊——還有，清晨宰殺的豬！那豬，沒命嘶叫，我親眼瞧着幾條壯漢怎樣攔截，怎樣對準喉頭一刀刺入、退出，鮮血如注。當全豬被滾水沖刷過，昂然倒掛，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溫柔體貼，只輕輕一刀，緩緩順下來，晶瑩熱燙的心、肝、腰、腸，蒙着如炊煙般青藍的透明的膜，成堆墜落。當着圍觀的男女老少，屠夫於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邊上。

後來讀到文革初年廣西大肆殺人的記載：河灘邊，死者的心肝、眼珠、腦，也被這樣一件件割取，給守候的村民奪了去，回家煮食，以為治病——紹興城的人血饅頭還算斯文的，此事怎樣秉告魯迅？而我在村中聽說的往事，是當魯迅在世的年代：臨村有位壯漢的父親，小地主，紅軍撤走，他成了尋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嘖嘖驚嘆他的體魄與彪悍：怎樣喝退左右，徒手殺豬，徒手殺人，那辦法，是握緊仇家的雙腿，高高拎起，使對方倒懸的腦袋對準山石，頻頻頓挫，連連撞擊，直到死。

他的兒子三十多歲了，沒人願意嫁給他，因他的父親是被槍斃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發呆，女人走過他便解開褲檔，遠遠笑着，

笑意粗野而嫵媚，活像周潤發。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記憶中，我看見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場排隊行列，春節前夕，徹夜守候。天沒亮，每個菜場佈滿黑壓壓騷動嘈雜的市民，曙色初露，人聲鼎沸。排隊！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終年記憶。春節前知青大抵回城，無業，無事，我在隊伍中享受無比的溫馨，傍晚菜市加班銷售，拉出電綫，點亮燈，尤其動人。我願幾小時排隊，尋看路過的漂亮女孩，欣然絕望，默認自己是戶口遷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戶戶會在春節領到特許的食品票證，人群盯着菜場案板冰凍的整豬、鷄鴨、黃魚、烏賊……開秤了，隊伍糾結形同暴動：鷄鴨總有大小，每戶一份，沒選擇，兇悍的男女奮勇搶奪，聲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罵，强者聲色俱厲，失敗者叫來是悠揚婉轉，彷彿哭喪……花生、蜜餞、瓜子、黃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記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錢。自領到票證，家人無數次從抽屜深處取出，清點，商量，然後深藏，當輪到付錢的一刻，四分錢票據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被暗中買賣。人民不遠千里萬里捎帶臘肉、鹹魚、菜乾、糖果，和各種土產，火車上，被綁縛的公鷄忽然在人堆裏啼叫司晨……我轉去江蘇插隊時，每次回滬背幾十斤大米，因江蘇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購糧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證已歷二十年，親友贈送糧油票，等於鈔票——順便一說，除了特權階層，七十年代全中國沒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異不是如今的貧富差別：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國資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階級標籤，家產資產一律被沒收凍結了。

億萬農民無票無證，口糧仍被嚴格限定。雖然史書記載歷朝歷代的災荒饑饉，口糧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記憶。我每月口糧二十九斤，當被省出版社借去畫政治宣傳畫，必須暫借糧票，然後擇時坐長途車一整天回縣城，再翻山越嶺走到本村，以稻穀秤滿數月的口

糧。糧庫的大鎖被啷噹打開，我記得會計的手與秤陀怎樣顫抖，記得村裏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後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穀子流泄無聲，沒入公社糧站的巨大穀堆。挑夫的酬勞是一塊錢，農民難見現鈔，歡喜接過，渾身大汗陪我到糧管所轉換糧票，清點後仔細端詳，遞給我。我給他叫一斤米飯、一盤豬血、一碗波菜豬肝湯——頃刻盡淨。

一九七五年當我流竄到蘇北二度插隊，再次面對當地村官的無奈：他們在田裏商量，爭吵，拖延，用力吐唾，每個腳趾縫湧出江北鬆軟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會計批發口糧。我又被領到糧庫，出來時，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這個據說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糧。

******

上海老家早已拆毀。如今要拍攝石庫門弄堂的最後影像，須得撞見臨近街區的斷牆殘壁。我穿行其間，有時一驚，依稀認出這是哪位老同學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間陋室人去樓空，屋頂掀開，一地爛家當。這非人的居所並非命該被毀，只因萬千私房從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幾代不具產權的住戶，繁衍、膨脹、潰爛，喪盡尊嚴。我在瓦礫堆中幾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損蒙塵，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攝於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國的爹媽和他們解放後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紅領巾、紅寶書，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於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紅、燙髮，廉價的西裝與時裝，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紀的人在廢墟間躑躅，顯然是老住戶，看去與我同齡，那麼七十年代正當年輕，就近上學玩耍，及長，務工務農，八十年代成家立業，直到拆遷。平庸的悲劇悲喜莫辨，被驅逐的補償是他們遠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當我們爬上屋頂佇立風中，猖狂而茫然，誰曾想連綿弄堂萬瓦鱗比，有一天會成廢墟，更

不曾想老來有住進公寓的命——煤氣，冰箱、彩電、冷熱水、抽水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沒有這些，因為沒有，事事理所當然：洗刷年夜飯後的油膩鍋碗，用冰涼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爐，看爐火逐漸變藍；挨家挨戶的馬桶等候糞車時，娘姨們和車夫打情罵俏……很久很久沒用雙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過竹桿，晾出去。移居紐約的母親至今不肯放棄手洗的積習，只不必與鄰里等候同一個水槽。

前現代生活並非地獄，時或簡直天堂。沒電視，但五十年代全國的小朋友從無綫電聆聽慈藹的孫敬修老爺爺 (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貧家沒有收音機，但隔壁弄堂的板車夫大叔常在家門口給大家講桃園三結義，聲若洪鐘 (七十年代誰敢當眾講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無邊的乘涼人群，人人裎膀露腿，無耻而坦然。不過革命少女當街熟睡，深宵時分被人剪開瀣褲的遭遇，時有所聞，肇事者的下場當然是逮捕槍斃。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間淪為慘劇的舞台：這裏那裏的人家，門窗洞開，晝夜抄家，鄰里屏息諦聽：呵斥、咆哮、嚎哭、抗辯，沉重的家當連續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毆打的聲響驚心動魄。幾乎每天聽聞誰家有人失踪或自殺：上吊、割腕、開煤氣……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頂，爬着，尋到羞辱她的那一戶頂層，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頭走過，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對門那位穿旗袍的母親當眾發瘋，聲若游絲，緩緩移步，緩緩煽動展開的雙臂，一臉令人驚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見殘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個門洞後有過甚麼故事。記憶是該搗毀，如今京滬的神奇，是除了我黨恩賜的傖俗繁華，看過去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情。

歷史在原來發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裏時常望見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燈時分，熄滅希望的家家戶戶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燈泡照亮，團坐吃飯，溫馨而淒涼。六十年代末的暴亂已告緩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張被輪番痛打的臉，寧靜了，漸有活色。公園店鋪熙熙攘攘，愛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裝，電影院停業多年後開始放映幾部革

命電影，閣樓或天井傳出小提琴聲，不事聲張的體育比賽恢復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時髦——一九七一年林彪事變後的莫大事變，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繼訪華，美帝國主義長驅直入。我小學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錦江飯店，「上海公報」即在那裏簽署，沿途所有住戶因此招致嚴厲監管，包括晾曬的衣褲不得移出窗外。外賓被指定經過的街市一時貨品充盈，春節才供應的全豬全鷄密匝匝堆出來，通體冰霜，只給看，不賣，美國人一走，當夜撤回——今歲京城舉辦奧運會的全套把戲早在三十六年前精彩預演，只是琳瑯道具可比那時闊氣太多了。

******

統治，監管，如今的招數與七十年代相比，各有勝擅。父親，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節不許出門，於是大年初一將自行車扛到樓上，拆一地，細細擦拭——五類分子總算廢除了，現在被各地官員層層扣押者是前仆後繼的上訪人員，再就是管不勝管的盲流人口，數千萬。前幾年坐火車北上，尾端兩節車廂擠擠挨挨坐滿民工，據説沒有暫住證，集體遣返，年紀最小的十三四歲，看守的武警也是農村孩子臉——九十年代上海黃蜀芹執導連續劇《孽債》，一開頭便是橫七豎八擠滿乘客的昏暗車廂，幾位被知青遺棄的小孩混票上車，北上尋親，被查出，逮起來。鏡頭移出窗外，黑夜，車聲隆隆，呼嘯轉彎：這一刻，我猛然撞見常年流離的七十年代。

現在車站送旅人，站台空寂。一九九二年從紐約初次回國，若有所失：車窗改成封閉式，送者寥寥，每一車門下站着女列車員。這就對了，但於老知青卻是記憶的錯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別永遠是在列車無聲啓動的剎那，人群轟然暴哭，無數手臂扯緊又掰開，同時吵鬧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樂……電影可能是火車生涯的最佳敍述，除了畫面，車輪的密集音響才是記憶的神助：闊別神州十一載，那年回國頭一次坐火車，清晨六點我被列車播音吵醒：雜音喧囂的起始樂「東方紅」，接着是播音員傲慢的誦詞：「**中央人民廣**

播電台」——聲勢虛張，和過去一樣，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調給我近乎刺痛的親切：不是記憶，而是感官，我發現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質。

七十年代的記憶被火車貫穿：文革十年，億萬人民不准遷徙，沒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證明，除非政治或商業性質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國大地」往來南北的群體，是上千萬知青：被賦予光榮的革命身份，卻沒有戶口和單位的人。那時我在深山徒然羨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車混票，出得山來，路近省城一眼望見鐵軌，思家之念洶湧難抑。籌劃票錢是父母的大筆預算，貧家兒數年回不得家。贛州，寧都，地方知青也得下鄉，也想回家。與我同村熬着一對贛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甚麼事故，哥哥暗中籌劃離開，沒錢，決定一路幫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過村，遠遠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辦法走啊！」同時淚流滿面——贛南山區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磚砌涼亭，予人歇息，牆上殘留紅軍時代直到文革的標語。我久在山中學會長途跋涉，走啊走，人會平靜堅毅。荒徑草長，蛇！驚人地美麗，瞳仁與我對視剎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聲，遺下一窩蠕動的小蛇。

七十年代沒有國道，沒有立交橋，沒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車，沒有任何人擁有私家車，火車、公車、大卡車、拖拉機，全部屬於國家 (直到八十年代，汽車司機還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對象)。軍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類被嚴格保密的移動群體：多年後，我從境外書刊獲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數度出行：忽然起意備車，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車廂逐一招見當地省官——「你們要對我說實話」，這位偉大的謊言家威脅並懇求他的屬下——這些屬下有吉普專車，不過與今日玩高爾夫球的省官們的進口車，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飛機的故事嗎，現在首都機場仍然保留周恩來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機場。那時幾乎沒有民用航空業，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一九七六年自南京去拉薩，當天機場的全部業務，只有一班飛機。

******

遼闊、貧荒、昏沉，七十年代遠未夢見日後中國的路途，一九四九年後的政治變局從未如此密集，接踵而來，以持續阻斷的形態聯結七十年代——

一九六九年，分送各省農村的大規模遣散，啓動了，世稱「幹校」，名單中囊括當時全國重要的文人和藝術家。上山下鄉號令經已發佈一年，數百萬老三屆初高中生以半數比例發配邊省，我所屬六九屆的遣送比例，則被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張春橋定為百分之百。

一九七〇年，我與數萬名初中生被發配贛南、皖北、雲南、黑龍江，三月註銷戶口，四月初塞滿一系列專程火車，喧嘩哭叫，離開上海。

一九七一年，當毛主席將他的專列停靠南昌郊外約來省委書記進車廂秘談時，我在當年他和紅軍盤據的深山學會砍柴做飯，認定此生將永遠落戶農村。九月，林彪事敗。

一九七二年初，我從蚊帳收聽到美國人來了，局勢緩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復歌舞表演和全國美展——同年，全國人民在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出訪北美四國的紀錄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樓和二次現代化的種種景觀。

一九七三年，各省出版業漸次恢復，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調繪製連環畫，走出山溝，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兩位才子：描繪《開國大典》的內控右派董希文；描繪土地改革，來自延安的革命畫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一九七四年我被告知仍須回鄉務農，鄧小平被安排去井崗山做革命「懷舊」之旅，意謂復職在即，年底，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斗膽宣佈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為觀看全國美展。首都空曠寧靜，古意蒼蒼，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許入境拍攝《中國》期間。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施政展開，其中包括有限放寬並調整下放人員政策，我的私人變動是轉赴江北落戶，趨近上海，南京就在長江

對岸。

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恩來死，三月鄧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繼爆發龐大騷動——我目擊金陵城數十萬工人借周恩來之死游行抗議，一路花圈高及樹頂，浩浩蕩蕩——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開始的一幕。不久華國鋒上台，十月，四人幫就捕。

一九七七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國恢復高考。四五天安門運動被中央適時正名，歷年積欠纍纍冤案的平凡昭雪，閃現希望：毛終於走了，為文革時期乃至上溯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數百萬舊案的一舉重議，在是年中央文件中顯露契機。

一九七八年秋，北上就學。深秋，西單民主牆貼出第一份民間政論，並呼籲鄧小平復出。冬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宣佈告別政治運動。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鄧小平訪美紀錄片公映，中國人看見了白宮與曼哈頓，並聆聽由丹佛演唱的輕型搖滾樂鄉村歌曲。

一九七九年春，中越開戰，西單牆被封。文革末期臨刑時被切斷喉管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忽然成為是年被隆重宣揚的人物，中國美術館為之舉辦專展，紀念活動隨即被抑制，相關連環畫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藝術團夥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這是一份被重複無數次的大事記，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無不仰賴國事的鬆緊與寬嚴，攸關億萬人的命運：命運就是公章——平反、出獄、回城、復職、退賠私產、准予高考、作品開禁……工人的獎金、農民的集市，終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瑣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帶輾轉錄製鄧麗君的歌聲……離散的人團圓了，到處是追悼會和骨灰安葬儀式 (劉少奇平反大會遲至一九八〇年)，控訴、涕泣、失態、過度驚喜、卑怯的感激——總之，一切的一切取決於公章和准許蓋章的命令。農場朋友曾描述這等傳奇：場部抽屜鎖着公章，如玉璽，萬難啓用。一九七七年允許回城的國家指令下達了，為一撥撥申請人分別蓋章，不勝煩，場部用一根長

長的橡皮筋栓住圖章，吊起來，大門洞開，四鄉來人隨時進入，一把扯下，自行蓋章，蓋妥了，命運的皮筋隨即彈回原位。

自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期間，雖然各省舊案的審斷仍將案犯執行槍決，其中許多怨鬼稍後便屬革命英雄。然而那時國家陶醉其間的總情緒可以概括為獲頒大赦令，而黨的語言甚至將一九七六年喻為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二次解放」——若非嚴厲的諷刺，顯然這是全黨共識：當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須隕滅、身死，這才換來二次大解放——「解放後」的成年人個個揚眉吐氣，悲從中來。久違的文藝名流陸續出台，蒼老、衰敗，動輒哭笑，引吭高歌，近於瘋癲——我們的好總理啊！你在哪裏——扮演白毛女的老區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幾度哽咽，收音機長時間錄播她的泣不成聲，還有超長的不斷被自己打斷的感言。

一九七八年，華爾茲舞曲帶動第二次解放感帶來的集體暈旋，在場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歲上下，我輩不會跳，對這一延安時期和建國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唯貼牆圍觀。第一學期的課外記憶是終日尋看內部上映的西方電影——凡事略微開禁，中國人的活力火速竄升：文革末期各省已悶着偷看若干「內部電影」——第一次目擊全裸女子的彩色電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褲檔登時鼓起；卓別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腸胃抽筋，我强忍絞痛，以全部體能繼續狂笑。

那年最莊嚴的單項記憶是中央電視台首播李德倫指揮貝多芬第五交響樂。雖然早就偷聽古典音樂，但中國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錯覺中似乎只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聽——此刻這些弓弦在中國奏響原本發自它的語言。不久，傅聰與小澤征爾被鄭重請到，以亞洲臉作為視覺過渡，在七十年代初開國門面對西方時，可謂入情入理，我接連三場混在紅塔禮堂聆聽排練《第九交響樂》，當「四海之內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來，忽然我想起贛南的村民與荒山。

那時，貝多芬已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七十年代世界範圍的太多劇情，很久以後才知道，才了解：當我在山溪沖洗那隻無頭死

貓，巴黎五月學潮、美國嘻皮士運動、胡士托露天搖滾樂大會、安迪•沃霍遇刺、畢加索逝世、薩特全瞎……這些人事均在一九七〇年前後發生，哥普拉的《現代啓示錄》、史高西斯的《的士司機》、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譚》、貝特魯奇的《一九〇〇年》等經典電影均攝於七十年代。索爾仁尼琴、米蘭•昆德拉、馬爾克斯、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長串的名單，他們，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與知識和藝術的可憐糾纏，當我後來去到域外，總算明白自己幾乎是野蠻人。因此一九七八年上學後的發現值得一說：原來京城文革期間竟有詩人團夥、地下藝術家，以及早就試圖謀反或治國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關傳說，最集中，最傳奇，幾乎獲得唯一的敍述與被敍述者，是北京群體。他們在七十年代的流傳書單，江南聞所未聞：《麥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條軍規》，還包括貓王與約翰•連儂的唱片……首都文藝高幹子弟可能是這個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亂世聚散，他們是共和國第一撥青苗，也是頭一代忤逆的人，他們和父輩一樣，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份，誠哉居江湖之遠而思廟堂之高，看來儒與我黨的混合基因，不絕如縷——在幾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憶中，他們研讀內部刊行的西方政治、歷史與經濟譯作，年紀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國務院的眼光思路，在邊村油燈下擺弄未知的國家棋局了。

而當時代轉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懷抱純淨的絕望，熄滅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穆旦寫出七十年代無可替代的詩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該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對墳墓**」，還是「**多少人的痛苦隨身而沒**」？我默念，不像讀詩，而是面對死者的遺物：放回一九七六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極深處的真實，以性命承受這真實感，並非我輩，而是上一代人。

******

諸位：倘若我們當年不是十七八歲，而是身為父輩或祖父輩的老人，該怎樣講述七十年代？會不會願意講述？

在各種文革回憶文字中，我留心受難者的年齡和死去的年份。淹滅的平民算不清，沒人說，廣西河灘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卻說拿天下的一代，一九七〇年前後，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賀龍……相繼恨恨而死，火葬時不具名姓，唯有編號。問題不在壽數，而是：有誰在七十年代進入晚年麼？那是老來遭遇的大劫、地獄、沒頂之災，且無可逃遁。穆旦，還有不及活到一九七六年的顧準，當他們在七十年代寫着詩與文，正是我們現在的年齡：現在，七十年代早已退遠，我們苦盡甘來，但對於穆旦顧準，那十年是迎面而來的深淵：並非死亡，而是覆滅，「**多少人的痛苦隨身而沒**」。

馮友蘭、梁漱溟、胡風、周揚、沈從文、巴金……不少高壽的人物活下來，經落實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個院子或公寓深處，但看晚歲照片，給很深很深的絕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鬱結為神色，顯然難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惡與毀劫；他們過去各自守護的主義、志業，似乎無助於七十年代給予的大絕望。嚴厲整人從無笑臉的周揚，晚年詞彙總算出現「人道」，這遲來的良知，等同空話，令我厭惡，其實和以上幾位曾在他鄙視與掌控範圍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壞：秦城監獄蹲了九年。

「**這世界會好嗎**？」在生命終點， 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雙目，如是說。

如今回來分羹的海龜人士有福了。懸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蘇聯回來報效祖國的前輩，除非會弄核子飛彈之類，老舍、傅雷，即選擇自我了斷，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現在知道他們在外面黃油麪包吃過，回來是甚麼意思，甚麼感覺，他們真的愛國家。我輩的品學怎與前代比呢，他們中有人便這樣收場了。

穆旦還參加過抗日遠征軍，並曾留學美國。

比穆旦輩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約四十多歲吧，

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嚴，得享晚年，但我記得一九六六年文革風動，父親日常答非所問，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書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歲了，一事無成」說這話時，文革才剛開始——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無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儀表非凡，學生時期即地下黨員，文革初被侮辱痛毆時年僅三十多歲，幾乎死，而父兄俱死。一九七八年初見我，他端詳片刻，說：你們可沒給耽誤啊！

是的。一九七六年後的中年長輩與悲觀和時間展開持續博弈，或委身才學之外的去處。但那種奮然豁達，在深處，仍出於七十年代無可挽回的失敗感——上一冊《八十年代》叫來我輩談論，這本書的敍述者仍是我們，這是一種權利麼？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說，本書不過滴水。然而尋求別種輩份的敍述，卻也為難：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確，中南海幾代主事者則大不情願，他們苦心給政權換一副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陰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輩，那是無盡淒慘，臨了個個不得歡顏：從南昌井崗山一路鐵血，那是他們的最後歲月了，幸有鄧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後來。他曾以七十高齡徒步登攀黃山，可是請鄧公談談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一九七三年我聽南昌郊區來人說，親見鄧小平鎮日在被迫蟄居的院子裏負手踱步，團團轉，小孩跨牆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聲，繼續走。

歐美人談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論文藝、哲學、越戰，還是民權、金融、科技，那是戰後資本主義陣營重建信念、開拓價值的好時光，是人家進入二次現代化的響亮時代；日本乾乾淨淨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灣九十年代初組織文人議述的七十年代專題，讀來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們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陽光燦爛」麼？不是說不像，而是如今敍述七十年代的人即當年失學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鬧的青春戲，竟可以是天堂。

談論七十年代就是談論文革。我們迄今尚未獲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識，尤難找到準確的語言——西方反芻歷史的思想工具，嫌太豐富：譬如漢娜•阿倫特剖析納粹文化，頭頭是道，以賽亞•伯林痛

陳民粹主義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廣——他對阿倫特不以為然——在海德格爾、馬丁•瓦爾澤、君特•格拉斯那裏，同一歷史公案持續展開强勁的道德緯度，緊張而飽滿……然而西方的訓誡總難契入我們的痛感，更與中國七十年代的災相與禍源，大有所隔。我讀《古拉格群島》和奧斯維辛的故事，無話可說，然而勞改營和焚屍工程，畢竟呈現為一種人類罪惡的「行政架構」和「專業景觀」，足使後人的指控有根有據，揭示歷史脈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國人三十年來的渾渾噩噩若無其事，簡直億萬活神仙。

而納粹與前蘇聯的罪孽在西方無論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與銳變的大前提——舊時代的賬目遠未結清，簇新的時代改頭換面，出發上路了：這偉大的民族真會「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寢陵停在首都心臟，供人瞻拜……中國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類似的歷史修辭，他們沒有。而中國修辭的古老歷史，及這修辭所能涵括的道德與人文，自先秦到民國，經五四開裂，也還殘破苟延至於五六十年代初，進入七十年代，行至終點，徹底潰滅。

此後，種種「底綫」的大規模喪失過程，于焉開始，直到現在。現在，這民族的萬般活力與事功，已令世界瞠目，這倒是幸賴七十年代的大教訓與催逼，然而，圖强求變的活力，和國家的元氣，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這樣地將七十年代匆匆表過，淹在書肆裏，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歲月人事，如何打發？那都是歷史的壞賬濫賬糊塗賬，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後果的後果，我們活該世代幼稚——實在說，七十年代的人質無分年齡，那十年的癌細胞早經內化為眾人的心理與生理結構，深藏而細膩，並抓住每一種理由，對內心說：忘卻七十年代。

不是麼？有關文革的講述久已在芸芸多數那裏，乖悖時宜，我聽說近有高端學術論壇中的少壯豪傑，西裝領帶，當面申斥在場人士省思文革的發言。難怪，這類國家主義邏輯，早經根植於將歷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嶺，鷓鴣聲從深壑間歇傳來，燈油盡了，熄滅前，火苗忽然那麼一亮，輕輕炸響，還有，雨後暴漲的山溪——在私人記憶中，我從未停止懷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濁紛亂的描述，假如我有過銘心刻骨的優美體驗，全在那十年。甚麼能替代一個人在少年時分的所見所感？當我躺在板床上凝視法國巴比松派的風景畫片，村口的大樟樹亦如畫中那樣，亭亭如蓋；油燈下讀到《戰爭與和平》片段——羅斯托夫的弟弟與軍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見，顫聲叫道：你在哪裏？——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頭的溪，蜿蜒出山了，匯入兩條寧都縣境的清流，單是名字就多麼好聽：琴江與梅江，「秋來江水綠如蘭」。

刻劃承平歲月的種種惡，容易，講述罪孽時代的片刻歡悅，很難，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說，另有田園詩意，而自强的過程日後總會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時段是在青少年時代，倘若爭氣，賠得起，看得開。回顧七十年代的艱難是在個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細節與國家悲劇，兩相重疊，難分難解——這篇長稿的命題不是私人履歷，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贛南或蘇北兀自懷舊。好在是十六七歲上遭遇流放，不懂事，僅有命運的觸覺。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終於拿青春沒奈何。幸虧年輕！這題目，是為我輩僥幸，也為那時代無數被吞沒的人。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下鄉第一年

· 朱偉 ·

一九六八年初中未畢業就從上海到黑龍江下鄉，七八年回到北京，在《中國青年》雜誌當記者、編輯，八三年至九三年，在《人民文學》雜誌小説編輯室任編輯\編輯室副主任，九三年創辦《愛樂》雜誌，九五年起任《三聯生活周刊》主編。

我的七十年代開始於一九六八年。

這一年九月十日，我還不滿十六歲，就完成了從一個孩子向成年人的過渡。這種過渡，是從去向父親告別開始的。當時父親正被隔離審查，而我已經穿上了建設兵團發的一身嶄新的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在那個年代，穿這樣一身軍裝，自然有一種英氣勃發的氣派。其實這軍裝不合身，很肥大，到全家合影時，姐姐只好以一個夾子來固定我瘦瘦的脖領。

我至今記得與父親告別的那天下午。父親被隔離的地方，在看守所的東側，看守所高牆下有一個藍球場；我在西斜的陽光下穿過球場，父親則從一個很小的門洞走出來，似乎在躲避陽光。在我至今仍然痛楚的回憶裏，那不是一個簡單的告別，而是兒子在向父親表達一種父子割裂的決心，一邊是一個內疚的父親，一邊則是一個鄙夷父親歷史的兒子。在我心裏，父親和他的歷史，就像一根束縛着我飛向光明的繩索，我的建設兵團之行，就險些由於他的問題而通不過政審。最後，是在我的堅決申請下，班主任説了很多好話，領導才額外放行。我由此意識到，只有從這繩索中掙脱出來，才能掌握我自己的命運和未來。那是一個可以輕易決裂的時代，親情顯得那樣微不足道。可是實際上，父親所謂的歷史污點，只不過是解

放前在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局裏，做過一個比科長還小的管事員——課長。而能當上這課長，只不過是因為他打得一手好算盤，他能雙手同時在算盤上運算。

母親躺倒在床上，只有哥哥與姐姐送我到火車站。火車開動前站台上一片淒厲的哭聲，千萬人之哭，一下子匯為一體。在那一刻，我才感覺到了告別的份量——三天三夜火車，去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也許，這輩子就再也不能回來。不過火車一開動，更多的卻是激動與神往。那種激動與神往，是由《好兒女志在四方》這首歌的歌聲所引發的。那是描寫新疆建設兵團生活的紀錄片《軍墾之歌》的主題歌，一片片黑土被犁開，變成一望無際的金色麥浪。現在回頭看，這首歌中豪情已經成為現實：正是由於我們的軍墾，今天的黑龍江成了中國最大的糧倉，成為一塊在糧食戰略儲備上讓億萬人安心的基地。

也不知怎麼，現在越來越覺得，在自己的一生中，這一段生活彌足珍貴——那麼多來自各方的男男女女集聚在一個個知青點，許許多多窮鄉僻壤幾乎都被來自各大城市最有活力的千千萬萬青年所佔據。這是城市對農村的包圍，是另一種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關鍵是，那時候的我們，都是那樣年輕，年輕單純到如一張張白紙。那是一種只有毛澤東的氣魄和遠見才寫出來的歷史，以後不再會有這樣純淨的青年，不再會有千千萬萬青年經受這樣從身體到精神的磨煉，也就不再會有這樣令人難以忘懷的記憶了。

運送我們的火車專列從上海開出，直達嫩江。待下車集結的時候，正是黃昏時節，車站廣場上一片生氣勃勃的草綠色。形成對比的是，運送我們去農場的嶄新的兜棚卡車，不是草綠色，而是天藍色。上車後開始覺得冷，然後在顛簸的路面上各自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中聽說車正經過小興安嶺，大家爭先掀開棚布向後望，可是除了看到一對跟一對爬行着的車燈，黑黝黝的，甚麼也看不見。

我分配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第一師第一團，編號為建字一〇一，正處在邊境綫上，很值得驕傲。卡車到了團部，換成膠輪拖

拉機，突突突噴着黑煙，拉我們去連隊。這種拖拉機叫「二八」，大約是因為具有二十八匹馬力吧。到連隊的沙石路還是當年日本關東軍所修築，一路坑坑窪窪，拖拉機就不斷劇烈地搖頭甩尾。連隊在一個山崗下，站在崗上看出去，大約有十來棟磚房、草房，每棟房的屋頂，都有起碼有六個煙囪，非常醒目。傍晚時分，每個煙囪冒出的煙都無憂無慮地裊裊上升，與晚霞連接在一起。

土房是拉合辮的牆 (將草擰成辮，甩上土)，泥地，屋裏有兩鋪炕，中間隔着一堵火牆，連着火爐。宿舍以班為單位，班長副班長都是從部隊轉業的老兵。班長有家，我記得他請我們第一次到家裏，吃的是煨熟的剛出土的土豆，蘸大醬，我第一次感覺到，土豆原來那樣好吃。副班長睡在炕頭，他喜歡拉二胡，還好喝兩口小酒。

到連隊的第一件事，是裝點宿舍。我們之中年齡最大的三個自然成為核心，他們是上海少體校六八屆高中畢業生，兩位打網球，一位打籃球，各自帶着網球拍、羽毛球拍與籃球。其中打網球的余海星，是核心的核心，他帶來了各種廣告色，有繪畫才能。他用廣告色在窗玻璃上畫出屯墾戍邊的標識，一手拿鎬一手拿槍，我們於是都為擁有這樣一扇美麗的窗戶而自豪。

到連隊後沒多久就是十一。前一天連隊殺了牛，這天是兩頓飯，早上開飯結束了連續半個月沒有肉的伙食，食堂裏香氣撲鼻。大家爭着每人都買兩三個紅燒牛肉，狼吞虎咽，結果到晚上，幾乎人人都肚子疼得不可開交，隨後爭先恐後上廁所。那廁所一到晚上就一團漆黑，蹲在裏面的人，必須以咳嗽警示，以免被匆匆進來小便的人滋着。

那是一個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第二天食堂就開始被清查，追究有沒有階級敵人投毒。查來查去，不了了之。後來才鬧明白，原來是食堂急着讓大家吃上肉，肉沒有燉爛就出了鍋；儘管大家一個個都有朝氣蓬勃的胃，但是也無法消化如此之多的沒有燉爛的肉，這也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吧。

過了十一就下雪了。我們把有兩層窗戶的窗縫都用報紙封起來，中間鋪上木屑，還插上樹枝養鳥，鳥在其中喳喳亂叫。窗戶上有了水氣，日漸污染着窗玻璃上的畫。到十月底，第一次領略了暴風雪，那種淒厲的呼嘯持續了一夜，真是驚天動地。第二天醒來，宿舍的門被厚厚的雪封住，推都推不開。

下鄉第一年的冬天，我們能幹的，只不過是維持生計。所謂生計，一是取暖，二是用水。那時除食堂用煤，我們每個宿舍都是燒柈子取暖，要進山砍樹，拉回來先鋸成段，再劈開成柈子。而水，一到嚴冬，營區裏的井都枯了水，只有溝底的那口深井還沒乾。到那井去挑一擔水，要爬二十多分鐘的漫坡，來回地換肩也還是不堪重負，於是每逢輪上挑水，都成了對我最大的考驗。井台上結滿了冰，只留一個寒森森的冰窟窿。一擔水挑在肩上，因為個子矮，前後兩個水桶裏的水，都會不斷潑灑出來，灑在褲腿上就變成冰。等挑到宿舍，一桶水變成了半桶，棉褲則完全變成鎧甲。這樣挑水實在困難，後來就換成以牛車或拖拉機拉着水罐去拉水；一個人管搖轆轤把打水，一個人往車上提水，再一個人將水倒進水罐。無論提水還是倒水，一桶水都會灑掉三分之一，灑在身上，棉衣棉褲都是冰，進屋前必須將冰敲掉，才能把衣褲脱下來，至於腳和鞋，肯定就冰凍在了一起。

僅第一年，我們就不知燒掉了多少樹。樹最多的地方，是當年日本關東軍遺留的一個飛機場，那裏的白樺樹，齊齊整整，都有碗口那麼粗，在皚皚白雪中一排排密密地站在那兒，顯得十分寧靜。從連隊到飛機場，馬車要走兩三個小時，零下四十度的嚴寒，坐在車上，風像刀割一般，帽耳上很快結成了霜。口罩是不能戴的，一戴上，眼睫毛馬上也會結成霜。最要命是凍腳，我們用一晚上在火牆上烤得暖暖的氈墊，很快就變成了冰，於是就必須下車跟着馬車跑，以防腳不被凍壞。跑暖和了，上車坐一段，待冷得受不了，再下車跑。那時候，寒冷可以冷到那樣的程度——吐口唾沫，到地上馬上就變成一個冰珠。

砍樹的斧子都磨得飛快。砍樹的竅門在於一斧接一斧，順着刃口，不斷形成斜面，再將斜切的木片劈飛，使斜面步步深入，以撼動樹心。而我掄起斧子，經常一個斧刃對不准前一個斧刃，還經常把斧子頭和斧頭把連接的地方砍在樹上，自己的虎口震得生疼，斧子把也被折斷。

中午吃飯，是自己帶來的凍得硬梆梆的饅頭，還有鹹菜。饅頭吃之前，要用樹枝點一把小火，把凍饅頭在火上烤，但是常常的，誰也不耐煩等到饅頭完全烤熱就吃上了，往往外面已經焦了，裏面還有冰碴，不過也不在乎，反正另外能够就着饅頭吃的，也還是雪。那雪看起來雪白，其實裏面積存了大量塵土，所以化在嘴裏，總有一種白樺樹粉的氣味。如果把它們放到鐵桶裏化成水，那水總是黑的。幹一天，等到砍够了一車木頭，馬車上堆得高高的，再上去下來，就變得很困難；坐在這樣的柴禾車上，最好的辦法是將腳埋在樹枝裏，馬慢慢走着，路變得不再顛簸，高高的柴禾堆隨着路面來回搖擺，我們就像睡在了搖籃裏。

我當時在班裏最小，年紀最小，個子最小，人也最瘦弱，在嚴寒下每天凍得鼻涕邋遢，狼狽不堪，砍樹的業績也差得毫無自尊可言。於是我被剝奪了砍樹資格，留在宿舍裏劈柴燒火。在當時，這是一種耻辱，因為這等於你缺少了別人都有，可是唯獨你沒有的一種重要的勞動能力。

負責劈柴的，其實另有其人，一個被監管的朝鮮族老兵，是所謂「朝鮮特務」。我記得他姓朴，每天只穿一件部隊發的軍綠色球衣，不停地舉着斧子在那裏劈柈子，劈下的柈子都堆成了山。我的工作，是把柈子抱回宿舍，碼在一進門的地方。白天，大家都出門砍柴、拉水去了，我就成了燒爐工。工作主要是保證晚上的柴禾，打掃衛生，保證爐火不滅，還有一壺壺地燒開水，灌滿全部的暖瓶，再就是到偏近黃昏的時候，開始燒炕。每天晚飯後，是宿舍裏最熱鬧的時候，沒條件洗澡，大家只能圍着火牆擦身。一個個都脱

得僅剩一條褲衩，打半盆水，先把腦袋整個埋在水裏，呼嚕呼嚕，水濺得四處都是；那水濺在燒熱的火牆上，就冒出帶石灰味的水氣。然後，一塊毛巾，從上擦到下，擦下身時候都是工步，毛巾整齊地在褲衩裏來回地掏。擦完了，紛紛展開雙臂，靠近火牆熱烤，烤到渾身舒展，那是最愜意的時候。擦乾淨後上炕，下棋打撲克，吹笛子吹口琴，侃山聊天，各不耽誤。紅燈牌收音機是唯一連接世界的紐帶，有時候能聽到一個極為低沉的聲音，「這裏是紅旗廣播電台」，於是就趕緊轉台。

這樣的室內浴，洗完往往一地的潮濕，同時屋裏開始瀰漫出各種臭味：火牆上開始擠滿各種鞋與鞋墊——都需要靠暖暖的火牆烤上一夜，第二天穿上，再走進嚴寒之中。燒爐工最美好的時間是在晚上：歇燈號吹過，大家很快就都熟睡了，於是世界就會變得特別的靜。這時候你的任務，是保證爐火不斷熊熊燃燒，反正門口有的是柴。搬個板凳，面對爐膛，看着那些白樺樹的桦子滋滋響着冒水汽，美麗的樺樹皮在火中漸漸卷起來，被烈火吞噬，變成熊熊燃燒的一部分。對着爐火看書，在我的記憶中是最美妙的——那火光就在書頁上跳動。那時流傳的是大家從家裏帶來的書，五花八門，我最難忘的，是法捷耶夫的《毀滅》。還有一本厚厚的《馬克思傳》，以及一本厚厚的《朱可夫傳》，不過記不大清是不是那一年冬天在爐火前讀到的了。

燒爐工最值得炫耀的，是把火爐的爐蓋燒成通紅透明。這時火膛裏，爐火憤怒地轟鳴着，就像奔馳着火車。爐蓋透明得像要融化。那時候，屋裏溫度就會很高，窗玻璃上的冰霜全都融為水，進入夢鄉裏的人一個個舒服得四仰八叉，全不蓋被子。走到寒氣凜冽的室外，是寧靜的冰天雪地，月亮清寒，就像一個大冰盤，抬頭看月色下煙囱裏散發的紫色的煙，實在是另一種的美麗。

當然我們的生活也不盡是田園。當時正是中蘇關係緊張之時，我們地處中蘇邊境，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任務是挖出「蘇聯特務」。周邊晚上的荒野裏，經常會升起很多信號彈，也有各種各樣

的傳言。傳言最神的是關於七連的。七連駐地是山神廟，那裏本是日本關東軍面對蘇聯最近的一個兵營。據說當時關東軍有「大大的山神廟，小小的哈爾濱」的說法，所以這裏戰敗後留下了幾百棟成片的營房。這些廢棄的營房全部只有房架，沒有了房頂與門窗，蘇聯紅軍驅除關東軍後，把可用木料全部拆除運走了。這些廢營房裏出現的信號彈很密集，據說信號彈是定時自動發射，所以圍剿總一無所獲。當時最毛骨悚然的傳聞是，巡邏人員走到廢房子裏，不見人，卻有還未燃盡的火。關於信號彈問題，至今仍然令我不解：如真有特務，當時的信號彈除了恐嚇作用，又有甚麼意義呢？是為了證明他的存在，還是為了與清查較量？

因為形勢緊張，夜晚增加了輪班巡邏，主要任務是保衛麥場。麥場上有幾個大糧囤，積存着秋收的全部果實，拖拉機與各種農機具也都停在那裏。農業連隊沒有槍，值班的兩個知青只能空手徒步巡邏，現在想想也覺得荒唐。除了冷，還有在黑黝黝的凜冽寒風中的恐懼。我清楚記得，有一位北京知青在一次夜巡中與我同班，他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子弟，說話瓮聲瓮氣。他似乎是胸有成竹地說，我們一定不要在明亮的地方走，在暗處，別人就在明處，我們就處處主動。我們於是就專揀暗黑的地方走。他又說，兩人一定不要並排，並排危險的概率就太高，我們就彼此拉開距離，可是越拉開距離，就越覺得身前身後都是聲音。夜裏很靜，踩在結了冰的雪面上，咔嚓咔嚓的腳步聲顯得格外響。巡邏時候，最溫暖是從麥場走進亮着昏黃色燈光的馬厩裏，馬不吃夜草不肥，這時候那些馬都把腦袋伸在馬槽裏，安靜地嚼着夜草。到值夜班的馬厩的火爐邊坐坐，有時能吃到烤得香香的老玉米。

隨着一批哈爾濱工讀學校的學生到連隊，清理階級隊伍升級了。在批鬥會現場，他們搬了個窄窄的樹墩子，讓有嫌疑的所謂「特務分子」搖搖晃晃地站上去，然後一腳將樹墩踢翻，看着他們仰面摔倒在地，再上去拳打腳踢。後來，「特務分子」越擴大越多，先是牽連到睡在我們班的開「二八」拖拉機的司機，再牽連到

愛拉二胡的副班長。開拖拉機的司機姓齊，因為像狗熊一樣長得又黑又壯，被老戰士們稱為「齊瞎子」。追查他，他嘴硬，不服，就被打得厲害，半邊臉都腫了。我們全班都對這樣打人反感，又沒人敢站出來。「齊瞎子」被打後，也不說話，後來我們見他炕頭放了一旅行袋的餅乾，是在小賣部買的，足有十幾斤，就在暗下裏嘀咕，怕他想不通，要自殺。大家就開始監視他的一舉一動，決心一旦發現就阻止他輕生。後來發覺，他每晚睡覺都是鼾聲如雷，才明白他根本就沒當回事，「活一天算一天，該吃的吃光，該喝的喝光」。這事後來不了了之，查了一通，甚麼也查不出來，就一風吹了。那年冬天，「齊瞎子」問題查清後，他就結婚了，娶了一個漂亮的小媳婦。我記憶中最清晰是我們到他家新房，見他與小媳婦面對面，一塊扯被裏、縫被子的場景。兩人面對面地扯被裏的樣子，後來一直在我心裏成為溫馨家庭生活的一種象徵。

冬天食堂的菜，只有三種：土豆、白菜、蘿蔔。這些菜平時貯藏在菜窖裏，全都被凍過，吃的時候放在大鍋裏燉，根本沒有油水。所以，那時候能到老戰士家裏吃一頓麅子肉，是天大的享受。冬天，麅子會成群結隊在遠處的雪原上跑過，在白雪上留下的腳印，回來時候，它們一定還走這條路綫，所以被稱為「傻麅子」。老戰士們在它們經過的路上設下連環套，就可以套住牠們。麅子肉的做法，在當時幾乎千篇一律，都是和土豆一起燉，而且肉少土豆多。

還有一個解饞的辦法，是到小賣部。小賣部裏最吸引我們的，是上海梅林牌的紅燒豬肉罐頭。鐵盒包裝的罐頭裏，其實有一半是油，肉很破碎，一共也沒有幾塊，但是吃起來極香。從食堂打回沒有油水的菜湯，摻上罐頭裏的紅燒豬肉，然後在宿舍的爐子上加工，再吃就感到鮮美無比。那時候，我們的工資加上邊境地區的津貼，每個月只有四十九元，但是作為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過的簡直是奢侈生活。所以，我們到小賣部並不憐惜花銷。最奢侈的一

個，大約是少體校打籃球的陳文江。他近一米九的個子，穿四十四碼鞋，張開手就能把籃球單手抓起來，大家覺得這一手非常了不起，因此都叫他「大手」。他有每天保持乾吃奶粉的習慣，只要回到宿舍，就靠在被褥上一口口乾吃奶粉，還說，奶粉的味道比牛奶要好。除奶粉，他還愛吃白糖，也不用水稀釋，就那麼一勺勺地乾吃。

冬天小賣部裏的水果，只有凍柿子與凍梨。相比凍柿子，我對凍梨的印象更深，那是一種圓圓的黑色的梨，凍得非常結實，像一個個鐵球。把這些鐵球買回來，先扔在水裏解凍，等一層透明的冰殼褪去之後，裏面是半爛半不爛軟軟的瓤，咬在嘴裏，還是冰牙。

當時最吸引人的娛樂，當然是看電影。放映地就在食堂，冬天四面漏風，牆上都結着一層冰霜。最難忘是那一年放朝鮮電影《賣花姑娘》，輪轉到我們連隊放映，似乎已經是下半夜的兩三點鐘，可是大家仍然像是迎接一個節日那麼高興，沒有人在意那冬夜的寒冷。

冬天最難受的是上廁所，風從茅坑下鑽上來，有如利刃割膚，下面，是寶塔般聳立在那裏結成冰砣的糞便。這樣蹲坑的滋味實在受不了，我們就選擇野外的雪地方便。但是曠野裏八面來風，又是另一種滋味，等拉上褲子，屁股凍得完全麻木。一場大雪後，我們在靠宿舍的山牆邊上，動手用積雪圍成了一個廁所。這廁所壘成一人多高，走進去還有一個拐角，經過這拐角，才是用來如廁的隱秘的空地，周邊是潔白的雪牆，頭頂是明淨夜空中一輪清明之月，風都被擋在外面。這個雪廁又乾淨又方便，每天的排泄物會迅速冰凍，也沒有臭氣；清潔的時候，只需把糞便鏟去，再鋪上新雪，就能每天都保持整潔。

在宿舍門口，另一個必需解決的，是日常的潑水問題。每天洗臉洗腳的水，如果出門就潑，門口就會都是冰，相當危險。我們設計出一個坡度，大家都順坡倒水，漸漸變成一個順坡的冰面，於是

很快有人用樺樹幹釘成一個小爬犁，順着坡面可以滑下去，大家都覺得好玩。

在記憶中，這一年過年，我第一次喝了白酒，喝的是六十五度的「北大荒」。過去在家裏，只跟着父親喝過一點甜酒 (也就是那時零賣的葡萄酒)，所以烈酒下肚，似乎五臟六腑都在燃燒，結果大年三十的夜晚，我吐得一蹋糊塗。不過喝多的好處，是暈暈乎乎忘記了想家。等到酒勁過去，大家動手包的的年夜餃子，都已經包得差不多，等着下鍋了。對那個除夕夜，還有一件事很難忘：我們放到室外去冷凍的餃子，最後都給狗吃了，還有我們埋在雪窩裏準備過年吃的很多別的東西，也都給狗刨了出來。

從過年到開春，其實還有一個漫長的時間，但在我記憶中，好像只是瞬間。開春時候，開了九大，林彪當了副主席。這時雪化了，道路變成泥濘不堪，山牆邊的廁所變成了最醜陋的所在，我們捏着鼻子才將它清理乾淨，但臭氣猶存，久久消散不去。

起　程

——一個農村孩子關於七十年代的記憶

·高默波·

出生在江西一個小村莊的貧苦家庭。作為工農兵學員上廈門大學，後選派到英國留學，先後就讀威爾士大學、劍橋大學、西敏寺大學和埃塞克斯大學。後移民到澳大利亞，先後在格里菲斯大學和塔斯曼尼亞大學任教。現任阿得萊德大學講座終身教授，兼任阿得萊德大學孔子學院院長。發表了四部專著和一系列文章及合著章節。最新專著是《解釋中國過去的論爭：毛和文革》。

一

要說七十年代，還得先從六十年代末我剛上初中時說起。

那時一個農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經了不起了。拿我們兩百多人口的高家村來說，只有包括我在內的四個孩子上了中學，其中一個是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兒子。

父親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臨終前的唯一願望就是我能繼續升學。那時的初中離高家村有十幾里地，不可能天天來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親省錢買了個搪瓷臉盆，生怕把農村人用的木盆帶到學校丟人現眼。

在我上中學期間，父親去世了，兩個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雖說才十幾歲，但也該是掙工分的勞動力，可上學非但不能養家，還得由家裏負擔學雜食宿費。三寸小腳的母親也不得不下地幹活，貼補家用。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時，我剛上初中二年級，學校突然就宣佈停課了。文革到底怎麼回事，我們搞不清楚，但高年級同學寫的那些大字報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個地理老師的臥室兼辦公室被抄，他單身多年。大字報上說，他有肮髒的資產階級思想，因為他

日記中寫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車坐在一個女人身旁，貼着她感覺很舒服。另一個證據是，他嫌公共廁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學校旁的樹林上廁所。

甚麼是資產階級？我們似懂非懂，只是覺得這老師的確有點怪。村裏男女老少之間，打打鬧鬧動手動腳是家常便飯，為甚麼身體接觸一下，就會激動得寫進日記？讓人不可思議。

學校裏有好多新鮮事，讓我們好奇。比如說那些單身，我們數學老師個子高挑，雖說沒多漂亮，但找個對象應該易如反掌；另一個女老師也是，還總是穿高跟鞋，這對我們農村人來說感覺挺怪的。還有教導主任黃某，胖得出奇，腆着個大肚子，跟我們這些皮包骨的鄉下人相比，好像來自另一個星球。

我們對老師很尊敬，沒人打老師，甚至也沒人給他們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學生們毆打學校食堂兼倉庫的管理員。那時候農村學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從家挑一擔大米和柴禾到學校，交給管理員過秤，再根據重量給我們飯票。他過秤時總是偷奸耍滑，飯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飯又比飯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懷疑他貪污，但又找不到證據，文革終於給了人們發洩的機會。

有一天，上面說毛主席接見紅衛兵，要從學生中選代表去北京，十裏挑一，協商提名，公開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貧下中農、工人和革幹家庭；第二條就是學習成績，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對，說我道德品質有問題，偷過他的折疊小刀。這是胡扯。我在屋外撿到一把小刀，愛不釋手，就留下了。他非說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沒人相信他的指控，我還是被選上了。

那趟旅程最讓我激動的是頭一次坐火車，這比見毛主席更令人激動。北京街道寬敞豁亮，高樓大廈，真有點兒像神話世界，連發給我們當乾糧的餅乾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點起床，步行去天安門廣場，等待毛主席接見。我

們編隊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條條讀毛主席語錄。終於一輛輛敞篷汽車開過來，一晃而過。周圍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點莫名其妙。說實話，連毛主席長啥模樣我都沒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問我看到毛主席了嗎，我當然說看到了。啥模樣？跟畫像上一樣。

那些高年級的造反派頭頭是些愛虛榮的傢伙，軍大衣、自行車和白塑料底鞋讓他們出盡風頭，惹得漂亮女生頻送秋波。至於紅衛兵是甚麼，為甚麼造反，造誰的反，我很茫然。停課鬧革命，我稀里糊塗成了公社紅衛兵造反派的頭頭。在公社無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們生產大隊，我又為挨整的大隊支記辯護，結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裏的年輕人最嚮往的就是離開農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從小聽力不好，入伍我身體不够格，招工機會更少，所以對我來說，脱離農村的唯一途徑就是上學高考。文革一來，不管學習成績好壞，這條路都斷了。於是我成了「返鄉知青」，造反不知道怎麼造，上學上不成，我這本來就是農民的學生就又成了農民了。

不過，我倒也沒覺得天塌下來。跟那時多數農村人一樣，我總是認為，事情是怎樣就怎樣。我們農村人跟黑格爾一樣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後來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對。

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我也成了被打擊的對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隊的人看見我讀《水滸傳》，就把書沒收了，說是封建書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煩。為了鏟除農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隊把村裏的宗譜收集起來準備燒掉，我那時正熱衷於練毛筆字，農村缺少紙張，就從查抄後存放在倉庫的宗譜中拿了一些來練毛筆字。工作隊覺得「偷家譜私藏有封建意識」，連同讀封建書籍的罪名，數罪並罰，將我抓了起來。

那時我已經是高家村的「赤腳老師「，工作隊就把我交給教師群眾們批鬥。我在中心小學被軟禁了兩個星期，白天寫檢討，晚上接受來自各村老師的批鬥。不過，最後這事也不了了之。但對我

以後的生活似乎並沒有多大妨礙。一九七三年國家招收工農兵大學生，我還被推薦去廈門大學讀英文——而我並沒有任何家庭背景。

二

如果僅僅從世事的環環相扣上來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來實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樣的年代裏，我有政治運動中受批鬥的「污點」，但卻又因為「政治可靠」被推薦上大學。只是事過多年以後我才發現，其實這些並不矛盾。

文革前有個「四清」運動，那次運動中，徐家村人徐從旺因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隊會計的職務。很快，文革給了這個徐家村人一次機會，他立馬起來造反，要打倒當時的大隊黨支部書記高常銀。於是高常銀被炮打靠邊站了。

高常銀正好是我們這個族系的人，為了尋找罪名打倒高常銀，已經在大隊文化革命委員會掌權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隊，要我承認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銀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這麼巧，當年批鬥我最起勁的中心小學的徐校長也恰恰是徐從旺的妹夫……到一九七三年時，徐從旺造反沒成功，高常銀也沒有官復原職，高徐兩人的爭鬥悄然成為歷史，沒翻出甚麼浪花。

恩怨永遠糾纏不清。此其一。再說我被推薦上大學的事，那也是無巧不成書。當時公社文教組負責推薦大學生的名字叫高常艷。巧的是，他名字的前兩個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範」前面兩個字一樣。所以，當高常艷把我推薦到縣教育組時，負責人竟然誤以為我是高常艷的弟弟，而這位在選拔上掌有生殺大權的負責人，又正巧是高常艷在上饒師專的好同學。

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不少當代中國政治、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潛規則」。

首先，政策和指示從最高層下達，到地方上執行時，可能已經跟原來的意願和內容完全不一樣了。「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

反革命活動，反投機倒把、反貪污、反鋪張浪費。但我當時受的指控，和這些內容完全沾不上邊。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樣的農村小圈子裏，宗族、族系的傳統和意識，總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執行和政府的運行。從「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兩家，一直在你爭我鬥，看不出誰會長贏誰又皆輸。

現在回過頭來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經歷。我們譴責毛澤東時代用階級鬥爭的教條來解釋和指導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會和經濟條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這是不可否認的。

就拿所謂的樣板戲來說吧。巴金在《隨想錄》中曾說，他一聽到樣板戲就心驚肉跳，成為一種典型的記憶創傷。可是我的記憶恰恰相反，它是我在農村最好的記憶之一。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間，為了解決廣大群眾「看戲難」問題，當時的文革派決定普及樣板戲。北京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和長春電影製片廠等聯合，由謝鐵驪等執導，將樣板戲先後拍成舞台電影片，在全國農村發行、放映。

也是由此機緣，我學會了欣賞和演唱京劇，特別是它的唱腔和台詞，由此得益一輩子。現在還時不時唱一兩段，使我在需要的場合能出個節目。國內外的朋友，包括搞京劇專業的，都會對我這個沒有師從的農村京劇愛好者的水平大吃一驚。

所以說，巴金的經歷和我們農村人的不一樣。巴金的回憶不但寫出來了，而且有很多人讀，包括外國人；而農村人一般不寫回憶錄，不會寫，寫了也沒有人看。於是巴金的回憶就不僅僅是個人的經歷，還成了歷史；而佔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村人沒有記憶，也沒有歷史。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文革期間小說、電影、戲劇創作枯竭，文化生活長時期極其枯燥。八億人民八個戲，經電影、電視、廣播反復强制性播放，連不熟悉戲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幾句樣板戲，這

成了文革時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貧乏的代名詞——但是，這要看是對誰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個戲吧，但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那都是給城市老爺們看的。粗略地估計下，當時七億中國人是農村人，很難說「一億人一百個戲，七億人民沒有戲」的狀況能證明整個中國更有文化生活。況且城鎮的一億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個戲。

「不熟悉戲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幾句」，樣版戲的京劇應該說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數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現代的所謂民主和人權理念。而且，樣板戲普及的過程中，廣大的老百姓變客體為主體，三百多種地方戲曲劇種對樣板戲進行了移植就是證明。

事實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這一前所未有的戲劇移植工程。我們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傳統戲曲曲調來改演京劇。移植很成功，我們不但在本村演出，還應邀到幾個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學既當導演又當主演，給大隊也演了一齣京劇。這些活動不但大大地豐富了當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團和公共活動意識。農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熟悉的曲調上台演戲，都興奮得很，而且，他們全都認真地讀劇本，也提高了識字和閱讀能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樣的活動還開闢了年輕人之間自由戀愛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過介紹人而達成的。而戲劇移植的活動，讓各鄉鄰間走動得更勤，兩對年輕人自由戀愛成功，而且他們的婚姻打破了階級成份和族系門戶。主演阿慶嫂的就是高家村一個富農成份的女孩，她沒有受到歧視，反而揚眉吐氣，大大風光了一番，成為很多年輕人羨慕的對象。

我們把這種活力帶向了周圍的各個村落。高家村還建了個籃球場，還組織各村之間的的比賽。在那個年代，這給年輕人帶來很多歡樂的時光。

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號召。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的《人民日報》又以《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為題發表編者按，引述毛澤東關於「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的指示。此後，大批的國家機關幹部和家屬被下放到了農村。

就在那時，兩個機關幹部家庭從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機關下放到了我們大隊。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個孩子，兩男一女，侯家是一個女孩。

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怎麼說也不是件愉快的事，開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條件的不便。對於習慣電燈的城裏人來說，每天晚上漫無邊際的黑暗是無法忍受的，即使他們兩家都點着很大很亮的煤油燈，在其他農村人看來着實浪費，但他們還是不習慣。再就是沒有自來水，生活用水都得從井裏打上來，擔回家儲在水缸裏。另外，孩子上學的條件也自然沒有城裏好……

最令他們煩惱的，恐怕還是前途的不確定。

我們農村人都覺得他們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他們的到來有點不可思議，而他們離開農村也是必然的，只是遲早的問題。但是一年年過去，他們還在農村呆着，那種不確定似乎就要演變成確定。他們孩子也越來越農村化，沒人敢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農村人都很尊敬他們，但大多是敬而遠之。他們被認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員，大隊的領導不但經常請他們吃飯，還請他們開會、出主意、提建議。到後來，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動和決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參與。他們被認為是很有知識和教養的人，我打拍子指揮唱歌就是從老李那兒學來的。

另外，他們在我們眼裏也很富有。他們衣服的料子 (甚麼毛料

和「的確良」) 和做工好得我們看都不敢多看。他們照樣拿在省城的工資，他們所在的生產隊還分給他們糧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錢，有的則很便宜。我們農村人只有過年過節時才能吃到的東西，卻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他們從農村人那兒買魚，不但很新鮮而且很便宜，農民還給收拾得乾乾淨淨。這些服務那時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們顯得那麼高貴和優雅。

我尤其欣賞李先生的女兒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脫俗，皮膚很白很柔滑，沒有絲毫的斑點紋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勢都是那麼的文靜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對我來說，她簡直高不可攀。

當時，我並沒有上完初中課程，但因為文革時農村中小學擴展的需要，我當上初中老師。有的學生跟我年紀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連跟她說話的勇氣都沒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搶球的機會碰了她一下，心滿意足了好一陣。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見面時，我談起當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上中學的李倩如只是淡淡一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樣。老侯對毛時代的革命理論和實踐更虔誠，更投入。他們都不需要參加勞動，但老侯卻像個普通農民一樣，積極參加一切農事。最後他結實墩黑，成了道地的農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則很少參加勞動，有的話也是一些輕鬆活，意思一下而已。對此也沒人有甚麼異議或批評，只是偶爾有人說他們架子大。對此他們要麼不知道，要麼無所謂，架子大又怎麼的？

四

文革前，高家村沒有學校，孩子們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學，一天來回六趟：早讀後回家吃早飯，再去上上午的課，回家吃完午飯去上下午的課，傍晚回家。那時農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

買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濘，夏天的酷熱和冬天的風雪，對孩子們着實是折磨，再加上其他困難，不少農村孩子想讀書也沒法子，失學現象很普遍。

文革兩年後，教改的目標之一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於是高家村辦起了本村的小學，我返鄉不久就被選為本村小學第一任老師，同時教一年級和二年級。經費不足，我這樣的老師沒工資，按課時掙工分，農忙時也得赤腳下地幹活，故得「赤腳老師」的稱號。

在我任教的兩年，每個學齡兒童都入學了，老人們說這在高家村歷史上前所未有。隨着一二年級學生人數急劇增加，上高小和初中的也直綫上升，而原來的中心小學就升格招收中學生了，我跟着「榮升」到中心小學教初一初二的數學。可那些課本連我自己都沒碰過，只能邊學邊教。做「赤腳老師」，報酬只有一般老師的五分之一，還得教更高年級的課，但我樂在其中，更不在乎甚麼公平不公平。

雖說有被群眾批鬥的「政治污點」，我還是被「重用」，可謂「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同時也說明在一切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並不能簡單劃分得益者和受害者，我自己在文革就兼而有之。當時的那種孤獨與悲涼，如今只剩下一點惆悵而已。

有時想起高家村，竟會莫名奇妙地熱淚盈眶。當年，我一直覺得自己和那些摸魚捉蝦的鄉下孩子有些格格不入，我用書本把自己和他人區分開來。後來教書，我硬着頭皮啃大本的哲學書，半懂不懂，折騰得精疲力盡，但還是咬牙堅持下來，似乎為了讓自己對抗環境。

我終於被推薦上了大學。先搭車去縣城，轉班車到鷹潭，再從鷹潭坐火車去廈門，一路輾轉好幾天。一條扁擔，一頭挑着舊木箱，一頭挑着打補丁的被單，我就這樣走進了廈門大學的校門。

廈門是漂亮的花園城市。海灘上，校園大道寬敞，小徑幽靜，都是柏油或花崗岩石鋪成。對我這個鄉巴佬來說，感覺像是一腳跨進天堂。

鄉巴佬倒沒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去上海國際海員俱樂部實習，才感到身份的壓力。瞧不起我的倒不是外國人，而是所謂同胞。那些百貨商店那些穿着時髦、皮膚白淨的上海姑娘，用眼神和身體語言告訴我：不會上海話，一看就是鄉巴佬，你買得起嗎？

我確實買不起。

大學的生活還是挺美好的，儘管伙食差。早餐是稀飯饅頭加鹹菜，中晚飯是季節菜加幾片肥肉，偶爾有帶魚或巴郎魚。米飯是黃的，那是快要發霉的陳年大米，居民不買，就給大學生吃。而對我來說，這飯菜已經够好了，每月定量不够，女同學總是把飯票讓給我。

雖說招的是工農兵學員，但一九七三年那屆真正農村人就我一個。大多數是上海知青，主要是從國營農場選拔上來的，工人出身的居多。至於當兵的學員就別提了，學外語的盡是部隊來的軍幹子弟，上山下鄉時他們入伍，一轉身就成了工農兵學員。他們養尊處優，學習沒動力。比如來自福州軍區的盧曉俞，很少跟我們來往，人倒還和氣，總是笑眯眯的。他人胖，夏天酷熱，整天穿着花哨的游泳褲在宿舍涼台沖澡，用有限的英語打招呼。正是我想像中的花花公子！

我們那屆有個上海的高才生，進廈大後把插隊時結婚的妻子休了，妻子一告，他就被大學開除了。還有個同學叫張東華，父親是福州軍區的高級將領。我在他那兒頭一次聽到《梁祝》，覺得美極了。他畢業後留在廈門，後來聽說因流氓成性，民憤極大，八十年代嚴打時被送到新疆蹲了大獄。

軍宣隊撤了，工宣隊一直留到我們畢業。畢業分配的大權掌握在工宣隊的老蔡手中。畢業前，風聞各種幕後活動在進行，而我對此一向反應遲鈍。最終留校的都是踏踏實實的共產黨員或工農子弟。那些從上海北京來的學生都另有小算盤，他們更想去這個部那個部甚麼的。

有件事我至今還暈頭轉向：杭州來的女孩姚晶靜，分配前貼出

聲明，說她志願去最艱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結果卻美滋滋地留校教書。

我也留校教書。

一年後我去英國留學。有同學帶話說，姚晶靜有意跟我談戀愛。去英國途中，我順路看望在杭州過暑假的姚晶靜。她父親送我去北京，買了幾十塊香皂讓我帶到英國用。我在英國跟姚晶靜通了一年書信。兩年後，姚晶靜從廈門調回杭州，從此渺無音信。

我三年後回國，七十年代已經結束了。

寧靜的地平綫

· 張郎郎 ·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出生於延安，六八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美術理論系。曾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員，院刊編輯。之後曾任《國際新技術》雜誌總經理，《中國美術報》副董事長，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出版文集《從故鄉到天涯》和《大雅寶舊事》。 現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同時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教授漢語及中國文化。

一

一九七〇年代，我聽說許多人在全國各地草棚裏、油燈下，一肚子理想，滿腦門子深刻。在寫着、畫着、唱着，做着文藝夢。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層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義者。玩文學的差不多都是這種人。他們琢磨、創作，試圖活出個模樣，尋找意義。

也許他們就這樣歪打正着，一不留神為中國文學藝術傳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個年代，大面兒上看來是個文化貧瘠的時光，他們這些活動漸漸形成了文化潛流，在地下交匯着、湧動着。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會有那樣一次劃時代的文化群體勃發。

我也許是由於喜歡寫東西，曾經組織過一個文學沙龍，還在酒後茶餘口無遮攔，於是，在那個年代蹲進了監獄。也算是那個年代裏間接對文化傳承「有所貢獻」。大概，正如魯迅老頭兒說的：咱萌不了芽，還當不了供天才們生長的泥土嗎？那些年頭，的確我當的就是最底層的泥土。

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的那個午夜，我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是在油燈下守歲。不過，大多數人在農村、在農場。而我卻在牢房。

平時屋裏再冷，今夜爐子一定要火旺。也許，這意味着來年沒準兒會轉轉運。我們這兒的爐子，你一定沒見過。這是當地名為

「掃地風」的全泥爐子。「掃地風」沒有爐膛，沒有爐箅子，沒有任何其他爐子必備的金屬附件。整個爐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當地人憑多年經驗，知道如何利用爐子內部特別的結構形成空間，還有爐子底部有別樣通風口。不用風箱，自來就有風，所以得此名。「掃地風」是當地窮苦人專利。除夕那晚，「掃地風」威風八面，爐火通紅。

那是在河北省饒陽縣大獄裏。

此前，我從沒到過這個地方。這是衡水專區的一個縣，這兒屬於一個革命老區，曾經是抗日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老鄉至今還記得呂正操、程子華這些當年在這裏亮劍的英雄好漢。我們這群北京政治犯，被下放到這裏，這是當時副統帥一號命令所決定的。那時全國、全民都在準備打仗。

是得準備，於是我們這些北京犯人被準備成了饒陽犯人。

當時我黨應付局勢的架勢與心態和保衛延安時候一模一樣。「要有準備」是多方面的。必然包括對腦瓜子裏有問題的文化人進行必要準備。保衛延安時候，給王實味準備一把斧子就行了。這會兒王實味們實在太多了，全準備斧子也不行。

於是，一批批我們這種人從北京被押送出來。這些腦瓜子裏不對味兒的人中，包括「大小劉麻子」英若誠和他太太吳世良，中央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楊秉蓀，歌唱家劉秉義、鄭佐成、王芃等等。當然，也包括我和老七這些無名鼠輩。把這些不安份和不可靠的傢伙放在老根據地，有利於戰時管理。這個地區有革命傳統經驗。

後來，我聽當地的一個老幹部告訴我，在打日本那會兒，他們晚上經常的任務是「掏窩子」，就是清除異己的意思。半夜三更，幾個縣大隊的小年輕，就去甚麼人家把目標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佈他的罪行，然後為了省子彈，就手工處理了。有一次，他們去某村去掏一個漢奸嫌疑，沒掏着，就把他老婆掏出來了。為了打擊漢奸，這老婆扔進枯井也能滅他們的威風。在扔下枯井之前，小年輕們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視眼，也搶着去摸。別的隊員笑了，說：「瞎子，看清楚嘍，那是你姑啊！」那些

村的人，很多都有親戚關係。小王說：我不管，我摸的是漢奸婆！眾人齊聲喝止：我們都行，就你不行，漢奸歸漢奸，也不能亂了輩份。

聽到這兒，我明白了。人家這兒管我們這類人有經驗着呢。

我前面說這是縣大獄，其實是傳統習慣說法。確切地說，我們由於還是未決犯，所以關的地方還不是監獄，而是公安局下屬的看守所。

這縣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長，也姓張。他還是老區傳統做派：不穿官衣。就愛穿着對襟黑棉襖，一條絻襠褲，手裏提着個抗戰時期的鏡面盒子炮，和當年鬧日本那會兒的捯飭還一個模樣。估計那是他一生中最閃光的年頭兒，那年代絕不能忘。

饒陽這地方到處都是鹽鹼地，還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兒上了——苦得厲害」。周邊的幾個縣，從來都不怎麼富裕。有些縣農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窮」，去討飯，把自家的糧食省下來。饒陽縣的人，很要面子，丟不起那人。他們也到全國各地去「混窮」，可絕不要飯，他們耍的是本鄉絕門手藝——劁豬。就拿着一個劁豬刀子，走遍全國，吃萬家飯，和古代俠客有幾分神似。

除夕之夜，這個窮鄉僻壤老鄉們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好像這兒炮仗不要錢似的。原來，這塊大鹽鹼地產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這兒的重要副業之一。今兒晚上人們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產的，才能可勁兒地造。

我們這夥人，是一九六九年底從北京公安局看守所 (就是那著名的K字樓和王八樓) 押解到這兒來的。其實不過才三個月左右，已經把我們給徹底餓廢了。

現象是，這夥人裏連大小伙子們都不會跑馬了，的確也沒馬可跑了。甚至連生病都不會發燒了。人們開玩笑說，咱們都成人乾兒了，細菌也全餓死了。

人們坐在炕上閑聊，有人發現我們這些人 (甚至包括我們中間最胖的李友鈿先生在內) 緊並着的兩條大腿之間都出現了一個橫拳那麼寬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當然地消耗殆盡。

北京公安局規定看守所裏一人一天八兩糧食。每個窩頭二兩，

正好四個窩頭，一天兩頓。在北京，人們已經覺得餓得前心貼後心。據說，當年批這個定量指標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長馮基平先生。文革中，他也被關到這兒來了。人們傳說，他為此後悔不已。誰會想到，八兩糧食怎麼這麼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這窩頭之外，就一碗菜湯。甚麼菜便宜，就是甚麼湯。偶爾有點兒肉末兒，那就屬於上上佳餚了。當然，逢年過節如果「形勢大好」，我們還會有點兒改善。那陣子，我們已經被改造成了這種人——天天想的就是一個「吃」字。除了睡覺時間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較勁。

到了饒陽，每天倒是三頓，定量也是八兩。早晚各喝二兩粥，中午有兩個號稱二兩的「餅子」。就連當地的農民進來以後，第一次開飯的時候驚訝得眼睛都直了，絕沒想到伙食這麼淒涼。有人當場就掉淚，也有人用腦袋去撞牆，剛進來的人，胃酸都勁兒大。

我們喝的稀飯可以當鏡子照，身體也都和那粥差不多，餓得快透明了。可是當地人，比我們招兒多，他們很快就找到「抗饑」的竅門，那就是，越餓越得有存糧，中午那兩個高粱麪的餅子，最多吃一個。一定得咬牙留下來一個，到後半夜餓得無法睡眠的時候，一點兒一點兒，慢慢品。那就可以減弱胃酸對你的折磨。為了防止犯人自殺，每晚牢房裏的犯人都得輪流值班，每個人兩個小時。房上值班的解放軍也是每兩小時一班，他們在房頂上踱來踱去，隨時都可能點名。

這個縣城，竟然沒有起脊的大瓦房，一碼兒的平頂黃色土房。機關或有錢人家才是磚房。我們監獄因為重要，是磚房，但也還是平頂房。房頂可以當場院用，可以曬糧食，還可以放哨。

這樣的款式讓值班解放軍看守方便，來回踱步。他們在房上叫到幾號，那個號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門前大聲喊道：「二號五個犯人，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這時候要不是有存糧釘着，你怎麼熬過那漫長黑夜裏的兩小時？

我們這屋「掃地風」比別的屋子也大一號，給的煤餃子也比別

的屋子多一倍。這兒的煤球不是用篩子搖出來的，所以不是圓的，這兒是把煤末子和黃土和成了煤泥之後，就用我們的飯碗當工具做煤餃子，攏出一個個月牙形的煤泥，往地下一磕，就齊活了。一開始，這活兒都把我們這夥人看呆了，那煤泥絕對是煤少土多，那顏色一點兒都不黑，快和新四軍的軍裝顏色差不離，灰不拉唧的。我們想，這成色的煤餃子，有法兒着嗎？沒想到，這兒的煤還挺好燒，就這種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

為了節約，我們屋一個星期才分給一百個煤餃子，平均每天只能燒十四個，而其他小號每天只能燒七個。二十四小時都燒，絕對不够。所以一到傍晚我們就必須封爐子，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才打開火。封火的時候，把半塊煤餃子研成細粉再用水和成煤泥，糊上爐口以後，再用一根磨細了的筷子扎一個隱約可見的小洞。從那洞口，隱約見到煤火的紅色這樣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每夜下來，我們碗裏的剩水都結了冰，被口嘴邊那兒，都有一塊由我們整晚哈氣形成的白霜。每個值夜班的，都凍得只能坐在爐台上。所以，每個犯人棉襖的背後都有一綹如屋漏痕般的焦黃——那是封火後的微小火眼升騰出來的熱氣所為。

那時候，我和拉小提琴的楊秉蓀正好在一個房間。我們那個房間是個把角兒的大屋子，住了十來個人。別的小號才有五六個人。我們屋連炕都沒有，在地上鋪了些麥秸算是我們的鋪位。所長對我們說：這些麥秸在這裏也是「稀罕物」，麥秸比稻草隔寒隔潮，是打地鋪的上好材料。

話是這麼說，對我這個風濕性心臟病患者來說，這地鋪再「高級」，在這不見陽光房間裏地氣陰潮，照樣讓我忐忑不安。

當然，這兒也有這兒的好處。北京倒是住樓，還有電燈，還有够份量的窩頭，還乾燥爽朗。但那兒管的太嚴了，每天除了改造自己，就是批鬥別人，其餘時間都得坐在那兒學習，還得坐得筆管條直。你連找個人聊個天，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樣機警，才能偶爾進行。

這裏物質條件差多了，可是根本沒人搭理你。你愛看書就看書，愛聊天就聊天，愛幹嘛就幹嘛，只要你別打架鬧事，他們只要求你老實呆着就行了。

人生何處不相逢，楊秉蓀萬萬沒想到，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饒陽縣，見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見到過的老朋友李友鈿。你想想那年頭兒，有幾個人出過國？老楊人家是蘇聯、匈牙利雙料留學生，在那兒學的是小提琴。老楊和我屬於一個大案子進來的，都是因為傳說了文化旗手的笑話。

老李從來不說政治笑話。他本來是上海的一位名廚，陰錯陽差被外交部選中，派往國外常駐，在莫斯科和布達佩斯都呆過。在文革中，有人在國外揭發他買菜中間可能有貓膩，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聽臉就白了，那個火紅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眼溫順的他，半夜就逃出使館，企圖「叛國投敵」，結果，還是被抓了回來。

當年，老楊是使館請來的藝術家，給國際政要獻藝。老李則負責演出後給大家準備上好的佳餚。你想想，那時候他們是甚麼架勢，甚麼派頭？吃甚麼？喝甚麼？

在饒陽這裏，他們大眼瞪小眼，喝着白開水，等着下頓的黑李逵餅子。這兒的餅子剛下鍋的時候是黑紅黑紅的，近似巧克力顏色，等涼了下來就黑得像鐵疙瘩一樣。這是全高粱麪的餅子，所謂全面就是在磨麪的時候，把能磨的東西都磨進去。不出麩子不出糠。這樣的糧食實惠，所以才那麼黑。

老楊和幾個同屋的人，每個人都拿着各式各樣的本子，各種各樣的筆，一本正經圍坐在老李的周圍。老李用他無錫口音普通話給大家講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這是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固然，越寫越餓，越餓越寫。別看老李已經餓成細脖大腦殼了，可講起來菜譜，還是當年著名大廚的譜兒，言簡意賅，形容準確，細細道來，不緊不慢。專業人士就是專業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緻無比。無論中餐還是西餐都可

以錄入最頂級的菜譜。就這樣，我國的飲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傳承。

我這人雖然也喜歡吃好的，但絕不是一個美食家，所以向來對飲食文化就興趣不大，這會兒又餓得要命，他們還一本正經坐在那兒進行精神會餐，那胃臟一定更加難受。所以，我不去聽。老楊說：不會，精神會餐可以分散注意力，就減輕胃臟的痛苦。再說，你學好了這些手藝，出去以後一定大顯身手，自己徹底伺候自己一把。

當時我們屋子裏大概有十二、三個人，七、八個人都參加了那個精神宴會。

我呢，正給幾個小年輕侃故事。當我侃完一個故事，他們正七嘴八舌爭辯的時候，一位叫段鐸的小夥兒突然說：「你別就光給我們窮侃了，乾脆教教我們，也玩玩文學、寫寫詩。」

段鐸那時候大概還不到二十歲，餓瘦了更顯年輕。原來，他發現我在牢房裏靠侃故事就可以佔據一席之地。在這兒，這也算一種本事，要練別的本事，這裏邊兒沒條件。要練文學，就是練嘴、練筆，在饒陽絕對有這條件。不練白不練。

他話這麼一說，其他幾個年輕人都同聲附和，齊齊嚷嚷要拜我為師。段鐸學習的根底很好，因為出身問題，沒被大學錄取，只好上了一個中專。雖然他一直喜歡文學，可沒機會玩文學。另一個同號叫王濤，是青龍橋的一個著名玩主，那片兒住的都是正兒巴經的八旗子弟。於是，他們就開始聽我侃詩。

年底之前監獄進行調號，把老楊和老李他們都調走了。

我和這些北京來的小伙子們還留在這個大號裏，就開始一起寫詩、評詩。段鐸是個非常聰明的青年，他本來是在中專學電機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詩、舊詩，讓他體會詩的意境是甚麼，優美在甚麼地方，如何在文字裏寄托筆者的情愫。

從蘇東坡的《水調歌頭•大江東去》到柳永的《雨霖鈴》，從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到艾呂雅的《你好，哀愁》等等，我

給他瞎背一氣，他就瞎記一堆。

別人聊天的時候，他就在那裏瞎背。為了記得清楚，他就把剛躉來的貨都抖摟給王濤。不用幾個月，他和王濤，還有景山東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從我這裏躉去的二手詩作。

後來，以小段為首的這夥孩子，一人釘了一個本子用來抄詩。後來，把我搜腸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只好一起命題自己來寫詩，每個人都寫。他們各有千秋，全都進步神速。你想想那個王濤，本來是個玩主，現在居然和我們一起寫詩。小亓喜歡寫古詩，寫完後也和我們切磋一番。小段兩樣都試試，雖然他是淺嘗輒止，寫的詩味還是很濃的，對一個學理工的孩子來說，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我們都沒睡覺。除了留下來中午的一個餅子以外，我們還把晚飯稀飯裏的胡蘿蔔，也留了下來當年夜飯。我們把胡蘿蔔圍放在「掃地風」的火口邊，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蘿蔔。吃起來有點咬勁兒，還香甜無比。後來，看到莫言的小説裏描寫的透明胡蘿蔔，似曾相識。那天晚上，我們約定在一小時內各自寫一首詩。

王濤寫了一首自由體的新詩，題目就叫我們大為驚嘆——《我是流氓！》他生動熱情地標榜自己就是一個流氓，談到流氓的快樂，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們紛紛叫好，每個人還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個流氓！》、《我心裏就是個流氓！》、《我也想當個真正的流氓！》

我們輪流朗誦，笑得滿地打滾。那時我們非常快樂。我們把這幾首詩釘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術字寫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樂的流氓》。我看大家越來越上癮了，寫作熱情高漲，就説：乾脆咱們辦個報紙，當年在渣滓洞人家陳然還辦了個《挺進報》，咱們也在這裏辦個解悶兒的文藝報，怎麼樣？

他們三個齊齊喝彩，我就開始主辦這個報紙了。其實，每次只是一張大紙，那是我們用粥把幾張紙粘在一起。這張報紙只有正反兩面，一共兩版。我本來就是學美術的，所以我先畫好了版樣，他們的稿子，也都由他們自己抄寫在預留給他們的版面上。我還給每

首詩都畫了插圖。用了兩個下午，我們第一期就出版了。

當然，我們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後，大家悄悄傳閱。當然，只是在我們這幾個人中間，多一個人看了，我們被發現的機會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別近的朋友，決不傳閱。我們本來商定，看完就毀掉，可是，每次大家還是捨不得，於是就分別保存着。我們說好了，誰的萬一被發現了，就說是自己寫着玩的，別人就盡快銷毀。

陰曆大年初二，又調號了。這次我分到一個只住五個人的小號，和楊秉蓀分在一個房間，我很高興。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時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報給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樂，拼命忍住笑聲。不過，他抹抹眼睛，嘆口氣，說：「別捨不得，快點兒銷毀了吧。這地方，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說得對，我就是為這種罪折進來的。於是，立刻把它塞進了火爐，眨眼間，這張報紙就化為一縷青煙。這也是在縣大獄的好處，這裏沒有暖氣。冬天只好生爐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銷毀點兒甚麼就沒這麼容易了。這裏銷毀一篇文章之類的東西實在太方便了，原始環境有原始環境的好處。

二

我本來想過兩天找個機會告訴他們仨，都銷毀了才保險。可計劃不如變化。

大年初四 (一九七〇年二月九日)，監獄裏人們前兩天遇上了難得的改善，肚子裏終於有了點兒寶貴油水。混了個肚兒圓，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來。

剛喝完早飯的粥，張所長就提了鏡面盒子炮上了房，解放軍也在房上架起了機槍。這裏的犯人們，非但不會為此而緊張——對他們來說這早就是家常便飯了——反而都興奮起來。人們嘀嘀咕咕：「有戲！今兒肯定有戲！」哪齣戲並不重要，有戲就有得看。

老張頭看各路人馬都佈置齊了，在房上開始發話：「田壽鵬，

出來！打開庫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來，再到庫房把自己東西都拿出來，在當院打好鋪蓋卷，然後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誰誰出來。」人們都興奮無比，人挪活、樹挪死。再不挪，我們耳朵後頭該長青苔了。

「索家麟，王濤，宋惠民，朱章濤，田樹雲，張郎郎……」老張頭兒這麼挨個點名，接着他還點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對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賀，說：好啊，你小子發了，別忘了我們哥兒幾個。我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說：「發甚麼發？純粹是騎驢啃燒鷄——這把骨頭指不定扔哪兒呢！」人們紛紛說：挪就好，挪就好。

乾淨麻利快，沒過幾分鐘，被點名的這七八個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裏。然後，老張頭一個一個往外叫，間隔大約五分鐘。

輪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兒一看，頭皮頓時就麻了。先出來的那幾位都已經加工過了——被砸上了死銬、死鐐，傻大黑粗還都帶着鐵鏈子，和電影裏見過的那些死囚的行頭差不離。我被命令坐在地上，兩個警察叮哐幾下給我砸上了死鐐，又給我帶上了死銬。我想：也許這是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這麼大的陣仗。

然後，我們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門外。大年初二的饒陽縣城響起一片清脆的腳鐐聲，打破了清晨的寂靜。

沒想到我這寧靜的七十年代剛拉開幕，就鬧這麼大一個響動。我們走到監獄大門口，這條街已經被封鎖了，遠處街口堵滿了翹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們自己提着行李，走到車邊交給警察，他們和當地的工作人員一起，把我們的行李綁在汽車頂上。我們這些叮叮鐺鐺的人，陸續上車坐在指定的位子上。過去聽老獄底們說過，這種捯飭的犯人被戲稱為「嘩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開車前宣讀了一篇甚麼文件，那文件並沒說為甚麼要挪動，去哪兒，幹甚麼，只是警告我們在押送途中，必須老老實實，否則「勿謂言之不預」。他們從來不說要緊的，光說萬一的。

我們路過冀縣，那裏也有一批犯人上來，上來的也全是「嘩啦

棒槌」。打頭兒的是位名叫孫秀珍的女犯，在監獄學習班的時候，我就和她認識了。她可是這兒的第一大美女。後來，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樹雲大夫關在一起，可以說，我和他們倆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對視的時候，微微一笑，看來，她在冀縣也關煩了，也覺得只要挪動就好。

你別聽她這個名字簡直俗不可耐，可她那個人，絕對清純出眾。我們進了監獄學習班，第一次集合的時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時候，我在監獄裏已經關了一年了。人們說：這時候男犯眼裏「母豬都賽貂嬋」了。可我到底還是美術科班的，別看她一點兒不張揚，一點兒不打眼，低眉順眼，說不出的溫柔而迷人。在鐵窗水泥塊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會兒，多數男犯的目光都被外號叫「餡兒餅周」那位女士給吸引住了。她的確是北京著名老字號餡兒餅周家的嫡孫女。可能因為是回民，所以皮膚白裏透紅，濃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眾人眼球。

當時，孫秀珍風度與眾不同，是典型的知禮小女子。我誤以為她是個日本女孩兒。在聽別人叫她的時候，聽錯了，以為她叫「庫里」或者「庫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國際關係學院日語系學生，他悄悄告訴我：「如果發音是庫里的話，那就是黃昏的意思。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那麼迷茫，那麼優雅。」原來，他也和我一樣為她暈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筆寫了類似「暮扎」兩個漢字行書，這在日語裏讀作庫里，意思是黃昏。每次開會，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樣經過孫秀珍的身旁，可她視而不見，一點兒反應都沒有。小薛以為，這是她應有的矜持。

後來，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忘了這是甚麼地方。半夜我倆推心置腹，發現我們倆心儀的對象並不重合，都鬆了一口氣。他告訴我：他喜歡的是「餡兒餅」周，我告訴他我喜歡的是「庫里」。我們倆反復商量如何向她們表白——在鐵窗中照樣有熱烈真誠的愛慕。

有一天開大會。周姑娘帶領女犯隊伍入場，她是小組長。看得

出來，她這種長相的人，單純大方，心地善良。老天有眼，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面。好啊，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我連忙寫了個紙條：「周同學，你好：請問，坐在你後面第三位那個女同學叫甚麼名字，能告訴我嗎？張郎郎」我把紙條疊成了團，回頭看看沒人注意，低聲說了一個字「信」，手一垂，就扔到她鞋邊兒。她似乎沒聽見也沒看見，直視前方認真聽講，還一邊兒記着筆記呢。我心裏開始七上八下：糟了，要是她不接這茬兒，我不就現了嗎？我心如大鼓一樣咚咚響。再仔細一看，那紙條已不見踪影。我鬆了一口氣。老天爺，行，這姑娘真够麻利的。我又回頭假裝四處張望，人們都在認真聽講呢。她自言自語咕噥說：「小心有狗。」嘿，她真是膽大心細，還不忘給我提個醒。

散會時，她站起來整隊，帶隊退場。路過我跟前，她望着前方喃喃說：「原來意在沛公啊！」哎呦喂，原來已經看了字條，還不大高興。但願這誤會別讓她就此跟我翻臉吧？心裏繼續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咏活動，路過我身邊，她也扔給我一個小紙團。是這樣寫的：「張同學，你好：她叫孫秀珍。這樣通信太危險了。以後，你把信用圖釘釘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這封信，喜出望外。嘿呀，這孩子真聰明，簡直是個天生的地下工作者。於是，我們倆趕緊分別給她倆各寫了封信。傍晚倒土，我們倆自報奮勇，抬着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釘在箱底兒。把土箱就留在那兒，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們就這樣建立起來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老七天天幫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邊呢，是由周姑娘和學生李世佺倒土。後來，李世佺告訴我，小周很聰明，知道孫秀珍案情嚴重，而她和小李從進監獄就關在一起，信得過，決定讓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剛開始，小周沒想到老七會給她寫信，有點兒意外，猶猶豫豫，但老七勇往直前，坦誠熱情。很快他們就進入白熱化。我和孫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溫。當然，這一切都在虛擬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個年代，誰都沒想到在會監獄裏發生這樣的童話故事，我們四個人都非常珍惜。

在監獄學習班，幾乎所有犯人都發現就我們四個精神抖擻，跟打了雞血似的，覺得其中必有蹊蹺，時不時旁敲側擊。而我們倆只能裝傻充楞。

在學習班認罪階段，孫秀珍做了發言，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樣都有「裏通外國」的罪名，而且她案子裏還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生死相依呀。即使如此，也不影響我給她寫情書的熱情，她和我的通信中對那個主犯一個字也沒提。

那時候在監獄，早已告別了社會上的生活與身份，交換這柏拉圖式的情書，我們都很愉悅，讀得臉紅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裏最艷麗的一道晨光，顯示着頑强的生命力。

可惜，在一號通令下，我們並沒被分配到同一個地方。

我們是鄰縣，她和英若誠、吳世良兩口子、學生李世佺等人都被發配到了冀縣。她從冀縣上車來，即使她變成了「嘩啦棒槌」，可舉手頭足還那麼風韻萬般，她見到我的時候還有些害羞，臉微微一紅，低頭笑了。依然那麼天真，那麼動人心魄。

然後這車就撒開了往北開，路邊的城鎮飛速後退。深州、安平、獻縣、河間……我知道了，這車離北京越來越近了。我興奮了起來，本以為在這備戰時期，一時半會兒絕回不了北京呢，這一大挪動還真不賴，心裏就湧現出小學課本裏的詩句：

「車過鴨綠江，好像飛一樣。祖國，我回來啦！祖國，我的親娘。」在我心裏改成了：「北京，我回來啦！北京，我的親娘。」可惜，那時候的汽車可沒現在的那麼快，還沒飛起來。

一直到凌晨兩點，我們的車才開到北京。輕車熟路，又開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半步橋四十四號。

幾輛大轎車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場上，操場四周裏三層外三層地圍滿了警察，而在警察外面，還有荷槍實彈的軍人。那時候的警察也都穿着軍服，不過他們沒槍。在這地方，我們管警察都叫隊長，管軍人都叫班長。從這些大轎車裏湧出了幾十個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嘩啦棒槌」，在隊長們的指揮下，我們稀裏嘩啦地走向操場的西北角的小門。

我頓時明白了：今天的「戲」是要命的戲！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橋這個大院裏，關押犯人的建築一共分為二十四個筒。所謂筒，就是建築物裏的筒道。分屬於三個部分。K字樓，三層，每層四個筒，從一筒到十二筒都在這個樓裏。五角樓，兩層，每層五個筒，從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這個樓裏。第二十三筒，官稱死刑號。就在西北角的這個小院兒裏。二十四筒，是後來新蓋的也在這個小院兒裏。這兩個筒是死刑號，也被犯人稱為「槍號」。

我關押在看守所裏學習班的時候，有機會出去勞動，也來過這個小院裏幹活。一次是打掃新蓋的二十四筒牢房，二十四筒裏有幾間牢房「設備先進」，那就是所謂的橡皮監獄，四面的牆都釘滿了泡沫塑料，和沙發差不多，關押一些特殊犯人，讓他們沒法自殺。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間，就是拉一個小車把剛剛騰空的槍號裏所有東西都堆到小車上，推到庫房那個院子裏。據說，事後會有犯屬來這裏領取遺物。當我看到那雙皮鞋，心裏就感到非常彆扭，因為我知道昨天這雙鞋的主人還活着，而現在，說沒就沒了。

還有一次，是幫這兒的警察沖洗死銬、死鐐。上面確實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沖洗乾淨後，幫警察裝箱，留給後人用。幹這些活兒的時候，我萬萬沒想，竟然會輪到自己。

我們這些人一字排開，面對小院兒的高牆蹲在地下。這裏的强光燈明如白晝，連我對面老牆上的青苔一絲一毫都歷歷在目。這時候我才注意到，這個現代化的大院兒裏竟然還保留着這麼一堵歷史性的老牆。那些磚縫都磨凸出來了，每塊磚的風化程度不同，因此各有各自的風姿。我聽說過，這裏曾經關押過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的汪精衛，還關押過著名的川島芳子——金璧輝，據說她就是在這個小院裏被處決的。

我們身後的警察開始叫名字，叫到誰，誰就到院子中間的桌子那裏去登記，然後拿着自己的東西進入筒內。

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經一年半了，被提審了幾十次了。一會兒說要寬大，一會兒說要從嚴。時間長了，人也就皮實

了。後來知道了，無論他們和顏悅色還是橫眉豎眼，無非是要我交待背後「長鬍子的人」。邏輯很簡單，我講的那些笑話和「反動謠言」，如果交待出「謠源」，我的罪過不過是個傳謠者。如果交待不出來，我就是個造謠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個傳謠者，也許只判個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謠者，就可能判個無期，最少也得二十年。這年頭兒數字，對我說來都差不多。要是為了從寬，交待出來別人，我關了三、五年出去，照樣還是個現行反革命，還得內疚一輩子。再說，在裏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難過，何況，二十年後指不定怎麼樣呢。所以，無論他們來軟的還是來硬的，我還是那樣，我心裏有底。每次，我都會自問：最壞又能怎麼樣？自己觸觸底，心裏反而踏實了。

這次，我蹲在那裏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樣來思考，最壞又怎麼樣？突然發現，心裏沒底了。最壞？那就是玩兒完了。「雜耍要收場了——沒戲啦！」正這麼想着，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們把我的名字登記在冊，然後讓我打開行李。只讓我拿了一條被子，一個臉盆，一條毛巾，牙缸、牙刷、牙膏，一個飯碗，還有一本毛選。其他衣物，連褥子都不許帶，就揮手讓你進號。前面一個警察領路，自己稀裏嘩啦跟在後面。我心裏想，進去以後趕緊問問同屋老犯人。進屋以後才知道，每屋只有一個犯人。心裏沒底，照樣沒商量。

我像一個麻包一樣，「咕噔」一聲坐在炕箱上。也好，終於可以自己安靜一會兒，放鬆下來。讓繃緊了一整天的神經，稍微緩一把。

三

死刑號裏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還是封死的。犯人無法鑽到床下去，也無法把東西藏到床下。炕箱佔了整個屋子的四分之三，只是在靠門那邊留出了一條水泥地，那裏還有一個抽水馬桶。在普通牢房裏，絕沒有這個設備。在馬桶後面的牆上有一個觀察孔，上面

嵌了玻璃。另一個觀察孔則在牢門上。這和其他牢房一樣，那觀察的小窗戶旁邊有個按鈕，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這個按鈕。和醫院一樣，你房號的那牌子就會翻下去。這裏的牢門有兩道。裏門是動物園那種鐵柵欄，外門則是厚厚的鐵皮木門。在木門的底部有個貓洞，原來可以從這裏把飯遞進來。人們想得很周全，一個犯人鎖到這裏頭以後，不用打開門，吃、喝、拉、撒、睡全都解決了。

我心裏沒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絞盡腦汁的時候，聽見有人打牌兒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細聽來：「報告班長，和我一批進來的犯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因為我有重要的問題要交代，才留了下來。你們怎麼也不提審我呢？」一聽到這嗓音、這腔調，我就知道了：這是遇羅克，他是利用報告班長的方式告訴我們，我們來到這裏意味着甚麼。一句話：每個人都要準備走上刑場。

這就是遇羅克，這就是他的風格。他在監獄裏無論甚麼時候，都那麼主動，那麼從容不迫。從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

大約在我進監獄半年左右的時候，官方安排調號，把我們倆調到六筒同一個房間。那時候，他在監獄裏已經非常有名，人們都知道他，是因為一篇轟動全國的《出身論》而被捕的。

此前，在「血統論」籠罩下發生了八一八後的紅色恐怖，當時，全國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壓得喘不過氣兒來。遇羅克借着形勢的變化，橫空出世——一篇《出身論》如彗星劃破漆黑夜空。而出版這篇文章的《中學文革報》，一時洛陽紙貴，風行全國。每天，遇羅克和這個報紙編輯部收到的讀者來信，得用麻袋來裝。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簡直形成了一個類似狂熱會道門似的旋風。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關方面注意到了……最後，決定抓捕遇羅克。

遇羅克從進來那天起就沒有屈服過，他似乎就是個天生盜火者。他把入獄當成必然的結果，這裏是和當局智鬥的現成平台。他

理所當然地成為當時人數眾多「被侮辱被損害」弱勢群體的精神領袖，先行者，也是個殉教者。

而當時，我的罪行中還有所謂「聯動思想後台」這麼一條，因為我當時的許多小哥們兒都是聯動的骨幹。其實，在他們最得意的時候，我卻堅決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那個血統論對聯。我認為，這和德國法西斯的「人種優生」一說，沒甚麼區別。

我是在他們被江阿姨耍了之後開始思索、最不得意時候，才和我成了哥們兒。他們還救過我一把。

最近，在北京我和這些老朋友相聚的時候，大家在笑談中，都認為當年當局這樣給我定這個罪實在荒唐。其實，當時他們真正的思想後台，應該是石油學院的老范，而我是他們文化藝術的啓蒙者。

我壓根兒就是一個說書人。當年，這夥老紅衛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靜地圍坐在我的周圍，從《基督山恩仇記》開始，一本本中外名著聽下去，給他們打開了一個從未接觸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樣能讓他們迷醉。他們不讓我休息，輪流給我倒茶，給我點菸，甚至給我買來飯。除了上廁所，或者最後累得睜不開眼的時候，我們才橫七豎八地胡亂睡去。醒來，再接着侃。

在這之後，這幫老紅衛兵看書，找書蔚然成風。

這些聽眾中後來也寫東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還有紅衛兵發軔者之一楊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勛，老謀深算的老范，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老賀，浪漫騎士哥兒倆老狗和小濤，後來老狗一度天下聞名。還有第一個在大會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別那麼狂了」的蘇色，等等，那真是「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居然，這些人都被我一個說書人的書給拿住了。後來，聞聲趕來的彭小蒙，還撲了一個空……

那些日子，我除了講故事，還愛講笑話，當局正賊着誰在散佈旗手的笑話呢。你想想，再不通緝我那就怪了！

貼着我兩寸照片的通緝令貼滿大街小巷，讓我無處遁形。第二

天，所有的照片都被嚴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給撕下去了。

當時北京公安局的軍管會，把我們倆——這兩路水火不容人馬的禍頭子，居然放在一個房間裏。也許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當局萬萬沒有想到，我們竟會殊途同歸。兩個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竟有同樣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會不同的層面，竟有同樣的價值系統。一個是出生延安的紅孩子，一個是「工廠主」的後代，居然會有類似的思維框架。

開始我們倆互相提防，互相看不上，到後來我們爭論辯解，推心置腹，終於變成了朋友。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們自己的意料之外。

即使如此，我們倆在監獄裏的生存方式，還是大不相同的。

遇羅克在獄中一直在和當局惡鬥，樂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當局不懈纏鬥，還自願充當宋士傑，幫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寫狀子，出主意，爭取最輕的判決。他真是一個天生鬥士，而我卻是一個魂不守舍的散漫學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後，認為我的案情太複雜了，靠我自己根本無法解脫。他告訴我，進來之前，他已經設法和陳毅老總建立了聯繫。他相信陳毅先生是個明白事理的開國元勛，等他出去以後，一定會為我去斡旋。否則，我那罪行，弄不好讓人玩兒個底兒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當今的法。聽了這話，我心情沉重，但又覺得不至於吧。對他的好意，還是很感激。我心裏想：他不太了解我黨的高層運作，估計他的許諾根本做不到。即使如此，有這句話，也就够了。

後來，我被調到監獄學習班去學習，那時候，我以為自己的問題很快將得到解決。在那兒，見到了侃侃而談的老丁，原來他就是負責遇羅克案件的主審員——丁大個兒。犯人們小心地問他：遇羅克的問題會怎麼解決？丁大個咬牙切齒地說：「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認罪，以為我拿他沒辦法。好啊，我不信那個邪，咱們就

耗吧！總有一天，他一定得趕上點兒。」

他和丁大個都不幸言中，我和他都折進了死刑號。

我萬萬也沒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撓的他，竟然也折到了這兒。但，到了這兒，他還是值得佩服的。都甚麼時候了，誰還能像他那樣——自信而主動，不亂半點方寸。

也許，明天早上我們就要走上刑場了。這晚誰還能入睡？我躺在炕箱上，看着高高房頂上鐵絲網罩裏的電燈。走廊裏，還有人陸續「叮噹」進來。看來，我們是新來的一批人。也就是說，我們是下批要被執行的人。許多人都曾問過我，那時候你害怕嗎？

用「害怕」這個詞都難以形容當時我的心情。我就像一個看見蛇的老鼠，被震懾住了。腦海裏一片空白。我，死刑，二者怎麼相連？整個不明白。我的「罪行」無非就是「胡說八道」，就至於非槍斃不可嗎？可是毋庸置疑，這兒可不是在群眾專政的時候，這不是嚇唬人的那種虛張聲勢。鍋是鐵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號，這就是事實。遇羅克僅僅是為一篇文章進來的，他也沒想到會進死刑號。何況你呢，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腦子以極快的速度，把自己這輩子的經歷，像過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我在審視自己，到底我做錯了甚麼？多年來，理想主義的教育，讓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就有標準，必然有對錯之分。我嚴格地用當今法律來檢測自己，最後得出了結論，我沒錯，是他們錯了。這樣，我的心裏似乎踏實了一些。我想起來，在牢房裏玩寫詩遊戲的時候，我曾寫下過這樣的句子：

我們都是快樂的青年，
為自由被關進了牢監。
我們的道路是自己選定，
絕不後悔也永不改變！

我知道，寫這些句子的時候，就是認定自己沒有做危害國家和社會的事。在一個歷史大潮中，在一個轉折點上，一定得有人被當成籌碼，當成犧牲品。而自己的最大過錯，不過就是為自由二字而已——自由的創作，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話語。

我明明知道，當時的社會是不允許這類所謂的獨立思考，我還是選擇了這樣的生存方式。現在，人家和你玩真的了，真要為此殺你了。你的認定就出了問題。那，你還會認同這樣的詩句嗎？我知道：按照專政程序，無論現在你再說甚麼，結果都一樣。即然如此，這幾句詩依然還可以蕩漾在我心中，讓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個立足之地。

這世界上，沒有賣後悔藥的地方。我曾經是一個非常喜歡女孩兒的文學青年，要寫詩、要畫畫，也有震震她們的潛意識。讓我最後悔的是，我居然沒有和她們其中任何一個人有過傷筋動骨的羅曼史。這時，我就和法國作家左拉所寫的《盧貢家族的命運》那本書中所講的故事如此相似：一個青年軍官在告別未婚妻之後第二天就戰死疆場，沒有圓房，留下永恒的遺憾。

我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在杭州龍井和定粵姑娘定的婚，同年六月十四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一九七〇年二月九日我被送入死刑號，也來個永恒的遺憾。

好在，我和她分手的時候，告訴過她：「別等我了，走好自己的路，你有幸福的未來，我就知足了。」所以，這會兒，這世上我沒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為誰擔心，只是為自己短暫的一生有些許惋惜。

那天晚上，我們這些死難臨頭的人，還舉辦了一場死刑前的晚會。因為，我們都是在倏忽間，突然人人都要面對死亡。我們都在這强烈震撼的磁場中，每個人都希望走好這最後一步。好在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文化裏有濃厚的戲劇根底，於是中國人的骨子裏也染上了這種色彩 (也許幾百年來崑曲繁盛，强化了這種色彩)，人如戲子，人生如戲，遊戲人生，戲劇人生。最後這一齣，咱們絕不能含糊。

我記得有一篇日本小說，叫《喬遷喜麵》。說一個犯人調到一個新的單人牢房，其他牢房的犯人說，搬家就得請大家吃喜麵，在這兒就得給大家出個節目。於是，他伸手穿過鐵窗摘了一片綠葉，用那樹葉給大家吹奏了一支兒歌。

那晚，我們也如法炮製，人人都躺在炕箱上，開了這個晚會。每當隊長或班長們聽到了甚麼響動，就打開辦公室跑來查看各個牢房。一看，死囚們都在安靜的酣睡中。他們查完號後，再回到辦公室關上房門繼續暖和暖和，而我們則躺在炕箱上又開始小聲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經教給過遇羅克的蘇聯歌曲《光榮犧牲》，據說，那是列寧最喜歡的歌：「忍受不自由莫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你英勇地拋棄頭顱……」唱到這兒，我覺得這支歌就是為我們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熱血沖到我的胸前，一時不能自己。

突然，我不再小聲哼哼，而是開始放聲歌唱，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聲唱道：

「哦，我的太陽，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在死刑號裏，我還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這還是在老七家學的呢，我估計這也是前無古人的第一遭。至少，我還沒聽說過汪精衛、金璧輝他們學過意大利文。猶如石破驚天，一時間，隊長、班長跑出來一走廊，腳步雜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們依然那麼安寧，似乎還都在睡夢中。他們小聲七嘴八舌嘀咕着：「肯定是做怕夢了。」「準時撒囈症。」「到這兒來能不作怕夢嗎？」然後，腳步漸杳，又都走了。我笑出聲來，天哪，我居然還笑得出來。那晚，我們繼續唱歌，用不着再低聲吟唱了，也犯不着縱情怒唱了，我們只是在唱人間熟悉的歌。他們也不再出來折騰了。

我開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歡唱的意大利歌曲《來到海上》，別人都靜了下來，聽我的歌。那時候，會這首歌的人還不怎麼多。我唱完了。他們就小聲說：唱得好啊。聽見這話音兒，我就知道，他們這會兒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門前，趴在觀察孔的小窗戶旁邊呢。嘿，我都沒聽見任何動靜，他們就都下地了。頓時我就明白該

幹嘛了，我也在炕箱上，抬起雙腿，然後綳直兩條腿，把腳鐐的鐵鏈綳成一條直綫。然後坐了起來，再轉動一百八十度，整個過程中沒有鐵鏈碰撞的任何響聲。這時，我已經坐在面對牢門炕箱上。我依然綳着雙腿，落在地上，然後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戶旁邊。這時候，我才聽見，人們早就起來聊天了。這會兒，誰都不會去睡覺。不久就會永睡不起了，夢醒時分變得無比珍貴。

我們來看看這些小聲聊天的人們。

索家麟和王濤都是旗人，索家麟說，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為他的祖先索三是內府的，就是今天說的大內高手的頭兒。在他們那個圈兒裏，內府的比八旗子弟還高一等。索家麟從小就習武，這些練家子供奉的是「達木蘇王」。而王濤屬於玩主，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這些團夥，在政府眼裏那會兒自然就是反動集團了，說他們要成立一個莫須有的「救國軍」。這會兒，他們聊得好着呢，沒一點兒肝兒顫的意思。

宋惠民據說是歷史反革命，在運動中逃命，越過了黑龍江。據說，讓「蘇修」裝到麻袋裏，又扔回了國境。他也興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這田樹雲可不是個等閑之輩。他告訴孫秀珍，為了未來的幸福，她必須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蘇聯大使館的小轎車裏。孫秀珍從小就沒關心過政治。即使如此，也沒過過幸福的生活。為了自己愛的人，她鋌而走險，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將田某寫的書信，投入到那些黑牌車裏，一次都沒被抓到過。最後一次，也許是她看花了眼，也許是公安局下了套兒。總之，那次投信後，很快他們就被捕了。

至於我和老七，除了「惡毒攻擊中央首長」的罪行之外，還有裏通外國的「罪行」。我的專案組組長說：事實上，我已經是法國間諜了。我的上綫就是留學生馬麗雅娜。正好在審問我的時候，《人民日報》刊登了法國紅衛兵走上街頭，而其中的一個學生領袖就是瑪麗亞娜，嘿，還有照片。在巴黎他們緊跟打倒資產階級法權的毛思想，人們把他們稱為毛派紅衛兵。

我反問這專案組長：我的上綫怎麼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

他很平靜地回答我：「也許她在巴黎是個革命者，是個毛派紅衛兵。在這兒，她的身份就是法國間諜。」

「你說我是間諜，出賣情報。她一分錢也沒給過我呀。」

「你主動提供，說明你更反動。」

我們之中，除了遇羅克之外，還有個不同凡響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還在北大歷史系三年級時就被打成右派而開除。後來，困難時期後政策緩和。他居然被當時近代史所的領導劉導生和院領導黎澍破格錄用。然而，到了文革，他們倆為此挨鬥無數次。沈元處境之悲慘則可想而知。他最後也化妝成黑人，逃向蘇聯大使館 (一說馬里使館)，自然成了長期蓄謀，叛國投敵。

還有，還有，還有。我們一起聊天，有的生，有的熟。現在，我們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條生死地平在綫上。

沒甚麼奇怪，幾千年來就是這樣：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我們平靜地聊着彼此的案情，發現個個都頂着那麼大的帽子，如今我們都是最合適不過的對號入座者。我們聊着，聊着，估計過不了幾天，就要一起共赴黃泉了。還互相開玩笑，最後，咱誰都不許當場就尿了，都硬氣點兒。誰先到上帝跟前兒，別跟惡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兒，就沒定量了。全悠着點兒，等大伙到齊了再一塊兒唱歌。我們在那個磁場中，似乎找到了最後自尊的支點。這時候還照樣瀟灑依然，我們對自己就有點兒小小的自得。

聊着，聊着，有人說：「真的，家裏人這會兒不知道會怎麼想呢？」「就是，就是，要是他們知道我們最後，還開了晚會，還都樂呵呵的，那就好了。」「我說，咱們這裏頭，誰還有可能活着出去？」

我們公認，只有那個小不點兒——他是個小佛爺，那不至於上刑場。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金豆兒。

我不禁笑了起來，說：「誰會想到，咱們這會兒還開晚會，還唱歌，還聊天。」

「是啊，這就叫：望鄉橋上唱小曲——一群不知死的鬼兒啊！」

「你們心裏都和明鏡兒似的，還有甚麼放不下的？」那小佛爺問道：「萬一我出去了，一定把話給你們帶到。」

「我們就想讓家裏知道，最後的時刻，我們沒瘋、沒傻，沒哆嗦，我們平靜、輕鬆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後幾步。你丫出去了，一定帶話給我們家，告訴他們，我們最後都樂和着呢。」

「好吧，放心吧，各位大哥，到時候我一定把話帶到。」

別看人家金豆兒一個小佛爺，照樣仗義。

第二天開始，本來以為這就拉去盧溝橋了。沒承想，哪兒那麼便宜啊。政府給我們這幫人每個人準備了一份罪行資料，並且都已經分發給全北京市的各個單位，直至街道，要求傳達到每個人。一不留神，我們也爆得大名了。

實際上，我們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給人民當反面教員。很簡單，這不過就是傳統的殺雞儆猴把戲而已。

第一場批鬥，我就大概清楚了當局的目的。

我們除了原有的手銬腳鐐之外，還在脖子上勒了根兒麻繩。倆警察一左一右，中間的警察用膝蓋頂着我的後腰。同時，手裏攥着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繩。人家就還算客氣，事先警告了我，要是敢乍刺兒，就立馬給我來個鎖咽喉。會場前面多少排，全坐着民兵，手裏還拿着半自動。

人們批判我們的台詞，都是當局事先印發下來的。而高喊的口號，那就是實話實說。甚麼「萬里江山萬里營，八億人民八億兵」，甚麼「備戰備荒，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甚麼「保衛鐵打江山，開除先行反革命分子球籍！」甚麼甚麼的。敢情拿我們開刀，還不就是為了打仗麼。

戰前用另類來祭刀，那是歷來必要程序。古已有之，中外皆然。記得《戰爭與和平》那本書裏，描寫過庫圖佐夫放棄莫斯科最後時刻，也和北京一樣把監牢裏某些「莫須有罪」的叛國者，拉到大街上游鬥，最後被活活打死。

雖然在小說看見過這種連獸類都臉紅的暴行，對受難者無比同

情。誰想到：有一天竟輪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場回來，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面。原來他就關在我的隔壁。進號之後，趁着隊長們正為死囚入倉而忙亂的當兒，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對老七說：「看毛選。」然後，我就開始輕輕敲牆。我試圖用毛選當密碼本，用分節的敲擊聲分別代表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以此傳送信件。

敲了半天，他好不容易開始明白了我密碼的意思，準備有所回應時，我卻忽略了再輕的敲牆聲，照樣可以傳到隊長的耳朵裏去。正當我全神貫注敲牆的時候，突然，牢門洞開。兩個隊長抓我一個正着。沒話可講，我被立刻調了房間，同時，把我的手銬改成了背銬。

其實，我們也沒有甚麼機密可言，無非來日無多，只是想最後的交流和訴說。

人，是有預感的。在饒陽縣的時候，有一天半夜我從噩夢中驚醒。醒來以後，夢中的畫面還在眼前，揮之不去。我夢見和許多朋友，坐着大卡車在黑霧行進。感覺還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見不到警察。那卡車就走到一條奇怪的街道上。街道兩旁有無數的小巷，我們的卡車路過每個小巷前都停一下。為了看清看小巷口懸掛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有許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裏明白，這些都是即將執行死刑的人們。怎麼會這樣呢？突然，我明白了，我們這輛卡車裏的人，現在還都五彩繽紛，我們也將進入某個同樣的小巷，我們也將化為鬼魅似的照片。這時候，我一身冷汗醒來了。當時還慶幸，還好不過是個噩夢而已。

如今，這個噩夢幾乎是不差毫釐地再現了出來，我想：那一個個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執行的人。而我們就是急匆匆的後來者，而當局印發討論判處我們死刑的資料，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進了死刑號以後，每天即使入睡也絕不香甜。每時每刻一種尖銳的肉體痛苦無法停止，如刀割心頭。那時的噩夢已經沒有了以前的那種複雜情節和過程。老是夢見自己漂浮在一個漆黑的地鐵裏，

地鐵裏似乎發生過地震，到處都是橫七豎八的鋼鐵框架、水泥碎塊、石柱木樑，我就被擠在一個狹小的夾縫中。冰冷的地下水一點點漫上來，自己的鼻子緊貼在地鐵的穹頂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會窒息，沒有任何逃脫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後淹沒。

每天在醒來前一秒鐘，似乎心裏快樂了一下：哦，原來是夢。可是，立刻又在尖銳的痛苦中醒來。原來，我還沒死，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數時間都是非常單調和無趣，只是在無邊苦海中掙扎而已。沒有甚麼值得你去回憶，只有兩種狀態，讓你難忘：要麼你在苦海裏急速下降，隨時會被溺斃。要麼你從海底迅速上升，將吸到新鮮空氣，會看到藍天白雲和陽光，還有你苦海的地平綫。

在死刑號的日日夜夜，我都被壓在鉛一般沉重的水底，像終極前的苟延殘喘。

每天，在兩場批鬥之間，我們在分局吃午飯、喘喘氣兒。田樹雲大夫小聲告訴我：「別灰心，馬隊長告訴我了：對咱們是批判從嚴，以後處理從寬。」他那雙眼睛裏居然還充滿着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見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他問我：你說會怎麼判？我說：死刑。他微微一笑，說：「沒那麼便宜吧？多半兒得去長年苦役。」我說：「不可能，遇羅克說了，上一批都挺了。對咱們這批就特別寬大？別做夢了。」他默默看着我，甚麼都沒說。回號以後，他就開始發瘋了，有人說是裝瘋賣傻，有人說是真瘋。反正最後的日子，你打算如何扮演這個角色，也是一種選擇。

有一次，在重型機械廠禮堂的後台等候出場的時候。孫秀珍進來了，和我打了個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學習班那樣——儀態萬千，甚至還不如在冀縣上車的時候，她那會兒還那麼精神，那麼從容。這時候，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樣，看到我，微微一楞。眼圈兒頓時就紅了。

在隊長的命令之下，我們倆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開始抽搐，哭了。

一個女隊長輕輕踢了踢她，說：「哭甚麼哭？今兒怎麼了？你不是挺豪橫的嗎？」她似乎無知無覺，自己繼續啜泣。

多年以後，我遇見了她當年的同屋——北京醫學院的學生李世佺。她告訴我，孫秀珍家裏是個小康人家，姐妹三個。一九四九年前父親是個小業主，很早就過世了，三個姑娘都心靈手巧，特別能幹。

老二孫秀珍骨子裏是個愛情至上的弱女子，卻也是個典型「紅顏薄命」。她溫柔多情，從骨縫裏透出來嫵媚秀麗，可她命苦，先嫁給了一個每天下班後先到母親和大姐那兒去報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着，過着乏味的日子。她是從北京醫士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挑花廠當廠醫，那是一個集體所有制的小廠。沒想到在那兒遇見了復原回來的廠醫田樹雲，老田頓時就展開了瘋狂地追逐，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後來對小李說：女人一輩子就是在等一個人全身心的愛。

為了老田，在那個時代，她毅然決然和丈夫提出離婚，整個就轟動了，從裏到外罵聲四起，不言而喻。最後，居然被她離成了。可是，老田這時候卻沒接她這個茬兒，和一個出身好的姑娘結婚了。孫秀珍這時候才知道：愛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現實的份量。

文革爆發了，田樹雲在廠裏的日子也不好過，也許家裏的日子漸漸沒意思了，他又捲土重來，告訴小孫自己發現真正愛的人還是她。在中國現實社會中，他沒錢沒勢，也沒有前途。他們的愛情是沒有結果的。他還說，他已經和蘇聯聯繫好了，只要孫秀珍幫他一把，定期把他寫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車裏，建功樹業以後，他們可以比翼齊飛，一起到蘇聯去過神仙日子。

孫秀珍壓根對政治一無所知，也從來不關心。這時候，她對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看他一臉真誠，就決定賭一把，萬一是真的呢？就這樣，變成了這個案件的協從犯。

進了監獄以後，她一直和李世佺同學同屋，也和吳世良女士同屋。經過多少次提訊，她才知道田樹雲講故事，不過是天方夜譚，還是在利用她對愛的嚮往。在監號裏，她心灰意冷，萬念俱灰。所以，平時溫柔可愛的她面對刁難她的女隊長，頓時橫眉立目、異常

勇猛。難怪吳世良女士說：小孫，天生一個美人坯子，漆黑的頭髮，水汪汪的大眼，窈窕的身材。沒想到，面對强勢從不低頭。她外表是貂蟬，骨子裏卻是猛張飛。

李世佺告訴我，其實聽老吳這樣說，她也不以為然。那時她只是被逼到那份兒上了。她原本一心想就當一個小女人，等待有人來疼愛。可是命運作弄了她，讓她面對鐵窗，她只能剛烈。

在學習班裏，我們之間交換的書信，我寫的那些類似波德萊爾的憂傷情書，給了她瞬間的喜悅和安慰。或許，那只是她暗夜中的一縷微光。我寫的那些信，她只給小李一個人看過。

一次她們嬉笑着看完以後，小李說：「他這麼動心動肺地喜歡你，將來，出去以後，沒準你們倆還真有戲。」她苦笑着說：「我已經是殘花敗柳了，而他不過是個學生，是個孩子。他哪兒知道我呀，等他了解我了，還有甚麼戲？我們只有此時此刻，哪兒有甚麼將來。」

她說的也對，在那個時刻，外面的世界和我們無關，我們已經屬於了另類的人群。以前喜歡我或者我喜歡的女孩子，我那時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將來絕對不會有甚麼舊夢重溫。孫秀珍——庫里娃，就是我黑獄中嬌柔的花朵。

那天，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邊，幾天的批鬥之後，我們都已經是蓬頭垢面，手腕腳踝全都血絲乎拉。她嚶嚶地哭着，似乎是在回答隊長們，其實我知道她是在對我說：「我這輩子，過得太不值了。來都不知道為甚麼來，走也不知道為甚麼走。剛想好好活下去，才發現再沒有這個機會了。」

幾個女隊長厲聲呵斥她：「別胡說八道，宣判你了嗎？你只有老老實實接受批判，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嗚咽，說：「甚麼希望不希望，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們過去不去，只是為自己的一生傷心。」

這場會我們倆是主角。起立準備上場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對視了一下，我努力對她微笑了一下，微微點了點頭。她透過淚眼望着我，依然那麼楚楚動人。我想，她也是在為我傷心，她讀懂了我。

那時候，我們每天至少出去批鬥兩場。幾十場裏有兩場，我永生難忘。

一次是，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中央美術學院，把我拉回那個熟悉的舞台。我曾經在這個舞台上扮演過古希臘的寓言家——伊索。在全劇結束的時候，我曾站在這個舞台上，這樣高呼過：「人們啊，聽聽伊索最後的一個寓言：狼問狗：是誰把你餵得這麼肥胖？狗說：我的主人！狼高喊到：我與其餓死，也不戴上那條鎖鏈。人們啊，讓我作為一個自由人而死去吧！」沒想到，今天，我居然會回到這裏，重複這千年前同樣的故事。

那天，激動發言要求政府槍斃我的老師、同學，並沒讓我傷心。我知道，他們一定是迫不得已，他們只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們在生死這個關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作為演員，我比他們演得更為真切。

另一次，把我拉到我父親任教的學校——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同時把我父親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鬥。那天，我看到老父的頭髮全都白了，他為我如此擔憂，更讓我難過。很久以後才知道，當他得知我被判處死刑後，一夜白髮。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樣。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長高了，他那麼無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這晦氣的陰影。我期望他們能理解我，可是我卻無法說出一個字。

為了讓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在走入會場的時候，放穩了自己的腳步，鏗鏘有力地趟着我的重鐐。這道具很質樸，你趟好了，那聲響相當沉着。我老爸和弱弟，也都不含糊，他們和我一樣平靜地面對群眾的瘋狂。淡然處之就是把持一種心態。

當批鬥者第一次喊「現行反革命分子張郎郎」的時候，中間的警察扯住我的頭髮，往後一拉。讓我在群眾面前亮相。從第一次批鬥開始，我就知道了這個程序。從第二次開始，每當我將被動亮相的時候，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個平和、友善的面孔。讓人們知道，我沒有被粉碎，也沒有被打垮。我不是你們心中的假想敵。這次，我

給這場戲，準備了一個微笑的亮相。參加過這個批鬥會的人，應該是記得的。

同一天，我家的居委會主任和兩個警察趕到我們家，他們要找我媽媽談談。他們知道我們家孩子多，萬一有人想不開，會有更惡劣的後果，所以我媽媽得首先得想得開。媽媽一個人坐在陽台上望着遠方。警察走上前來，說：「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趕上點兒了，你可得想開了。這會兒誰都沒辦法，你們家的人，可別胡思亂想，別出了岔子。」媽媽平靜地說：「我小時聽說過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們，因為寫東西被判處死刑，那時候他們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沒想到我兒子也成了這樣的人，我沒甚麼想不開的，我為他感到驕傲。」主任連忙對警察說，老太太瘋了，快走，快走。

有時候，批鬥回來我想：過去常聽見「生不如死」的說法，覺得那是矯情。現在，我們每天幾場示眾，這些演出遠不如阿Q那麼幸運，壓根沒我們表現自己內心感受的機會。連唱一句「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機會都沒有，更沒有「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的悲壯場面。

警察為了趕場，往往就乾脆把我們像生豬一樣，直接扔到卡車的車廂裏。我們的臉就被車廂底的鐵皮、雪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腳踝都被鐐銬磨得鮮血淋漓，只得撕開自己的襯衣，嘬着牙花子，慢慢綁裹自己的傷口。這哪兒是要處死頂天立地的野狼呢，就想讓你像一條癩皮狗一樣被悄悄處死。這時候，我才明白了甚麼是「只求速死」的心態。

當然，甚麼事都有例外。有一天，我們被拉出死牢，沒想到天氣居然開始轉暖。天也晴了。也許是天氣的關係，隊長們的脾氣也見好轉，也有點兒耐心煩兒了。這天，他們沒把我們挨個扔到車廂裏，居然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卡車的旁邊。兩個警察把我一舉，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車上的警察，又拉了我一把我提着鐐輕輕一躍，就上了車。卡車兩邊坐滿了警察，我就坐在中間的地下。這時候我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車來，那就是我心中的庫里娃——

孫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狀態好多了，大概她也想開了。好像自己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學習班的時候消瘦了不少，似乎更清秀了。原來這輛大卡車，只拉我們兩個人。我想，大概今兒就是我們的大限了。最後的日子，還有一個心儀的伴侶，還不錯嘛。

隊長叫她和我背對背坐下，臨坐下來，她假裝看落座地方的時候，和我在百分只一秒中交換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電擊了我。我心裏一個微小的金色火苗，被她的目光點燃。

我穿着一個藍色的棉大衣，她穿着一件碎花小棉襖。我們溫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面的警察互相打招呼，開着玩笑。他們和我們是兩類人。這會兒，他們眼裏沒有我們，我們也對他們視而不見。此刻，整個世界上我心裏只有她，優雅的庫里娃。車開動起來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緊緊地靠着她。她也在盡量在靠近我，我們的生物電和熱量通過後背在無形中濃度交換。在那段時間裏，我心裏慨嘆不已，沒想到在死刑號，我還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離接觸。兩個死囚，這樣緊靠在一起，在那些日子裏，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原來，我們是被拉到官園體育場去參加批判大會，我們倆是唱頭牌的。同場有一個師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和北醫的學生李世佺是一樣的案子，她們都是「反動日記犯」。後來，聽說她們倆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們强點兒，我們都已經是死囚了。大概那幾批死囚中，也就我們倆，還在堅持着最後的浪漫。

晚上，我們在回死牢的路上，倆人還是背靠背坐在車廂裏地面上。我們運氣不錯，回來的車是個大轎車。穿過長安街的時候，燈火輝煌，燈光穿過車窗閃爍在車廂裏。投下斑斑光影，給我們最後的浪漫，抹上幾道光彩。我們一會兒輕柔、一會兒緊密地靠在一起。心想，要是這樣天天出來批鬥，也就值了。我心裏也明白，沒那麼多時間了，也就這幾天了。

四

也就是過了那一天，突然不叫我們出去挨鬥了。

一早開始，陸續開門，把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審。一個外號叫背兒背兒的預審員，叫我出去。他遞給了我一根繩子，讓我提着腳鐐跟着他走。讓我低着頭，不要和其他犯人打照面。我知道這是去預審樓，就低着頭走出了死刑號的小院兒。即使低着頭我也能看見，和我一個方向的大操場上每隔若干米就有一個和我一樣的死囚在向前走，而在我後面，還有一個接一個的死囚陸續跟我而來，我的對面，也是每隔若干米就有一個從預審樓回來的犯人。我們像是一條巨大無比的傳送帶上的產品。我頓時就明白了，巨大的國家專政機器啓動了，開始運轉了。那麼，任何人都無法改變它的程序。我們就是這部機器傳送帶上待宰的豬羊。這幾個快樂青年的血肉之軀，和這碩大無比的鋼鐵機器抗衡。

這就是天真，其實我們從來沒想過甚麼對抗，但趕上了這一步也沒辦法。我不知道，無辜的熱血是否可以澆鈍機器上的屠刀。

這次審訊簡單、迅速，只有幾個問題：你叫甚麼，多大歲數，哪兒人？最後問你犯的甚麼罪？就完了。我明白了，這是驗明正身的最後審問。

我回到槍號以後，就聽到走廊裏開始人聲鼎沸，進來了一批別樣的警察。他們挨個打開門，問我們的姓名、年齡。他們都穿着嶄新的軍衣，還戴着白手套。看看牢門上的號碼，他們議論着哪個號碼不太清楚就叫人來，再好好描描。我知道，他們是法警，是死刑的執行者。

第二天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早上大約四點多鐘，就聽見許多卡車開到我們牆外。五點鐘就讓我們全都起床，每個人發了兩個窩頭、一塊鹹菜，沒有菜湯，也不給水。我知道，去刑場前還得參加一次公判大會——最後的審判，所以不讓我們飲用任何液體。六點鐘左右開始叫人，也是隔幾分鐘叫一個人，我們安靜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後的點名。我聽見，他們叫了遇羅克、田樹雲、孫秀珍、王文滿、宋惠德、索家麟、王濤、沈元等等，最後，連金豆兒也被叫走了。我們還指着他帶口信呢！

這些都是我認識的，還有我不太認識的北大畢業生顧文選等等。我聽得見，每個人都是趟着腳鐐走到小院裏，然後「轟隆」一聲就被撂倒。隨着就聽見囚犯短暫的掙扎聲，口中嗚嗚地哼幾聲，就安靜了下來，然後被架上汽車，一輛車開始緩緩開動。

我明白，一個人一輛車，死囚在去公判大會之前都得進行一次必要處理——讓他們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說在他們嘴裏塞了一個木球，有人說是警察用掌側砍擊了犯人的喉頭。我在等着，心想：我最後的表演，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們是練家子，戴着鐐走起來照樣瀟灑。他們會表現出俠士之風，我也會亮出書生之格。

我等着，等着，等到最後，聽見他們竟然把死刑號的筒道大門都給關上了。這次沒有我？是的，沒有我，也沒有老七。

筒道裏死一樣的寂靜。那天，他們都沒有回來。孫秀珍，庫里娃，她真的就這麼走了？我不知道。雖然，我還在苟活着，卻從此見不到她了。心頭滴血。

我知道，和遇羅克一樣；所有的死囚躲得過初一，也躲不過十五。看來，我還要趕下一播兒了。那天晚上，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機器運轉如常。

當新的一批死囚又去游鬥的時候，居然沒叫我。我難得清閑。我仔細看着面對的水泥牆，牆上曾經有人在上面寫過字，也有人刻過字。但都被用銳器鏟去了。所以，那牆上只有斑斑駁駁的表面，和一些筆劃的殘餘。我明白，那些人最後還是要留幾個字，誰都明白，也許只有以後來掃除的犯人才能看見。也許，只是想留下一句話，哪怕給一個任何活人看到，沒準就留下來了。也許哪怕只給自己看看也好。

我想，如果是這樣，我還能寫幾個甚麼字呢？我來到這個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就這麼莫名其妙地走了，隨風而去。別人呢，他們也是一樣。一輩子，很快地隨風而去，也許重於泰山，也許輕如鴻毛。然而，這不過是後人評說而已。對自己來說，這有甚麼區別？又有甚麼意義？

活一百歲，還是活二十六歲，在大自然來看又有甚麼區別？想

到這裏，我心裏就踏實了點兒。我想起來，聖經裏媽媽要我看的兩句話，很符合我這時的想法。略略改過，我用手銬的彎角，「吭哧吭哧」花了大概兩個鐘頭，在水泥牆上刻下了八個大字：

從宇宙來，回宇宙去。

早年我寫過幾天《張騫碑》，這八個字似乎還有點兒金石意思。

雖然我不是個基督徒，寫完這幾個字心裏就平實了。最後的日子，扮演人生最後時刻那一幕，自認還算得上心靜如水。

五

我在死刑號關了近一百天，在這生死一綫的剃頭刀刃上滚了一百天。在五月上旬的某一夜，我又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還在水淹的地鐵裏。死亡的冰水一點點沒上來了，即將把我吞沒了。我又瀕臨死亡，幾乎窒息。就在這時候，突然一股强勁的清風吹入了地鐵，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張大了嘴，大口吞吐新鮮的空氣。轟隆隆地鳴響，從地底傳來，那些堵在地鐵裏巨大的框架、石塊、柱樑都隨着巨大轟鳴聲，被激盪的水流給裹挾而去。我知道，這風是生命之風。我在巨大喜悦之中醒來，三個月來，我從來沒這樣醒來過，百思不得其解，想：也許是孫秀珍還沒走，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但願。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來。又走向預審樓。

我關進死刑號的那幾天，天天風雪交加。如今，久違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紅柳綠。我眯縫着眼，望着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着鐐，進了預審室。預審室裏坐了十幾個官員。心想，臨了臨了，還來這麼一齣，甚麼意思？

坐在正中間的是一位老軍官，看來，不是個一般的人物。他和顏悦色地問我：「張郎郎，最近學習得怎麼樣？」

一個臨死的人，哪還有心思學習。既然他這麼問我，也許有轉機，咱們也可以順坡下驢。只要他不逼我再咬別人，説甚麼都行。

「反正，也沒別的事兒，就看看《毛選》學習唄。」他們也知道，我們只有那一本書。

「學了哪篇了？說說，說說。」說話聽聲，打鑼聽音。我在這裏邊兒關了這麼久，還不明白？這是給我鋪台階呢。我也不能牽着不走、拉着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說：「最近，我反復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將革命進行到底》。還看了《別了，司徒雷登》，還有……」

「你看了這幾篇，有甚麼體會呢？」

「我明白了，蔣介石八百萬軍隊都被共產黨消滅了，我一個手無寸鐵的學生，還能怎麼樣呢？」

「看來，經過學習，你還是有一定進步的。」這要擱在過去，我這麼回答，預審員決不會這麼回話。他打算說你有理，你怎麼說都有理。打算說你沒理，你說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個時期，你在批鬥中，態度還是老實的。學習呢，也有些收穫。所以，今天決定把你從死刑號轉回普通號去。」

天哪！太陽從西邊出來啦？我連忙真心真意地說：

「太謝謝您了，太謝謝您了。」

「不要感謝我，要感謝毛主席，感謝黨。我個人是做不了這個主的。」

我又趕緊感謝該謝的人。

老軍官說：「從前，去死刑號的路是單程路，沒人從那兒回來過。關於死刑號的任何事情都是國家機密。今天，我們會把你的鐐銬卸下來，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鐐銬還在我們手上，如果你不好好改造，隨時都可以再給你帶上，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嗎？」

「明白，明白。」那天，他說甚麼話，都不能改變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陽格外光明媚。

那天，我就是從水底掙扎浮起，飛出水面。看見了太陽，苦海有邊，那邊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綫。

出來後，聽老七說：有關方面兩次都決定槍斃我們了，最後還

是周恩來寫了「留下活口」四個字才救了我們。平均倆字一條命。而那位把我從死刑號提出來的人，就是當時的公安部長李震。可惜，等我出獄的時候，周恩來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來的我都不知道該去謝誰。

六

一年以後，又把我押回饒陽。這時候，小段、楊秉蓀都已經分別判為十五年、十年徒刑，送到勞改隊去服刑了。小亓告訴我，我們走以後，還真來人調查過我們那份報紙的事情，因為我們這些當事人，早就死的死，走的走了，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頭的那份報紙早就銷毀了。

回到饒陽縣，這裏已經不同往年了。張所長認為，這些政治犯如果天天在屋裏呆着、憋着、餓着，早晚會出事。說：閑饑難忍，幹點兒活兒可以分散注意力，否則，這夥人指不定琢磨出甚麼呢。於是，這裏開始擰麻猴。

所謂「麻猴」在北京叫軸毛，就是一條五彩的麻毛。當年人們騎自行車的時候，就把這軸毛拴在車軸上。隨着車輪旋轉，顯出騎車人的風采。這是當年自行車的裝飾物。

估計這「麻猴」零售也沒幾個錢，附加值極低。幸虧我們這些犯人都是免費勞動力。別看這個小小的「麻猴」，製作也不那麼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運到看守所中間的空場，然後由勞動號 (有特許勞動權的犯人，一般都是當地犯人。) 用大鍘刀，把那些長麻鍘成一尺長左右的短麻。然後，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術的犯人，把這些麻染成紅、黃、藍、綠四種顏色。下一個工序是：把這些色麻分發下去給老弱病殘的犯人，讓他們用梳子把這些麻梳成像蠶絲那樣通透柔軟，發出緞子般的光澤。

我和老七算是青壯勞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車間。三年多來，由於我們是同案，所以一直關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號都是如此。如

今，到了車間，我們倆的車床就可以挨着，就可以暢聊一通了。這裏所謂的車床就是木製的土車床，我們就用這種車床依次把不同顏色的麻毛，用一根鉛絲把它們擰在一起。生產出我們這個工廠的唯一產品——麻猴。監獄長為了刺激生產力發展，把我們的產量和我們伙食的定量綁在一起。

一開始，當地的青年農民手頭都比我們利索多了。他們認定我們肯定玩兒完了。他們吃最高的定量，我們吃最少的定量。這還不算，一不留神，我還把自己的手掌給剪了個大口子。這又讓那些青年笑得喘不過氣兒。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樣，三個月以後，我們的技術突飛猛進，漸漸地我們就開始吃最高定量，而新來的農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術的老農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們了。

在這段時間裏，我們還進行了技術革新，不但把那個車床進行了徹底改造，還把當地多少年來擰「麻猴」的標準程序和姿勢都進行了改革。這些改變，地位的轉化，並沒有引起饒陽當地人和我們之間的矛盾。他們很樸實，能面對現實。笑話我們的時候很真誠，佩服我們時也很真誠。

我們把這裏的「麻猴」產量翻上去不只一番，這裏環境因此就變得更加寬鬆。一天，張所長高高興興地把我們集合起來發表講演，說我們的改造已經初見成果，現在產量上去了，超額完成了任務。可是，質量也要嚴格把關。質量過關以後，下次改善，一定有豬肉燉粉條。雖然，他的講演時肯定剛喝了酒，但就算就這麼說說，我們也高興。在饒陽我們一年標準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舊年。他老人家甚麼時候給我們吃豬肉燉粉條，那就不知道了。

最讓我們高興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產標兵，所以吃的比過去多多了。暫時不再被饑餓煎熬。其實張所長也沒有給我們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進來犯人的部分口糧挪給我們吃了而已。新來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產指標。我們也沒有因此良心不安，因為當地犯

人都在這裏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勞改隊去服刑。在勞改隊他們成了合法勞動力，到了那兒他們就不會挨餓了。而我們等於是死緩犯人，不知在這裏還要等多久，所以自保為先。在這裏開展生產之前，和我們一塊兒來饒陽的北京氣象學校學生鄒宗志，就餓死在這裏了。我們不想重蹈他的覆轍。

開展生產對我們最大的好處是，我們可以在車間裏天天一邊擰麻猴，一邊聊天。有時候，我們也一起唱歌。當地的青年也不時唱點樣板戲，或語錄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來《倫敦德里小調》。也許，那憂傷的情調很符合那時大家的心情，所以，我們倆就一遍遍小聲唱着，不願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覺中，其他北京青年和當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個車間都寧靜下來，除了車床的嗡嗡聲外，剩下來的就是我們倆的歌聲。

這時，我們倆才發現大家都在聽這首歌，唱完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來。人們都沒說話，大概還沉靜在那個曲調中。過了一會兒，休息開飯了，幾個青年走過來，有北京的，也有當地的，都向我們要歌篇，我和老七答應晚上值班的時候，幫他們回憶回憶，寫出歌譜。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兩個人的回憶加在一起，謄寫出了一張歌篇。他們就拿去抄寫了。此後，每天一上班他們就要求我們唱這支蘇格蘭的老歌，他們就小聲和我們合唱。幾天之後，差不多整個車間的青年都學會了這支歌。以後每天，我們都必唱幾遍這支歌曲，《倫敦德里小調》似乎成了這裏的廠歌了。誰會想到，這首蘇格蘭旋律會繚繞在饒陽白花花的鹽鹼地上。

後來，我們也教給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鄉》。其實這支歌的歌詞我都記不確了，只好自己根據大概那意思來填寫，就這樣以訛傳訛教給了大家。後來還教給了大家許多歌，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機寫了幾首歌，也教給了大家。不過，那三年中，人們最喜歡唱的還是他們學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懷着美好的願望……」

後來，人們覺得還不够過癮，就開始自己寫詩、寫小說。我的程序就是這樣，每晚在兩個小時的值班時，自己寫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給老七，他一邊兒看一邊兒幫我編輯、改錯。第三天，在工餘休息的時候，我讀給大家聽。

我們用辛勤的勞動換來了這珍貴的自由。

那一段時間裏，漸漸地，這樣的寫作就成了我的一個習慣，每天萬籟俱寂的牢房深夜裏，我都要寫上一千來字。對同一個車間的犯人來說，等於多了一個說書人。也許，每個寫作的人都需要讀者或者聽眾。而這裏的犯人，在這裏除了物質方面的饑餓以外，也有精神的饑渴。所以，我寫作就有了動力。

在那個階段，我和老七在幹活的時候，最多的是聊社會上的風花雪月，自然會聊到許多遺憾的浪漫故事，就會有許多「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也有晴雯那種「早知枉擔了虛名，也沒了遠限」的那種遺憾。這些深聊讓我決定寫一個這樣的愛情故事。因為從一個房子開始，又以同一所房子為結，所以小說的名字就叫作《房子》。

講的是我小時候住在大雅寶胡同甲二號，我們院兒的後門是小雅寶胡同六十六號。而六十五號是一座北京胡同裏難見的童話般的兩層小樓，裏面住着一個姓黃的老頭。在樓上，還住着一個和我們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因為她的穿着，和我周圍的孩子完全不一樣，完全是動畫片裏的打扮，舉手投足也都是儀態萬方。今天明白，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時在我眼裏，她就是童話中的公主。

反右的時候，黃老頭自殺了，那天我在房上看見救護車如何來把老頭拉走，也看見那個小公主面色蒼白，嘴唇微微發抖，站在院子裏。不久，我們搬走了，那一切就漸漸淡忘了。那就是我們童年的相遇。

我大學時代，一個聚會中偶然遇見她。一聊，發現很談得來，又好像在哪兒見過。她告訴我她在北京醫學院讀書，家住在小雅寶胡同六十五號。

我恍然大悟。這時候我才知道小時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字名

誰。我才知道，原來她是黃老頭的養女。而黃老頭那次自殺並沒有成功，如今仍然低調健在。

那時候，我已經有個女朋友了，她和我都少年氣盛，還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我們正在鬧彆扭、鬧分手。

也許，生活的際遇不同，黃姑娘則非常低調、通情達理也非常善解人意。於是，就覺得她才是最適合我的人。

然後，我們開始來往。但是，在那個時代我們的交往，必然遭到我們學校，我的同學，以至於我們家庭的堅決反對。

文革中，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衝擊，這次黃老頭就沒有再次躲過，終於乘黃鶴而去，她家也被某個紅衛兵司令部佔用了。好在，她當時還是學生，作為支持紅衛兵運動的醫療隊，被派駐到清華大學。

我穿過風雨硝煙，在清華校園裏的帳篷中找到了她。相顧無言，也無淚一行。最後，她送我出來，說：「你回去，做你同學的好同學，你朋友們的好朋友，做你媽媽的好孩子。離開我吧。」我的自行車消失在夜霧中。

過了幾個月以後，被幾個老兵拉去他們司令部喝酒，沒想到去的地方就是當年黃姑娘家。我們就坐在以前她的閨房裏，這裏已經被這幫孩子糟蹋得不像樣子了。滿地啤酒瓶子，杯盤狼藉，到處垃圾。萬幸的是，還這裏居然還剩下來一個完好的電唱機。我放上一張，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陸》，這張唱片的第二樂章開始的旋律，就是當年我們倆最喜歡的一段。

我正在一邊兒悶頭喝酒，一邊兒在回想中玩味這旋律的時候，外面一個孩子大叫：快來，快來！這裏有一個上鎖的地下室，還沒被抄過呢！說着，就掄起磚頭開始砸那個鎖。幾個孩子都竄了出去，只有我還留在這裏喝酒。

外面傳來咚咚地砸鎖聲，留聲機裏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響……

這就是我在饒陽所寫的《房子的故事》的結尾。既然是小說，我自然要加以渲染，加以演繹和八卦。每天在我們勞動休息的時候，我們這些禿瓢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水粘滿了各種顏色的麻屑。

他們端坐在一起，我一字一句認真地讀着那故事，那些小伙子聽得直眉瞪眼。

只有一個在饒陽縣插隊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為然。

他叫柳陸森。他說：我打小兒在北京胡同裏開玩兒，就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你講的這種事兒。我揣摩，你整個就是一個侃爺，別這兒蒙這幫傻孩子了。他們一聽就以為北京到處可以遇見公主，你這不是害人家孩子嗎？你以後再侃，得事先聲明，這不過是你自己瞎編的。

我的這些粉絲就轟他走，說：你不愛聽，你就走人，真的假的不用你管，好聽就得，誰像你這麼彎彎繞？於是他們就把當地「四大彎」順口溜改成：轆轤把，大彎針，豆芽菜，柳陸森。

有一天，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後，人們坐在那兒玩味着，默不作聲。

柳陸森突然開始背誦起一首這樣的詩：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嘆息着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他讀完以後，人們都七嘴八舌說：行啊，大彎針，有兩下子，是你自己寫的嗎？

他慢吞吞地說：「在這裏邊兒，都把你們給關傻了。這是著名詩人郭路生寫的《相信未來》。你們真是井底之蛙，甚麼都不懂，甚麼都不知道。」

的確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邊兒寫了這首詩，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寫了小說《當芙蓉花重新開放的時候》，更不知道白洋淀還出了一群文學好漢。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與世隔絕井底的一窪水裏，和其他幾個

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潛流，不知道那算不算文學。對我們來說，算甚麼都不重要。這些微小聒噪喜悅，幫助我們度過了那漫長的鐵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寧靜的地平綫。

聽敵台

·阿城·

原名鍾阿城，一九四九年清明節生於北京。代表作包括中篇小説《棋王》、《樹王》和《孩子王》，及雜文集《威尼斯日記》和《常識與通識》等。現居北京。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結束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早結束了一年。

一九七六年結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結束了四年。

不過，算上一九七六年後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從一九六六年算起，有十年，所謂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按 decade 劃分，不準確，不符合。人生不是豬肉，不可以這樣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對我來説，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邊幹活兒一邊想，小時候讀歷史，讀來讀去都是大事記，大事中人，一生中因為某件大事，被記了下來，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麼一件大事，那麼，沒有大事的一天天，怎麼過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嗎？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時間，無窮的精力，反應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誡自己，慢一點慢一點，你有的是時間，你甚麼都沒有，但你有的是時間。

時間實在是太多了，因為田間勞作並不影響思維，尤其是分片包乾，簡直是山裏只有你一個人。天上白雲蒼狗，地上百草禽獸，風來了，雨來了，又都過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時候，索性脱掉褲

子，隨時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後已風乾了的排泄物，讓它們成為螻蟻的可疑食品。在溪流裏洗淨全身和農具，下山去。

當時都想甚麼呢？雜，非常雜，甚至瑣碎，難以整理。本來想到甚麼，結果漫渙無邊，直至荒誕。由荒誕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維是快樂的。

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幾乎是當天從境外廣播中聽到的。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澤東的神話頃刻崩潰。從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開始，不，從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開始，至此，催眠終止。大家都從床上坐起來，互相看着，震驚中湧出喜不自勝。雖然竹笆草房永遠是透氣的，但是大家還是往外走，覺得外面空氣好一些。

場上有個紅點，走過去，是隊裏支書在蹲着抽菸。我們知道支書也是敵台熱愛者，照香港的說法是敵台發燒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書說還不睡覺啊？明天還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別心思太重，甚麼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書一個都不理，只抽菸。

大概一個月後，省上派工作隊到縣裏，召集隊一級以上的幹部到縣裏。隊長回來後很得意，說咳，早鷄巴就曉得的事，還要鷄巴搞得多緊張，把人圍到山上，鷄巴山下民兵圍得起來，妹！機頭都扳開，亂就掃射，打你個鷄巴透心涼。黨中央說了，鷄巴林彪逃跑了。

雲南是沒得鷄巴說不成話。但是只聽鷄巴就想歪了，它只是語助詞。

我們就做驚訝狀，啊？林副主席？隊長說，沒的副主席啦，林彪；啊？往哪兒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飛機，你們這些小狗日的，哪個不聽敵台！還要裝不知道！那你在縣裏也裝不知道？咳，我們麼，在組織嘛。

這種互相裝傻充楞，永遠是我們的娛樂之一。不過，當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是武裝起義的諧音，恐怕後人不懂註

一下) 傳達下來的時候，立刻讓我們對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紀要中稱五七幹校和知青下鄉是變相勞改，大家都點頭。紀要中對毛的行狀刻畫，簡練準確，符合我們對獨裁者的想像。割江而治，老辦法，但還是好辦法。隔江對峙，南邊恐怕制度上會不同於北邊。制度不一樣，我們恐怕會好過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覺得挺高興，有上海知青耽心會在上海打得很厲害：隔麼好來，瓦特了，屋裏廂嘛…… (那麼好了，完蛋了，家裏頭嘛……)

其實事情已經過去了，說着說着好像事情馬上會發生。

《五七一工程紀要》是歷史文獻。它的行文口氣是文革初起時大學生的語言，不過林立果當時已經是空軍作戰部部長，他的文本語言，其實影響至今。我偶然看到劉亞洲先生的文章，也是這樣的口氣。平心而論，這個紀要是新中國第一份改革文獻，它第一個提出現代化的關鍵，即，現代化首先是解決極權，尤其是獨裁的問題。百年來中國一直沒有完成工業革命，即第一次現代化。蘇聯好像完成了，還贏了二戰，所以新中國誤會為工業革命並不威脅極權，尤其是工業現代化也並沒有阻止德國出現希特勒。到了極權的頂峰，周恩來在九大提出四個現代化，似乎順理成章，結果不久就出事了。

當下的所謂後現代，實質是針對第一次現代化，也就是解決了政治極權的工業現代化之後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現代化，即後現代。後現代要解決的是沒有政治極權的現代化社會中的各種權力的問題，以前的二級權力現在成了一級權力，商業化，媒體的權力，話語權，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國留學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現代化，教授們開出的教科書大致都屬於第二次現代化內容。他們九十年代歸來，可能忘了國內第一次現代化遠未完成，黨和國家極權仍在，而且退到初級階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結果庖丁亂解牛，模糊了兩次現代化。我聽過不止一個留學生說，啊你不知道，國外知識已經換代了。這種話，對於國內的人來說，真是壓力而又壓力，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處在一種希望的壓力之中。我還記得

八十年代初北大請來美國的詹明信，批判媒體，主要是電視的權力控制。在美國，沒錯，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國，全國才有多少電視機啊！有電視機，也只是個政治權力的喉舌啊。

八十年代，確實是湧入的年代，但確實將兩次現代化混淆了，時髦詞彙魚目混珠。但政治權力是清醒的，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下台，改革夭折發生六•四。抱歉扯到八十年代了，回到七十年代。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也是從境外廣播聽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議論昨天發生在萬里之外的事情。當地出生的人問起天安門廣場有多大，那時北京知青都辦回北京了，結果在場的人只有我見過天安門廣場，我大致目測了周圍幾個山頭的距離，用手劃了一下，說從這兒到那兒，從那兒到那兒吧。大家一齊驚呼「妹」。「妹」是雲南的驚嘆表示音，等同現在港台流行過來的「哇」。驚嘆時常常還會「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過我喜歡妹妹。

七十年代聽境外廣播，當時叫敵台，我不知道在全國知青當中普遍不普遍。雲南知青中相當普遍。雲南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聽不太清楚，報紙也要多少天後才運到山裏，收藏在黨支部書記家，捲菸抽的時候都是向支書手上撕條報紙。所以中央的電台和報紙，對聽敵台的人來說，只能算參考消息。聽敵台，並非只是關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娛樂。我記得澳洲台播台灣的廣播連續劇《小城故事》，因為短波會飄移，所以大家幾台收音機湊在一起，將飄移範圍佔滿，於是總有一台是聲音飽滿的。圍在草房裏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鄧麗君的歌聲一起，殺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總要有一段時間劇情大討論，昨天沒顧上聽的人，借機補課，總是矮人一截的樣子，聽過的人則都在發飈。

還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說……」，「主，告訴我們……」，「以西結書，第二十章，在曠野之違逆，這樣，我就使

他們出埃及地，領他們到曠野，將我的律例賜給他們……」。我那時記憶力真好，過耳不忘，隨時可誦。我也不會忘記聽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淚流出。

台灣台，男播音員的聲音有點乾癟，女播音員的聲音，「大陸同胞……」，有點妖，男知青的話：聽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蘇聯台，有一個播音員聲音怪，好像是叛逃過去的人，可是聽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這裏是莫斯科廣播電台，啊 (很短的一個啊)，莫斯科廣播電台……」好像瞟了一眼甚麼。

美國之音，英國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嘰哩哇啦的外語，所以每個知青的收音機短波綫上，都刻上道兒標示出漢語台的位置。我有一個道兒刻的是BBC英語台，不是聽英語，而是這個位置經常有音樂會實況轉播。現場觀眾的噪音，樂隊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揮出來了，慢慢靜下去，咳嗽，安靜，音樂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質相當好，有現場的空氣感。為了這個頻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過上海的時候買了一台很貴的熊貓牌全波段晶體收音機，需四個一號電池，一百六十塊錢 (當時一塊天津手錶一百二十塊錢)。不很大，但一個書包放不進。我記得喇叭是橢圓型的，直徑按長徑算，挺大的，可以辨出定音鼓，鄧麗君不在話下。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這個收音機成為晚十一點前的公共收音機，十一點一到，是我的音樂會實況轉播時間，收歸私有。

聽敵台，思維材料就多了。思維材料多了，對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樣了。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了，就更覺得度日如年了。

大概是一九七五還是七六年，記不清了。總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還在雲南，我決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決定建立一套音響。音響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級輸出、後級，或稱功率放大輸出，加上喇叭組成的播音系統。我當時要做的這套播音系統，其實是我那台熊貓收音機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黃其煦幫了大忙，他小學時就已經有做收音機的照片在報上發表，做我的這個巨型收音機算是手到擒來。

苦他的是要滿北京買零件。我不記得是我七六年上北京去取這套東西，還是有人幫我帶來？總之從北京到昆明，火車要走三天：從昆明再到所在山溝，長途汽車也是三天。就這樣，一個單聲道大喇叭(10吋？) 的播音系統終於立在我的草房裏了。

我特地請黃其煦留了電唱機的插口，因為我有幾張蘇聯和捷克的大唱片，這回我要認真地聽一下它們。當然，我主要是要好好聽BBC的音樂會實況轉播。音箱我用我認為的最好的木料。還做了架子，總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勢。

開播，對不起，聲音有點慘。本隊的和翻山越嶺來聽的朋友們，都挺客氣，「來來來，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頭牛啊，尾巴長在屁股後頭哇，四個蹄子分了八瓣啊，個鷄巴硬得賽了車軸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聲音不好的原因是電壓的問題。前數年電拉到山溝裏，電壓衰減到燈絲可以直視。但我堅信電的問題會好起來的，只不過現在我還要用我的四個一號電池的熊貓收音機了。後來縣裏有人跑來要買，我沒有賣。幸虧他沒買成，因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個喇叭的手提收音機走私進來了，哐嘰哐嘰，震耳欲聾，八十年代提前進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開始研究樹木，判斷它們中的誰是好的木料。我和別人各執長解鋸的一端，破開樹幹，鋸成板材。我開始打傢具，實實在在在這裏生活下去。

七六年，開始死人，周恩來，唐山大地震，毛澤東，四人幫被抓，一路滑坡。毛澤東死時，我正在北京，毫無感覺 (他已在聽敵台的雲南知青心裏於七一年死去)，買些東西，準備回雲南過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傳來，市面震動，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無甚念頭。到了隊上，知青們都說，哈，你逃過去了。追悼會的時候，都到縣上，不去不行。沒辦法，只好在會場自己昏到，昏倒總要抬出去嘍，抬到樹蔭下，好自在，後來多一半人昏

到，可憐大小幹部不敢昏倒，站着聽。

當晚備了酒，與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進山到小水庫邊，裸體喝酒，彈吉他，扎到水裏去，讓小魚咬鷄巴。女知青笑浪謔謔，同時嘴裏總是有吃的。我從北京帶來的種種，剎時消耗。明月當空，星塵糜爛，唯願人長久，到老不白頭。

當此時，心下澄明。

讓思想衝破牢籠
——我的七十年代三段論

・朱正琳・

一九四七年生。在貴陽上中專時，文化大革命開始。六六年在校被打成「反動學生」，七一年因反革命案被捕入獄，至七五年獲釋，七九年獲平反。八〇年考上北京大學外國哲學所碩士研究生，八三年畢業。曾任《東方》雜誌副總編，著有監獄回憶錄《裏面的故事》。

僅從我個人命運的角度看，是可以清晰地斷出一個「七十年代」來的。一九七一年七月我銀鐺入獄，一九八〇年九月我考上北大，對於我的人生來說，兩者無疑都是「劃時代」的事件。當時我在貴陽。

正題：生活在別處

一　被抓

七十年代在我的記憶中是這樣開始的。一九七〇年春節，大年初一上午，幾十輛軍用卡車載着一排排荷槍實彈戒備森嚴的士兵，押着剛剛在「公判大會」上被宣判死刑的幾十名囚徒，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緩緩駛過，然後直接馳向城郊的刑場。街道兩旁熙熙攘攘站着一些沉默的看客，我也在其中。

「軍事管制」，我們那個小山城裏的氣氛確實有幾分肅殺。從廣東方面調過來的軍隊接管了從「西南的春雷」中誕生的「紅色政權」，制止住了「派性鬥爭」。全副武裝的軍車和士兵在大街上游弋早已是城市的日常景觀。有一則當時流傳的笑話說，一對戀人在公園裏一時鬥氣，也招來了「武裝干涉」——背着槍的巡邏兵走

過來問道：「你們為甚麼屁股對屁股坐着？」那對沒好氣的戀人反問，這麼坐着有何不妥，士兵的回答是：「這裏是公園，沒有事不准進來！」講這個笑話要學着模仿粵語腔的普通話，其效果不亞於如今的某些小品。

有朋友私下裏曾自嘲說：「其實我們最不怕的就是嚇，因為我們就是嚇大的。」據我觀察，受驚嚇多了，彷彿便會從一身冷汗中生出一種冷幽默。就說這示威性質很明顯的「游街示眾押赴刑場」的景象吧，那幾年人們也好似見慣不驚。每年春節前照例會有一批，民間竟冷言稱之為「殺年豬」。不過，「殺年豬」理應是在年前，歷年皆是如此。唯獨這一年卻選在了大年初一。再不怕嚇的「看客」想必也會有些震駭。至少我是。當時我想，有一天我要把這一幕寫下來。

我當時其實也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在網之魚。幾個月後，一個幾乎天天與我在一起廝混的哥們被抓了，我和另外兩位哥們的時光似乎就只能用來等待被抓。因為我們認定，那位哥們被抓的原因是夥同我們仨偷書，在各大中學校圖書館偷書。當然，也風聞，我們幾個人被捲進了一個「反革命集團」案。但我們自己心裏卻清楚，除了偷書我們沒幹過別的。幾十年後我的說法是：「我幾曾有過『反』的壯舉？」

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又有一個哥們「進去」了。在「外面」的兩個人便約定，如果再有一人被抓，第四個人就去自首，以便案子早日了結。那時候我們倆都已隨各自家裏的老人「疏散下放」到農村去了。倆人又約好「倒流」回城市，東家借一宿西家住一晚地「打游擊」，一邊擔心夜裏遭突襲「查戶口」而被遣返，一邊卻又在等待甚或是期待（！）被抓歸案。雖然那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年代，但我們還是相信，我們幹的那點事算不了甚麼，不至於會被判刑，所以還是早了早好。當然，入獄之後就明白了，我們的想法不過是一廂情願。儘管在拖了四年多之後我們確實都獲釋了，但我在獄中的所見所聞使我相信，要判我們個十年二十年的，也絕不是甚

麼匪夷所思駭人聽聞的事。關鍵只在於我們趕上了甚麼樣的「形勢需要」。

在別人家借宿一般只能晚上悄悄「潛入」。那些年，我們的朋友大都住在父母家裏，還沒有成為獨立的戶主呢。因此，我們曾有過許多漫長的白天。兩個人時常在街頭並排行走，很少停步也很少交談。從大十字到大西門到紫林庵到噴水池再回到大十字，這一圈下來，過去了半小時。再走一圈 ，又過去了半小時。有時候我一個人走，速度就會慢一些。走走看看，那行徑也就更像一個城市流浪漢。我不逛商店，那年頭物資匱乏，商店也沒甚麼好看的。與所有無家可歸百無聊賴的人一樣，我會對牆上的文字感興趣。一字一句地讀了許多有朱筆劃勾的法院「佈告」，從那種千篇一律的抽象詞句，我也曾推想出一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罪犯們的人生故事。還讀了許多當年時興的「安民告示」，內容龐雜瑣碎，從居委會通知開會到失物招領或尋人啓事，不一而足。其中常會有一些遣詞造句令人意外的，當時會引發一笑，但事後卻大都忘卻。只有一則至今仍記憶猶新，那是貼在醫院門口的。抬頭照例是：「最高指示：安民告示」。正文的內容則是：「請自殺者家屬自帶急救藥品。」

幾個月「流浪」下來，消磨了我對「流浪」一詞抱有的全部浪漫情懷。以至於後來我「住進」看守所，倒好像鬆了口氣，於是顧影自憐地幽了一默：「這回好了，不會再有查戶口的了。」不過，我那幾個月的光景也並不像如今煞有介事地說起來時那麼慘淡。人畢竟年輕，經得起折騰，再加上滿腦子想的都是些不着邊際的「宏大敘事」，眼前那點顛沛倒也不怎麼當回事。用古話說，我當時是「一心以為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用今天的話說，無需借助電腦，我當時就擁有了一個虛擬世界。記得入獄前的最後一段時日，我一直背着一本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寫的《西方的沒落》「轉戰南北」，正讀得躊躇滿志，自以為有希望解透中國的「文化宿命」(斯賓格勒語) 哩！

當然，偶爾有些日子，也會有「臨時的固定住所」，我便也能

享受獨自在家的感覺。例如我被抓的那天，就是住在我哥從朋友那裏暫借的一間小屋裏。一大早，我剛打開《西方的沒落》，就聽見門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趕緊把書塞在被子底下。開門一看，是我哥當時所在單位——雜技團的軍代表帶着七八條大漢來了，其中赫赫然有表演拉大弓的大力士在。那位軍代表告訴我說，我哥出了車禍，要我趕緊跟他們去看看。消息太突然，我一時竟也相信了，一邊跟着他們往外走，一邊問：「人在哪家醫院？」回答是：「在市公安局。」我當然立即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我一直在等着的不就是這一天嗎？那位軍代表看我已識破了他們的意圖，竟沒敢把我往市公安局帶，而是就近帶我到了一個區分局，然後打電話叫市局來提人。事後想起來覺着有幾分好笑：我真有那麼危險嗎？還有，我至今沒想通的是，為甚麼市公安局就不直接來抓我？

我有幸成為我們四人當中的第三個被抓者，免除了能否痛下決心去「自首」的考驗。出獄後我方得知，最後剩下的那位哥們還真是如約去自首了，倒讓公安局的辦案人員吃了一驚，立即對他進行搜身檢查，隨後就把他轟出了公安局。聽辦案人員的那口氣，大約是抓與不抓的主動權在他們手上，哪裏容得你自己來決定？果然，過了幾個月才又趁其不備把他抓將進去。

此前的風聞立即得到了證實，我們的確是捲入了一個「反革命集團」案，拘留證上寫得明明白白。在公安局先呆了三天，接受晝夜兼程的突擊審訊，之後才被送到看守所拘押。這三天審訊，翻來覆去就是一個意思，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交代不出來，又不敢抗議，所以也只能翻來覆去地說「我沒有罪」。沒想到預審員一不耐煩竟問了我一句：「你說你沒有罪？那為甚麼大十字 (市中心) 那麼多人我們都沒抓，單單抓了你？」這一問可把我給咽住了，當時竟無言以對。讓我鬱悶許久的是：這話本來該我問他，怎麼他卻搶在前頭問了我？多年以後，我在一本法律學教科書上接觸到「無罪推定」的概念，這才明白我的鬱悶也不無道理。那個概念有一條簡明的定義是：被告人沒有義務證明自己無罪。也就是說，控方才有

義務證明被告有罪，所以是該由我問他：「大十字那麼多人你們都沒抓，為甚麼單單抓了我？」但這種「資產階級」的理自然沒法對當時的「公檢法」說。當時實行「三堂會審」，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被並成一家聯合辦案，誰向誰證明去？在公安局裏有一位年輕的預審員甚至對我說：「你知道我們這是甚麼地方嗎？我們這是專門給地獄發放通行證的地方！」我當然記得這是樣板戲《紅燈記》裏日本軍官鳩三的台詞。但他說這話時一臉的嚴肅，且表情生動誇張，讓我驚奇不已。更讓我驚奇的是，我竟然沒有笑。想來當時的我，只怕也是一臉的嚴肅！

二　案由

有一個夢在我出獄後一直在追逐着我，時至今日也仍反復出現——我老是夢見自己又被收監！說是案子還沒有結，說是案子還需重審，說是案子又查出新問題了……總而言之，我是又進去了。這是一個現在進行時的夢，在夢中我清楚地意識到事情就發生在我已出獄多年的當下此刻，我的有些反應因而會與時俱進，譬如這幾年我在這樣的夢中就會焦急地尋找手機。但有一種焦慮卻是始終如一的，我總是立即苦苦思索：我們的案子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案子？這事怎麼就沒有個完？

說實話，我對我們這個案子的來龍去脈一直都不甚了了。據說我們捲入的是一個全國性的反革命集團，涉案人員有好幾十人。但我只認識我這三個哥們。顯然是有人代勞，把幾十個人「組織」成了一個「集團」。逼供誘供透露出這個集團的形狀是：有一個工人組，還有一個學生組，按理自然還應有一個總部。我們四個人大概就屬學生組。後來了解到的背景情況大致是這樣：根據當時的「中央精神」，出現了一種「階級鬥爭新動向」，全國各地因此「破獲」了不少「無組織、無綱領但實質上是」的「反革命集團」，有些地方這種集團被命名為「讀書會」或「馬列小組」。我們那個山

城雖小，卻也沒人敢說「階級鬥爭」在我們那裏就沒有出現「新動向」。至於我們幾個人的「入選」，雖說純粹是由於運氣不好，讓我們碰巧進入了辦案人員目力所及而手又够得着的範圍，但我們的「地下書庫」卻不容抵賴地成了天賜的「鐵證」。替辦案人員想，哪裏還找得到比這更「符合中央精神」的事？

我們所偷的書，在當時當然全是禁書。不禁又何必去偷？況且，當時又有幾本書沒有被禁？這已然足以構成一條「罪行」，何況我們所偷的量還不小。據公安局收繳後的統計是三千餘冊，其中文學書籍不在少數，尤其是翻譯文學。從今天的眼光看，我們幾個毛桃小伙恐怕也就是幾個「文學青年」而已。在一起吹牛，說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我們那一代人都偏愛的俄羅斯文學。其實這種偏愛本來也是在成長過程中被長期灌輸的結果，但到了文革時期再堅持卻就成了叛逆的姿態。當然，那年頭你只要自己擺個 pose，就都在叛逆之列。不過，叛逆在我們也確實是自覺的，從偷讀禁書到「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偷禁書就是一種證明。一旦開了偷戒，自然就遠遠超出俄羅斯文學這種過去曾被允許閱讀的範圍，文革前被禁讀的各種「內部讀物」更是我們的首選。一個個充滿油墨香味的書庫，讓我們對「書香」一詞有了一種自定義的「質感」。那些已然粘結在書架上的「內部讀物」種類之繁多，更是讓我們眼花繚亂！於是有了「關門讀禁書，其樂也融融」的一段時日。此外我們還偷聽西方音樂，偷看西方繪畫……總之，被革了命的「文化」一時倒成了我們的最愛。只可惜好景不長。如今想起來，這種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種饑荒反應。當幾乎所有「食物」都被禁止食用時，你的服從與不服從，並不都是理性的選擇，常常成了一種生理反映。

我們所偷的「內部讀物」中有一些比文學書籍更為「敏感」的理論書籍。舉例說，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言論資料彙編、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著作、外國資產階級談中國近代史的論文集，以及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等等等等。這可

就够我們幾個哥們喝一壺的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時，裁定書上還留着一條「思想反動」的「尾巴」，其根據就是那些書，因為我們四個人都沒有其他文字落在辦案人手裏——文革開始後不久我們就已養成不寫日記、不記筆記的「良好」習慣！有趣的是，舉例用來論證我們「思想反動」的書倒不是「資產階級」或「修正主義」理論書籍中的一種，而是一本寫納粹德國歷史的內部讀物——《第三帝國的興亡》。我不知道辦案人員選此書為例的理由是甚麼，不過我傾向於認為他們是信手揀了一本。順便說一句，到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我才了解到，該書當年也是奉命翻譯，主要譯者多為正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其中之一是我所敬重的李慎之先生。

偷理論書籍當然不是為了收藏，我們當時確實也有一種「理論興趣」。那種「理論興趣」的來源，除了年青人一般總是產生的嘗試運用理性的衝動以外，還有一種那個時代特產的「政治關懷」。按當時的說法，我們都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我們都相信當時盛行的一種看法，認為只有首先「從理論上」認清歷史的總體進程，才能在實踐上辨明「我們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理論指導實踐」嘛！而且，這種「從理論上」的認識還須達到「哲學的高度」。我自己對哲學的特殊興趣有一半就是從這種看法而來，另一半也許才可歸因於個人氣質。我們的理論閱讀大多是從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開始的，讀着讀着就產生了讀《資本論》的雄心。但列寧說「不懂黑格爾的《邏輯學》就讀不懂馬克思的《資本論》」，我於是開始啃黑格爾。這樣一種閱讀先是讓我坐了牢，到後來卻又讓我考上學——一九八〇年我報考研究生的專業方向就是「黑格爾哲學和新黑格爾主義」。不知道是前者還是後者算是 「歷史的誤會」。

現在想起來，有一個事實頗耐人尋味：我們的「政治關懷」個個像政治家或毋寧說是一個革命家的關懷，沒有「公民」的概念，當然不可能有「公民」的關懷，儘管我們的個人權利已被剝奪殆盡。我們關心的是「國家大事」，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

途」。對於我們來說，沒有這樣一種關懷，人生就毫無意義。這固然是我們所受的教育和那個「血色浪漫」的時代氛圍使然，但也許被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的一點是，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個人出路」也都取決於「中國向何處去」。有人說過，「不自由，毋寧死」，有時候可以諷刺地解讀為「無出路，毋寧死」。以此觀之，當年搞運動整人時總是有所謂「給出路」政策，只怕也是深知此理。但對於年青人來說，對「出路」的理解往往會「大而空」，所以「廣闊天地」能給予極大的心理滿足。不相信這是條出路的人於是只能「生活在別處」。我們的大關懷怕是有點超現實主義的意思。當然，「超現實主義」在這裏純屬字面上的借用。

偉大領袖號召「要關心國家大事」。關心的結果是，直面現實而產生了懷疑。懷疑意味着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從來就被歸因於「敵對勢力」的影響。按那種邏輯，凡開始獨立思考的人，大體上就不再是「自己人」了。前述「中央精神」裏斷言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其實指的就是在一代青年中出現了獨立思考的「動向」。從這一點上說，可以認為那個「斷言」非常準確也非常敏銳。當時獨立思考的傾向確實已呈蔓延之勢，「思想者」們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讀書討論也成為一種遍及全國的現象。幾十年後有人把那種現象概括為「民間思想村落」。借用這個概念，可以說我們那幾個哥們就組成了一個「村落」，與我們「同案」的那些人也許另有其他幾個「村落」。

如果一定要為那種獨立思考傾向的蔓延劃定一個起始時間，大概可以定在知識青年被大規模動員上山下鄉的一九六八年底。曾經的紅衛兵小將們被連哄帶嚇地趕至遠離運動中心的邊遠地帶，忽然從「毛主席身邊的客人」(沿用當初的說法) 變成了一種「邊緣人」(借用現今的說法)，落差是大了點。運動初期被煽風點火引發的那份狂熱自然會漸漸冷卻，何況大部分人實際上從來就沒有真正狂熱過。我清楚地記得，當年那段「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著名「最高指示」一發表，立即給我所認識的

許多中學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毛主席都說話了，他們不敢不去。當時我已從一所中專退學在家，去火車站送過他們中的一些人，目睹了難忘的一幕：知青專列啓動的那一剎那，車上車下突然哭聲大作，竟形成轟然巨響。那景象，倒讓我想起了杜甫的《兵車行》。如今話說當年，知青們愛說起的是那些虛擲了的「激情」，其實自始至終與「激情」作伴的還有或顯或隱但卻更為實在的恐懼。為逃避上山下鄉，天知道那些「思想落後」的學生們曾想出多少怪主意。我就曾見過不止一人用醫用導尿管把葡萄糖水從尿道輸進膀胱，以期造成體檢時出現糖尿病的結果。還見過更極端的事例，這裏就不一一細說了。

我們幾個人對現實的懷疑其實還要早於文革時期。說起我們的「村落」，至遲在一九六四年即已形成。在這個村落裏來來去去的當然也不止我們四個人。我有理由相信，我們這個村落在那時候也遠不會是一個孤例。文革的來臨並沒有點燃我們的激情，我們幾個人無一例外地都是「逍遙派」。而且，四個人中有三人退了學，兩人從中專，一人從普通高中，另一人也想方設法逃離了做知識青年的命運。也就是說，在入獄之前我們四個人都沒有了單位，成了在社會上「鬼混」的社會青年。當年的「社會上」，差不多就等同於「社會之外」，離牢門是只有咫尺之遙！

就我所知，被定為我們這一案總頭目的人所在的「村落」好像比我們的「村落」要大一些。他是中心人物，受人崇敬，有些人竟稱他為「中國的馬克思」。今天看來，這個稱謂可能會顯得很可笑，表現出「村裏人」坐井觀天和夜郎自大的閉塞和狹隘。不過，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當年的中國大地上，出現過這種稱謂的「村落」恐怕不是一個兩個。這個稱謂表明：第一，「村落」裏的人都是胸懷天下的，想要解決的是 (如前所言) 「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第二，「村裏人」都認為「中國向何處去」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必須達到馬克思的那種理論高度，才有可能解答這一問題。第三，「村裏人」因此自覺和不自覺地期盼中國能出一個馬克思那

樣的思想家。第四，說到思想家，「村裏人」首先想起的總是馬克思。

我們當年那種「獨立思考」的局限性由此也可見一斑。我們確實拒斥了當時官方對現實生活做出的一切理論解釋，然而從思想方法上說，其實還是逃離不了官方理論之窠臼。長期吃精心配給的「偏食」，似乎能養成一種單一排他的口味。比如說，我總是容易傾心於「德國式」的玄奧，而不太能接受「英國式」的淺白。這種傾向曾嚴重妨礙了我的閱讀。我記得，我曾接觸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龐巴維克 (Eugen Bohm-Bawerk) 的作品——《資本實證論》，結果卻因嫌其「淺白」而沒有讀下去。儘管龐巴維克是奧地利人，我還是讀出他缺少德國味。呵呵！考慮到這些年我讀哈耶克所感覺到的興奮，當年我之錯過龐巴維克，還真當引為憾事。

我當初也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困境。在入獄前的那一兩年，我就開始有意識地胡亂讀書，意思是打破以「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為中心綫索的所謂系統閱讀。並且還常常徹夜不眠地用筆清理自己已然亂成一團的思想，企圖做理論突圍。那時候，為了安全起見，筆寫的東西往往被付之一炬。紙片灰飛湮滅，頭腦裏也難留下痕迹。對斯賓格勒一見鍾情其實就很能說明問題。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的頭腦彷彿已被看不見的遙控器鎖定了接收頻道，有些信息就硬是進不去了。思想的牢籠是所謂「靈魂工程」之傑作，囚禁人的，哪裏會只是某種理論？

後來我還了解到，我們那位「總頭目」確實讀過不少書，且多才多藝。據說他曾上過幾年大學，後卻因學業之外的原因 (我猜想多半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被迫退了學，在一家工廠做了工人。文革初期他在街頭貼過兩張大字報，文采出眾，見解不凡，一時頗有影響。此外，還聽說他精通美工，拿着他自己偽造的火車票在全國旅行，列車乘務員從未辨出其真假。這一點我在監獄醫院住院時得到過間接的證實。他當時也生病，比我先住進了那家醫院。據醫護人員告訴我，他用透視膠片作材料為醫護人員手工繪製那年頭買不着

的撲克牌，其精美程度絕對超過廠家印製的。他的此類傳奇故事，讓我想起的當然不是馬克思，而是梁山好漢聖手書生蕭讓和玉臂匠金大堅。本是一介書生，卻已淪落江湖，又竟然滿腦子想着「中國向何處去」。多麼奇特的人格，多麼奇特的年代啊！他的案情很重，病情也很重，肺結核大咯血，但卻顯然還是贏得了醫護人員的尊敬，不能不說他確有過人之處。只可惜他終於病死在那家醫院裏，沒能等到一九七五年結案。據我所知，這一案被關押的人員在結案時全部獲釋——有人代勞把那個「集團」解散了！

反題：生活不在別處

三　犯人格

鐵窗，在我的少年時代一直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字眼。所謂「詩意」，大體上可以借用電影上常見的那種英雄形象來表達——雙手抓着鐵柵欄，面帶着堅毅從容的微笑，他正在思念高牆外的親友和同志云云。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當代英雄」，我們那個時代的英雄當然不會是比爾•蓋茨或約翰•連儂。當年我們心目中的偶像都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又總是和鐵窗結下了不解之緣。《在烈火中永生》《紅岩》和《革命烈士詩抄》等書中的故事就不用多說了，俄羅斯從十二月黨人到老布爾什維克幾代革命者的囚徒生涯曾給我們帶來多少審美滿足？因此，我甚至曾經產生過某種大不敬的想法，覺得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沒坐過牢，乃是他們革命生涯的某種缺憾。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天氣晴好。在公安局接受晝夜兼程的三天審訊之後，我被押送至看守所。至少是可以暫時擺脫無休止的審問了，我當時的心情完全可以用放鬆二字來形容。說我坐牢是夢想成真恐有嫌誇張，但當我走進那道高牆時，卻確實是隱隱感覺到一種「今日到此一遊」的興奮。穿過一個寬敞的水泥地院子，來到獄警的值班室。我正有如一個旅遊者一般好奇地東張西望時，卻

猛然聽得一聲斷喝：「跪下！」聲音是從值班獄警的牙齒縫裏迸出來的。他說的是粵語腔的普通話，我沒聽明白，而且我萬萬沒想到他說的是「跪下」這兩個字，所以一時沒做反應。那位獄警怒了，又大吼一聲：「跪下！」我有些慌張，卻還是沒聽明白，這時候從大門口把我押解進來的那位獄警在我耳邊輕聲說了一句：「叫你跪下。」他說的是本地話，我聽上去卻簡直就像是吳儂軟語。我於是撲通一聲跪下了。那位值班獄警好似餘怒未消，瞪着眼睛補了一句：「你不老實我銬死你！」說着手往牆上一指。我看見了，牆上掛着一串烏黑鋥亮的手銬，從上往下地一副套着一副。不知道為甚麼，我當時竟然想起了「猴子撈月亮」。其實我已驚慌得不成樣子了，獄警把我帶向囚室時，我隨身携帶的行李散落得一地都是。進了號子，我就像一個散了光的手電筒，好半天注意力沒法聚焦。待到稍稍緩過氣來以後，我才開始想：我究竟怕的是甚麼？這是我鐵窗生涯的第一天，獄警們給我上了第一課。

第二課是同號子的犯人們給我上的。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入獄之初，我成天都在擔心違反監規後被罰——差不多成了一種焦慮！罰其實一般也並不可怕，就是給你戴上手銬。戴上手銬的確有諸多不便，吃飯睡覺且不說，單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够煩人的。但這些都有辦法解決，而且事出無奈也就不那麼難以忍受。問題在於，據說你要是不向獄警認錯求饒，那銬子就不會從你手上拿下來。我見過那種認錯求饒，那可不是一般的求，而是要撒嬌耍賴地求。借用現在的說法，那是一場「秀」。犯人不僅要裝得很誠懇，更重要的是要裝得很可憐。說話要帶着哭腔，尾音要拖長，能擠出兩滴眼淚來則效果更好。話其實就是那麼幾句，差不多是公式化的：「幹部，我錯了，以後再不敢了，你饒了我吧，給我開了吧，我受不了啦！哎喲！好疼啊……」關鍵在於態度。要讓對方感覺到你是個弱者，是個早就服軟認輸的弱者。有老犯總結說，這就叫作「見佛要拜，見官要賴」——八個字許是傳之久遠的一種百姓生活準則。更進一步的總結則是「人有人格，犯人有犯人格」——

這話當然已屬牢裏自創的格言了。

我的焦慮很快就解決了，因為不到半個月，銬子已經上了我身。理由是隨便找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犯了哪一條。老犯們的說法是，這是慣例，要給新犯一個下馬威。已然銬上了，我的心反而就放下了。戴銬子的痛苦我還能忍受，在公安局受審時我已曾領教過比這厲害得多的反手緊銬。一時間我倒輕鬆起來，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這時候那班老犯們卻着急了，可着勁兒地敦促我去向獄警求饒——「你不求，莫不成要幹部 (犯人對獄警的稱呼) 來求你？」他們七嘴八舌，是真急，急得也像是一種焦慮。聽上去他們是在關心我，但那種焦急卻讓我覺得他們好像也是在替「幹部」擔心，擔心「幹部」怎樣才下得了台。或者說，那種僵局讓他們感到莫名的緊張。

我終於屈服於他們半哄半嚇的壓力，開始向「幹部」求饒。像一個不會演戲的新手，那麼簡單的台詞我都背不下來。老犯們就着急地在我身後提詞：「你說我錯了……你說我再不敢了……」。結果是他們小聲說一句，我就照着大聲說一句，結結巴巴，語無倫次。這樣的表演當然不合格，但我居然還再接再厲地表演了十來回，不用說是在老犯們的鼓勵下。十來回也沒甚麼進步，所以獄警每次總是沒聽我說完便扭頭走了。按老犯們的看法本來最多只戴三四天的銬子，我那一次卻戴了十六天。有意思的是，在第十六天頭上我還沒來得及求呢，給我戴銬的那個獄警那天當班，一大早就徑自地走來給我開了，而且甚麼話也沒說。我想他是厭倦和我這樣缺乏訓練的新手做遊戲了。但不管怎麼說，老犯們認為不求不開的鐵律這一回也被打破了。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這樣一種求饒秀為甚麼能那麼煞有介事地進行？為甚麼就沒有人覺得好笑，像電影花絮裏出現的那樣，演着演着就噗哧一下笑出聲來呢？自己表演時知道，犯人們是不敢笑，可獄警們呢？噢，他們不能笑。久而久之這就成了一種「習俗」，一種雙方都必須維護的「儀式」了。多年以後我才琢磨出這

種儀式的文化含義，它體現的是在靈長類動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則——等級低的必須經常用一種具有象徵意義的姿態向等級高的示弱。

四　等

看守所裏的日子一天酷似一天，除了例行公事一般的吃喝拉撒睡以外，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等着有一天鐵鎖響牢門開，獄警站在門口喊：「某某，抱上你的鋪蓋卷，出來！」即使等來的不是自由，至少也是案子有了一個了結。看守所本來只是一個中轉站，按說不是久留之地，「嫌疑人」在此被拘押理當有一個法定的且為時不長的期限。但我們那個年代不興這一套，一旦進得那道門，「等」就很自然地成了無限期的。而且時間一般會偏長，長得嚴重超過囚犯們的預期。

打個比方說，你彷彿被困在了一輛因「臨時停車」而無限期晚點的火車上。你已經橫下心來準備等它幾十個小時，結果竟然等了一個月甚或是一年的時間也還是不見動靜！不過在你看來，這種一動不動的狀況依然是「臨時」的，你不太可能會有「長期打算」。你也許會想方設法轉移注意力以打發時光，但你的心思其實一刻也沒離開「車到底甚麼時候才能開？」這一個問題。再補充兩點，這個比方就會更貼切一些。第一，你呆在這車上是强制性的，沒有可能下車去另作選擇；第二，在這種無限期的等待過程中，基本無任何信息。　　沒有人給你解釋車為甚麼停下了，也沒有人會告訴你「快了快了」。因此，「無限期」在你的感覺中差不多就成了「無盡頭」。這樣一種感覺，在那班屁股都彷彿坐生了根的老犯口中變成了一聲長嘆：坐牢坐牢，越坐越牢！

我剛進去的時候，同號子裏的人報出來的「牢齡」就讓我心驚：十三個人中，五年以上的就有倆人，一年以下的只有一人。還聽說了更驚人的例子：看守所裏有一個「殺人嫌疑犯」，當時已經被關了整整十年！後來這位「殺人嫌疑犯」終於獲「無罪釋放」，

所長以此為例來教育我們說：「我們黨從來就是實事求是的嘛，某某被我們關了十年，問題查清楚後我們還不是把他放了？」再後來我從那個郊區看守所轉監到了市看守所，才知道甚麼叫「小巫見大巫」。有一位老革命在那裏已呆了足足十五年個年頭！據說他在解放前夕率領一個地下黨小組潛入台灣，回來時卻只剩下他一個人。這件事他沒法說清楚，所以有獄警打趣他說：「你的問題，等台灣解放了再說吧！」

有限期的等，你可以數着未來的日子等，等一天就少了一天。無限期的等，你就只能數已經等過了的日子，等一天就多了一天。這樣一種等的焦灼感是不難想像的。入獄後有好長一段時日，我只要一聽到大牆外有汽車聲就激動不安，想像着是不是我的預審員來了——那光景，就好比盼情人！哪怕只是來提案呢，至少也說明「案子在動了」！那些老犯看上去好像是比我要淡定得多。但我後來發現，他們也只不過是比我更有判斷力而已。其實他們機警得像狗一樣，睡覺時都豎着耳朵。他們的耳朵能聽清楚牆外的車是否在看守所的大門口停了下來。如果是，他們才開始集中注意力做進一步的「監聽」，並且總是能準確地判斷，是來提案了還是來放人了，抑或只是來了個新犯。至於說是哪個號子發生的動靜，當然就更不在話下。漸漸地我自己也成了老犯。我於是明白，那種等的焦灼感，像是時間療不了的傷，不可能因時間長了就結疤或變得麻木起來。它總是那麼尖銳。而且，那種近乎信息真空的狀態似乎還有一種放大效應。

我剛入獄的那兩個月，按規定號子裏須搞所謂政治學習。每天讓讀讀報，至少還能從字裏行間獲取一丁點關於時局形勢的信息。從那種大形勢來分析案情動向，雖然有點用大炮打蚊子的感覺，但至少還是能捕風捉影地引出一些話題。後來大概是出了個九一三林彪事件的緣故吧，忽然間就完全鬆弛下來，政治學習的要求不再被提起。而且，為了封鎖林彪事件的消息，有一年多沒讓我們看報紙，也沒讓九一三之後被抓的新犯關進我們這些老犯的號子。「裏

面」和「外面」於是徹底隔絕開來。號子裏只見走人不見來人，終至於只剩下兩個人——我和一位年屆六十的老農。據說他年輕時跑過馬幫，也曾十分了得。但在這個號子裏，他卻從來是異常沉默，人道是「三扁擔打不出一個屁來」。話又說回來，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時寸步不離，勝過天下最恩愛的夫妻，又哪裏還有多少話可說？所以，我和他常常是各據一個角落，似睡似醒地坐着，頭往下垂且越垂越低。時間長了我便有些恍惚，覺得自己真是坐上一輛永遠不會到站的火車了。

我那五尺見方一塵不染的囚室，好像是時間裏的一個空洞。我有理由擔心，我們可能是被外面的世界忘在這個洞裏了！等了近兩年的時間，不見有人理我。我開始沉不住氣，反復懇求獄警幫我催案。一般情況下，這種懇求照例都不會有回音，但我卻終於碰上了一次例外。所長答應了我並給了一個我絕對意想不到的回話：「你的事情有點麻煩了！我打電話去找你的預審員，他們說他調走了。我問這個案子現在歸誰管，電話那頭說：『我自己都沒人管！』」

聽到這話，我的感受就不必細說了。沒過多久，我開始稱病絕食。三天之後我的預審員來了，敢情他其實沒有調走？隔着風門 (牢門上開的一個小窗) 他劈頭問了我一句：「怎麼樣？」我又一次覺得這話本該我問他。這一回我沒讓自己被噎着，利索地回了一句：「不怎麼樣！」他突然臉一沉，說：「我們知道你很頑固……」沒等他說完，我爆發了：「沒錯！我就是頑固，你重判我吧！我不求從寬，但求從嚴，行不行？趕緊派輛車來，把我從這裏拉走。沒有小車來輛大卡車，沒有汽車來輛手板車。實在不行你就給殯儀館打個電話，讓他們來輛拖死人的車直接把我拖到火葬場去……」我簡直就是怒不可遏。他也沒等我說完，轉身走了。兩天後果然來了一輛車，把我送進了監獄醫院。

打那以後我就沒安寧過，幾乎不停地在折騰。從醫院回來後又先後三次稱病絕食，其中一次還加上了打腿自殘，且都弄出了些動靜。一次被轉到市看守所，送進病號監，另外兩次都獲「保外就

醫」。那種折騰當然也堪稱「費盡移山心力」，鬧出來的故事後來在對年輕後輩「痛說革命家史」時倒是派得上用場，但其實那點動靜從根本上說是絲毫沒有改變我的處境。我動，案子並沒有因此而「動」。我的生命之旅依然處於「臨時停車」的狀態。我還在等。

合題：理論是灰色的

五　夢魘

在大牢裏我曾做過這樣一個奇夢。我夢見自己來到一個廟門前，意識中覺得那廟叫作「革命大聖廟」。門柱上有一副門聯，上聯云：誠惶誠恐群眾在上，下聯云：莫逆莫違歷史如天。門楣上的橫批則是：南無階級鬥爭。夢很清晰，我至今還記得夜半驚醒時我立即反復默記和玩味那副對聯的情景。因料想別人會覺得難以置信，所以我後來在說起這個夢時一般會聲明，我醒後很可能對那副對聯做了加工。不過，這一點在這裏並不重要。

我自己對這個夢的簡單解讀是：這是一個與理論糾纏的夢，生成於那些年籠罩着我整個意識的一種「理論夢魘」(姑妄名之)。革命、群眾、歷史和階級鬥爭，都是在那個年代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把它們拼接起來反復論說，確實已構成了一個籠罩性的惡夢。在這個惡夢中，「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彷彿成了一個有着自己意志的怪物，人倒是歷史 (通過革命和階級鬥爭) 實現自身意志的工具。不巧的是，這頭怪物似乎還剛好是頭嗜血的怪物，因為「惡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槓桿」(黑格爾語)。理論的困擾因而已變成一種道德困擾：人是否能够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斷善與惡？

把這樣一種夢魘帶進牢裏，歷史那尊怪物彷彿就現身了——你孑然一身直接面對着的專政機器正代表它在否定你呢！那種「否定」力量的强大，讓你不可能懷疑它的正當性。因此你很容易產生的第一反應就是嚴重地懷疑自己，懷疑自己真的全部錯了：所有自

己認為好的，可能都是壞的；所有自己認為壞的，可能都是好的。而且，你覺得自己正在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而地球照樣還會轉動下去，歷史照樣還會大踏步地前進。即使你負隅頑抗，不承認自己在道德上低下，你也必須承認你是被歷史無情地拋棄了。被歷史拋棄是甚麼意思？那意思差不多就等於你從此不再存在。但是，「生活卻還在繼續」，這話的意思又是甚麼呢？我的困擾確實非同小可。

看守所是書的禁地，所以我在那裏度過了幾年不讀書的時光。入獄前開始進行的「理論突圍」自然是難以為繼，「思而不學則殆」啊！ 不過，「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即使是牢裏那麼乏味且近乎停滯的生活，也會給人受用終生的教益。那種漫長的「等」雖然說不上任何外在的「進展」，但似乎也能在人內心裏積累起某種效應。上述那個夢其實就是一個例證。夢境雖惡，但那種反諷的意味卻也透着一絲亮光。長話短說，我在那些單調的日子裏得到的最重要的教益是：不需要有歷史觀，我也可以判斷善與惡。而只要還能做出這種獨立的判斷，我作為人的生活就仍在繼續，或者借用一位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的心理學家的話來說，我就能够「活出意義來」。獲得這種教益之後我做出的第一個判斷就是，以「歷史」或「歷史必然性」的名義作的惡，也同樣是惡。

六　出獄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我蒙恩獲釋。我知道，這當然不是我努力的結果，裁定書上寫得很明白：「教育釋放」。不過，四年零兩個月的時間，我所受的「教育」倒也剛好有如上了一個大學。從無字句處讀書，我們這一代所謂「老三屆」的中學生，那些年大多可以像高爾基一樣，每人寫一本《我的大學》。出獄後我多少有點驚奇地發現，我與獄外的朋友們所受的「教育」似乎還是同步的，彼此依然心氣相通。幾乎所有人都已經自己做出了鮮明的善惡判斷，

而並不需要尋求理論的支持。是啊，有眼睛的人就能看得見的事，還需要論證？整個社會生活充滿了人心思變的氣氛，而且直接訴諸行動的衝動很强烈。有些朋友向我出示他們連夜手抄的廣東李一哲寫的大字報。有些朋友則告訴我，他們找到了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的英譯本，正在抓緊譯成中文。還有些朋友來找我商談，直接提出應該有所行動。我想，他們相信我，是因為考慮到我已經坐過牢，是一個「老反革命」。

緊接着就是偉大的一九七六年到了。確實有人開始有所行動。市中心街頭出現七君子的大字報，要求轉向經濟建設，搞現代化，一時反響熱烈。北京爆發「四五事件」後，第二天街頭就出現了「堅決支持首都人民革命壯舉」的大幅標語，消息顯然是從收聽「敵台」得來。七月四號，一幫一直在自學英文的朋友悄悄聚會，紀念美國獨立革命兩百周年……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那景象自然又有不同。短短兩三年間事件不斷，看上去像是所有的「村落」都動起來了。

我們那個山城比較小，到一九七六年似乎已實現「村村通」，幾乎所有的村落相互之間都有了交往。一個村落在行動，其他村落多半會知情。也許是整個社會氛圍讓大家都意識到，是該公開行動了。於是，所有長期處於地下狀態的村落就都很自然地開放了邊界。用現在的話說，一個民間的公共空間正在形成。當然，那個時候產並沒有「村落」的概念，大家都以朋友相稱，只不過那一兩年間朋友圈子明顯在迅速擴大。接下來我要說到的幾件事，就都是我的朋友們所為，而我自己也都曾介入其中。介入的程度有深有淺，但肯定都不止於道義上的支持。

顯然有一種希望在滋生，受到鼓舞的朋友們開始表達自己。我的意思是說，朋友們不再只是關心「中國向何處去」，而是也開始關心自己作為一個人應得的權利，首當其衝的當然就是表達的權利。我想朋友們已經意識到，表達的權利對於思想自由來說，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思想的牢籠雖然常寓於無形，但門上那把鎖卻

始終是看得見的，那就是言論箝制。因此，先是有幾位寫詩的朋友幾次上京，把自己創作的詩歌貼在北京街頭，後來索性成立了「啓蒙社」。接着又有幾位畫畫的朋友到北京街頭辦了個飛行畫展，被稱為「五人畫展」。其間還有一位朋友，隻身到天安門廣場站了幾天，身上掛了個牌子，上面寫着「要求繼鄧小平訪美之後訪問美國」。

在那個年代，這些行動當然都會被視為某種政治行動，行動者們也當然都具有政治意識。尤其是「啓蒙社」一幫人，成立了組織，組織名稱又似乎超出了文學範圍。而且，他們最初進京貼大字報時，北京西單民主牆還沒有誕生。不能說他們就是西單民主牆的催生者，但可以斷定是他們把民主牆帶回到貴陽，讓貴陽街頭也出現了那麼一塊地方。不過，據我對他們的了解，我認為他們才是地地道道的文學青年，其中不乏很有詩才的詩人。貼到北京街頭的詩，有意無意地會選擇一些政治性比較强的，那個年代的詩人不可能沒有政治激情。但私下裏他們寫得更多也更好的是抒情詩，只不過在文革時期寫那種抒情詩也是政治上的叛逆行為。一開始他們上京的動機只是想衝破言論禁區，公開發表自己的詩作。緊接着他們產生了進一步衝擊結社禁忌的念頭。在我看來，他們的結社說到底只是文學結社。但他們所受到的壓力和鼓舞都來自政治方面，這使得他們曾一度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行動引為一種政治事業。話說回來，那年頭除了政治還有甚麼其他事業？有人說，都是「啓蒙」二字惹的禍。我倒覺得，在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思想禁錮之後，「啓蒙」二字只怕是順理成章的一個選擇。而且，「啓蒙」二字為甚麼就不能是一個文學社的名稱？寫到這裏，想起一件小事。「啓蒙社」的一位成員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一開口說的居然不是「同志們」，而是「女士們、先生們」，我認為那是在公眾場合最早恢復這種稱呼的舉動，值得載入史冊。這個舉動實際上是在衝擊籠罩着整個社會生活的「革命意識」，也即把整個社會生活都理解為「革命事業」，實質是「政治事業」的意識。

「五人畫展」的幾位朋友與啓蒙社的朋友有着相同的動機：公開發表自己的作品，同時衝擊言論禁區。但他們想得更簡單，滿足於一次飛行畫展。他們當中有後來很有成就的畫家，也有自己不畫畫但為使這次行動更有成效而參與的朋友，比如一位自任的現場英文翻譯。事實上在他們五個人背後還有一大群幫忙的朋友。展出的畫中也有在主題上政治性 (或毋寧說批判性) 很强的，但更多是藝術觀點不同於主流意識形態的作品。因此也可以說，展出的作品都是有意識地不尊奉「政治性第一，藝術性第二」這一教條的作品。他們當中有一位詩人還執筆用散文詩的形式趕寫了一本小冊子，題名為《藝術小詞典》，相當於表達他們藝術觀點的宣言。用現在的話說，他們的觀點顯然比較「前衛」。他們當然也知道自己的行為具有政治性，因為明擺着有政治風險。不過他們自始至終沒有把自己誤解為政治家或革命家，而只是作為一個人在爭取表達的權利。

至於站到天安門廣場要求「繼鄧小平訪美之後訪美」的那位哥們，也一點不是在「發神經」。他很清醒，並沒有異想天開，以為自己因此就可以被美國方面邀請和被中國政府允許到美國去一遊了。他也只是在作出一種表達。他想表達的是，中國的平民百姓與中國的政要一樣有出國的權利，尤其要强調的是有到美國這種資本主義國家去的權利。

民主牆遭禁之後，「啓蒙社」也被取締了。朋友們卻並沒有就此偃旗息鼓。醞釀民間辦報，構想街頭競選，商量進京聲援魏京生……。一時思想非常活躍，但卻沒人認為需要先從理論上統一認識。以上各種謀劃都胎死腹中，原因在此不值細論。到了一九八〇年，終於有一件事成了：好幾個「村落」的朋友聚在一起，辦了一個民營的食品廠。與當時想做其他任何事一樣，辦廠的動機中也包含着政治意識，或曰理想主義：用實踐去改變中國社會結構——這是多大的一件事！而且，民營辦廠也是公民應有的權利。總之，他們當時都很少想到錢。他們當時開玩笑說：「這回好了，公安局要抓本市的反革命，只需把這個廠子圍起來就行了。」後來這幫朋友

分分合合，大都成了企業家，這裏按下不表。

就是在這一年，我考上了北大。籌備辦廠的朋友們前來道賀，說出的話卻是：「考上了？太可惜了！我們正要起事呢！」待到我入學之後，一位福建籍的朋友還果真就去了美國。只不過他不是去訪問或旅遊，而是去投親靠友，奔着移民的目標前往。他從美國寫回來的信說：「朱正琳走了一條中國傳統的路，而我走的是我的祖先們開闢的路。」

完稿於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日

黎明前的躍動
——我看到的七十年代

・鮑昆・

一九五三年出生，自由撰稿人，主要從事影像視覺文化批評和策劃、策展攝影活動。八三年大學畢業，在大學任教七年，九〇去德國。九三年回國從事廣告業。二〇〇二年至〇五年出任CCTV 攝影欄目執行主編。是二〇〇五武夷山國際攝影周、二〇〇六桂林國際攝影大展、二〇〇八北京攝影季的策劃人與二〇〇七廣州國際影像雙年展的學術主持人。

一九七一年，前兩年那狂躁動盪的生活已經過去了，大批中學生和大學生，也以到廣闊天地煉紅心的理由，早就被遣散到邊疆和各個貧困地區「鍛煉」，北京安靜多了。但是，許多「插青」還是以各種理由，又返回了北京，養病就是最合理的理由；回來的「插青」和一些留在北京工作的年輕人，於是開始了他們獨特的精神生活。讀書、學藝和遊山玩水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不過，普通的平民子弟並不擁有這種生活，他們沒有支撐這些活動的能力，也沒有這種貴族式的興趣；熱衷於這種生活的，多數是幹部子弟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處於青春期的這些年輕人，在北京的郊區尋幽問古，遍訪青山。當時，近處著名的去處有臥佛寺、圓明園和頤和園，遠處的是潭柘寺、戒台寺、鷲峰，再偏遠的就是溝崖、龍門澗、上方山雲水洞和十渡等地了。後面這些地方現在都成了著名的旅遊勝地，在當時，還是人迹罕到的清幽去處。

七月十六日，一個艷陽高照的夏日。北京十三陵水庫的水面像鏡子一樣平靜，我和從山西永濟插隊回來的原二十八中的老戴正在那裏游泳。平靜的空氣，平靜的陽光，讓人慵懶。我們倆游累了，上岸躺在大壩上曬太陽。忽然，大壩上的廣播喇叭嘶嘶啦啦

地響了，看來要廣播了。下午的廣播時間還沒到，有些突然。不一會兒，喇叭裏傳出那熟悉的高亢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的聲音：

> 下面廣播新華社重要公告：「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
>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

我們看着高懸在頭頂上眩目的太陽，懷疑自己的聽覺出現了幻覺。中國邀請尼克松訪問？美帝國主義——美國侵略者，要來中國訪問？我和老戴都驚呆了，面面相覷。可是廣播喇叭中那高亢的聲音一再重複，證實了消息的權威性，不容我們再懷疑。

太神奇了，我們天天怒吼詛咒的美帝國主義總統就要來中國訪問了？而且他的助理居然已經來過北京，還走了？接着，更多的問題和疑惑，開始在我和老戴之間出現。這對抗美援越有甚麼影響？對台灣問題有甚麼影響？是為了抗衡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嗎？這對這麼多年的反美立場意味着甚麼？再往深，往遠——，我們難道和這一百年多年來的宿敵化敵為友了嗎？我們不是一直斥責赫魯曉夫在國際關係上搞修正主義的和平競賽嗎？那不是投降主義嗎？老戴和我，都是那時候愛讀書的人，也是屬於那種愛掰持問題的「有思想」的年輕人。但這個消息，確實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和判斷能力，一種莫名的興奮也開始在心底湧動，感到這個世界可能要有變化了。

在那個年代，從小被灌輸的革命思想和對領袖的忠誠意識，已經把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完全依附在一種集體的、社會的觀念之中。

不過，年輕人求知的天賦，卻仍像魔鬼一樣驅動着我們。實際上，即使在狂躁的六十年代末，在最急風暴雨的時期，年輕人思考社會和歷史的願望，也從未停止。就像一九六八年的遇羅克們一樣，無論出身甚麼樣的青年人，大家都從不同的立場、身份和態度，思考和汲取着知識，希望對這個世界更多地做自己的判斷。

在一九六八年，我已經接觸一些以讀書為樂的中學生圈子，讀書的範圍從法國文學、俄羅斯文學、二戰歷史，到內部出版的白皮書，不一而足。甚至連《赫魯曉夫講演錄》這樣的政論書籍，我也半懂不懂地讀過。這些書，給了我們許多新鮮的信息和知識，但自己其實沒有獨立的判斷能力。書中那些故事和言論，只是給了我和朋友相互之間炫耀知識的資本而已。我們閱讀的眼光和立場，往往是先判定言論者的身份和他的立場，然後據此做對號入座式的分析。這樣，對於赫魯曉夫，我們事先已經認定他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叛徒，背信棄義的修正主義者，至於了解他的言行，不過是在驗證我們理想的純潔性，再次證明他就是一個「壞人」而已。在那個時候，我們的思想和知識相當封閉，完全是在一九四九年以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裏完成的。

不過弔詭的是，當時由於毛澤東親自下令，將原來只局限於處級幹部以上才能閱讀到的《參考消息》，完全開放到全國有黨支部一級的單位，人們可以隨便閱讀，這實際上就將這份四開四版的小報完全大眾化了。這份完全是境外報刊文摘的報紙，自然受到了新華社編輯的嚴格控制，所有的消息都經過極其嚴格的篩選，但它畢竟是「原汁原味」的境外言論，有心計的讀者還是可以從中讀出許多消息背後的含義。比如我的一個朋友居然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幾天後，就從塔斯社的一則在外訪問的勃列日涅夫因中國事件急促返國的消息中，讀出中國出事了。而那時距我們正式傳達和公佈這個消息還有很長的時間。另外，除了編輯從境外左派報紙摘登的贊頌中國和毛澤東的消息外，對於東西方兩大陣營的一些

軍事報道，還是相當真實的，所以這份報紙對很想了解中國之外世界情況的人，是非常有價值的。

尼克松要來中國的消息，讓我們雖然覺得不可思議，但很快也把對這個事件的理解納入了我們的思維定勢。那就是，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勢力，不得不正視我們中國的存在了。中國是一個有着核武器的大國，而且也擁有了航天技術。再說，中國支持的東南亞三國的武裝革命鬥爭，也一定是迫使美國人必須坐下來和我們談談了的原因。這是我們對這個事件進行分析後的第一個結論。這讓人興奮，因為它證明了我們的存在，證明了我們正義事業的勝利。後來，新華社那篇關於這個重大事件「言簡意賅」的報道正式公佈，各個單位又舉行例行的「吹風」會議，領導們一級一級向群眾解釋「我們為甚麼要請尼克松」。對這一切，我們有一種朦朧的心理滿足，那就是那個神秘的美國終於可以接觸和了解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本雜誌是我們這些青少年極其喜愛的，就是《航空知識》。這本專門介紹航空技術的科普讀物，實際上是中國人了解世界的一個重要的窗口。它替代了因中蘇關係緊張後越來越少見的、以翻譯介紹蘇聯的科技進步的一本大開本的雜誌《知識就是力量》。《航空知識》裏豐富的航空武器的介紹，和各種航空航天飛行器研發進展的報道，讓我們知道了這個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國家是美國。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劃剛剛成功實施之後，《航空知識》雜誌就作了大篇幅的深度報道，這也打破了我們原來對前蘇聯科學技術優勢的神話般的迷信。我當時對美國的兩個成就極其崇拜，那就是阿波羅登月和F–4鬼怪式戰鬥機；對後者，我還自己按《航空知識》上登載的三維模型圖紙製作了模型，掛在家裏。我當時是一個飛機模型愛好者，美國的戰鬥機系列，從F–86開始，到後來最新型的F–104等，我都全部製作了模型，然後把它們用綫懸掛在家裏，與蘇制的米格系列對峙，就像一個空中的戰場。我覺得它們凝聚着人類發現和創造的力量，也構建了我對美國認知的一種相當矛盾的心理。美國，對我來說是一個潛藏在心底的神話。現

在，誰也想像不到當時一些中國人對世界的了解居然是通過這樣一個路徑。

記得在那個廣播後不久，《參考消息》接着後續報道了國際傳媒對這個事件的跟踪新聞和分析。魔術師般的基辛格博士，帶領他的團隊飛越喜馬拉雅山的傳奇之旅，更加深了此事件的神秘性。後來美國白宮神秘兮兮的態度，也讓這個事件十分吊人胃口。跟着，就是人們的期待了。這個事件是中國七十年代最重大的幾個事件之一，後來證明它為這個東方古國的一系列巨變埋下了伏筆。

在人們等待那個歷史性的會晤時，又發生了一個徹底擊碎我們信念的事件，就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林彪出走。記得那是一個初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正在北京新街口外小西天電影學院門口幹活，為修建防空工事挖土方。我的同事張海濤趁旁邊沒人，緊張地對我說，「中央出事了，林彪叛逃了」。我當時手中的鐵鍬停在了半空，驚得呆在那裏，忙問，「哪來的消息」？他說，「昨天晚上一個老幹部來我們家說的，沒錯。」張海濤的父親是文革前計委勞動工資局的局長，是中國沿用多年的八級工資制的設計者，也是文革開始後第一個被余秋里拋出揪鬥的所謂「黑幫」。如果沒有文革，這人有可能提升為計委副主任。揪出批鬥後，他因被醫生確診為罹患肺癌，所以沒有去幹校，在家養病。那時我經常去他家和他聊天。他是一九三七年從香港去延安參加革命的學生幹部，參加過抗大學習，後在晉察冀邊區平西支隊負責敵工工作，是中共黨內有文化的幹部。他經常對我講黨史和它們在北京山區的戰鬥生活，所以從他那裏來的消息應該是不會錯的。在確認這個消息的真實性後，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失魂落魄，然後，心中的精神建築也轟然垮塌。我現在回想那一刻，甚至還能聽到那垮塌瞬間的轟然巨響。多少年來建立的精神信仰，就在這一刻一下子蕩然無存了。後來我問過許多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的人們，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九一三林彪事件，將絕大部分中國人幾十多年來建立起來的政治信仰徹底

瓦解了，也就是說，那以後，人們在接受各種信息和分析信息時將不再有一個固定的解釋系統了。

中美之間開始對話，以及林彪九一三事件，為七十年代的中國青年人思想精神的變化作了最重要的鋪墊。可以說，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順利完成了他的訪華之旅。中國的門打開了。以後一系列眼花繚亂的事件，讓中國人又進一步大開了眼界。中國的乒乓球外交、莊則棟的美國之旅；楊振寧、李政道、牛滿江等人被毛、周等人的接見；中國加入聯合國；中國允許五十年代從東南亞歸來的華僑再次出境；中國各種不同級別貿易代表團的出訪，這都給中國人吹來了强烈的外來之風。想像中的美國、日本和歐洲，都在從這些地方出訪回來的人的口中具體化了。北京為了迎接尼克松的訪華，還進口了大量的豐田小轎車作為出租車。北京以前基本沒有出租的汽車，只有可出租的帶篷的三輪摩托車，每公里行駛費是四毛錢。日本豐田車的出現，一下子讓北京有了一種現代化的感覺。尼克松來華時候正是嚴寒的冬季，正好那年北京的雪很多。北京市政府就臨時製造了許多掃雪車、鏟雪車，都是利用解放卡車改造的，在車上加上了可以滾動的雪刷和可升降的刮鏟。這些車被噴上鴨蛋青色，每天在主要街道上活動，很有點節日彩車的感覺。不過，隨着尼克松的訪問結束，這些車輛立即奇迹般的消失了——把加上去那些部件拆除之後，這些重新又去拉貨了。但這些擺設了幾天的各種掃雪機械車輛，也為人們了解現代技術世界增加了感性的實物認識，因為發達世界就是這樣的。

國內的政治局勢，由於林彪事件的影響，也發生了很大轉變。老幹部們開始活躍，鄧小平在周恩來的支持下和毛澤東的批准後復出，而鄧復出後開始的「整頓」，又帶來的是全民對於發展生產的振奮，談論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開始公開化和合法化。另一方面，由於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對權力的窺測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政治鬥爭漸趨白熱化。面對這樣的局勢，毛澤東發佈了打壓江

青的講話，於是在老幹部和民眾中，公開地議論江的「女皇夢」變得相當普遍。那時我們朋友之間的聚會，交換這些消息成為主要內容。在工作單位，我的師傅們雖然不敢地指名道姓地公開議論，但黑話般的相互接茬兒，時常引得大家會心地一笑，出了單位，利害關係沒有了，就更肆無忌憚了。就這樣，民眾民間言論的禁忌開始打破，這是對後來改革開放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的一個社會變化。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大氣候中，千千萬萬的青年人開始了自己的精神追求。眾多下鄉插隊的知識青年到了「廣闊天地」之後，等於放出了籠子的鳥兒。沒有人管理他們，除了農村生產隊能以口糧施加一點限制，讓這些青年人為生存有些許顧忌之外，思想和精神上有着巨大的自由。一些家庭環境比較好的，比如幹部子女，並不為生計發愁，他們經常以各種理由返城「休息」。這種休息，其實是一種賦閑的精神活動，因為那時並沒有任何可以讓他們在城裏工作的機會。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於是開始讀書、閑聊、逛街、遛公園。也有一些青年，繼續「破四舊」時養成的暴力生活習慣，成群結夥地嘯聚街頭，從打架、玩女人到以吃「佛爺 (小偷) 」為樂，真是為所欲為。正派的年輕人，則是進行讀書和各類藝術活動，形成很多小圈子。這些圈子的成份主要由插隊知青、留城工作的青年工人組成。

從一九七一年到文革結束的一九七六年之間，北京青年人的文化活動是非常活躍的，內容也非常豐富。文革旗手江青對於藝術的愛好，實際上倡導和推動了文藝的群眾性普及，其中最具規模的，是舉國上下，樣板戲演唱蔚然成風。北京幾乎每一個像樣的工作單位都有像模像樣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這些宣傳隊都是由各個單位裏選拔出來的俊男靚女組成，排練的時間投入和密度都非常高，基本屬於半脫產，大型的國營單位則是完全脫產。宣傳隊一般都有樂隊配置，樂器多少，則根據各單位的財力情況而定，但無論如何，一般都有一架手風琴、幾把小提琴，至於竹笛和二胡這樣

便宜的樂器，肯定都有。大型企業，西洋管弦樂則一應俱全。像東郊七九八廠和七七四廠 (現在已經成為北京著名的「七九八藝術區」)，就都有這樣的規模配和陣勢。這些宣傳隊，角色除了京劇需要的生旦淨末丑，還有歌手舞蹈若干，以備獨唱獨舞之需。每年，各地區、各系統還要舉行文藝匯演、調演，興師動眾。這些宣傳隊還有一個共同趨勢，就是向專業化看齊，像「樣板團」一樣地演樣板戲，那是任何人都不能質疑的。這都使得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成了文革中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

我所在單位西單商場的宣傳隊，規模就有四十多人，他們幾乎有一半的工作時間用來排練節目。對於這些隊員，除了能歌善舞之外，還要求政治上根紅苗正；個別出身成份有瑕疵的，也是政治上狂熱追求進步的人，所以你有宣傳隊的身份，還意味着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們單位對面是北京電話局宣傳隊，人數更多。由於電話局下屬單位多，演出任務就較多，他們出來進去大客車接送，非常氣派。我當時在學習吹黑管，和他們非常熟，因為他們樂隊裏有兩個人會吹黑管，經常在一起交流。那時的北京電話局是半軍事管制單位，有些機要部門的意思，管理很嚴。不過這些宣傳隊員們，則像是籠子裏的鳥兒，自得其樂。說心裏話，他們的手藝都非常粗糙，樂隊齊奏時，雜音跑調不斷，因為都是自學，無師自通。但那個宣傳隊真是一個歡樂窩，俊男靚女正值青春，宣傳隊也就是一個談情說愛的大熔爐，緋聞自然也不斷。

一九七〇年至七六年之間的文革時期，一方面是上層對階級鬥爭的不斷推動，一方面是底層工人群眾的自娛自樂，而且一切都以革命的名義。樣板戲的普及，推動了民間的音樂、戲曲和曲藝等藝術的活躍，許多年輕人都學習樂器演奏，從時髦的手風琴、小提琴，到管樂的黑管、雙簧管、小號，甚至被斥之為資產階級靡靡之音的吉他，都成為青年人業餘生活的時髦愛好。一九七一年，我就用第一個月的工資十七元零八分，跑到王府井宏聲樂器行，買了一把十六元五角的吉他。那時候，音樂愛好者們相互交換各種練習曲

曲譜，小提琴練習曲，從馬扎斯到帕格尼尼，應有盡有。北京故宮的筒子河畔，每天晚上都聚集一些音樂愛好者，他們那銅管長號和雙簧管的吹奏，為文革北京沉悶的夜晚添加了不少浪漫。一些公園的幽靜之處，也是許多樂器演奏愛好者常去之處。北京城裏如此之多學習樂器的人，很多都是希望可以以此改變自己的命運，爭取能被各種部隊和地方演出團體接受，穿上最為風流的軍裝。當然也還有我這樣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絕對無望的人，純粹是希望在這些活動中尋找青春的慰藉。

在那一段時間裏，音樂活動的活躍還有一個作用，就是帶動了民間中的音樂欣賞。一些文革破四舊時未被砸爛的舊唱片，也開始四處流傳。這些唱片既有文革前發行的蘇聯和國產的美聲獨唱、交響樂，也有偽滿和民國時期的流行歌曲，甚至李香蘭的《何日君再來》。年輕人之外的中年人，由於命運已經確定，面對前途渺茫的生活，就更加在音樂的世界裏尋求安慰。我曾接觸過幾位中年朋友，喜歡和我大談巴赫和梁祝，那神情，像是在他們面前的黑暗中點亮了一支蠟燭，他們的眼中映射的光芒，給我非常深的印象。還有一次，朋友帶我到西單的一個胡同裏，拜訪一位彈鋼琴的中年工人。已經記不得他的名字了，只是記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同一般的氣質，他帶着眼鏡，很斯文，可他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工人。看他彈琴，就像見到蕭邦。在優美的琴聲中，他還對我大談人生哲學，記得他有一句話影響我很久。他說，「你需要不斷地接觸『高級的人』，才能讓你的生活充實」。他說的「高級的人」，決非現在世人眼中有權勢的人，而是指站在精神高處的人。這句簡單的話，在那個壓抑的時代，聽起來顯得很悲壯，讓我立時激情澎湃，感動了很久。有一年的春節，一個從北大荒兵團回來的大朋友，身穿兵團發的顏色不正的「假軍大衣」，肩上背着一把吉他，在一群朋友的拱衛下，自彈自唱起蘇聯歌曲「第聶伯爾」。在北京安靜的黑夜中，吉他浪漫的琴聲和他略帶憂傷的歌唱，幾乎讓大家都滾下熱淚。

最讓我難忘的是一個同單位的師傅。我當時工作的西單商場，

是一個比較大的單位，按所賣的商品分成許多商品部，他是文化部賣樂器的售貨員。他因為長年接觸樂器，彈得一手漂亮的月琴，也能吹一些管樂器。我經常到他的櫃枱「起膩」，其實就是想看那些樂器。我們後來漸漸熟悉起來，他經常在下班後到我家來找我瞎聊，但沒有樂器的聊天實在是沒甚麼感覺，我有些不太耐煩，覺得有些浪費時間。他看出來了，顯得有些忐忑，但還是默默丟丟地來。終於，在一次他到訪後我送他出門時，他忽然緊緊地擁抱我，而且神情慌亂。我對他的舉止莫名其妙，一把推開了他。對於我的「憤怒」，他驚呆了，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眼中忽然濕潤，然後扭頭離去，從此再沒有找過我。對此我一直雲裏霧裏。直到很多年後，見到老同事，才知他早已離開人世。他們還告訴我，他好像是一個現在所說的「同志」。我聽後一震，忽然想起他還養花。他有一個袖珍的花房，在他臥房的窗台上伸向室外，養着若干仙人科的植物。在北京灰冷的冬日，那個小玻璃房子裏的紅色仙人球，像火一樣可以灼傷路過人的眼睛。

那時候，在樣板戲的普及之外，繪畫和攝影活動也很炙熱。隔一段時間，各個單位都要舉辦文革成果彙報展覽，展覽內容，往往都是群眾創作的繪畫以及書法、攝影作品。當時的中國攝影學會和中國美術家協會，在文革開始時暫時癱瘓之後，很快就轉換身份，成為全國美術展覽辦公室和全國攝影展覽辦公室，並基本按年度舉辦各種活動和展覽。這個文革中形成的臨時體制，給民間繪畫等藝術活動留下了不小的空間。一些藝術愛好者可以利用它提供的方便，比較安全地從事繪畫等藝術活動。另外，繪畫普遍被認為是個技術性極强的藝術，尤其是油畫。是技術，就得練習，所以當時許多年輕人都在業餘時間學習畫畫，特別是畫油畫。北京的公園，是這些人寫生的好地方，那些背着油畫箱的身影，在很多公園裏都經常可以看到。文革前，中國的美術教育和理論體系，基本都是照搬前蘇聯的東西，所以當時北京的繪畫愛好者們，學習和談論的都

是俄國和前蘇聯的現實主義繪畫。蘇里科夫、列賓、列維坦、希施金，這些俄羅斯巡迴展覽畫派最著名的畫家，是年輕繪畫愛好者耳熟能詳的名字。一些文革前《美術》雜誌介紹的中國畫家，也是年輕人崇拜的偶像，像靳尚誼、羅工柳、詹建俊、聞立鵬等。還有北京畫院的張文新、軍博的何孔德、美院附中的王文彬、青海的朱乃正，都是年輕人追捧的人物。每次繪畫展覽之後，我們都會對自己心儀的畫家津津樂道，對其新畫作品頭論足，談他們的色彩，他們的素描。

一九七四年，我所在的西單商場新樓建成，需要牆上裝飾繪畫，於是領導決定由商場美工組完成。但那麼大尺寸的油畫，美工組無力獨自完成，正好我們美工組裏有兩位由中央工藝美院畢業的老師，於是由他們出面請美院附中的衛祖蔭老師來幫忙。這期間，我還借機參觀了另一位美院附中老師王文彬作畫的現場，他正在給北京飯店畫一幅以長城為題材的巨畫。王文彬在文革前以畫作《夯歌》聞名，他畫中那燦爛的陽光感覺，讓許多一代年輕畫家非常仰慕。記得見到他時，我連大氣都不敢出，就像見到一位聖人。那段時間還去了總政歌舞團，見到了以畫作《四個姑娘》著名的溫葆，以及現在還活躍的王懷慶。

為了更多地了解繪畫歷史，當時一個重要活動，是朋友之間交換借閱畫冊，也經常到在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去閱覽和借閱，並用油畫棒臨摹。當時中國畫家對俄羅斯繪畫以外的西方繪畫情況知道有限，所知道最多的也就是法國的印象派繪畫。再後的，就是德國女版畫家凱綏•柯勒惠支了，因為魯迅先生曾極力推崇她，她的左派色彩也符合文革時的環境，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至於其他，如康定斯基、蒙克等，是有所耳聞，但不熟悉。不過對於印象派，很多人非常熱衷，但決不是從藝術史的角度，而是只從繪畫的技術技巧方面注意和欣賞。像雷諾阿、畢沙羅、莫奈，都是從技巧上理解，認為他們能够那樣科學地觀察和再現對象，是現代繪畫在技術上了不起的革新。至於馬奈和高更，就有些費解了，對梵高，則是他發瘋

的傳奇故事讓大家欽佩，卻沒有人認為自己應該去學習他或者模仿他。直到文革後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畫展的時候，我才見到來看畫展一位年輕人，手裏提着一幅他模仿梵高筆觸的習作。我吃了一驚，覺得新的時代真地來臨了。

攝影在那時候是一個相當普及的愛好。由於當時中國封閉的環境，中國的照相機工業面臨一個非常好的國內市場機遇，照相機工業在文革中獲得了高速發展。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全國的照相機廠如雨後春笋般紛紛成立或重建，生產量迅速擴大，以至於在文革末期，在北京這樣的城市，收入較好的幹部、知識分子都擁有照相機，已不鮮見。一些有條件的單位，都養着專職的宣傳幹部，其中一項工作，就是為單位的各種活動攝影。在部隊，許多團一級的單位都有專職的攝影宣傳幹事。在城市裏，攝影的業餘愛好者就更多，去公園照相，是當時一項高尚的時髦。春節下鄉回來的知識青年，一項重要度假內容，就是去各個公園或天安門照相。當時還在起步發展的保定膠片廠，以及河南南陽的第二感光膠片廠，因為生產質量很不穩定，大量的殘次品以「處理品」的名義拋向市場以挽回損失。這些「處理品」的膠捲四毛錢一卷，在前門大柵欄和西單、王府井幾個照相器材店售賣，大量等待購買的人經常擁堵在那裏，「處理品」一來，馬上一搶而空。後來隨着產量的加大，情況才開始好轉。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四五運動，在廣場上拍攝的難以計數的大量攝影作品，差不多都是用這種「處理品」拍攝的。

在家庭中自己洗印照片，當時也是件時髦的愛好，洗印放大器材都是自己製作。自製的曝光箱和放大機千奇百怪，但卻傾注了製作者全部的熱情。我曾在同學和同事的幫助下，做了一架人見人愛的放大機，為此幾乎動用了車、鉗、銑、刨等全套金屬加工技術。除了自己繪製圖紙之外，我還通過放大樣的方式，自己獨立完成了這個放大機燈室的下料、阪金和焊接。那架放大機當時幾乎可

以和工廠出品的媲美，頗得朋友們的欣賞，也成為他們頻繁借用的工具。

說起那時候的攝影，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文革「旗手」江青酷愛攝影，這使得當時的攝影活動附加了某種隱喻式的革命色彩。當時發行量極大的《人民畫報》與《解放軍畫報》，時常刊登她以「大海」和「峻嶺」署名的照片。她那種樣板戲式的戲劇風格的照明，成為一些愛好者羨慕的風格，而且也强烈地影響了我。我當時的工作是西單商場照相館的照相員，時常忍不住拿眼前的顧客實踐模仿「旗手」的用光方法，結果不斷造成顧客的「退照」抗議。領導為此沒少批評我，而我則倔强地認為顧客覺悟不高，不懂得這是江青同志提倡的突出革命形象的方法。為此，我也寫過不少「檢查」。所以，江青對攝影在中國的普及，不能不說還是非常有影響的。

比繪畫不利的是，攝影沒有可資參考的「歷史」來學習，除了文革前一些關於攝影技術的出版物，基本就沒甚麼。個別老攝影家中還存着幾本老的民國攝影雜誌，但是印刷非常不好，數量也極少。國外的攝影雜誌在北圖有一些，但因照片要比繪畫真實，所以管理者認為比較敏感，借閱也就很難。雖然有這樣的困難，攝影的技術性畢竟要比繪畫簡單一些，不需要太複雜的技藝訓練，上手還是要容易許多。那時候北京攝影愛好者的小圈子很多，成員多是自己周邊的志趣相投者。我自己就經歷了好幾個圈子。開始的圈子是中學時代的幾個同學，同時還和幾個大學生來往。後來隨着生活工作的改變，又與文化部廊坊五七幹校的一些年輕人，構成小圈子。他們每周末返回北京時都會聚會，當然也會談論交流其他各種話題，成為一種簡單的「沙龍」。這樣的攝影圈子，後來比較成氣候和出名的，是新街口百花深處胡同北影宿舍的池小寧家。由於都是電影專業人士的後代，這夥人對攝影理解自然要比其他圈子要深入一些，他們不但定期學習交流，而且自辦展覽，組織集體郊遊，采風拍攝。那個院子後來誕生幾位著名人物，例如陳凱歌、田壯壯和

池小寧。不過陳和田並未參與攝影活動，圈子裏的主要人物是池小寧和年齡大一點的陳凡。池小寧周邊聚攏了一大批熱愛攝影的年輕人，他們甚至請來了老資深攝影工作者狄源滄先生定期講課。狄源滄是建國以後少有的既掌握外語，又熱衷於攝影理論的人，而且他長期從事攝影刊物的編輯，理論和實踐經驗都非常豐富。狄源滄為這夥年輕人帶來各種歷史和國際的攝影信息，這在當時就屬於非常有系統的知識傳授了。不過，狄源滄也受那個時代的禁錮，所掌握的國際信息基本局限在上個世紀的前半葉，不可能十分全面和系統。即使這樣，對於這些饑渴的年輕人們來説，這些知識也是有如久旱的甘霖。在後來的一九七九年的四月影會活動中，這一群人成為重要的力量。

從現在快節奏的喧鬧生活看來，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最近幾年，知識界經常梳理我們這三十多年來的思想歷史，尤其是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給予了巨大的關注。無疑，八十年代是一個激情澎湃的時代，因為變革的快感幾乎覆蓋了那十年的每一天。但八十年代畢竟是從七十年代走來的，對於那個前十年，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其歸納進文革的歷史，色彩自然是黑暗的，好像那只是一個政治權力爭鬥的年代。但是，在我的回憶裏，那個年代要複雜得多。還在一九六七年破四舊的暴力運動未完結之時，文革前出版的那些抒情流行歌曲，已經開始在「老兵」(老紅衛兵) 們的室內悠揚地飄蕩了；文革前的印刷讀物，雖然受到「焚書」的命運，但一直在民間被大量地保存和大規模地流傳——無數的碎片重新彙集起來變成一條波濤滾滾的心靈暗河，在千萬的青年人心中演繹着文學光輝中的愛情和命運，同時也映照着黑暗卻並非虛無的生活。「羅亭」、「安娜•卡列尼娜」、「奧勃洛摩夫」、「于連」這些人物形象，仍像鮮血一樣在那一代年輕人身體裏涓涓地流淌和活躍，積蓄着他們遲早一定會爆發的青春力量。也正是這些能量的積蓄，才讓一九七六年偉大的四五運動在廣場上悲壯地演出，才導致八十

年代初的思想啓蒙運動井噴式的爆發，讓八十年代初那場關於人道主義的討論有歷史的依托。所以，我們回望令人動情的八十年代，不能不回溯七十年代黎明前暗流湧動的陣痛。因為，一切歷史都有其成因。歷史也從未間斷。

二〇〇八年八月八日

探討，整肅與命運*

· 許成鋼 ·

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倫敦經濟學院教授 (終身教職)，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全歐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CEPR) 高級研究員。曾任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及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從師於諾貝爾獎經濟學家馬斯金。為十多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學術期刊的編委或學術顧問。在十多個主要國際經濟學及法學期刊發表過論文。曾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發展署、英國財政部、歐洲開發銀行等做過顧問。

放在我桌上是一份近四十年前的手稿，末尾的署名和日期是：許成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這是今年夏天母親在中關村的家裏找出來的，還找到一摞厚厚的七十年代家書和一九七五年上訪的文稿。剛巧最近北島提到要編撰關於七十年代的專集，再加上不久前北大荒插隊的戰友張瑩傳來她的相關回憶，好像驟然間這一切都在提醒我重新梳理記憶，儘管那十年似乎從來沒真的遠離我。

我們習慣把歷史以十年計，這種斷代法常有不盡人意之處，可當我回頭看自己走過的路，七十年代，的確整齊地切割了我的人生。一九七〇年，我不到二十，在北大荒建設兵團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的「頭目」，被關押審訊批鬥以及監督勞動管治。在監督勞改的過程中，我自學了高中及 (中國和美國) 大學本科的數學、物理、電子工程及英語，並搞了不少技術革新。七十年代最後一年，近而立之年，我考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成為該校唯一沒有本科學歷的研究生。那十年，我從階下囚到所謂「科舉及第」，對歷史無足輕重，而對我自己卻是一生最重要的轉折之一。

我七十年代最初的災難，就始於上面提及的那份完成於六十年代最後一天的手稿，那是計劃中的一本書的最初四個章節，長達

* 作者感謝張瑩和郭迪對本文寫作提供的重要幫助。

六十六頁，有引言有腳注有文獻索引，工整地複寫在當年的小格稿紙上，書名為《試論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我忘了當年到底複寫了多少份，給多少人寄過，總之，這份文稿成了我最重要的罪證之一。黑龍江建設兵團二師九團黨委一九七四年為我的「案件」所下的結論，主要是組織遍佈全國九個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反革命集團」，因此定為「反革命集團案」。

說到這份書稿，就一定要回溯到文化革命。文革開始時，我在清華附中讀初中二年級。文革前，我最大的興趣是工程，清華附中有很好的無綫電業餘小組和實驗室，我的課餘時間大都花在無綫電上。那時我已開始自學無綫電電子學和相關的數學，沉醉於技術設計和發明。我出身不好，父親許良英於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罪行」見諸於《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主要媒體，後被迫離職到農村當農民；母親受株連被開除黨籍及降職處分。不過，我在政治上還算活躍，文革前我是清華附中少先隊的大隊副。父母曾是中共地下黨員，即使遭到殘酷整肅，他們仍持有非常正統的觀念，並用它教育我。我在文革前是個堅信共產主義的好學生。

而文革讓我感到非常困惑。文革前，反修防修已成為學校裏每日的話題。文革最初反對的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綫。一九六六年五月，清華附中高二的幹部子弟成立了「紅衛兵」。當毛澤東離京到外地視察，團中央奉黨中央之命派工作組進駐學校。工作組層層打招呼說，「紅衛兵」是非法組織，如同當年的右派學生。隨後毛澤東回到北京，他立即表示支持「紅衛兵」。

一時「紅衛兵」成了文革主力軍，矛頭指向學校領導、教師、學生幹部和出身不好的學生。我出身不好又是學生幹部，自然成了打擊對象。這有如晴天霹靂——我一下成了革命的對象。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勢變化是以天計的。清華附中和清華大學成為全國政治的中心。毛澤東表態支持紅衛兵後不久，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小組到清華大學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組在兩個月前親自定的案。此舉意義重大，文革的矛頭轉

而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派組織蜂擁而起，成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里糊塗，但親眼所見周總理和江青對造反派的支持，認定他們代表毛主席，於是參加了造反派。

緊接着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清華大學出現直指劉少奇的大字報，隨後是毛澤東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意味着共和國主席成了革命的對象。讓我困惑的是，我父親的罪行之一，就是他造謠説黨中央分裂了，説以劉少奇為首的老幹部反對毛主席和百家爭鳴。一九六五年我為了與父親劃清界限，讀過一九五七年的相關報刊文章及評論。莫非我父親十年前就説對了？*

劉少奇的「罪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和鄧小平都被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對我來説是全新的概念，我試圖弄明白，到底甚麼叫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快在清華大學展開大辯論。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甚麼？打擊的是甚麼？甚麼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隨後毛澤東一再發出各種指示，總體而言，文化革命不是簡單的路綫鬥爭，而是階級鬥爭。隨着毛的一系列指示，「階級」矛盾越來越激化，打擊面也越來越廣。

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性質，在清華大學的激烈辯論中有一種提法，即文化革命之所以是階級鬥爭，是因為產生了新的階級——官僚特權階級，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官僚特權階級。關於文化革命，對我影響最大的觀點是，在過去十七年(一九四九至六六年) 產生的官僚特權階級，與人民大眾之間構成基本的階級矛盾。文革就要發動人民大眾同官僚特權階級進行鬥爭。這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大辯論對我思想的發展起了巨大影響。

一九六七年，文革進入奪權階段，造反派開始在各地奪權，而保守派盡力反抗。軍隊也捲入了。全國很多地方發生了血腥的武鬥。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謂「二月逆流」，就是幾位元帥領頭公開批評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動。與此前後，北京的「老紅

* 我在一九六五年為了與父親劃清界限，曾讀過「揭露」其「罪行」的主要報刊文章及評論。八十年代，哈佛大學政治學家麥克法夸在其著作《文化革命》中引用當時《人民日報》所刊登我父親的言論作為證據説明文革的政治根源，並因此曾與我父親展開了爭論。

衛兵」組成「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江青，保劉鄧和老幹部。

群眾衝突的升級，讓我對文革更感到困惑。為了試圖理解這一切，我刻意與外界拉開距離，把自己關在家裏，大量閱讀毛未發表過的文章和馬列原著。毛澤東的許多觀點讓我震驚，例如，我們不要迷信馬克思，馬克思無非是比我們站的高一點，比我們站的高一點沒關係，我們搭個梯子就能爬上去……在個人迷信登峰造極的瘋狂歲月，毛關於「不要迷信」的說法讓我茅塞頓開，我的理解是對任何人都不要迷信，包括對毛本人。毛澤東與斯諾在天安門城樓的談話，他屢次提到耶穌、穆罕默德和釋迦牟尼，說：「人們叫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四個偉大，他自己最希望是「偉大的導師」，其他都不重要。這讓我隱約感到毛希望做宗教領袖，希望他的思想和理論具有宗教般的影響力。而這和他所說的「不要迷信」有衝突。

我開始閱讀以前較少涉獵的社會科學書籍。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狂熱的地步。首先自以為找到打開理解現實的鑰匙，那是普列漢諾夫的兩本書《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和《歷史唯物論》，讓我第一次認識到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特別是毛澤東在歷史上的作用。我以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看待毛看待文革，意識到毛作為偉大個人在歷史上有巨大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歷史進程自身的規律。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進程的規律是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會起反作用，但歸根結底，歷史發展的進程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而偉大個人只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我並不懷疑毛澤東思想，只是認定個人迷信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這些自由的思考讓我欣喜萬分。但關於文革，我的疑惑更深了，特別是關於文革的性質。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國武鬥更加激烈。夏天，我隨清華附中一撥同學，還有幾個哈軍工大學生一起到江西「支左」。其中屬我年齡最小，我主要是想與年長的同學討論我心中的疑問。剛到江

西省蓮花縣。就發生激烈的武鬥，造反派把我們安置在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校園裏。由於我們是從北京來，在當地很轟動，保守派生怕北京來客會產生滾雪球效應，立即調動了數千武裝民兵，把我們團團包圍。而造反派要我們撤離，以免被對方置於死地。我們狼狽不堪，半夜裏翻牆逃走，晝伏夜行，從江西翻山越嶺逃到湖南省。一路上不敢與當地人接觸，連食物都沒有。

這一戲劇性的經歷，給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不同社會階層與社會集團的自身利益是殘酷奪權的動力。毛澤東説，文革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毛還説：文化革命永遠不會停，每隔七、八年就要進行一次，一直到共產主義為止。我看到的殘酷現實，對照毛的話，讓我感到文革絕不僅僅是毛與劉鄧的權力之爭。這麼多人冒死而戰，肯定有自身利益。每一方都號稱保衛毛主席，事實上是保衛自己的利益。從全國範圍的奪權運動和武鬥 (實際是內戰) 中，我認識到文化革命的基礎是因社會矛盾激化而產生的革命。

另一個讓我困惑的問題是，過去所受的教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是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而共產主義是無階級的社會。那為甚麼在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中，卻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呢？階級鬥爭怎麼可能導致消滅階級？我讀遍了毛澤東著作，找不到任何答案。我轉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按恩格斯的理論，階級是從一定的經濟關係中產生的。既然毛説文化革命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是廣大人民大眾對新生官僚特權階級的鬥爭，那麼從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階級一定是從社會主義已建立的特定的經濟關係中產生的。

當時另一個刺激我深入思考的問題，是基於對造反派和所謂老紅衛兵或所謂「聯動」兩派鬥爭的觀察。當時聯動組成者的「高幹子弟」中，有些代表人物揚言「天下是我們的父母用鮮血打下來的，因此我們就是最終的統治者，是坐天下的」。這些言論，在我看來都相當準確性地落入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當時我認為這些

言論生動的告訴了人們，中國社會存在不同的階級，借用法國革命時期的語言來說，他們是貴族，而中國的社會的多數人屬於第三等級。當年這方面的討論很多。我讀過許多人的文章，包括遇羅克的「出身論」。但我感到所有的討論都遠不够深刻。因此當時真正對我有系統影響的是馬恩的歷史唯物主義著作。

當時，我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及自己的觀察都告訴我，文化革命是階級鬥爭，是階級之間關係激化所致。如今我雖然已經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再以階級解釋一切，更不再追隨毛，但我至今仍然認為文革背後的社會力量在於民眾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簡單地解釋成毛的陰謀——通過群眾運動整掉劉少奇。

持續的閱讀和觀察，讓我覺得文革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特殊時期，是尚未認識的仍在演進中的重大歷史事件。當時我自以為已經捕捉到對文革及當時社會的理解綫索，這讓我尤其興奮。當時毛澤東反復說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就會再來一次，我就想弄明白，下次文化革命要做甚麼？文化革命到底要解決甚麼問題？如果階級與階級之間永遠在爭鬥，那甚麼時候能够過渡到共產主義？當時也讀到了湖南楊曦光 (*以後改名楊小凱，英年早逝；在美國留學期間我們成為朋友*) 的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並讀到江青點名他為反革命的指控。我喜歡他提問題的方式，但也感到，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解析我正在探索的一系列問題。

一連串的問題讓我强烈地感覺自己對中國社會發生的事知道得太少，尤其强烈地感覺到自己不了解農村。我從來就生活在城市，而文化革命中所看到的，人們能够告訴你的事情也都發生在城市，可是對農村發生了甚麼卻知之甚少。當時我認為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在農村。為了了解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就必需了解農村的社會階級，不到農村去就不能了解中國。一九六七年深秋，我產生了到農村去的念頭。

有了這種想法後，我就開始在清華附中找了我熟悉的幾個同

學，當時來往最多的高年級同學車宏生、常放、劉滿强和劉剛等，後來還有戴建中、仲維光、宋海泉等，討論我們幾個人一起到農村去。結果談了一陣子，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個激動人心的想法，但沒有一個人真能下決心去，我感到很失望。我覺得「到農村去」的想法已經無法抑制，所以決定自己去。剛好當年的初冬，黑龍江國營農場到北京來招工，我就報名了。當時清華附中一共有三四十人報了名，而這些同學我都不熟悉。清華附中有三個學生組織，第一個是清華附中紅衛兵，即老紅衛兵；而造反派分兩支：一支是井崗山；一支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崗山紅衛兵相對較激進些，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則較溫和一些。報名參加支邊的人，主要是井崗山紅衛兵的成員，其次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成員，也就是說，多半是造反派。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一行人大約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號離開北京。

當時無論政府也好、中央文革也好，都還沒有關於學生下鄉的政策，全都是學生自願去的，都是一腔熱血為了他們多數自己也並不懂得的「革命」目的，有的是為了支援邊疆，有的是去進行文化革命的，至於「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口號當時還沒有，是我們下鄉一年之後才有的。我們這一批北京知青大概有一千多人到黑龍江，一個專列，到黑龍江鶴崗後又分別由卡車送到各個不同的農場。我們第一批分到綏濱農場的學生有二百至三百人，到了綏濱農場的場部，集體學習了幾天。我們之中，大約一半是高中同學，一半是初中同學，初中同學裏大多是初三的同學，沒有初一學生，而我是初二年級的，也就是說，從清華附中來的學生裏屬我年齡最低。在這集體學習的幾天裏，我同幾個清華附中的高中同學住在同一個招待所的房間裏，認識了高中同學劉先立、莊平、張邦寧，比較談得來。初中同學王貞平和章士偉給我的印象最深，他們也和我分配到同一個村子——十五生產隊，是往來最多的人。

到了十五隊以後，把我們知青統統集中起來，住在知青的大房間裏，每間能住二十至三十人的大通鋪。當時我覺得這完全違背

了我自己的願望，我來農村的目的絕對不是要和一群中學生住在一起，而是為了了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因此我就去尋找甚麼地方能有機會和普通農村老百姓在一起的住處。後來我就發現了馬號，那裏有農民住家，也有住的地方，於是我把行李抱了過去，我印象裏是劉先立和我一起住到了馬號。這決定了我以後在農村將近十年裏大部分時間的工作是放牛，餵養牛馬，趕車。這就是我脫離知青主流的開端。

我去東北，心裏裝了一大堆關於制度的問題，更準備要面對非常艱苦的環境。然而，北大荒給了我極為震動的印象，非常驚人的平靜，和處於驚天動地文革中的北京完全不一樣。我曾去過房山的農村，見到過極度貧窮的農民。北大荒卻是機械化的耕作，場部實際上是小城鎮，人們的住房比較整齊，生活上相對舒適。北大荒的冬天，寒冷但是異常美麗。我感覺出乎意料的好，令人驚異的自然景觀和久違了的正常的生活狀態。

打破那裏平靜生活的是我們這批知青的到來。我們來之前，當地也開批鬥會，只是那個批鬥會比起城市的激烈鬥爭來，都是有一嗒無一嗒的，不那麼激烈，也沒有很尖銳的衝突。多數農民並不真的在意誰曾經是地主、富農，誰是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是城市知青把暴力帶到那裏。我們一起來的北京知青，有些人以暴力標榜革命，有些人也許從暴力和虐待中獲取快感。開批鬥會時，有些人會不分青紅皂白上去就打，甚至使用酷刑。

年少的我，自信自負，非常自我中心，一心想尋找我要找的答案，對周圍的人和事關心甚少。由於那個村莊相對平靜，我把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閱讀。我一直以為，世界上的一切制度都是從歷史唯物論來的，而歷史唯物論屬於哲學。因此我要通過研究哲學來弄懂文化革命和理解中國社會。當我閱讀了更多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後，我才意識到，要了解社會和分析社會，需要研究的是政治經濟學，因為階級是從經濟基礎中產生的，是經濟基礎決定的階級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的鬥爭。認識到這些基本道理後，我很

興奮，覺得是在發現真理之路上的第一個突破。因為這是在沒有任何人指導甚至沒有人交流的情況下，完全靠自己通過閱讀悟出來的道理。同時也因為這想法同當時中央文革的宣傳，同毛的多數說法或背道而馳或毫無關聯。我自負地以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沒有弄懂這些基本問題。當時，我給還在清華附中沒有下鄉的同學寫了很多信，跟他們交流這些看法，告訴他們自己在農村鑽研這些問題的重要進展，希望更多的同學能和我一起探索。

一九六八年的春節，在剛到農村沒多久的時候，我回了一次北京，和在京的同學交流了我的這些感想，鼓動大家都下鄉。雖然沒有任何人受我的鼓動下鄉，但是我的想法對一些同學產生了影響。我的信和「論文」在一些同學中流傳。一九六八年初春，文革的鬥爭還相當激烈。我的清華附中井崗山紅衛兵同學，絕大多數是高中的同學，都對文化革命向何處去特別感興趣。可是多數同學更關心的是小道消息，中央文革說了甚麼，毛主席最新指示是甚麼，甚麼人反對中央文革，等等。而當時我的心得，認為所有這些權利鬥爭都是一時的。若不能解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根源和階級鬥爭的問題，在權力鬥爭中的得勢只是過眼煙雲。最重要的是要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要了解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新階級的來源是甚麼，要解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基本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無論誰上台，仍然不可能避免新階級的產生，階級鬥爭仍然繼續進行，永遠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

我當時最主要讀的是《資本論》。我把《資本論》當成像數學和物理學那樣在學習。即我學習的是《資本論》的分析方法。目的是要應用從《資本論》中學到的工具去分析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問題，分析中國社會的現在和將來，去解決要解決的問題。我當時信仰共產主義，因此認為這些問題是全人類面對的尚未解決的問題。我所探索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寧未能見到的問題；是毛澤東見到但未能解決的問題。

文革之前是批修反修，文化革命的目的是為了防修。當時我

思考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修正主義的制度是甚麼？為甚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會產生修正主義制度？蘇聯、中國產生新階級的修正主義制度根源是甚麼？如果我們連為甚麼會產生修正主義都不懂，我們又怎麼能去反修？我們怎麼能去防修？那時毛澤東在討論有關培養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問題。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以後，我認為這裏面有很嚴重的問題。因為，修正主義是一種制度，制度是不可能通過培養接班人的辦法來解決的。修正主義制度是變異了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的問題是，是甚麼因素導致了社會主義制度會變異？會退化變質成修正主義？只有認識了它，才有可能去防止修正主義的產生。

當時我寫了好多東西，跟很多同學講，自己覺得很興奮，認為自己的思路是一個重要的起點，一個重要的探索的起點。所以我就把相關的認識和在綏濱農場第十五生產隊的一些談得來的知青討論。當時來往比較多的同學有王貞平、章士偉、常慧如、張瑩，在張邦寧、劉先立這些高中同學沒有離開十五隊之前，我也經常試圖同他們探討。當時即使高中同學也都只是十幾歲的孩子，在那個年代，基本上所有學生都沒有受過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教育。所以包括當時清華附中的同學在內，很少有人明白我說的寫的是甚麼。所有這些都讓我當時感到精神上很孤獨。但遠為更嚴重的是，在那個無知及極端的個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一些知青把我的見解當成異端邪說。把我的一些言論逐漸傳開演變成別的一些內容了。有人以為我有甚麼政治野心。當時，在十五隊的知青中有人對我表示了異議。一些知青，對我持很尖銳的批判意見。他們認為我違背了林副主席 (林彪) 的指示。他們引用林彪的說法來批判我。說因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離開毛主席著作去讀馬列著作意味着我有政治問題等等。我當時對林彪的這些說法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反林副主席就成為我後來的主要罪名之一。

在同這些知青辯論的過程當中，我為自己的探討辯護，提出了一些說法。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說過，由於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

的頂峰，為了要登到這個頂峰，為了理解毛澤東思想，我們就需要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甚麼，否則你就沒辦法知道為甚麼毛澤東思想是頂峰。而且馬克思已經說過的話，毛主席就不一定再重複了，因為毛澤東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發展的。但是，由於毛主席沒有說過，我們並不懂，所以還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更要害的是我對「毛澤東思想是頂峰」的置疑，我談到毛澤東思想自身也還是要發展的，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們的努力等等。其實我要表達的見解無非就是有許多問題毛自己也沒有解決，所以我們要一起努力學習來解決一些問題。這些言論逐漸在知青之間傳開了，有些人認為我非常反動。政治思想迫害的引信已經點燃，我卻根本沒有覺察，我沉醉在發現問題的興奮裏，以為討論本身就是找到答案的途徑。

在一九六八年底冬天的時候，我又回了一趟北京，同當時在北京還沒有下鄉的同學進行了一些交流，當時毛發表了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我的同學們在準備下鄉，大家也就分散在不同地方的農村。我和去山西太谷的同學一起到了太谷縣，訪問了太谷不同的村子和他們在不同的村子裏一起生活了一段。其中印象特別深的是，去過一個山村，已記不得村名了。當時在這個村子裏我們的同學有車洪生和鄭光昭 (後來筆名為鄭義)。那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山村，和我們黑龍江國營農場是完全不同的耕作方式，那裏就太貧窮落後了，大部分是手工耕作，由於是很陡峭的山坡地，連用牲口作動力的都比較少。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訪問了當時駐扎保定的在三十八軍當兵的清華附中同學王湘林。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走訪真正的兵營。在兵營裏，我們討論的仍然是文化革命和對文革的探討。

一九六九年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和蘇聯在黑龍江邊界上發生了珍寶島戰爭。我們綏濱農場就在松花江和黑龍江之間的那個岔裏邊 (從地圖上看「叉」很形象，我們農場的北部是黑龍江，南部是松花江)，所以在中蘇邊界開始發生糾紛的時候，我們

農場情勢很緊張。在這期間，黑龍江農墾總局的國營農場改編成為軍管，稱為建設兵團。整編為建設兵團以後有大批知青進入，我所在綏濱農場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黑龍江省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師第九團」，我們原第十五生產隊整編成第二十四連。通訊地址則變成：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設字 (兵團共分六個師，分別以「建設鋼鐵長城」這六個字命名，二師為設字) 九團二十四連。中蘇邊界珍寶島軍事衝突，甚至更嚴重的戰爭都在醞釀中。

邊界衝突之前，前綫調動部隊大多是從黑龍江江面上走的。戰爭爆發以後，江面基本被蘇聯所控制，邊防軍的供給都要靠陸地運輸，可是整個黑龍江沿江內地多是沼澤地，運輸落後極其困難。因此把黑龍江兵團的相當一部分力量調去修戰備公路。我當時就被調去修戰備公路。修戰備公路是一項極其艱苦的工作，也是一個很長見識的機會。為了最短的時間內在沼澤地上修起一條戰備公路，以便軍隊的炮車、坦克、給養能從這條路上過去，採用了很極端的做法，就是大量的伐木，把那些木材直接往沼澤地裏鋪，然後再在鋪倒的木材上堆積大量的石塊，就這樣硬是用人工的辦法在沼澤地裏堆出一條路來。石塊都是從沿綫山上採來的。在山上用炸藥打眼放炮。在修這條公路時，除了卡車沒有任何的機械，一切都是用人工的，用人工打眼放炮，用人工大錘子把石塊打碎，然後再用鐵鍬把石塊裝上卡車，由卡車拉到路上去，再由人工用鐵鍬卸車，人工取土，再由卡車把土運到公路上，非常非常的艱苦。當時修公路的主體都是知青，十幾歲二十剛出頭的青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沒有固定的房子，都是搭的臨時帳篷。因為那個地方極其荒涼，有時會有狗熊出沒，當地人叫熊瞎子，在我們住的帳篷周圍有一段時間經常有熊瞎子光顧。它們經常是晚上跑到食堂來吃東西，白天就走了。記得有一天早上開工時，一隻母熊帶着兩個小熊一家三口跑到我們食堂裏坐在那裏不走了，嚇得大家都不敢出來。最後，有人打了電話叫來武裝連民兵帶着衝鋒槍把它們打死了，這就是當時的情景。那個時候，大家都是學習毛主席著作「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拼了命地修戰備公路。從剛剛修好的公路上，會看到有從前綫帶下來的蘇聯俘虜，也有從後方去前綫的炮車、戰車、彈藥和糧食。看得出來當時的情況非常緊張，上來的車和下來的車給大家很大的刺激，也時不時地會有軍官來做鼓動，來報告前綫的戰事等等。大家都以為自己是在為反修防修保衛祖國做貢獻，覺得很光榮，周圍充斥着很强的理想主義情懷。為了趕戰備任務，每天工作十八小時以上。有相當比例的知青累病了，但情緒極其高昂。我當時在愛國主義方面思想簡單得和任何一個知青一樣，甚至有過之。我在工作之餘作詩作曲歌唱我們「兵團戰士」的「革命」豪情。

其實在去修戰備公路之前，批評我的「反革命思潮」、「反毛澤東思想」、組織「黑格爾小組」等等的流言蜚語都已經開始了。那時的批判都不是來自官方的，而是來自知青。實際上，文革中我所遭到的整肅的起源，就是知青發起的攻擊和中傷。儘管來自知青的攻擊不會導致我正式成為反革命和正式的被打擊對象，但是精神上，我已經開始感覺到很大的壓力。我知道雖然還沒有正式開始整肅我，但是當時的上級已經很關注我潛在的「政治問題」。所以當我到達修戰備公路的駐地時，我感覺到九團似乎已經負責向修戰備公路的領導有交代。在修戰備公路期間，對我的行動已經開始有所監督。

從一九六七年底到農村直至六九這兩整年時間裏，除了必須的體力勞動以外，我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研讀《資本論》上。有趣的是，當初下鄉的初衷是了解農村的社會。而事實上，到了鄉下後，我遠離了政治運動的旋渦，既遠離了北京的文革，也沒有加入到當地的政治鬥爭。我把農村當成我的書房，安安靜靜地認認真真地去思考。閱讀《資本論》的過程中，我一直在不斷地做筆記。一九六八至六九年期間，我寫了多篇論文，與此同時就產生了一個寫書的計劃。當時想寫一本相當龐大的書，囊括所有我探索的主要問題，分析社會主義制度和文化革命。當時深受馬克思著作的影響，不僅探索的方式是馬克思主義的，連寫作計劃也在很大程度

上是學習馬克思的。

我當時感到自己面對的理論問題之龐大不是一個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解決的，所以非常迫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討論這些問題。因此我除了在本村找一些同來的知青外，還大量的通過書信和清華附中原來的同學探討。那時我每天都在寫信、記筆記，總是在讀、在寫。後來被打成反革命以後，幾乎我所有在農村寫的東西都被沒收了，也就遺失了。眼下留下的，就只有這篇文字最初提到的那一小部分文稿和書信。前面提到過，結束這部分書稿的時間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是我十九歲的生日，也是我到達黑龍江剛過兩年多一點。我已經不記得是有意還是巧合，我在那個七十年代新年到來的前夕完成了那本書的前四章。那時的輕狂少年不知道，一場劫難已經不期而至。

一九七〇年，成為我生命裏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雖然，我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成長和轉折都並不始於這一年，而是更早。自從父親在我六歲的時候被打成右派，離開北京，我從此成為出身有問題的孩子。從此我因為出身而遭遇政治歧視。但是，從一九七〇年起，我第一次完全獨立地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在全國的文革進入「一打三反運動」(打擊現行反革命、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 及清洗「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大背景下，一九七〇年年初，整黨整團的工作組進入二十四連。他們的目標鎖定在所謂的我組織的「反革命集團」問題上。實際上，無論是我個人還是和我來往的知青，沒有一個人是黨員。但是早在一年前已經有大量流言蜚語認為我反毛澤東思想，極端反動等等。這些置人於死地的流言蜚語及報告送到上級，所以工作組下來時，我的問題就已經列為重點了。在整團的時候，和我來往較多的知青共青團員張瑩和常慧如都碰到了嚴重的問題。工作組試圖從她們那裏找到「突破口」，證明我的反革命活動及反革命言行。緊隨整黨整團之後，所謂「一打三反」運動正式開始。我被作為現行反革命成為重要打擊對象。

一九七〇年夏天，在團黨委派來的工作組領導下，全連對我展開了大規模的批判和鬥爭，從連部到宿舍，從修理廠到場院，從食堂到學校，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漫畫和極盡侮辱之詞的人身攻擊等等，批判我的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言行和其他所謂反革命行為。對我的大批判還總是要把我的大右派父親連在一起，以編造的罪名咒罵我父親，用以說明我的反動思想始於反動家庭教育，等等。使得很多不明真相的知青公開的唾棄咒罵侮辱我，

一九七〇年七月一天晚上，連隊裏突然吹起緊急集合號。兵團是軍隊的組織方式，凡是重大的事情都吹號。一般晚上是很少吹集合號的，那天晚上突然吹起緊急集合號，全連的人全部集中到二十四連的修理廠。二十四連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連隊，這個連隊有自己的拖拉機修理廠，是個相當大的廠房，可以同時修理很多台拖拉機。由於七月份正是農忙時節，拖拉機都下地作業去了，廠房基本上是空的，廠裏的大修理廠房可以容納全連二百多人。那天晚上，全連的職工都集中到修理廠，門窗全都關閉，突然間宣佈對我進行隔離審查。在宣佈的同時，就把我關押起來了。這實際上是沒有審判的拘捕。這一切來的極其突然。集會中一些領導及知青極盡手段煽動對我的仇恨情緒。從出身到個人，從思想到行動，從政治到道德，無不卑鄙齷齪。一些「義憤填膺」的人借我的肉體當眾宣示了他們的深刻政治覺悟和强烈階級仇恨。

那天宣佈隔離審查之後，我被捆綁到二十四連的酒坊。酒坊在夏天農忙時不作業，是空的，我被帶到酒坊的一間很小的休息室裏，從此這間小休息室就變成關押我的獄室。那個房間非常小，屋頂是斜的，人在裏面站立不起來，只能坐着或躺下，有一條很窄的只能容納一人的小炕，別的甚麼都沒有。被關押後，基本的生活狀態就是白天被嚴格的押送出去，接受批鬥，在監督情況下進行勞動改造，晚上進行審訊。我到甚麼地方，總有兩個人看守。我在任何一個地方幹活，不允許其他人和我接觸。我睡覺的時候仍然有看守。每天除很少的時間睡覺，其餘所有時間不是勞改就是審訊和鬥

爭會。鬥爭會一天可多達四次。

不知為何原因，我的這個「反革命」案件成了當時建設兵團的重大案件。一度廣為流傳的關於「黑格爾小組」的流言，在那個年代其政治涵意已然彰顯兇相。在我被關押後，師團級領導多次親自光顧，加强批鬥力度，指導整肅方案。我的所有論文、信件、 照片、書籍都被沒收。我自製的無綫電收音機也被送到師部鑒定是否特務設備。除書籍外，所有其他被沒收的東西至今一律不知去向。

鬥爭會或批鬥會被用來作為打擊和施壓的手段，目的是要我招認莫須有的反革命集團罪。除了我的「反革命言行」外，當時鬥爭會上最常打擊的對象就是我的「反革命囂張氣焰」。動不動就被人指稱為「不老實」，而任何不老實都可以是被鬥爭的理由。鬥爭會同時也是打擊其他知青和向其他知青施壓的辦法。在鬥爭會上，一些同我有過交往的知青被迫當眾「揭發」我的「罪證」，或交代和我的罪惡關係。每當他們的交代「避重就輕」 時，鬥爭的矛頭立即對準他們。對我來說，鬥爭會主要是一種體罰方式。除極度精疲力竭外，在鬥爭會上也常有一些人或義憤填膺或幸災樂禍地上來拳打腳踢。看守我的有些人也會拳打腳踢或找藉口來體罰侮辱。但是，這些體罰以及鬥爭對我精神上的衝擊並不是最大的。

當時對我摧殘最大的來自於審訊，以及審訊所採用的手段。在一開始審訊時，我以為他們的目標是要整我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當審訊進行深入之後，我才意識到他們是要把我打成一個反革命集團案的首領。他們莫須有地把我從事理論探討的活動編織成所謂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活動，他們甚至把我的十九歲年齡都當成審訊內容，要我交代偽造年齡、偽造歷史的罪行。他們說我寫的論文是二十七歲有大學畢業文憑的人都寫不出的。因此我一定是偽造年齡。審訊中使用剝奪睡眠輪番打擊，威脅利誘等惡劣手段，脅迫我承認莫須有的罪名及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團活動。他們極其惡劣的審訊迫害曾經使我感到自己會終身受盡侮辱而沒有活下去的價值。在政治迫害最高潮的時候，我的心理狀態曾極度悲觀，甚至一度產生

過自殺的念頭。記得在那期間，一天夜裏審訊後被押回我的獄室，看守感到我的神情反常，緊急叫上級增派一名看守，並把獄室內所有金屬及陶瓷物品清理一空。該看守帶着顯然的恐懼情緒對我實施虐待，我猜測他是誤把我的悲觀絕望當成仇恨情緒。這樣在嚴格監禁的狀態下生活，一直持續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發生。

我被關押的時間，正值全國大搞整肅「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狂潮，各地整肅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在殘酷折磨下，自盡身亡的事時有發生。母親在她所在的學部 (社科院前身) 及近代史目擊了整肅的殘忍，擔心我會發生意外。深知我已喪失所有自由 (在被隔離監禁的這段時間裏，所有通信來往都要通過專案組的審查)，她大量寄信寄書給我，用隱晦的語言用各種曲折的方式鼓勵我堅持下去。那段時間和我唯一的通信來往就是我母親。母親的通信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使我從那種極度悲觀的狀態下挺過來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探索的願望。用整肅的暴力强迫我停止探索使我感到生命的絕望，但是我感到如果使自己的探索精力轉移到別的甚麼問題上去，轉移到探索工程技術，去發明點甚麼，解決些重要的生產技術上的問題，我還是能找到生命的價值。從此，鑽研數學和工程就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給母親寫信，要求她給我寄一些工程技術方面的書。幸運的是，當時的工作組並沒有禁止我讀這些工程上的資料。此後的七十年代，我的探索從政治經濟學轉移到了工程。

記得有一次，押送我去監督勞動的人是年輕獸醫龐春泰。他在押送我的路上對我說：「你真是很可惜，為甚麼要去花時間關心那些政治上的事呢？你本來在無綫電上很有才能 (因為我自己組裝過一些無綫電設備。所以，在方圓幾十里，老百姓或者農場裏有甚麼收音機或者拖拉機的有關電器設備出毛病，常會找我幫忙)，你就做這件事不是很好嗎？」雖然他的話說的很簡單，但在那些殘酷的日子裏，這些話給我的鼓勵令我銘記在心。

那段時間，重新撿起小時候對工程的興趣，給了我精神上很大

的幫助。發明和工程探索成了我主要的精神寄托。雖然我當時的政治經濟學探索已經離開了共產黨的主流，但我的政治思想還是很正統的，正統是當時年輕人很喜歡用的一個詞。所謂「正統」，簡單的說就是緊跟黨中央的號召走。那個時候搞「農業學大寨」，我也很相信那一套。但是我相信農業學大寨，最終是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而為了提高生產力最重要的應該是搞技術革新。在機械化的農場裏，我看到了很多嚴重的技術上的問題，在收割季節有大量的糧食浪費在地裏，這是由於收割機械不够好所致。所以我想，如果能發明一個收割機割台高度自動控制裝置，就可以大幅度地改進收割的效率減少浪費。為了要完成自己的這一願望，我開始了系統的自學。

我基本上同所有的北京知青都隔離開了，看管我的人主要是哈爾濱知青，有時是上海知青。由於鬥爭會、大批判把我的名聲搞得很臭，幾乎所有來監視我、押送我、看管我的這些知青都對我有着很强烈的敵意。因此，在這段時間裏，很少有人能和我有稍微正常的交往，在連隊裏能够談幾句話僅有的人就是獸醫和當地的一些農民。在被隔離監禁之前，我的工作大部分時間都在馬號，和幾個獸醫都比較熟悉。這幾位獸醫對政治都不感興趣。他們是二十四連很少的幾個知識分子，大家更談得來一些。被看管之後，我還勉强能和他們有一些接觸。幾個來往比較多一點的獸醫名叫張躍生、楊修岐和龐春泰。他們非常幽默，在我最危難的時候，他們一如既往拿我當一個普通人，和我開玩笑，這對我精神上是相當大的安慰。另外還有一些老職工 (農民) 也對我精神上幫助很大。我們馬號的班長叫陸書坤，他是山東梁山人，有點梁山好漢的氣質，他父親陸詩勤是老八路。老陸始終對我很和善，記得他曾經用一種很特別的口氣批評我，要我遠離政治，過好自己的日子。有時候，他們還會從家裏帶些好吃的東西送給我。在那段最壞的日子裏，這些在我的精神上都起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以後，我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轉變。當時，關

於林彪事件的文件已經傳達到了團一級。我的案子中「反對林副主席」的罪名一下變成無害言論。我事後猜測得益於林彪事件，我的「案情」比原來有所鬆動了。從那以後，雖然我的「反革命」案子沒有解決，但是對我的嚴密監禁逐漸放鬆，審問也停止了，鬥爭會也基本上沒有了，我的隔離監禁，變成了讓群眾和知青監督勞動。勞動時，把我放到「地富反壞右」的行列裏，連裏的一些「地富反壞右」們也有人主動來接近我，同我聊天，表示對我的同情。

我開始有了業餘時間。實際上我能够認真系統地自學數學、自然科學、工程和英語主要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從一九七二年恢復了我的放牛工作，放牛對我來說是最好的工作，因為這個工作使我有自己控制的大量時間。大多數最難的自學內容都是在放牛的時候學的，例如物理和數學的學習。我先是集中幾個月精力把高中數學和物理自學完了，之後就系統地自學了大學的物理和微積分、高等代數、電動力學等課程。

對我來說，所有自學的課程裏，最困難的是微積分，我讀了好幾本大學教科書，其中包括好幾本高等數學習題集，我拿着習題集，一道題一道題地做，依此來保證我自學的扎實性。因為我認為不僅讀了教科書，而且還做了習題，包括非常困難的習題在內。把高等數學和大學的物理學習完以後，又開始學習電動力學、無綫電電子學、自動控制原理等，就這樣把當時能够找到的大學教科書一門一門地自學下來以後，自己感覺到，雖然把文革前的大學教科書都學習過了，但是要做發明設計工作知識還是不够用。這時候我就同我常在一起的同學王貞平提起這個苦惱來，他告訴我說：「其實現在北京已經可以買到影印的國外原版教科書了，你可以讓你母親買到影印的美國教科書寄給你，你就讀那些書」。我說：「英文我是不會的。」他又告訴我說，實際上英文學起來很容易，因為他自己就在自學英文。他說：「你可以找一本內容上你基本懂得的英文教科書，借助字典你就讀它的內容，就把裏面的英文弄明白了。你自己再讀一本這樣的書，你就會了。」我就照他說的方法做了，

寫信給我母親，讓她給我寄英文版的美國電子學方面的教科書。我記得特別清楚，我收到的第一本我母親寄來的英文教科書的名字叫 Modern Electronics (現代電子學)。這是四十年代末美國大學的教科書，是我母親從中科院圖書館買來的報廢的書，因為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已經過時近三十年了，但對於我來說卻如獲至寶，所以我是把它從第一頁一直看到最後一頁，每一頁我看得都非常認真。從電子學角度講，大學二年級的教科書，我對所有的內容都能看懂，實際上這本書是我的第一本英文教科書。

從那以後，我就非常自信地開始閱讀美國大學裏電子學方面的教科書了。以這種方法，我自學了美國大學的許多門課程。如計算機工程和自動控制方面的教科書。其中還有一個悲涼而有意思的故事。當時我母親給我寄來了英文的《模擬計算機原理》，現在模擬計算機已經不存在了，但在七十年代這還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我拿到這本書時特別激動，特別渴望能盡快把它學下來。可是，我的時間很少。正在這個時候，我連發生了一個慘痛的事故，有個上海知青潘金根，當時的連隊油庫保管員助理，到油庫樓頂上去擦天窗的玻璃時，不慎一頭栽下來頭部撞在水泥台階上，當場摔死了。他是上海知青，發生了這樣的嚴重事故，他的葬禮需要等他的父母家人從上海趕來參加，他的屍體放滿冰塊放在二十四連的倉庫裏，晚上要有人看護。幾乎沒有知青敢在晚上看護屍體，連裏只好公開讓大家報名。我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全脱產地來進行學習，這對於我來說實在太難得。於是我就報名了。這是我記憶格外深刻的一件事，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在倉庫裏，打着一盞油燈，在潘的屍體旁邊聚精會神地來讀我的這本《模擬計算機原理》的教科書。我的這門課程幾乎完全是在這兩個星期時間裏自學完成的。有些知青很奇怪，他們中有些人打架鬥毆很勇敢，可到這時候他們都怕鬼，他們覺得我很奇怪，怎麼敢和死人天天晚上在一起？其實就是因為晚上夜深人靜才能够潛心集中精力鑽研，這對我來說是個很激動人心的難得的學習機會。

那個年代系統地自學鑽研中國和美國大學工科的內容，既是精神的寄托，也給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壓力，長期的過份精神壓力導致我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北京知青吳先當時是衛生員，他對我這個反革命分子的關心和幫助，讓我至今都心懷感激之情。

從一九七三年夏起，尤其是一九七四年，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在連隊裏，知青開始為去讀工農兵學員而競爭，為了能上大學，很多知青變得很焦躁，一些沒有上成大學的落選知青變得很悲觀。我知道自己是個「反革命」，覺得自己完全沒有可能有機會出去上大學，心裏反而很平靜。自認為我自學的水平已經超過了大學裏所教授的內容。那段日子我幾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的革新項目上了。我當時滿腦子琢磨的最大的革新項目就是「聯合收割機割台高度自動控制」。我認為，如果自己能够解決這一割台高度的自動控制問題，就可以解決大豆在收割過程中嚴重浪費的問題。當時在農場裏，聯合收割機的高度設計是按小麥的高度來設計的，所以當收割大豆的時候，大約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產量浪費在地裏，相當巨大。我當時自己作了一個包括詳細電路圖的設計方案。

一九七四年，對我的政治管制進一步有所放鬆。當時中國政治的大環境發生了一些變化，鄧小平重新上台工作了，四人幫的勢力有所削弱。這時候我申請回京探親，居然得到了批准。這是自從我一九六八年底回北京之後，第一次回北京。我把這次回京看得很重要，我想利用回北京的機會，拜見有關的老師來幫助我改進我的設計。到北京以後，我找過若干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清華大學的常迥先生。常先生是中國無綫電電子學和自動控制方面的權威，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四十年代末期後回國，回國後就一直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常先生的女兒常放是我的同學，也是清華附中井崗山紅衛兵的成員，我們曾在同一個小組，非常熟悉要好。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去過她家很多次，同她的父親認識。一九七四年夏回北京時，我自己闖到她家裏去請教常先生。先生給了我很好的原則性的指導，對我後來的自學起到了非常重大的積極作用。尤其是在自

學的方向上，先生給了很重要的建議。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常先生是我在工程方面學習的導師。當時我也曾經訪問過中科院自動化所及清華數力系流體力學實驗室，請教我的技術革新設計方案。在北京的那段時間裏，我非常忙碌，完全都是圍繞我的設計請教奔波。

從北京回到連隊後，我的若干個技術改革方案得到了連隊技術領導及修理廠的支持。所以，雖然當時我的正式工作是放牛，但實際上我每天晚上都在修理廠試驗我的一些設計，試驗基本是半成功半失敗，也有許多設計即使實驗成功也並不能真正實施運作。部分實驗成功未能實施的有大犁自動高度控制液壓裝置等；實驗成功並在生產中使用的有自動稱重灌袋機等。一九七五年師裏曾在我們連開技術革新推廣會，自動稱重灌袋機得到好評，我這個「反革命」在技術革新方面得到了一些稱讚。記得團長碰到我大聲喊着對我說，「你整的那玩意兒挺好使呀，以後多給咱整點兒這些就好了。」

一九七四年以來，母親不斷提醒我必須關注我的政治問題的結論。實際上，從一九七二年起，我幾乎把全部的精神都寄托在工程上了。我有意識地迴避了自己被整肅的事。但我明白，這是我始終要面對的。這樣，在母親的提醒下我去團裏詢問了。

一九七五年初，團黨委對我的案件給了一個正式的結論。結論把我定案為「組織全國九個省市和軍隊的陰謀反革命集團的頭目，『目標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目的是要奪取全國政權』」。這個結論始終讓我莫名其妙，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究竟我有甚麼九個省市的網絡組織，而奪權更是莫須有的罪名。這個結論最後的簽注日期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但是我拿到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七五年。母親在親歷了建國後諸多的政治運動之後，堅持我必須為這個錯誤的政治結論上訴，因為這有可能影響我一生的命運。這樣，從一九七五年年初開始，我不得不時常中斷我在北大荒鄉下的學習和設計，準備我的上訴材料。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回到北京，通過各方面的關係，遞交上訴材料。曾經找到父親的好友，四十年代的浙大同學呂東

明，又通過他的兒子呂匡益將上訴的材料通過他的一個同班同學遞交到其父——當時的總政治部常務副主任手裏。希望通過他給兵團一個批示，轉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來解決我的問題。同時，母親還帶着我到當時總參作戰部部長家裏，希望他幫助從軍內解決我的「困退」問題。該首長曾和我母親是同鄉同學，並且曾是我外公的學生。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對我來說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杭州見我的父親。這是一九六二年最後一次見到父親以來，十幾年裏我第一次見到他。一九六二年最後見父親時，我才十一歲，一九七五年時我已經是二十幾歲的成年人了。到杭州見到父親時，他幾乎都認不出我來了。當時我還帶了好友車洪生同行。他是我在清華附中最要好的同學，我們一起討論過很多理論問題，一九七〇年之前我曾和他通過很多信來討論理論問題，並給他寄過我的論文。當時父親非常急迫地想要見我，見面之後才知道，他急着把我這個十幾年未見的兒子找來，除了敍父子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跟我討論當時的形勢。一九七五年在鄧小平治理整頓風之際，「四人幫」又開始反撲，父親當時非常擔心的是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擔心「四人幫」會篡權，中國可能會面臨巨大的災難。他迫切希望同我討論我的人生，同國家的前途相關的我的人生道路。

雖然當時我已經很多年被迫和政治保持距離，也沒有機會接觸社會科學的文獻，但我的本性並沒有改變，潛意識裏，社會主義制度內在的問題仍然是我思考政治問題的出發點，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在我心裏的影響根深蒂固。記得，當時父親特別關注四人幫可能篡黨奪權，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等等。而我認為當時的問題更主要起源於中國的制度，弄不清制度本身的機制，就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當時父親很吃驚，因為他沒想到我認為現有社會制度存在嚴重缺陷。在我的一生中，從六歲父親離開北京，我和父親一直是聚少離多，但他對我有很重要的影響。從我最初對科學和技術的熱衷，到後來思考更多的社會問題，無不和父親

相關。那次見面前，他更多的是我的師長以及崇拜的偶像。而那次見面，是我一生第一次以成人的方式同他交談，討論的是我們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也由此，開始了父子之間幾十年從未間斷的討論。

除了分析和討論重大社會問題外，針對我的政治遭遇，父親給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他給了我一本傳記，中世紀因持不同政見而遭受教廷殘害的空想共產主義創始人——康帕內拉。在我當時的處境下，閱讀那本書的價值實在是非同凡響。自幼受父親影響，對中世紀教廷和愚魯迷信的民眾共同迫害科學家及異教徒 (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等) 之殘暴有深刻印象和感觸。在我自己遭受整肅時，我深感奉命而來的工作組猶如中世紀羅馬教廷煽動民眾殘害異教徒的無知且虔誠迷信的暴民。當時那本書對我的影響很大，一本關於殘酷虐待異教徒暴行的傳記居然成了我同呂匡輝 (我的前妻) 開始戀愛時共同閱讀的書。在這種精神的支持下，我逐漸地恢復了一點對社會問題的探討。記得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幫」大張旗鼓地在全國以引用馬克思的論述來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我查閱了英文版的《資本論》，發現來勢洶洶的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運動依賴的竟然是文字翻譯中的基本誤解，或者是有意利用翻譯中出現的誤解。

遞交了申述材料，又見到久別的父親，一九七五年對我是重要的。我回北大荒，回到連裏，在前面提到的雙重關係的幫助下，我的狀況有了很大的好轉。儘管我的反革命案子還沒有真正得到平反，我的「困退」手續也沒有真正在法律上確認，對我的政治監督管治事實上已經結束了。我於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餘波未息的時候離開了黑龍江，回到了北京。一九七七年文化革命結束後沒過多久，我的案件得到了徹底平反。

回到北京，我成了無業游民，卻有了更多的時間和機會探索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父親從浙江鄉下回到北京，繼續他有關愛因斯坦的研究。當時他在商務印書館辦公室裏，組織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討會，一兩個星期碰一次頭。當時經常來的人有趙中立、張宣三和范岱年等，方勵之也來過多次。我旁聽了許多討

論並參與了一些科學哲學及科學史文獻的翻譯工作。經濟學是同物理學享有許多共同性質的學科。愛因斯坦對世界的探索方法，或者是我所理解的愛因斯坦對世界的探索方法，對我自己對世界的探索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這段時間裏，通過閱讀文獻，我非常興奮地了解到經濟計量學的發展。當時我以為它像物理學裏的統計物理 (以後我知道自己當時對經濟計量學的認識並不正確)，渴望有機會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從事對制度的研究。記得那時曾同父親一起去看過于光遠。我對他談起希望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從事對制度的研究，雖然于光遠是個相對思想開放的老一輩學者，但他對此並沒有顯出多大興趣。

一九七八年張宣三成為剛剛組建的社科院工經所副所長。他多次通知我去旁聽或參加工經所的討論會。在一些討論會上聽到過工經所長馬洪、副所長蔣一葦和時任室主任朱鎔基的高見。我得益於聽到他們關於企業自主權改革方面的討論。但同時也感到對相關體制問題需要更透徹的學術分析以指導進一步改革，雖然當時我對經濟學的知識只限於一九七〇年之前的《資本論》及以後對經濟計量學的相當膚淺的了解。在一九七八至七九年期間，曾經帶着極大的興趣在社科院聽過蘇紹智等報告南斯拉夫與匈牙利的體制；布魯斯關於波蘭的改革及「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等等。所有這些討論都是將中東歐經濟改革當作中國改革學習和借鑒的對象。這些重要的信息及當時的思考都對我以後研究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九七八年夏，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考試開始了。因沒有我認為合適的經濟學方面的導師及研究方向招考，我報考了中科院地理所遙感室 (後分出成為中科院遙感所) 的計算機圖像處理研究生，以數學及英語第一的初試成績通過，但複試時因種種原因沒有被錄取。下一年報考了清華計算機系的研究生。通過了筆試。但因為當時清華計算機系對於沒有本科學歷的我的能力頗具懷疑，增加了額外的複試。複試後他們把我介紹到機械系再來一次複試。經兩輪複試後我才被清華機械系錄取。一九七九年秋天，我進入清華大學，

成為了清華大學研究生中唯一一名沒有大學學歷的研究生。我是清華機械系的第一個計算機輔助設計的研究生，從事的是有限元分析及非綫性最優設計研究。除理論工作外，還與導師及同學一起，我們解決了馬鞍山鋼鐵公司八千噸水壓機最優設計的難題。我負責該項目的計算機模型及計算。一九八二年研究生畢業時，清華機械系非常希望我留校作計算機輔助設計的博士論文。但我在六十年代末開始貫穿七十年代始終的，是自己對社會制度的探索，面對中國改革的現實，這使我的心無法不回到經濟學。經于光遠幫助，我以一個機械工程學碩士的身份進入了正在組建的社科院技術經濟所 (後正式改名為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所)。從此我進入了，或者説回到了經濟學。

如果一定要以十年來記，我的七十年代至此為止。而比較起七十年代戲劇化的命運，其後我的生活異常平靜。出國、讀書、教書，和大多數我當年的朋友們的軌迹相似。只是，不得不提的是，經歷了這麼多年之後，從大的方向上説，我其實又回到了起點。清華機械系畢業後，我在社科院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到哈佛大學研習經濟學。這麼多年以來，在文革之初困擾我的最基本問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從來都沒有遠離我。我研究的課題從來沒有脱離過制度，只是更寬廣了一些，包括世界各國的制度，包括各種體制的制度。重讀近四十年前自己的文稿，除了當年的政治用語和少年躊躇的張揚讓我忍俊不禁，面對文中提出的很多問題，我依舊沒有辦法給出讓自己滿意的答案。

夢想與回憶

·陳建華·

生於上海。獲復旦大學、哈佛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復旦大學、美國歐柏林學院，現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著作有《十四至十七世紀中國江浙地區社會意識與文學》、《「革命」的現代性：現代中國革命話語考論》、《帝制末與世紀末》、《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説的現代性展開》、《去年夏天在紐約》、《陳建華詩選》等。

從一九六八年八月起，我被分配在上海某個中央交通部屬下的船舶修理廠裏做工，因犯有「政治錯誤」而成為一個被改造對象，直至一九七九年秋因考上了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而離開該廠。幾乎整個七十年代裏，我的生命背負着一片灰色，顯得沉重、平庸、不光彩。但在一部成長小説中，這十年會佔據敍事的主體，加之以弔詭和反諷的現代修辭，會更具典範：青春期的主人公　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　在生活的熔爐裏歷盡磨難，自我得以鍛造，最終為社會認可、擁抱而走上成功之途。

但畢竟和那些「成長小説」不同。我是鍛工，也練就一手絕活，能掄起十來磅的鐵錘，三百六十度揮舞手臂，朝鐵砧錘打。然而不像高爾基自傳裏的主人公誠實地經受社會的考驗，而鐵砧上的「鍛煉」沒讓我成為一個美麗的比喻。首先是心不在焉，幹得再好也是「改造」使然，看不到前途。真正的自我卻在另類空間裏伸展：利用業餘時間讀書、學外語，抱着隱秘的希望。

修理廠在浦東近郊，每天從外灘陸家嘴擺渡，再乘車到廠裏，路上來回足足三小時。放工回家，爬進我那個伸不直腰的小閣樓，便進入了人文的大同世界，生活好像重新開始。胡亂讀了不少書，包括一些大學教材，如王力的《古代漢語》、朱光潛的《西方美學

史》、周予同的《中國歷史文選》等，也算完成了「我的大學」。

學外語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我的中學同學的姐姐嵇吉利帶我去見了安耀華老師，他同意教我學英語，這預示着我的生活方向的改變。我和安老師相濡以沫，與七十年代相始終。安老師個子不高，大約五十出頭，貌如童稚，心地單純。英文名「彼得」(Peter)，是從前教會給他起的，但他更受賜於宗教的仁慈。他在上海科學院圖書館工作，做提供訊息資料之類的事。那時剛因裏通外國的嫌疑被單位裏隔離審查過，且教學外語本身便是一件犯忌的事。收我做學生，沒有別的原因，照上海人的說法，是「前世裏緣份」吧。當然迷信不能解釋一切。半年之後我也被隔離審查，睽違了兩個多月我們重聚在一起，好像甚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相互之間更分享一種文化上的共識或默契了。

每星期一兩個晚上去安老師家，手把手從音標教起，用的是一套老牌帝國主義的「基礎英語」(Essential English)。看看學得差不多了，其實還差很多，就讓我加入他的「圈子」，和小伍、老姚一起，兩位是安老師的莫逆之交。小伍在中學教書，皮膚白皙，戴一副秀郎架眼鏡，風度翩翩。老姚是某處職員，謙謙君子，喜歡咬文嚼字，幽默中略掉書袋。每星期六晚上聚一次，讀他們帶來的讀物，從《北京周報》、《大不列顛百科詞典》等處找來，人文科技的文本都有。然後是閑聊，從街頭新聞到日常生活。他們的程度已相當高，我是聽得多，所謂潛移默化，到後來也能插話了。有一回讀一篇有關天文方面的文章，大量專有名詞，使我知道了許多星座，也有不少忘了的，因為再也沒有碰到過。

因為住得近，不必等上課也會去看安老師。橫穿過馬路，走進公交醫院的大弄堂，拐幾個彎就到了。常留晚飯，陪他喝一兩盅酒。安老師已喪妻，小孩男男女女六七個。那不是物質豐裕的時代，多我一雙筷子，像多個家人一樣。總是先讓孩子們畢食後我們

兩人對酌。有酒便喝，不管是黃酒白乾。我最中意的是和梅乾菜煨的紅燒肉，不膩不碎，這些多虧他大女兒阿月頭，裏裏外外打理得舒舒齊齊。前幾年回滬見安老師，孫子重孫一大群，阿月頭還沒嫁人，為老父和家庭也可謂盡心竭力也已。

為甚麼學外語？忽然想起這問題自覺有點奇怪。顯然沒用處，尤其是文革還轟轟烈烈正在興頭上，政治上絕對不正確，只會招麻煩，不像後來學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對我來說，從寫詩轉到學外語，好像是轉移一種精神寄托。在這十年裏，不光學英語，還學了法語、日語，輾轉於好幾個圈子，交了不少才俊之士。這固然拜賜於上海地理文化的土壤，掃蕩之餘卻沉渣泛起，仍不乏資用，但我想作為一種集體行為，當然懷有隱秘的夢想，儘管朦朧而遙遠。或許這也是一種文明的習慣，大家走在一起，須有共同的語言，也須造出新的規則來。

七一年抑是七二年夏天，小伍帶來一位青年，叫郁福民。相貌俊秀，談吐文雅，一口流利的英語，聲調軟美，令我暗中嘆服。小伍說郁能教我們法語，於是另有法語班，我們全參加了。在黃河路郁家上課，一個大客廳擺設整齊，一看是個頗有底氣的家庭。我們從發音開始，用的是一種英語講解的教材。法語聽起來有一種優雅的節奏美，而小郁的聲調更動聽。有一個 r 的音特別難，據說發這個音巴黎人用的是喉音，如果讀成捲舌音，就像外省人了。為了發準這個音，我在家裏練了好一陣子。

可惜法語班上了兩三個月就停了。過了一陣又恢復，只是換了地方，在淮海中路上陳安安家裏。也是小伍介紹的，陳長得魁梧，氣色白裏透紅，嘴唇厚厚略帶調皮和性感，也戴一副眼鏡。他英語已經相當好，在家裏早已開班授徒。法語老師趙樹華，也是「老三屆」同齡人，安安和我都加入，還有喬治和南希兄妹等人。樹華好像在哪個中學裏教書，外表樸素，一派正氣，像電影裏的地下幹部。教得很認真，口音純正，語法精熟。我很驚訝他從哪裏學的，但從來沒問過他。

安安家在淮海中路繁華段上一條新式洋房里弄裏，其父在解放前從商，家裏被紅衛兵衝擊過。居住一套房，我們在廂房裏讀書。他有時會進來，笑呵呵跟我們打招呼，相當海派，穿背帶西褲，腹部略挺，顯得練達而樂觀。安安在一個里弄工廠做事，並不安份，曬網的時候居多。他下功夫背誦英語詞典，可見其熱誠之一斑。家裏似有兩三個英語班，起初我也加入過一個，另有小伍和安安之妹，過了些時，兩人經常缺席，因為互相擦出火花，到外面去發展了。

法語班堅持了兩三年，讀完北京外語學院編的一套四冊《法語》教材。每次學一課，大家事先做準備，課上讀課文，每人輪流讀一句，用中文翻譯出來。碰到語法疑難處，大家討論，或趙老師加以解答。沒有作業，也沒有考試，主要靠自學。快學完時，大家去附近照相館拍了一張照，每人給放了一張六寸的。共十一人，可能有的是在英語班上的。

隔了三十餘年來看這張照片，有的叫不出名來。以前也沒有這麼認真看過，看着看着，看不出瘋狂來。衣服幾乎是清一色灰暗，特別是坐在前排的三位女生，在今天女孩眼中大約會覺得不可思議。其實她們的衣着打扮還是有分別，不知出於偶然還是事先商量過。右邊的梳短髮，穿人民裝，屬於五十年代；左邊的梳辮子，穿中式裝，代表傳統；中間是南希，燙髮，穿開領衫，露出高領羊毛衫，顏色大約是紅的，可說是「上海摩登」的流風餘韻吧。

一瞬間的留影，不知有多少見證了那個時代　　一個不尋常不那麼透明的時代。拍照以志紀念，不無一種「合家歡」的意思，一個小小的在陽光陰影裏成長起來的另類家族。像我們這樣的在上海應當還有，但淮海路上卻具某種象徵，從前是法租界地段，代表某種殖民文化的精緻，卻在我們身上找到了新的載體。後面兩排各站四個男生，有的微笑，有的木然，獨有我在微笑與木然之間，也看不出個所以然。

另有幾張照片，是在安老師家中照的，有小伍、老姚、安安兄妹、喬治兄妹等，有點像兩個方面軍「會師」。中間安老師，左右

是絕對够「美人」標準的兩位妹妹。我和安老師的那張，我笑得如此璀璨。那是在七十年代中後期，我們學外語的鼎盛期，卻是蹉跎的青春，桃李芬芳。

那是一種奇特的集合，說「家族」有點誇張，「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卻和「文化大革命」不一個路向，或許也分享了它的無私、拜賜於它的閑暇，回想起來驟生緬懷。八個樣板戲畢竟填不滿空閑，沒有別的娛樂，倒催生了特別的私人空間，打牌、烹調、縫紉，把小家庭佈置得漂漂亮亮的，所謂「上海男人討老婆歡心」的神話，其實由文革而來。學外語也是一種消閑，卻含自救的意味，好像在同一條船上，互相勉勵，不計利害，像安安那樣長期提供場所和資源，常常在課上分發用他老舊打字機打出來的輔助材料，這種慷慨大約現在要找也不容易。

聚在一起讀書，學習本身即目的，不問你是誰，不議論國事，這種氛圍和我以前的文學沙龍不一樣，那是為道德正義所主宰，胸懷天下，呼天搶地，造就的是詩人。學外語含有工具理性，不光視語言為工具，無形中為外來文化所薰陶，正像首先要學會「女士請先」之類的禮貌習語一樣。如果深入觀察文化的肌理，不可忽視學員們的家庭背景，大多是知識分子或資產階層。這一代父母歷經政治運動，被改造得相當成熟，學外語像擦邊球，某種意義上凝聚着中產階級的夢想，與其說是與文革對着幹，不如說屬於「和平演變」的策略，說起來還源自晚清「洋務運動」的改良精神呢。

有一點，我想也是環境使然。在陳安安家進進出出，鄰居也知道我們在學外語，都見怪不怪，泰然處之。在安老師家上課，如果在夏天，會把家門開着，就在底樓，朝向弄堂，走過的人可聽到我們在說洋話，沒有人來過問。不光是的大家都知道安老師是好人，住在這「張家花園」的新式里弄的，階級覺悟不那麼敏銳，或許像張愛玲說的，都有那種上海人的「聰明」。

數年下來，我和喬治、南希兄妹較熟。有一次應邀去他們家，在成都路上沿街一棟樓裏，靠近南京路。那天下午陽光充足，英國

式紅茶，配上一套精緻的茶具。聽說父親從前在南陽經商，已經過世了；見到他們的母親，五十開外，端莊嫻雅，保養得很好，沒一絲皺紋。安安曾跟我說過，她是個「女中豪傑」，果然厲害，思想藝術無所不曉，大談柏拉圖的哲學，她說她做甚麼事都有計劃，當然包括對於喬治和南希的學習。不知道怎麼會談到牙齒，她說她牙齒不好，經常看醫生，後來她做了一個決定，乾脆把牙齒全部拔掉，包括不少好牙，裝上了一副假牙。我聽了大為震動，在她的語氣裏，她是個有決斷、不尋常的女人。

安安對她非常敬佩，不過在這麼說的時候，我察覺到他有些感傷和無奈。他喜歡南希，在課上也看出來了，他和南希說話帶一種特別的溫柔。安安說她母親不同意，甚麼原因也沒說。怎麼說呢，我們學外語的大多是老三屆，已臻而立之年了，不是文革的話，也許有的已談婚論嫁了。如果有機會，在學習中發生愛情，豈不天公造美？如郁福民和姍麗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七八年結婚時托人帶來了喜糖。當然也有緣慳一世的，小伍和安安的妹妹便如此。小伍一表人才，但女方家長沒接受，大概還考量到家底、職業等因素吧。成功的當小說讀，不成功的為現實抱憾，反正都能滿足我們的心理期待。

售與帝王家

找出一本日記簿，彩色錦緞的封面，小橋流水，廟宇亭台，楊柳依依。翻開便是偉大領袖的寶像，一身戎裝，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檢閱紅衛兵，旁邊沒了林副主席。裏面有我的日記，從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二月九日為止。

不怕記日記了。一切都好像在回春向暖，而我心頭的解凍仍顯得遲緩。記日記緣自一陣難抑的激動，那天晚上在音樂廳聽了德國鋼琴家康塔爾斯基兄弟的演奏，我這麼寫道：

柔美的音質、默契的配合、純熟的技巧、閑雅的風度……我屏息傾聽，注視着兄弟倆每一個動作，折磨了我一整天的牙痛消失了，白天所感覺的異常的疲乏彷彿也沒有發生過。

於我，這二百多天像急轉的漩渦，充滿焦慮與機遇、衝突與挫折，千頭萬緒，欲理還亂。報紙上在繼續批判四人幫、在平反冤假錯案。文學經典在重印，書店前排起了長龍；圖書館座無虛席；電影、音樂會、展覽會接踵而至，伴隨開放的許諾。環顧四周，各路好漢摩拳擦掌，熬過十年寒窗，面臨龍門一躍。各種機會在向我們招手，好像黑洞盡頭，豁然開朗，大小洞門一齊敞開，頓顯奇景，阿米爾上！有的取到了幸運的鑰匙，更多的名落孫山。

日記裏有無數的名字，關於書籍、電影、展覽會等，有的書買來沒看過，有的電影看了全然記不得。但那些人和事歷歷在目，那些給我幫助，給我鼓勵的人們，都盡力把我往上提、往前推，出自私人的同情和友情，卻緊跟歌唱民族新生的主旋律，一九四九年後還沒有過如此無需官方組織的熱烈的群眾運動。這些人有許多大約已不在世，生者也不知在哪裏，重睹自己的文字，久久無語。

在廠裏我成了個「筆桿子」，為車間主任起草總結報告，給小組職工上課；外文知識也曝了光，局裏有文件要翻譯，也找到我。幹活也不馬虎，加班加點不在話下。九月十六日記載了晚上加班的情景：「近三個鐘頭在艙裏，肩挨着肩，敲鏟聲震耳欲聾，灰塵迷漫。我赤着膊，兩耳用棉紗塞住，汗一直沒有停過，流到褲襠，大家的褲子都濕了。」但另一方面，我們要求落實政策，找局黨委談，遞交「複查申請書」，局武保組也派人來調查，卻推三阻四，不見下文。

不曾體驗過那種讀報的興奮，從小看慣「紅色經典」電影，也激動流淚，而現在黨中央的號召另有一種着肉貼心的感覺。十一月裏《人民日報》宣佈「四五」天安門事件為革命行動，釋放西藏叛亂在押犯人，為《海瑞罷官》平反，並發表《實事求是，有錯必

糾》的社論，我在日記中寫道：「一場新的革命正在扎扎實實地開始。」又覺得「當前先進與落後思想鬥爭尖銳，要加速建設步伐，非有思想解放運動不可。」

於是社會上激起民主的呼聲，在人民廣場和淮海路上出現「民主論壇」，要求加快開放步伐，我興奮莫名：「這是新中國真正的曙光，有識之士正在我輩之中……振興中華，匹夫有責。會當奮起請長纓，誓將民主遍中華！」然而「民主論壇」很快就退潮了，與中央的表態有關。我寫道：「目前的形勢，我始終認為不能再亂，不能再鼓勵無秩序的活動，但必須實行自上而下的穩步的改革，逐步確定法治。的確，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想想也奇怪，「漫長的過程」好像是在昨天說的，三十年就這樣過去了。

對我們來說，各種機會中最具誘惑的莫過於允許社會上以同等學歷報考大學研究生了。七八年第一次這麼招生，一連三年，所謂「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學外文圈子裏，一起學法語的錢國新和王佶民兩位捷足先登。錢被復旦物理系錄取為研究生，王報考北京中國科學院，赴京複試後也高中了。郁福民、趙志石也考過，失利。最沮喪的是安安了，考上海外語學院的研究生，信心十足，卻未取。他決心再接再厲，乾脆向里弄生產組辭職，在家以教英語為生。見了我劈頭就問：「你不打算考研究生？」在他鼓動下，我參加了他新組的複習班，和趙志石、小劉，每周三晚在他家聚會，複習英語語法和法語。

既是背水一戰，大家精誠團結，全力以赴，幾個月下來足見成效。於是安安口出狂言，說那些「老頭子」(如葛瑞規等英語權威)沒甚麼了不起。談到下一回考試，他說英語打到九十分、法語七十分、日語六十分，就有把握了。我說應該是中文九十分、英語八十分、法語和日語各打七十。那時自己還不知考甚麼專業，卻把中文放在第一位。

研究生沒錄取，還有其他機會。安安在街道辦事處通過了英語考試，明年可能去做代課老師。趙志石與金山某單位簽訂了兩年

的合同，去教兩年英語口語。趙帶來不少消息，告我們說，市裏的筆譯考試即將開始。的確，知識受尊重，外文最吃香，從市裏到基層單位，甚至在街道這一級，都在搞外語測試，彷彿在打一場羅致人才的「人民戰爭」。我的單位也如此，局裏舉行外語考試，同學王基立去了，我臨時沒去。王和我、還有何灼興是廠裏的外語小圈子。多年來與王一起學日語，常常偷閑躲到角落裏切磋一番。灼興跟我學英語，每周末來我家，這年他考了大學，沒成。

不參加局裏的考試，我另有打算。正當盛暑季節，安老師在為我奔忙，借他的人脈給我在上海科學院找個位置。先後同生化所、昆蟲所聯繫，讓我搞資料翻譯或教口語。昆蟲所的負責人老劉極其熱心，見了幾次面，也給錄了音，給我單位發調函，足足忙了兩個月，最後見我說「酸了」(sorry)，事竟不成。此時安老師也忙得不亦樂乎，市三醫院、仁濟醫院都把他請去教英語，把我帶去做助教，讓我上課實踐。

在我周圍像安老師那樣的不止一個，蕭金芳先生是有大氣魄者，和他短暫的交往，卻印象深刻。當長夜之後曙光來臨，他已經七七歲了。知識淵博，精通法文，北京外語學院、政法學院都請他去，結果沒去，準備進即將成立的上海法學研究所。每次見他，談鋒凌厲，刺痛時弊，有「辣子」(他是四川人) 味。有一晚我們閑談，他不叫蕭老太開燈，如日記所言：「我們在陰影中談話，只有窗外透入一些淡淡的光，我們能體會到互相的聲氣、能感到互相的情緒。」當時就有這麼一種曖昧的氛圍，大家敞開胸懷，好像都在同一條起跑綫上，不問老幼，不計尊卑，相互激勵幫助，擁抱同一個明天。蕭老給我解決翻譯上的疑難，對我的處境提出忠告，最記得的一句是「凡事勿苟且」！

我在熱戀中。女友汪衛星是學畫的，因此也認識一些美術界人士。我們跟蕭家奎老師學水彩畫，常在禮拜天同他的學生們騎單車去郊外寫生。他帶我們去拜訪了顏文樑、承名世、謝稚柳夫婦等前輩。我大有唐人「溫卷」之遺風，或贈詩、或出示書法求教，雖然

被承名世先生批評說根基不深，使我臉紅。也是通過蕭老師認識了劉明毅，一到他家，發現其妻陳雲霞原來是我航校的體育老師，連呼世界之小。明毅在文革中已經翻譯了八十萬字的美術資料，其父劉汝醴是南京美術學院教授，專治美術理論。明毅也熱心幫我，說他父親明年要招美術史研究生，問我是否有興趣。其時陳老師是三航局幹部，也說如我想調進局設計科的話，她可以幫忙。

我的機會隨着圈子在滾，如夏天裏滾雪球，不是越滾越大，其中各種私人紐帶犬牙交錯，但在藝術上各有其話語和趣味，圈子之間不搭邊。在顏文樑先生家裏，方始領略了印象主義的畫風，一幅幅風景小品畫得極其精細，色彩鮮麗，兼有莫奈的朦朧、畢沙羅的點彩和雷諾阿的濃艷。而且顏老久已眇一目，我在《為顏文樑先生作》一詩中讚頌道：「天上的明珠失落在海底，/給人間帶來奇麗。/參悟了三萬個晨昏的奧秘，/兩顆併一顆，如今更神奇。」

五十年代之後的油畫界崇尚蘇聯式現實主義，像顏先生的法蘭西風雖屬於另冊而遭受壓抑，仍尊重寫實，不越過前期印象派的底綫。蕭家奎和劉明毅稍稍越界，對後期印象派大加贊賞，劉翻譯了梵高的傳記，但碰到抽象主義兩人就大搖其頭。

忘了在哪裏見到汪之傑先生的。汪畢業於中央美校，是徐悲鴻的高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初見到他的一幅肖像畫，正宗蘇聯畫風，但並非照相般真實，那種凝重的筆觸似乎觸及物體的內質，令我想起塞尚，越看越震悚。八月底一個秋陽驕人的下午，我和女友去看他，敬畏如朝聖一般。在雙陽路一個八平方米的矮屋裏，一張床佔了大半。他的面色比上兩次見他時好些，而病態仍在，目光灼灼，孤傲如昔。他說中央美校正在解決他的問題，對五七年之事的清查結果是：純屬虛構。我們聽了為他欣慰，但二十年裏他吃了多少苦頭，令人扼腕。汪一邊看畫，一邊笑，怕講得太重，怕使人難為情。從他那裏可聽到「現實主義」的精髓：你必須研究自然，深入對象的本質。對象不會給你任何東西，你若要把對象畫像，必須研究對象。

另一位陳創洛先生，在展覽會看畫時認識。他畢業於上海美校，走的是新派路子。住在吳江路天樂坊，和我的住處一箭之遙，於是熟悉起來。他醉心於抽象主義，對畢卡索情有獨鍾，且竭力使之與中國傳統美學相融合。他對於新知的熱情令人敬佩，單單法國畫展就去看了十二次。對我傾向抒情感性的來說，覺得他太着重觀念。但事實上他代表了「開放時代」的風格，「新概念」使他擺脱歷史而另闢蹊徑。在八十年代初《中國－瓷器》一畫在日本受賞獲獎，成為新潮的領軍，至今蜚聲畫壇。

從七十年代末開始了新一輪外來文化的狂轟亂炸，一時間中國又成了新舊世紀的老君爐。我們是那麼貪婪，凡是到了嘴邊的，不照單也吃。日記裏那些看過的電影和美術展覽都有一長串，也不放過廣播裏的音樂，蕭邦、德沃夏克、科薩科夫、貝遼茲、勃拉姆斯、德彪西……卻趕不上日本電影《追捕》的打擊樂，在電視裏播放，從家家的窗口傳出，夜晚的街頭加快了脈搏。

那時我是盲無頭緒，覺得自己潛力無窮，三腳貓甚麼都想出手，市裏舉辦書法篆刻展覽，公開徵稿，我送作品去，結果落選。又寄詩歌給《詩刊》，退稿。對甚麼都覺得新鮮，在上海圖書館裏閱讀《考古學概論》、沈從文《龍鳳藝術》、沈尹默《書法論叢》等，即給迷住，筆記作了一大蘿。在六月的日記中，曾在船桅上眺望吳淞江，心曠神怡而詩興大發。或沉醉於求知的海洋裏，榮辱兩忘，還表示不想急於離開修理廠。但形勢不饒人，不光周圍的同道們已在雷厲風動，後來愈覺得廠裏不能久留，外單位來借調我去搞翻譯，不同意；有一陣差點要把我調遣到連雲港去工作，突然覺得不安全，還給我穿小鞋。

其時找出路外語翻譯是條捷徑，這方面黃天民先生對我的幫助至為及時。他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原是上海電影製片廠翻譯部主任，住在我們同一條弄堂裏。他女兒黃英是我小學同學，其兄黃仁是我的棋友，時而結伴出游野外。文革後期常去他家，加入了黃老師的英語班。雖說抄過家，搬走不少東西，但如不僵之蟲，仍有

些寶貨，從他家借到五四新詩選本及《淳化閣帖》等。反正之後，黃老重操舊業，翻譯西洋電影資料，讓我譯美國百科全書中的電影資料，並發表在電影廠的內部刊物上。他後來計劃龐大，準備創辦《外國電影》刊物，然而發覺我心猿意馬、不能專注投入的樣子，頗不高興。

我像個沒頭蒼蠅，胡串亂闖，但夢裏老是夢到文學。大約是情感久遭禁錮之後，對於紛至沓來的新奇，特別容易興奮。讀了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和《祈連山下》，便想立刻給他寫信，寄作品給他看。看到夏衍在全國文聯的講話，整段的抄錄下來。且表示要照他所說的，去挖掘、研究新時期「英雄人物」，「給社會樹立其典型，是文藝家的光榮任務」。雖然詩作屢投屢不中，仍在刻苦地寫，在時代與自我之間分不清真假。

那時開始翻譯波德萊爾的《惡之花》、愛倫坡的詩和小說。十多年前認識朱育琳時，驚嘆其美侖美奐的譯筆，便懷着接觸外文原作的夢想。愛倫坡的《安納帕爾•李》被老朱稱為千古絕唱，現在終於自己能着手於斯，即使其中的「哀」音難以傳神，也歡喜無量。那些文學原典購自於福州路上的外文書店，在二樓的舊書部有買主要是抄家沒收的書。難以形容初獲《惡之花》的那份驚喜，一九五二年的經典舊版，五臟俱全，有名家註釋。把老朱的幾首翻譯一一對照，人亡物在，「惡魔」的記憶被喚醒，徒增一份時代的沉重。

從那裏還買到拉馬丁 (Alphonse de Lamartine)、瓦雷里的詩集。覺得前者悶、後者玄，都不親近。似乎和惡魔特別投緣，又買到波德萊爾翻譯的愛倫坡小說，後來又買到《愛倫坡全集》，厚厚的一本，紅色的漆布封皮已經磨損，卻要價四元，頻呼「辣手」之餘，還是囊為己物。那時我的月薪是三十七元一毛，據我們航校學生的自嘲，屬於「三七一〇部隊」。

累呀累，人呀人。「感覺異常乏力」、「只想睡」、「昨夜一時半睡下，撥好鬧鐘」、「鼻炎嚴重、頭脹、神疲、咳嗽」之類的

字句充斥在日記裏，但又處於極度的亢奮中。所有的信息，無論來自公私渠道，無不意味着希望、未來的允諾和新舊的衝突，從而激起陣陣詩的狂喜與憤慨，傾倒激情澎湃的宣言，和報紙社論的語調何其相似乃爾。這段時間也在不斷的自省，凡是師友的箴言、失敗的教訓都促使自己更加踏實和謹慎，甚至涉及平時待人接物方面，對「心中之賊」窮追猛打，痛加批鬥，可說是真正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卻完全出乎自覺。

數月之後報考復旦中文系唐宋文學專業，因名額限制，轉為元明清專業，後來章培恒老師說，在考慮錄取時，我的外語是個因素。努力沒有白費，雖是歪打正着。在遞交的材料裏，也附帶着那些翻譯稿，包括在黃天民老師編的《外國電影》上發表的數章《卓別林自傳》，這些大約都起了作用吧。

日記沒寫下去，太累了，後面也越寫越短，所剩下的就是行動了。

二〇〇八年九至十月

七十年代記憶片斷

· 王小妮 ·

一九五五年生於長春市。六九年至七二年隨父母插隊。七四年再次插隊。後讀大學，八五年遷居深圳。二〇〇五年起居於海南島。出版有詩集《我的紙裏包着我的火》，《有甚麼在我心裏一過》，隨筆集《派甚麼人去受難》，長篇小説《方圓四十里》等。

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這十年，我幾乎都是在中國北方農村度過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隨父母下放農村，一九七二年回城一年多，一九七四年再次插隊，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離開農村上大學。鄉村記憶，成了那十年的主體。

一　一九七一年春天，過冰河

那一年，咖啡色斜紋卡嘰布成了流行色，很多城裏年輕人用它做褲子。當時，我們家下放的地方離長春市只有二十多公里，這個時尚也慢慢來到鄉下。

屯子裏王會計的女兒跑到我們家説：燒鍋嶺供銷社新來了各種各樣的布，明天早上一開門就賣。王會計的女兒讓我陪她去買布。我説要問母親。我還沒去過燒鍋嶺供銷社，但是，早聽説那兒有個大供銷社，很想去看看。

那年，我母親正像餵自己的孩子一樣用心地餵了一頭小黑豬，她在忙着豬的間隙，給了我七尺布票和五塊錢。

我們家下放在小朱屯，燒鍋嶺在小朱屯的正東，先走一里地，有座火車乘降所 (日本人留下的説法)，再向東走七、八里。我們起

得很早，怕去晚了買不上布。買布的細節全忘了，印象中是要了命的擁擠，我和王會計的女兒裹在人山人海裏。周圍全都是穿着肮髒棉襖棉褲的人。有人踩住我的腳，我就用勁推，被推的人也毫無感覺。所有的人都撲向賣布的櫃枱。到中午，布賣光了。

王會計的女兒買了兩種花布，我也買到了咖啡色布。新布一打開就傳出香味，把它疊成方塊，裝進書包，我們靠在供銷社的土牆外，吃了甜脆的油炸麻花。燒鍋嶺供銷社比辦年貨還熱鬧。王會計的女兒認識很多人，她不停地小聲告訴我，人群中的某個人是誰誰誰，感覺全公社的人都來買布，那些不認識的人，她說是對面另一個縣的。

下午往回走，春天的太陽特別溫暖，棉襖有點穿不住了，圍巾也圍不住了。我們回家的那條沙石路有一些歷史，聽說俄國軍隊在二十世紀初打進中國的東北，有一隊騎兵主力走的正是這一條路。正因為的「老毛子」的原因，周圍的農村在七十年代初備戰備荒挖地道很盛行，大隊幹部一開會先說：要打仗了。整條路兩邊沒有像樣子的樹，隔很遠歪歪斜斜有一棵柳樹或者榆樹，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遮陽，我們熱得夾着棉襖走。

後來，為了抄近路，我們下了大道，繞進了一片甸子，今天該叫濕地。迎着下午的太陽，看見一條亮晶晶的冰河橫在前面。

一看那冰面就知道，冰已經被太陽曬酥了。河面寬十幾米，走在我們前面是幾個男孩子，他們先後都跑上冰河，非常快地跑，踮着腳跑，冰面在他們腳下發出嘎嘎的響聲，幾個人都平安跑過去了。這個時候，再繞回去走大路，我們都不情願。我們也學男孩，踮着腳飛快地跑，每一次落腳都聽見冰裂聲。

過了河的幾個男孩子並沒有馬上走，全坐在一個向陽的坡上，笑嘻嘻的，好像等着有人落水。我們也坐在坡上，看着後面的來人，幸災樂禍地盯着那條冰河。

對岸有人走近問：你們咋過去的？

我們說：快跑。

從燒鍋嶺方向來的人一群接一群，每個人都夾着布。連續有幾夥人都沒敢冒險過河，被迫返回去走大路。

幾個男孩有點沒趣地走了。我們離家只有三、四里路，二十分鐘肯定能回到家，所以我們不着急，我們躺在土坡上，討論新買的布。

河對岸來了幾個人，嘰嘰喳喳幾個大姑娘，走在前面的兩個人想也沒想，直接走上冰面，才走幾步，突然尖叫，最前面的那個一下子矮了，另外一個也緊跟着沒了，冰面裂了一大片，兩個人在河裏撲騰，頭上圍着彩條圍巾。

河水不深，兩個人周圍飄着冰碴，她們又喊又叫，沒下河的幾個同伴，也在岸上喊叫。

河不能淹沒她們，但是，水相當涼，她們兩個不趕快上岸，還彎下腰在周圍撈，各撈出一塊水淋淋的花布，才費了很大勁爬上岸。

王會計的姑娘突然使勁地拍我。她說：那不是鐵姑娘嗎，前幾天還在廣播裏「講用」呢。

我不知道誰是鐵姑娘。王會計的女兒捅我說，快走快走。她怕那幾個大姑娘們罵我們看笑話。

一路上快走，進了炊煙四起的屯子。井邊打水的人過來看我們新買的布，都說好。後來，我那塊咖啡色的布料請一位「五七戰士」給裁了一條褲子。

二　一九七一年秋天，被狗咬了半邊臉的孩子

當時，我在公社農中讀初一，寄宿在學校。那一年幾乎沒有上課，總在學農勞動。秋天，莊稼等待收割，大田裏已經沒活兒了。我經常一個人在公社附近「繁華」地帶游逛。就是在這一年的冬天，我平生唯一一次看見了還留着辮子的農民，他應該很老了，高個兒，一根細辮像一縷黃麻，有一尺長，拖在背後，他穿很髒的黑

棉袍子，正是辦年貨的時候。別人見他，都不覺得新奇，好像他就該拖一條辮子在供銷社門外的雪地上走。

一個剛下過雨的下午，我和幾個同學在國道邊的林帶裏閑逛。下雨以後，林帶裏比土道好走得多。忽然，有人喊：快上國道，看熱鬧去。

我們一起向墊得很高的國道上跑，路肩又陡又滑。聽見哭聲，感覺很多人在哭，離我們不到一百米。記得當時路邊碼放了許多電綫桿，農民叫電棍。電棍露天放着，怕人偷，全用粗鐵絲固定在一起。我們踩着電棍上了國道，看見正站在道邊哭的不過是兩個人，一個女人，女人腳下一個四五歲的孩子。女人頭上包着一塊鮮艷的方圍巾，當地農民的圍巾都是一直包到額頭上。這個女人和孩子肯定趕了不少路，褲腿上都被泥漿糊住了。

女人的哭聲大，好像唱地方戲，哭也有一種民間固定的節奏。孩子的哭聲更像嚎，乾啞，斷斷續續的。女人不斷地跺着腳，像國道欠了她甚麼。看見有人過來，女人的哭聲更大，夾着些難聽的罵人話。

我跑在最後，從我的角度卻最先看見了那個孩子。我看見半邊血淋淋的臉。那孩子一邊乾哭，還一邊用很小的眼睛看着我。我嚇得有點不敢再往前了，那是我一生中看見的最恐怖的傷口，皮肉全都翻開，那半張臉上有一個鮮紅的血窟窿，血窟窿裏居然露出兩顆半白的小牙齒。孩子的棉襖領子上也帶着血。

奇怪的是，這可憐的幾乎沒了半邊臉的孩子就獨自站在泥裏哭，那女人並沒有抱他，也沒有給他包裹傷口。她可能完全嚇糊塗了。

很快圍上來更多的人，那女人顛三倒四地說着話，一會兒對着那個，一會轉向那個。她說的大意是，孩子是給自家的狗「掏」的。她剛了給小崽子 (孩子) 一個粘乾糧，自家的狗就竄上炕搶乾糧，一口就把孩子臉掏成了這樣。她半說半哭，咒天咒地，還抓住那孩子的肩膀，一下一下地推搡，好像責怪那孩子。她發出最大聲音的時候，那孩子反而不哭了，抬起受傷的臉，去看她的嘴。

不斷有挎着筐的女人圍過來，那些筐裏裝着臘燭和大粒鹽。她們不約而同地做着同樣的動作，使勁地嘖着嘴唇，連連嘆氣。有人問，咋不送衛生院？女人說，衛生院不給扎沽 (醫治)，讓上國道截車，讓上城。

孩子看見這麼多人圍上來，忘記了哭，乾裂着嘴，大口喘氣。女人們指着孩子說，那不是抽了一肚子冷風嗎。孩子不喘了，斷續地乾嚎。

七十年代初期的那條國道，在我的印象裏又寬又直，向南走是長春市，向北是農安縣城，當年路上很少走汽車，只有送公糧的時候，馬車排列成隊，道路上散落着被車輪碾碎的玉米。

有人問那女人進過城沒有，那女人又搖頭又點頭，好像聽不懂別人的話，然後還是哭罵。

後來，從泥濘的小道上來了一輛馬車，車身左右扭，走得極慢，馬蹄子踩着亮的泥漿。那女人看見了馬車，一下子撲倒在國道上，兩手拍着地，大聲哭叫：大爺大叔大兄弟呀，救命吧，大爺大叔大兄弟。

這時候，被別人抱起來的孩子也加大了哭聲。馬車上的人不知道出了甚麼事，車就停在稀泥裏。車上裝了玉米秸。車老闆站在車幫上問：咋的了？

大家一起對那女人說：離城好幾十里，坐這馬車得顛到啥時候。

女人爬起來，又開始哭。馬車慢悠悠地上了國道，車老闆問：是丫頭還是小子？

女人的哭聲突然加大，不斷地說：是小子，是小子，是小子啊！

很多圍觀的女人聽到「小子」，都哭了。

再後來，也有汽車經過，根本不減速。一輛吉普飛一樣開過去，濺起不少泥，那麼快的車速，司機不可能注意到聚在路邊的這些農民。

不知道甚麼時候，那孩子臉上給人包了一塊藍布，有人說傷口

怕受風。可是那女人一直沒有想到把頭上的圍巾給孩子摘下來。圍觀的人們越來越着急，怕再錯過汽車，開始往國道中間湧。

國道上走來一個人，這人我認識，是公路道班上的。鎮上的人都知道，他坐班車不用花錢，搭上任何過路的班車都能進城。他有點着急，說班車快到了，他看手錶。所有的人都開始盼望長途客車，又等了很久。

方頭方腦的班車終於出現。人們緊急商量，一起堵在國道上，那女人反而向後退，哭着說：怕人家不讓上啊。但是眾人都說，不讓上就硬上，孩子都這樣了，拼着命也得上。

長途汽車好像根本沒準備停靠這個小站，它在國道正中間晃着。賣票的伸出腦袋喊：滿員了。司機也伸出腦袋。

人們都擁在國道上，受傷的孩子已經被人舉得很高。後面還是有人喊：快舉孩子，快舉孩子！

班車慢下來。可是車門根本打不開，車裏早塞得滿滿的。道班上的人認識司機，趕緊過去和司機說話。汽車周圍一片混亂，不知道有多少雙手，推着那女人，舉着那孩子，想把他們從車窗塞進車。最後，受傷的孩子被車上人從車窗裏接進去，女人也從車門擠上車。

賣票的大聲喊，起票哇，扒窗戶進來的！

下面，有幾十雙手一齊拍打車門說：快開車，快開車呀！

道班的告訴賣票的，這兩個人的票下趟出車來找他要。當時，班車從這個叫合隆的小站到長春市的票價是五角錢。

汽車終於又開了。人們嘆着氣漸漸散開，國道又變得光溜溜空蕩蕩。

三　一九七四年春天，第一次吃酒席

那一年，我十九歲，第一次吃了正規的酒席。

我不知道，那天早上起來時候，我父母的心情是甚麼樣的。開

始，我沒覺得甚麼特殊，跟平時差不太多，還沒有「事到臨頭」的感覺，那天，家裏人送我去插隊。

是個星期天，比平時上學上班起得還要早，起來以後等車。後來全家上了一輛吉普車，我母親把那輛單位裏的車叫大屁股吉普。用塑料布和紫色氈子包捆好的行李，還有一隻白茬兒的薄木箱子也都放進車。從那天起，它們就是我的全部用具，將要和我一起下鄉插隊了。車開動以後，行李箱子不停地在車後部搖晃。

我是沒經過敲鑼打鼓舉紅旗宣誓，就下鄉了的。送我的是家裏的其他四口人，父母弟妹。

出城前，又上來一個人，母親讓我叫他張叔叔，我覺得父母對這位張叔叔特殊地熱情。很快車就出了城。季節還早，車窗外面的田野裏還沒長出莊稼。一路上，弟妹兩個很興奮。我和他們一起看風景，春遊一樣。父母一直和張叔叔說話。

當天下午，就是這輛大屁股吉普，將把他們都帶回城裏。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未知之地，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之間，我一個人被拋下。

文革以前，在我們家裏，就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學。母親經常愛說一句話：我們堂堂正正，萬事不求人，不搞歪門邪道。但是，一九七四年春天的那一次，我看見他們為我而笨拙地改變。我去插隊的那個公社是張叔叔的老家，他的幾個親戚在公社和大隊當幹部，為了得到照應，父母帶上張，並且要在縣城請他的親戚們吃飯。

將近中午，聽說快到縣城了。我聽見母親低聲問張叔叔，他們是不是能喝酒，要甚麼酒合適。我母親囑咐我們，一起吃飯的，還有幾位客人，你們都要安靜點。我覺得那天她和父親都有點緊張。

弟弟很高興，他對我說：飯館裏做的肉好吃。弟弟小我一歲，他中學畢業插隊還要等到第二年。我妹妹也很高興，當時她剛上中學。

那天我很驚奇，父母並不認識他們將要宴請的客人。車一進縣城，張就把頭伸出窗外，向路邊望。父親還不斷問，是不是那幾個人。張總搖頭，他的頭又尖又長。他說他妹夫很胖，肚子都圓了，

一個管下鄉青年的公社小幹部，屁大個官兒，成天吃席。

那個小縣城現在升格成為一個市，當時它的交通要道只是十字路口，有四個重要的建築，除副食品商店是平房外，國營商店，國營旅社，國營飯店都是二樓，在一片平房中，這幾座兩層樓很顯眼。國營飯店門口，幾個穿藍色吊兜制服的人，有站的有蹲的正抽菸。張說，那就是他們。

大人們見面一番握手。我站在他們後面，看見我父母和不認識的人寒喧，表現出了不大自然的熱情。母親拿出菸，請每個人抽。

我記得，那種場面讓我反感，覺得庸俗。大人們之間客套了一陣，父母叫我的名字，我被推向前，父親的手熱熱地抓着我，說：就是這孩子。

陌生的人們很平淡地點點頭。然後全體人上樓。七、八個人一起上那小樓，木樓梯咕咚咕咚一陣響。圍着一個油乎乎的大圓餐桌坐下來，我看見母親和張叔叔商量着點菜。感覺母親拿不准該點些甚麼，淨看張叔叔，又小聲問服務員。她的意圖是不怕花錢，要盡量讓客人吃好。那天，我第一次感到做一個大人很不容易。平時下了班就在家裏看看書澆澆花的父母，應酬那天的場面很努力，連我都看出了他們的不自如。

酒席上，大人們都在喝酒，連不喝酒的父母也喝了。很多的時候，是客人們之間談得很熱鬧，父母只是聽着。我幾次看見我母親在擦汗。在我插隊前後的那幾年，她身體一直不好，肩周炎，心情煩躁。但是她那天好像很健康，一點病也沒有。父親一貫看不慣「喝大酒」的人，那個中午他對喝酒一點意見都沒有。

酒席吃了很久。我真不知道，一頓飯還能吃那麼久，從中午一直吃到下午。

弟弟說得對，我們吃的是酒席，不是家裏的菜，魚和肉都給做出了花樣兒。盤子端上來，一層壓着一層。我只能記住一道菜，是整個豬肘。我們離開飯館的時候，菜還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見母親動作很小地從褲子側面的口袋裏往外拿錢，是一疊

錢。在客人們喝得說話聲越來越大的時候，她算了賬。那一疊錢讓我吃了一驚。

後來，我才知道，和我們一起吃酒席的，有我插隊那個公社主管知青的幹事，大隊民兵營長，還有公社的其他幾個幹事。吃好了飯，人很快都散了。吉普繼續向東，幾分鐘就出了縣城。跟我們走的，還是那個張叔叔。他喝多了，話有些顛倒。我要去插隊的生產隊離縣城還有五十多里路。這一段路上，我父母都不大講話，只聽那張叔叔一個人說。他說的大意是，人不能太死性了，不能像我父母這樣，清高的人要吃虧，不遇到事兒還行，真遇到了，就要「渾和」點兒。

現在還能記住的下一個場面，我站在一個很高的土牆豁口上，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吉普走，我的心裏亂七八糟的，眼睛裏都是眼淚。後來，我自己走進集體戶，男生女生全不認識，全都冷眼看我，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都不敢動。

九十年代，我問起母親那天請客的細節，問她花了多少錢，她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吃酒席的任何細節，她都忘記了。反而她記憶最深的是，那天，她看見我站在土牆那兒可憐巴巴的。她小聲對我父親說：快走，別回頭。

四　一九七四年秋天，在敬老院

在我插隊的慶陽生產隊向南走兩里多地，穿過楊樹的林帶，有一座巨大饅頭似的丘陵。丘陵上面有座孤零零的院套，是公社敬老院。割完了莊稼的季節，大地有點淒涼。每到農閑，大隊都會組織興修水利大會戰，那年把臨時廣播站設在敬老院。我被派去管理廣播站的機器，播放大隊通知和各生產隊的挑戰書決心書，在敬老院住了半個月。

為了開廣播，我必須在天亮之前到敬老院。隊裏的社員都提醒我，敬老院的狗兇，常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它們能分辨人的高低

貴賤和身份年齡，從來不咬老年人、有殘疾的、要飯的。穿花衣裳的姑娘經過敬老院門口，就要加倍小心。

起早做豆腐的老人幫我趕走了狂咬不止的狗。我在豆腐房裏，喝了一瓢滾熱的豆漿。老人還到土牆縫裏拿了紙包，給我揑了一點糖精。豆腐房裏有一個熱氣騰騰的大黑鐵鍋。他話不多，他說，人活到老了，就該「撅巴撅巴」扔了。

廣播站設在唯一一個女服務員的小屋裏，一鋪小火炕。每天三頓，服務員喊我去吃飯。站在大院子裏，看見敬老院的三棟瓦房，不斷有老人緩慢地挪出來，有人半蹲在門口，有人佝僂着，咳嗽氣喘，往鞋底上擦着鼻濞。

在敬老院吃的第一餐飯是玉米渣粥。天還不太冷，鍋就架在院子當心。食堂是一間大房子，幾排木桌木凳。女服務員個高個子，二十幾歲，渾身上下黑衣黑褲，圍了一條大黑圍裙，拿加長把兒的鐵勺子，手腳麻利，往每個老人遞過來的碗裏添粥。我被安排在辦公室裏吃飯，同樣的粥。他們只有鹹菜，給我多加了兩塊豆腐。

那些老人們吃飯的速度異常地快，絕沒有人講話，每個人都緊看着手裏的碗。一鍋粥沒一會兒就見底了。老人們推開碗，臉上才出現了鬆弛，一個一個挪回到屋子裏，只剩個別幾個老頭蹲在太陽底下。

服務員洗刷完了，回到她的小火炕上，給老人做最後幾件棉衣。敬老院有一個廚師，她的主要工作是拆洗被褥和棉衣。她是一個很勤快的人。我拿那種半透明的塑料唱片放歌的時候，經常看見她戴了一個很大的口罩，在院子裏拿根木棍敲打老人用過的舊棉絮。她好像遇到了甚麼情感挫折，才住到敬老院來。敬老院裏的人都叫她大姑娘。

「大姑娘」對我說，一個人總待在這種地方，脾氣就古怪。她說她父母家所在的生產隊裏也有集體戶，那些學生多好，有時候唱歌能唱半宿。當時，我是第一次聽見還有人羨慕我們的生活。

老人們在吃過飯以後，甚麼也不做。一間大屋子，住二十幾個

人。我去過幾次，每次都一樣，整個屋子裏一個說話的也沒有。只有發呆的，睡覺的，坐炕上抽菸的。所有的臉上，長時間維持同一種表情。

敬老院的房子不分男寢室和女寢室，人和人之間只擋一塊膠合板。哪個擋板兒之間距離寬，放着兩個人的行李捲兒，說明住的是一對夫妻。

我很清楚地記得有兩個老太太，一個在炕上坐着，手上抖開一個裝豆莢的小布口袋，一顆顆從乾豆莢兒裏剝出豆粒兒，我停下來看她，她馬上用一隻乾老的手，擋住口袋不讓我看。聽女服務員說，有的老人能外出活動，在收割後，去大地裏撿糧食，糧食積攢多了，去換豆腐，一個人躲在沒人看見的地方吃。還有一個老太太，坐在磚地上，用甚麼硬器砸高粱殼裏的米粒兒，砸了一些，用手捧起來，對着空中吹高粱殼兒。

除了做豆腐的老人，沒有第二個老人問我：你是誰，你到這兒來幹甚麼。他們好像跟這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兒都無關。

有一個晚上，一個老頭因為別人的毛巾搭過了界吵起來。他直挺挺站在院子裏，氣得大喘氣。

老人們比種地的農民們更清楚哪一天是星期天，因為星期天改善伙食，也許吃豬肉燉粉條，也許有炒菜。炒菜的時候使用一種大鐵鏟，像工兵挖地雷用的那種工具。豆腐，在老人們看來是一種好東西，用鹵水點的，滿院子飄着香味。我看見過一個老人站在牆角，用鈎子似的手捧着一塊豆腐，直接吸進了嘴裏。

星期天的時候，敬老院的領導，站在食堂門口大聲吆喝着：慢點吃，別燙着。

敬老院有國家的撥款，和當時農民的一日三餐比，伙食不算差，數量也充足，有時候還有飯菜剩下來。但是他們一看見有肉的菜，就想着多吃，搶着吃，要把屬於他的那份兒，全裝到自己的肚子裏。

女服務員盤腿坐在小炕上，用一顆銅頂針兒為老人做棉襖。

頂針很好聽地敲着針。她說，他們多可憐，都是有今兒沒明兒的人了。

女服務員和我熟了以後告訴我，她曾經想過出家，又不知道哪兒有尼姑廟。她說現在不興這個，沒辦法才到了敬老院，伺候這些老人，他們再怪再髒再有毛病，卻沒有壞別人的心思，多數是老絕戶，都是可憐的人，需要人幫。她認為幹這個，總比在大地裏幹農活輕閑。老人們對女服務員也都很好，哪個老人耍脾氣，馬上會有人說，快叫大姑娘去。「大姑娘」說話有時候比領導還好使。

有一天太陽非常好，女服務員和我坐在她的炕上。她打開窗戶說，多像四月小陽春兒。牆角下面曬太陽的老頭兒脫了空心棉襖，露着皮膚鬆弛的上身，翻過棉襖找虱子。女服務員說，這麼幾天就生虱子了，讓他們在裏面套一件貼身的布衫兒，他捨不得。老人們說，有人味就得生虱子，誰要不生虱子，就快挺屍了。

又有幾個老頭也坐下翻騰他們的棉襖。大師傅敲着鍋沿兒喊開飯，他們很麻利地披上衣裳，又是各個房間都有人晃出來，我坐在炕上看見一片花白花白的頭頂。

每天，到了下午四點鐘，已經有人去關門了，敬老院的門是碗口粗的小樹扎成的。幾條狗臥在土裏，守着門外那條大道。修水利的人們吵吵嚷嚷經過，狗都竄起來，叫成一片，它們看慣了的院子裏幾十個老人，對外面的人好像有刻骨的仇恨。

五　一九七六年冬天，她說被迫害了

七十年代的中期，越來越多的知青通過招工推薦上大學離開農村，而一直沒機會走的知青心灰意冷，我們那個縣就有絕望自殺的。我所在的集體戶就有兩個都是一九六八年下鄉的女生。

剛進入一九七五年，我離開集體戶，被臨時調到縣裏辦知青報。第二年的冬天，有一個早上，我提前去上班，天還沒全亮，整個知青辦的小走廊空蕩蕩的，只有一盞小燈。估計打更的老人先把

每一面火牆都燒起來，自己去吃早飯了。我沿着走廊向裏面走。我們的辦公室在最裏側。找鑰匙的時候，突然腳下一絆，踩着了甚麼東西，軟軟的，嚇了我一跳，馬上後退。

沒想到，走廊地上躺着一個人，緊緊地縮成一團。

那個人抬起臉看了我一眼，沒說話，脖子上圍了一條又長又厚的綠圍巾，一個女的。

估計她看我也不過是個知青，根本沒理我，又縮回去，一動不動。我轉回身叫人。在門口正遇上知青辦一個幹事。縮在地上的人看見又有人來了，哇哇地哭，自己站起來了。

她渾身的土，兩手捂住臉，頭髮圍巾揉得很亂。我馬上想到我們集體戶那兩個一九六八年下來的老知青，當時，我看她，覺得她已經蒼老得不行了。

上班的人多了。一個部門主管，是個胖婦女，嗓門很大，從外型上看就像個領導，她一進門就問：這是咋的了。女青年像看到了救星，哭聲大了，邊說邊哭說她是知識青年，知青辦得給她作主。

女主管扯女青年，問她是哪個公社的，還警告她在辦公室哭嚎影響不好。

女青年的聲音立刻變小了。她說：領導啊，我被迫害了。

「被迫害」，這話在當時是極嚴重的一句話。在知青下鄉的七十年代，有非常的特指。女知青被迫害了，意思就是被强暴了。按政策，女知青被農民「迫害」的安撫政策是優先辦理招工回城，而「迫害者」將被公判槍斃，開完公判大會還要五花大綁，站在卡車上游街，胸前掛塊名字上打紅叉的牌子，衣服後領子裏插根很高的「標」。我在縣裏的幾年，每年年底知青代表大會召開前，縣裏都安排這種公判游街，殺一儆百。「被迫害」這三個字份量太重，它涉及到有人能很快回城，有人能很快送命。

聽到「被迫害」，馬上有負責辦案部門的人，把女知青叫到他們的辦公室。這種事情在當時非常敏感。而像她這樣公開找到縣裏，當眾宣佈自己被迫害的，我在知青辦的三年裏，只遇到過

這一次。那個上午，專案組的門玻璃上，臨時糊上一張報紙，神神秘秘的。

中午，有人安排女青年跟着我們去縣委食堂吃飯。我們走在前面，她在後邊跟着，故意和我們保持距離。離得遠了，我站住等她一下，心裏出現一種厭惡。

女青年吃飯相當快。吃完了，她自己又回知青辦。晚上再帶她吃飯。那一夜，聽說她住在縣委招待所。

第二天上班，一進門就看見她站在走廊裏，手裏抓着一個鼓鼓的舊書包，正對知青辦的幹事說沒臉回集體戶了，要買火車票回家。很快，她就消失了。

知青辦派了人下鄉去調查。調查回來那天，刮很大的北風，縣城的小馬路上捲着冒煙雪。進進出出的人把走廊門口都踩白了。調查回來的人在走廊裏大聲說，被女青年告發的農民一聽說迫害女知青，馬上嚇傻了。一家人都跪在地上喊冤枉，說就是打死他們，也不敢欺負下鄉的學生，誰都知道那是挨槍子兒的。

我估計，去調查的人在臨走之前已經有了懷疑。當時，正是每年年底招工指標由縣下達到公社的關鍵時候，一個女知青直接跑到縣裏來說自己被迫害，從她的不顧一切，知青辦的幹部都明白。

過了幾天，那女青年又來了。還是那條綠色的圍巾，緊緊包住了臉，不知道走了多遠的路，圍巾上已經結了一圈白霜。這一次她正好碰上了我們知青辦的主任，姓毛，是個又霸道又心軟的人，最怕看見女知青哭。

女青年就在走廊裏抓住了剛出門的毛主任，抓住他的大衣不放。說自己虛歲都二十八了，還連着喊，主任，我被迫害了，主任，我沒臉回戶了，主任。

每說一句就喊一句「主任」，這種場面，看見的人心裏都不好受。毛主任的脖子總掛了一對帶繩的皮手悶子，他還不知道情況，但是那麼一哭，他就受不了。主任不斷勸她慢慢說，慢慢說。

知青辦的人都從各個辦公室出來，在門口，探頭探腦看這個胖臉上滿是眼淚的知青。

她嗚嗚嚕嚕開始說。說着說着，被迫害的話題忘了，她說她們公社有門子的都在找人，都想走，連才下來兩年的，都填表了。說到才下來兩年的人，她放聲哭，想用頭去撞牆。

後來聽說，縣知青辦照顧她的情況，讓她直接參加了當年的招工。

從蜷縮在走廊上，到聽說她已經回城，她沒和我們幾個知青說過一句話，她盡量迴避。

不知道那個被她告發的農民是不是被追究了。部門女主管說得比較直露，我記得她站在辦公室門口的樣子。她說，真是啥人都有，多不知「磕碜」的人都有。

六　一九七八年春天，弟弟騎在毛驢上

我到大學報到的時間是一九七八年的三月。當時我弟弟還在鄉下插隊，他是一九七五年下去的。

上大學一個月以後的一個星期天，記得天灰濛濛的，空氣中有一種春天味兒，新鮮。我帶着父母的囑咐，從坐火車出城一直向西，去幾十公里外弟弟的集體戶，提醒他趕緊開始複習功課，務必參加七八級的高考。隨身帶了幾本複習資料，都用報紙包得很嚴密。當時我預感，凡是在心裏暗自盤算離開農村的，都是「壞心思」，不能大張旗鼓。

弟弟晚我一年下鄉，一直幹農活，下去第一年，就學會了抽菸喝酒。父母一直為他擔心。

下了火車，四周都是空曠平坦的田地，先經過了一個兵營，兵和老百姓不同，從大門口能看見裏面井井有條，一塵不染。然後穿過一條林帶。我是老知青了，不用問路，直接找到了那個獨自立在略微高的崗地上的集體戶。

一進屋，灶坑前有人仰臉問我找誰？屋裏全是煙，聽說找王惕，灶前的人指西屋。我弟弟生於一九五六年，父母所在的公安系統剛傳達過裴多菲俱樂部甚麼的，他們特別意識到，革命政權要時

時提高警惕，所以給弟弟起名「惕」。

西屋，炕上靠着幾個男生，全留着長頭髮，穿破大衣，身上隨處棉絮暴露。在大衣的腰間扎一根麻繩，這是當時知青身上必不可少的冬季飾物，顯示着骨子裏的瀟灑不羈。我聞到集體戶男生宿舍專有的汗味。

弟弟沒在。他們說，惕，磨穀子去了。

我能感覺到裹着破大衣的幾個男生有點冷漠。我知道，在那個時候，除非你是傳遞回城的消息，世上再沒有任何事情能讓他們表現出熱情。

弟弟出現在門口的時候，也裹着一件破大衣，也扎一根草繩。我看他比任何一個男生都頹喪，頭髮太長，臉又凍得通紅。早晨，從家裏動身的時候，我只是父母的一個使者。但是我看見弟弟出現在門口，突然在心裏想：這是我的弟弟啊。

這種感覺一瞬間裏特別强烈。我已經離開了這種生活，而他還深陷着。我一句也沒提上大學的事，不想刺傷他。

弟弟是和一匹黑灰的瘦毛驢並排擠進西屋門的，他的手通紅地搭在驢屁股上。他從小就喜歡動物。

他明明看見了我，卻對炕上的人說話。他說穀子沒磨上，人多，排號呢。

他故意站得離我遠一點，可能為了證明他是男生我是女生。他長大了以後一貫是這樣。他摘下帽子，把帽子扣在毛驢頭上，他還是不太看我，站在原地搓兩隻耳朵，好像根本不準備和我打招呼。他的帽子和別人不一樣，不是長毛狗皮那種，是硬的黑色亮皮，可以打油的，帽子裏面是短毛。他就是戴這種不抗寒的帽過了三個鄉下的冬天。

趁沒人看見，我把書包裏的包裹嚴密的複習材料給他，說了專門帶給他的，裏面還有媽媽的一封信。我說，你一定要看。他大咧咧地把它們塞到行李捲兒下面。

他說：給我帶瓶酒就好了，咱家還有西鳳酒，都給爸爸藏起來了，怕我偷着拿走是不是？

跟我說話的時候，他不斷地拽那毛驢的尾巴，毛驢終於不想忍受，逃竄到外屋去了，他的黑皮帽子滾掉在地上。他們集體戶好像用紅磚鋪的地面，但是早看不見磚了，坑坑窪窪的，都是泥。

我問：你還喝酒啊？

他說：喝，找個「由子」就喝，這麼冷的房子不喝酒能挺過冬天？

有一個男生過來說，每年冬天，後牆都給凍得嗚嗚響。弟弟的兩隻手紫紅腫脹，我問他有沒有凍瘡膏？他說：賊皮子，不用那個。他把手背到後面去說，沒事兒，到伏天準好。

後來，有人進進出出地說，又要下雪了。滿院子人攆得鷄狗豬鵝都在叫。女生們去高粱秸扎的圍牆上撿衣裳。弟弟打了一聲口哨，可能是叫那隻毛驢。他說：你上女生屋裏呆着吧，女生炕上乾淨，我還得磨穀子去。我馬上說：要下雪了，我也走。

我們一起出了門。灶前有一兩個人抬頭打招呼：姐，再來。好像我是他們大伙的姐。集體戶的院子裏光禿禿的。整個冬天倒的泔水凍成一個將近一米高的冰坨，正堵在門口，正在溶化。弟弟讓我看門口的一隻破缸茬。他說，夏天，男生在炕上喝完酒就往外甩瓶子，看誰扔得準摔得碎。

出了門，我再把父母關於高考很重要的囑咐告訴他。我特地說：這是一輩子的事兒。

但是，他不大理我，抓着毛驢身上的毛皮騎上去，高高地晃，專心逗那毛驢。我告訴他，報紙包裏是書，還有練習本。他高興了，說正好這幾天沒捲菸紙。我覺得他這麼說是故意的，故意逞「英雄」。

我們都不說話，默默地走。他騎着毛驢陪我走到一個岔路口，已經能看見兩個多小時前我穿過的那片林帶了。他說，另一條路通向屯子裏的碾房。我說，我上你們碾房看看去。他馬上制止我：都是男勞力，你去幹甚麼？

不知道幾點鐘有回城的火車，但是我準備去小火車站等。

很明確地記得，當時就在我的腳下有一墩馬蓮，向陽的一面

有嫩芽正要鑽出土。我對他說，好好複習，時間很緊，別再喝酒等等，全是廢話。我還把母親帶來的錢給他，可能是二十塊。

他一直騎在那匹毛驢身上，無所謂地晃着，很耐心地捋着毛驢透明的薄耳朵。

最後，他問：你去報到了？

我極短促地答應了一聲，然後向着林帶走。一下也沒回頭。

我和弟弟都在長春市天津路小學上的學，學校由日本人出資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曾經叫大和通小學，一直是名校，我們在這個小學分別讀到了三年級和四年級，那時候他成績很好，從來不和壞孩子在一起。下鄉的三年，他不僅學成了菸酒，還越來越內向，小時候甚麼都對我說，後來，他變得話很少，僅限於日常小事，他的性格改變直到今天。

那一年，他考上了大學，但是分數剛够本科綫。

一九七六：初戀敗絮

·唐曉渡·

一九五四年一月生。多年來主要致力於中國當代詩歌，尤其是先鋒詩歌的研究、評論和編纂，兼及詩歌創作和翻譯。著有詩論集《不斷重臨的起點》、《唐曉渡詩歌評論自選集》、《中外現代詩名篇細讀》、《唐曉渡詩學論集》等；散文隨筆集《今天是每一天》；譯有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文論集《小説的藝術》等。主編「二十世紀外國大詩人叢書」多卷本、「當代詩歌潮流回顧叢書」多卷本等；另編選有十數種詩選。

要被「炒魷魚」的消息，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剛過由廠長兼總支書記老段在全廠職工大會上正式宣佈的，根據是紅頭中央文件，甚麼《關於在全國範圍內清退國營企業合同工、臨時工的通知》之類。這噩耗早有風聞，可真等到棺材抬上門，大伙兒還是全傻了眼。有多憋氣就不必説了，更冤的是還沒地方撒氣，因為廠方和我們一樣灰頭土臉。

我們這個廠是從南京遷下來的，雖説當初也過來了些老工人，但一直心思浮動，四年下來，已回去了大半；作為補償，新招收的數百青工已逐步成長為各工種的骨幹力量，撐起了大半邊天，問題是其中大多數恰恰就是文件所針對的合同工，如全部清退，這個廠就會立地垮掉。

全廠籠罩在一派淒慘麻木的氛圍中，連周恩來去世這樣的大事都沒激起甚麼反響。兩天後公佈了第一批清退名單，走人的多原本就家在農村；又過了一個星期，第二批名單也下來了，基本是當年從應屆畢業生中招收的城鎮青年。兩批加起來近一百人，約佔該清退合同工總數的三分之一。剩下的維持廠子的運轉，照那幫正式工的説法，相當於「死緩」。

那年春節過得特沒勁，全家人都對我陪着小心，好像我是易碎

的薄胎花瓶。更讓我鬱悶的是，年前和小S約好初三下午來家裏一起做酒釀，結果糯米飯煮好了，藥引子備下了，卻苦等到天黑也不見人影。那年頭小縣城連公用電話都沒有，只能乾等，一邊等一邊胡思亂想：病了？有急事走不開？相隔沒多遠，怎麼也不過來打個招呼？第二天又白等了一天。本來我也可以去找她，一怕冒失，二是該死的自尊心不答應。三年了，這在我們之間還是頭一次，

挨過初五，到了上班的日子。我和小S上下班同道，平常默契，差不多總能碰上。那天下雨沒騎車，我在路上忽快忽慢，遲遲不見人影，心裏更加忐忑。到了班上，立刻去小S的金工車間，她卻到了，正低頭坐在工具櫃前，似乎在想心事。我有點懵，想想還是自尊心佔了上風，只在她左近晃了晃，確定她看到了馬上走開。

我和小S同是縣中六八屆初中畢業生，她在丁班，我在乙班。她父親曾是我們班數學老師，還代理過班主任。在校時我對她印象模糊，後來插隊三年，相隔甚遠，連面也沒見過。彼此產生好感是進廠一年後的事。她因滾齒機一時未到貨，被配屬到我所在的機修組當「小工」。其時我年方十九，血氣正旺，再加上腦子快，肯鑽研，早早就在同輩中拔了尖。拔了尖意味着有更大的話語權，隨之而來的是迅速膨脹的支配欲，於是幹起活來不免無意識地效仿師傅，頤指氣使，吆五喝六，用不了多久，「怎麼這麼笨」就成了我的口頭禪。也許正是我的霸道吸引了她；；而她之所以讓我屬意，不是因為她在跟隨我的一幫女工中最漂亮 (當然足够漂亮)，而是因為她最清澈，最文靜，從不嘰嘰喳喳；更重要的，是一説話就臉紅。戀情的小火苗一旦從心底呼呼升起，甚麼同學之誼啦，師生之緣啦，也都統統化作了助燃劑。幾個月下來，誰都知道我倆「對上了」。但由於進廠時約法規定三年內不許談戀愛，還由於性格中都不缺少在別人看來是「假模假式」的矜持，我倆竟不約而同地採取了「駝鳥政策」，以保守這公開的秘密。

説來可笑，三年來我們儘管一分開就彼此想得慌，卻連手都沒有拉過，很可點「相敬如賓」的意思。下了班倒是常在一起推車「軋馬路」，但多由我胡侃——我自幼一直隨父母住校園，守着圖

書館，再加上常和幾個「書蟲」切磋，這方面的功夫自是了得——她則安靜地聽着，有時也提個把簡單的問題，與其說質疑，不如說是鼓勵。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也不會正面觸及我倆的事，只有一次例外，那天我侃了一大通，她卻毫無反應，只顧低頭走神。我急問怎麼了，她一怔，滿臉羞得通紅，卻不答。最終實在被逼緊了，才沒頭沒腦悶聲甩出一句：「你真的沒聽說過嗎？」「聽說甚麼？」「女大一，苦滴滴唄。」

下班後照老規矩，我先到一條屬於我們的小馬路，放慢腳步，仄起耳朵。沒多久，身後傳來比平時略顯滯重的雨靴拖地聲。她輕輕一咳，我沒回頭，仍保持原來的速度，兩眼直視前方。她與我僅一肩之隔，步率幾乎一致，但就是不趕上來，顯然也不想先開口。

新鋪的瀝青路面散發着刺鼻的柏油味兒，由於做工粗劣，踩上去有一種不踏實的感覺。天寧寺巨大的陰影壓下來。回家該往右拐了，我轉身往回走，她也跟上來，但仍差那麼一步。氣氛越來越僵硬，我有點慌，不知該怎麼打破這從未有過的局面。天黑下來，隱在法國梧桐中的路燈灑下慘白的水銀光。又飄起了牛毛細雨，且淅淅瀝瀝越來越密。身後嗒地一聲，一柄打開的黃油布傘遞過來，伴隨着一聲輕輕的嘆息。

我接過傘，放慢腳步。傘足够大，能罩得住兩個人，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第一次這麼近地傍着走。雖然隔着厚厚的冬衣，但間或兩肩相碰，仍能感到一種陌生的溫軟。我有點暈眩，克制住突如其來的想摟過她的欲望。

她再次嘆息：「這個春節，我外地的兩個姐姐都回來了，是為了我們的事……」

「是嗎？」我漫應一聲，沒接茬。

「三十晚上開了家庭會……南京的大姐聽了我們的情況倒是沒意見，說只要人好就行。但北京的二姐不這麼看。她說……她說……」她停下來，似乎在積蓄勇氣。

我心跳加速，卻故作輕鬆：「說吧，沒關係。沒甚麼大不了的。」

「簡單地說，她不同意。」她的語氣變得流暢起來：「她說你們想啊，他們家弟兄五個，我們家姊妹六個，雙方父母的工作單位都是清水衙門，身體又都不好，根本沒有力量支持兒女；現在國家是這個樣子，經濟一團糟，眼看着兩個合同工都要被清退回農村，將來怎麼結婚成家？房子從哪裏來？生了孩子誰來帶？這日子，分明是沒法過嘛……」

「甚麼亂七八糟的！」我終於爆發了，把所有的怒氣都發洩在她二姐身上：「說一千道一萬，不就嫌我窮嗎？小市民！虧得還當過軍人呢！」

不能不承認她二姐說的都是實情，問題是此前我從未認真地考慮過這實情，我的心高氣傲甚至不允許我朝那方面想，因此一旦聽到，本能的反應就是立即駁斥，但究竟應該怎麼駁斥同樣沒想過，於是「小市民」就成了最先從我的道德詞彙表中跳出來的判詞。那一刻我甚至想到了保爾•柯察金挖苦冬尼婭的場景。

我的粗暴顯然令小S非常吃驚，也有點生氣：「我二姐根本不是你說的那個意思……」

「那還能是甚麼意思？」我再次以激烈的反問打斷她的話。自覺有點過份，又稍稍緩和道：「行啦，不說你二姐了。你父母是甚麼看法？」

過了好一陣她才應聲：「你知道我爸一直很欣賞你，贊成我跟你好。但現在情況變了……現在……現在他覺得二姐的意見值得慎重對待。至於我媽」，她的聲音低了下去，「你也知道，她總是隨着我爸的。」

「那麼你的三個妹妹呢？」口氣中怪怪的譏誚味兒連我自己都覺得意外。

她卻老老實實答道：「小六子還小，家庭會沒讓她參加；其他兩個妹妹都站在二姐一邊。小四子還說，這下子看他還怎麼驕傲，到家裏來兩眼朝天，除了爸爸，誰都看不見。」

我冷哼了一聲。當初我倆剛要好，這兩個妹妹曾不顧她的搶

奪，在家裏輪流朗讀我寫的第一封情書，讚不絕口，尤其是其中那些詩句。

「好，這些我都可以不管，我們的事，我們自己做主。現在我只問你，」我停下來，轉身面對着她，「你怎麼看你二姐的話？」

她低下頭，兩隻手絞弄着胸前的辮梢，昏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可以察知她的呼吸驟然變得急促。「我……我……，」囁嚅了半天，她終於說：「我覺得爸爸的意見是有道理的……我還要再想想。」

「那你就想吧，想好了再來找我！」我憤然把傘塞到她手裏，扭頭大步離去。

我沒見過她二姐，可對她父親卻知曉多多：前解放軍大尉、縣中最出色的數學老師、多年所向披靡的全縣圍棋冠軍，平素為人寬厚溫和。他的反應讓我困惑，當然最讓我無法理解的還是小S。

當時我們家因子女多被分作三處，我單獨擁有一間豬圈改成的小屋。是夜輾轉難眠，快天亮時我不得不在小本子上嘗試用簡易問答法處理亂麻般的思緒。

問：你愛她嗎？

答：愛。

問：她愛你嗎？

答：當然。

問：那為甚麼會出現當前的局面？

答：因為她太軟弱，就像她母親。

問：在這種情況下你準備怎麼辦？你會放棄嗎？

答：爭取她，和她一起與小市民價值觀鬥。決不放棄。

問：怎麼爭取？有勝利的信心嗎？

答：暫時不知道，看着辦。有信心，但不太足。

「不太足」似乎不妥，有點洩氣，圈掉，隨後改成：「前提是她要認識到自己的軟弱，並向我認錯。」

合上小本子，面對牆上自書的毛澤東聯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我做了個深呼吸。

隨後的十多天我參加了縣文化館和省出版社聯合舉辦的一個詩歌學習班。在這十多天的時間裏，我第一次刻意地與小S保持完全隔絕狀態，再上班後也仍然如此。我的自信和自尊都需要這種狀態。

這樣大概又過了一周。那天下了一場春雪，快下班時車間裏已空無一人，我也收拾好準備回家，忽然透過大玻璃窗看見小S正深一腳淺一腳地過來，心頭不禁一陣狂喜，趕緊迎到門口。不想她見了面臉一紅，眼睛看着地面，遞過來一個折成燕尾的紙條，一言未發，轉身就走。

甚麼意思？有這種認錯的方式嗎？我攥着手裏的紙條，像攥着一個巨大的秘密。去了一趟廁所，回來坐定，這才慢慢打開，只第一眼就知道自己錯了：平時她給我寫信抬頭都稱甚麼甚麼的曉渡，而這次只有光禿禿的「唐曉渡」三個字。時至今日，我還能幾乎一字不差地背出這封信：

「我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樹丫裏長出來的，而是父母生，父母養的；現在既然我父母不同意我們的事，我也沒有辦法。請從今日起一刀兩斷，再也不要藕斷絲連。」

第二天上班，我立即去找她，約好下班一起回家，她紅着臉點點頭，沒有拒絕。那天我們沒有走平時的熟路，而是繞道東郊，那裏行人較少。但談話毫無進展，任憑我怎麼苦口婆心，她只用父母的話搪塞。天黑下來，我們在她家附近的土路上來回推磨。行人越來越少，以至完全絕迹。我又冷又餓，終於失去了耐心：「我看，跟你說得再多也沒用，我也不想成為一塊牛皮糖。還是直接跟你父親談吧。」

「好，好，」她如蒙大赦，「現在各自回家，我幫你另約時間。」

「不必了，就現在。我是說，我要馬上見你的父親。」

她楞住了，借路燈看了看錶，用從未有過的語氣責備道：「現在？你太任性了……都快夜裏十二點了，我父親早就睡下了；再說天這麼冷，他畢竟是五十老幾的人了……」

「不！只談幾句，我不會耽誤他太長的時間。」我堅持着。

「太任性了……太任性了……你也不想想，這個時候你把他從床上拉起來談會是甚麼效果……」

「我不管！今晚必須和他談！」我開始低吼。

又僵持了幾分鐘，她長嘆了口氣，說：「好，我可以幫你去叫……不過咱們說好，是你堅持要這麼做的，後果也只能由你自己負責。」

她家在縣中宿舍，四間平房並排，傍着條小河，左拐再左拐就到了。

客廳門咔地一響，老S似乎一步就跨到了我面前，高大肥胖的身軀帶進一團砭骨的寒氣。

「那麼着急，改天談不行嗎？」他一身改制前的軍官行頭，顯然是慌忙中臨時披上的，皮帽子歪在頭上，棉大衣沒扣扣，手抄在袖子裏籠於胸前，光腳趿着皮拖鞋。他像往常那樣笑吟吟的，卻沒讓我坐，和我面對面站着。

我用最快的速度說明了來意，除了道歉，主要是表明心迹——我愛他女兒。

在此過程中老S臉上一直掛着微笑，兩眼看着我，極其專注的樣子。待我打住，又增大幅度笑了笑，這才慢條斯理地說：「你知道我一直欣賞你，從你在校時起就欣賞。對你和小三子的事，我從一開始就很贊成。本來基本就這樣了，誰也沒有想到情況會發生變化。現在你們都要被清退回去，但生活不存在清退不清退的問題。你可以想一想，我們兩家……」

「對不起，這些小S都給我說了。」我不失禮貌地打斷他，

「再說，情況可能還會有變化，至少最近廠裏沒人再提清退的事。」

「也許我們還可以再看一看，等一等，但實話實說，女孩子，還大你一歲，我們拖不起。我是父親，不能不為女兒的幸福着想。萬一你們被退回農村，別的不說，糖從哪兒來？煤從哪兒來？這些都要憑計劃供應。你們不會總是兩個人吧，有了孩子，你們怎麼辦？」

我盡量克制住怒氣：「不至於吧？不管出現甚麼情況，憑我的能力，大概都不至於混到需要為糖啊，煤啊，這些東西操勞的地步吧？真要到了這個地步，哼哼，」我冷笑一聲，「那就不是我個人的問題了，那這個國家就整個兒都完了！假如整個兒都完了，是不是被清退回農村又有甚麼重要呢?!」

「你……」他笑容僵住，兩頰抽搐了一下，隨後一聲嘆息：「你還是太年輕啊。今天就這樣吧，太晚了。」他完全恢復了鎮定，「甚麼時候你覺得有必要，我們還可以再談。回吧。」

我沒有打探那天深夜突訪後老S的進一步反應，小S也沒提起，這使我有理由認為那次我們是打了個平手，由此雙方，更準確地說，三方之間達成了某種默契，一如清退之事很久沒人提起，似乎我們和廠方之間也達成了某種默契。

四月七日晚，結束了每周三天的「七二一工大」課程，我們正一起騎車回家，全城的高音大喇叭中突然傳出中央台播音員那較之平日格外慷慨激越的聲音，報道說前兩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中共中央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哪有那麼多反革命！」我一邊猛擊自行車龍頭，一邊大吼了一聲，把她嚇得一哆嗦。分手時她一反常態提前下車，低聲說了一句令我至今難忘的話：「以後說話注意點……萬一出了事，叫我怎麼辦！」

那年初夏，我們家搬到了我父親新調的單位。剛剛住定，唐山就震了個稀里嘩啦，而據來自官方的消息說，我們這裏短期內也將

發生七點五級左右的大震，於是防震抗震成了生活中壓倒一切的大事。可期待中的地震卻惡意沉默着，躲在一個莫須有的地方躬身伏腰，就是不見動作。

臨時防震棚要改建成半永久的。父母考慮到我們家五條虎，人手多，而她家清一色女孩，連聲催我去幫忙。無奈，只好向父母說明真相。二老對視了一眼，一致以為橋歸橋，路歸路，既然還存在這層關係，那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即使被拒，也可求得個心安。「再說，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你挺身援手，本身就是一種態度，火燒眉毛，老S大概也是求之不得吧。」說給小S應了，隔天一早，我自帶工具上門，那邊的老兩口果然滿臉欣慰，一個充任下手，一個忙着端茶倒水，不時遞上擰好的毛巾，四個「娘子軍」也跟着團團轉。黃昏時大功告成，我婉言謝絕了老S留飯的邀請，凱旋而歸。

是不是七六年最後一場大雪？記不清了，總之是白天白地白睫毛，一離開大路，就陷入半膝深的雪窩裏。我抄近道跌跌撞撞直撲我家「穹廬」。

十米龍門鉋上馬已有一段時間了。這在我們廠是項大工程，為此機修組升格為大組，直屬生產科；我則被任命為大組組長，主持這一項目。按條例主持這樣的項目得具有五級鉗工的資歷，而我不過是一個尚處在「清退」陰影下的合同工，自是特別體面光鮮。開工時舉行了小小的儀式，總也黑着臉的廠長老段露出難得的笑容，講完話還特地走到我跟前，狠狠拍了拍我肩膀。

「穹廬」是我們家防震棚的別稱，以數十根粗竹竿結成拱形骨架，以纏上稻草的蘆葦築牆，再覆上油毛氈。裏外兩間，一家七口，吃住都在其中。因搬家後離廠近了，我中午也常回來「蹭飯」。

掀開棉門簾，一股紅燒羊肉的濃香撲面而來。這是我今天回來的理由。可為甚麼空氣有點沉悶？為甚麼以父親為首，所有的人都繃着臉，全無平時飯桌上那種熱鬧氣氛？更奇怪的是，為甚麼自小就不甚待見我的外婆，居然前所未有地親自到裏間為我盛飯？

「不着急……你爸説吃了飯再説，」外婆一邊盛一邊對滿腹狐疑跟進來的我叨叨，忍不住又加了一句：「……還是黃啦，人家來了信。」

「甚麼黃了？誰來了信？」

「還能有誰？S家唄。」

我回到外間，兩眼盯住父親問：「聽説老S有封信？」

「吃飯吃飯，天大的事也等吃了飯再説。」 父親敲了敲桌子，顯得煩躁不安，這在他是極為罕見的。

「不！」我沒接外婆遞過來的碗，仍然盯着父親，「不先看信我就不吃飯。」

父親跟母親對了對眼，從外衣口袋掏出一個紙條，也是折成了燕尾形。

信是老S寫給父親的，不長，大意是説您是本地教育界公認的忠厚長者，一直很敬重您，本來可以指望結成兒女親家，以加深情誼，不想如何如何，以致如何如何。最後一句我永遠也忘不了：小女已另有所許，特此奉告。

我把信撕得粉碎，擲在地上，轉身衝出門外。

等我稍稍清醒過來，發現自己正坐在鉗工台前發傻。

「小女已另有所許！小女已另有所許……」心裏反復念叨的只有這句話。台子上有一根折斷的鋼鋸條，我用尖角扎了扎掌心，錐心的疼。前兩天送一批零件給小S加工，她不是還表現得很正常嗎？怎麼突然就變了，一點迹象都沒有？

渾身躁熱，我脱掉棉襖，拿起加工了一半的平面導軌部件，塗上紅丹，到作為基準的大平板上磨了，再固定好，取來合金鏟刀，吭哧吭哧鏟起來。

身邊有人影晃動。抬頭一看，是笑眯眯的政工組長周成敏。我因常被他抓差，既是大批判組成員，又是宣傳欄主力，和他熟得很，沒心情理他，又埋頭幹活。

「怎麼，小伙子，失戀了吧？」

鏟刀停頓了一下。

「行啦，想說就說，想哭就哭。告訴你，我剛剛見到你母親。她怕你太受刺激出事，一直跟在你後面，眼見你進了車間，這才去找我。情況我都知道了。你放心，這件事組織上會出面，幫你們調解。」

「謝謝組織上的關心，」我慢慢直起腰，聲音聽起來變形得厲害，又冷漠又尖厲：「但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就不勞組織上費心了吧。」

「那不行！」想不到他居然抖起了政工組長的威風：「你倆都是團幹部，傳出去影響會很壞。都談了三年多了嘛，廠裏差不多人人都知道嘛，說斷就斷啊？這事你就別管了，等通知吧。」

下班恍恍惚惚回到「穹廬」，直接把自己扔到了裏間床上。昏暗中母親輕手輕腳走進來，先摸摸我的額頭，這才開燈，坐到我身邊。

「知道老S替小S找了個甚麼人嗎？」

我嗯了一聲。

母親慢慢俯下身，低低說出了一個名字。

我猛地坐起來：「真的嗎？」

「錯不了，是向老S的好友黃老師打聽來的。」

天哪！我忍不住在心裏大笑，可湧出的卻是止也止不住的眼淚。我所笑者是自己，所哭者也是自己：唐曉渡啊唐曉渡，你竟然就被這樣一個人輕易取代了！

兩天後的下午，組織上真的出面了。我拗不過，來到廠總支辦公室。小S已坐在正對大門的椅子上。我的視綫漫過去，未能碰上她低垂的目光，只看到她臉漲得通紅，連脖子都紅了。幾天沒見，她從形到神似乎都發生了某種變化。

「怎麼樣，這就開始吧。「代表組織出面的，是分管工會和

共青團的總支副書記周蘇珍。她是早兩年作為工人代表突擊提拔上來的，綽號「能豆子」，而她的大臉盤上也確實綴滿了大大小小的青春痘。由她出面說來名正言順，但她真有這份心嗎？看她那臉假笑，眯縫眼閃着幸災樂禍的碎光。

「今天算是調解會，體現了組織上對你們兩個團幹部的關心。具體情況就不說了，先聽聽你們各自的看法。誰先來？」周副書記殷切地看向我。

當然是我先來。我在沙發椅上擺出盡可能放鬆的姿勢。我說我只有三句話：第一，因個人的事麻煩組織，不安，感謝；第二，此事到此為止，各自回去，安心本職工作；第三，祝小S幸福。

「完啦？」周副書記顯然不滿意。

「完了。」

「那麼你呢？」周副書記轉向小S。

直到這時，我才看到小S的黑眼圈和腫眼泡，心突然抽搐了一下。母親英明，她是怎麼說的？「知道老S替小S找了個甚麼人嗎？」對，「替」——這就是全部問題的核心！

「我……我……」她「我」了好幾次，終於說出一句，「反正我和他之間沒有……那個。」

周副書記咯咯地樂，我卻完全懵了。我當然明白她說的「那個」指甚麼，但幹嘛在這樣的場合說這個？

(直到兩三個月後這疑問才有了解。那次我和金工車間書記老秦一起去馬鞍山出差，他也當過我們的書記，關係不錯。晚上在小旅館關了燈難免胡扯，他突然問：「聽說你和小S吹了？」我含糊應了一聲。「你啊，真是笨！」他從床上欠起身子：「當初你要是先把她幹了，就沒這麼多麻煩了。」黑暗中我驚得目瞪口呆，心口咚咚亂跳，那個「幹」字似乎一下子蹦起來，孤零零、亮晃晃地懸在正前方。張惶之下我只能問：「為甚麼呢？」「你啊，真是不懂女人！」他嘆息道：「你把她幹了，她就死心塌地跟你了。」)

又過了好一會兒，小S才憋出第二句：「反正……反正我一輩子都不嫁人。」

眼看她不會再說甚麼，周副書記重新轉向我：「對這兩條你還有甚麼要說的嗎？」

我搖搖頭：「一輩子不嫁人就不必了吧。古人說『三步之內，必有芳草』嘛。」這是那天我說的最無聊的一句話。

「那就是小S同志的個人自由嘍。」周副書記笑着站起來：「如果沒有別的要求，今天就先到這裏。回去各自再多想想……」

「我有一個要求，」我仍然坐着，但舉了舉手，「我想請小S帶個口信給她父親，我要再和他當面談一次。」說完緊緊盯住她的眼睛。

「行，我會帶這個信」，想不到她的目光卻迎上來，甚至神情也變得活躍，「父親說，我們家的大門永遠都對你開着。」

周副書記一臉迷惘：「那你們自己決定吧。」

原本放在右側靠沙發的長茶几被挪到了客廳正中，兩邊對放着兩張椅子。而面南的那張沙發椅居正中，是主座；面北的那張木椅稍稍偏西，角度也略斜，當然是客座，並且是晚輩的客座。客座前茶碟上放着蓋杯，茶顯然已泡上，此外還有瓜子水果之類。看來老S對這場會面準備得不可謂不精心備至——他居然不顧天冷，象徵性地敞着客廳大門。

我進來時他已坐在主座，站起來，滿臉堆笑，隔着茶几向我伸出大手，連聲表示歡迎。我注意到他還是去年那身行頭，只不過披着大衣，皮帽沒繫帶子，護耳向兩邊軟軟耷拉着。

我略顯生硬地和他握了握手。引我進來的小S悄悄退去，順手帶上門，空蕩蕩的客廳只剩下我們倆。

賓主落座。他神色有點尷尬，語調卻够誠懇：「小三子說你想見我，很好，很好。我讓她帶話說，你永遠都是我們家最受歡迎的客人，想必已經帶到了。」見我點頭首肯，又接着說：「這……這

事雖不得已發展到這一步，但感情這東西，該在它還是在。你和小三子不必說了，她一直很喜歡你；就說你我之間，也總有一份師生之情吧……」

「是。」見他略有滯澀，我立即接上茬：「您過去是我的老師，現在是我的老師，將來以至永遠，都是我的老師……」

「哪裏哪裏，」他雙手齊擺：「你年輕有為，前程遠大……」

「不過，」我話鋒一轉，「所謂老師，無非是說為人師表，學習上如此，生活中也當如此。可在我和小S這事上，照做學生的看，您恐怕還真不能為人師表呢。」

他臉色猛地沉下來：「這個……我記得跟你說過，作為父親，我不可能不為女兒的幸福着想。」

「是嗎？」我的口氣變得尖刻：「您真的是為你女兒的幸福着想嗎？別的不說，就說您給我父親寫信這件事，您似乎忘了，是您的女兒而不是您在跟我談戀愛；如果她真想跟我斷，應該是她自己給我寫，為甚麼要由您來寫，而且是寫給我父親呢？她委托您了嗎？假如沒有，您就連對女兒最起碼的尊重都談不上，還談甚麼為她的幸福着想？」

「你……」他身子往後一仰，似乎要發作，卻又克制住，重新往前湊過來。他語速本來就慢，這時就更慢了，「看來，你今天不是來和我談話，而是來抬槓的？」

「抬槓？您太客氣了！」我在心裏大叫一聲，「說白了，我今天就是來討還羞辱的！」那天在調解會上一見到小S ，這想法就冒了出來；等到結束我提出要見她父親時，則已下定了決心：您不是喜歡「替」女兒做主，或自己做主「替」掉女兒的意中人嗎？您不是非但「替」女兒甩掉我，還繞開我，用我父親來「替」那繞不開的難題嗎？您不是擅長迂迴突襲並自以為得計嗎？那好，就讓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動用一下您身上的「可替性」，請您「替」那些不懂得尊重兒女感情自主、婚姻自主權利的人，「替」那些只認得自己的意志，認不得他人 (尤其是親人) 痛苦的人，並且

同樣經由被迂迴突襲的方式，嘗一嘗被「替」的滋味吧。您已一再羞辱我，大違師道，那就請成全我一次「學」生之道吧。我料定面談的請求不會被拒絕，一直在心裏反復演練可能的局面和相應的對策，以確保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在我看來，關鍵在於要引他發火，那樣他將自取其辱。看來時機快到了，我決定再刺激他一下。

「聽說老師以前很喜歡看戲，」我也故意把語速放慢，「那麼，《馬前潑水》想必是看過的嘍。」

其實這齣戲我也沒看過，只不過偶爾聽父輩談及，略知梗概而已。劇中主人公朱買臣做官前被妻子劉氏及其父劉二公認定碌碌無為，竟至强索休書；做官後劉氏父女卻又攔住他馬頭，死乞白賴要重續前緣。朱無奈之下，命劉氏取來一盆水潑於馬前，稱再續前緣不妨，只要她能把地上的水再收回盆中。說來劇中情節與眼前的局面並不那麼貼切，但對我來說已不重要；我報復心切：若他熟悉此戲，從劉二公的形象中認出自己，且被「覆水難收」的警喻所傷……

居然讓我歪打正着！他呼地站起身來，一把扯下皮帽子摔在茶几上，聲色俱厲地大吼：「唐曉渡，我知道你很聰明，但還輪不到你來教訓我！」

話音未落，只聽得隔壁一陣響動，夾着低聲呼喝。想必是小S和三個妹妹(或許還有她母親) 躲在那邊偷聽，耳聞父親怒吼，以為我們要動手打架吧。

我穩穩地坐着，直視他，聲音足够平靜也足够强硬：「我教訓您甚麼了，S老師？請您不要激動；要說激動，我比您更有權利激動！」

後半句提醒他身為師長太失態了。他一楞，意識到這一點，揀回帽子，撣了撣，扣回汗氣蒸騰的頭上，喃喃道：「好，好，我不激動……我不激動……」坐下，直喘粗氣。

我盯着他那顫動的護耳看了幾秒鐘，自覺時機已經成熟，復仇的快意提前充滿胸臆。

「時候不早了，我該回去，您也該休息了。」我刻意讓口氣變得更加平靜，「只剩一件事：這幾年我和小S之間通過不少信，也互贈過書本之類的禮品，這些我想就根據各自意願處理吧，退來退去沒多大意思。但，有一件東西我今天必須帶回去。」

老S揚了揚眉毛：「甚麼？」

「那盆水仙。」我一字一頓。

正如我所預期的，他的臉頓時脹成了豬肝色！那盆水仙是一個多月前他母親，也就是小S的祖母去世時我送來的。水仙既能寄托哀思，又能表明自己的尊嚴，我想老S必能理會其中意味；索回這盆水仙，肯定會在情感上對他造成重大打擊。

現在他只有一個選擇：趕緊結束這場噩夢。他剜了我一眼，搖晃着再次站起來，對隔壁喊了一嗓子：「小三子，把那盆水仙拿過來。」

看到她端着花盆進來，滿臉淚痕，兩眼又紅又腫，我百感交集，一時差點不能自己。我接過花盆，走到門口，又回過臉，像背台詞一樣，對她，對老S，同時也是對自己，說出蓄謀用來壓軸的最後一句話：

「這樣一個家，是只適合養牡丹，而不適合養水仙的。」

前後也就半個來小時，老S彷彿老了足足五歲。他不再出聲，只舉起右手，手背向外揮了揮，樣子疲憊已極。

跨出門外，突然四周一黑：那年頭經常停電，難得的是這麼湊巧，像是壓哨球。待眼睛適應過來，首先顯影出來的是河對岸的皚皚白雪，由近及遠，漸趨模糊，襯着幾叢黑乎乎的樹林和低矮的房屋剪影；極目處又反捲回來，成為泛着灰白反光的天空。

拐上大路，我停下腳步深呼吸，這才發現心裏空落落的。忍不住回頭，除了雪光下淡淡的路影和一隻倏忽閃過的黑貓，我甚麼都沒看到。

一九七七年五月，拖了整整一年半的合同工清退問題終得解決：集體轉正。這樣的好消息，合同工們卻反應平平，至於我，更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恢復高考，年底，我被南京大學中文系錄取。報到前一天專門回了一趟廠，說是和幾個哥們兒道別，其實只為站在金工車間門口，遠遠瞥一眼小S。據她母親後來對人說，她知道我被錄取的消息後在家大哭三天，痛責其父，又過了七天終於鬆口，同意與「替」下我的王某結婚。此人肄業於揚州駕校，算大半個中專生，輾轉插過隊，替下我時正在縣人民醫院當司機。其時司機是吃得開的行業，老S看重的是他可為小S提供「幸福」的保障。據我所知，小S婚後一直波瀾不驚，至今仍和王某帶着一對兒女相守在一起。

一九九〇年廠裏的鐵哥們兒之一來京，一來二去說到小S。這位老兄六七屆高中生，在當時我們這批合同工中年紀最大，也最有學識 (至少他自己這樣認為)，性格深、細、怪，尤不喜理人，是個真正兩眼朝天的主兒 (於是只好去圖書館獨當一面)。據他說，我在廠時，小S跟他連一句話都沒說過，我走後卻成了他的常客，直至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你說怪也不怪？」我一時無語，然後問是否曾經談到過我。「不，她從不談你。我也不談。」這哥們兒壞笑着說。

一九九一年秋應邀回母校參加五十周年校慶，在會場與老S窄道相逢。握手，裝做甚麼都沒發生過。畢竟曾師生一場，而他十五年前給我上的最後一課讓我受用終生——雖說最終打了個平手，但他還是暗中修理了我。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每當自命不凡的意識抬頭，就有一根弦被嗡地敲響：狂甚麼狂！別忘了，一個汽車司機就把能把你給「替」了！如今我早已成為公認的「好脾氣」，很可能，如何保護好皮囊下僅存的幾塊傲骨，會成為我後半生最重要的事業。

二〇〇六年初夏，母親在一次通話中順便說到老S去世的消息。我嘆了口氣，不知為甚麼，心裏卻滿是當年小S在雪地中深一腳淺一腳走向我的身影。

2008年9月30日

鷦鷯巢於這一枝

·寶嘉·

漢族，北京市人，一九六七年初中畢業，去過農村，當過工人、警察和律師。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莊子•逍遙游》

關於七十年代的記憶是一本未曾裁開頁子的舊裝書，塵封在心的一隅，一直不想打開，不忍打開，也不敢打開。

一

一九七〇年春節過後，我又一次來到蘭州。

蘭州對我來説並不陌生。五歲時，父母隨着支援大西北的大軍到蘭州時我就跟着來了。我記憶中的躍進秧歌和鑼鼓就是和蘭州聯繫在一起的。九歲，即使父母是雙職工、鐵路局的幹部，也到了家無隔夜糧的地步，於是我和哥哥被送回北京住在爺爺家。那是一九六〇年。

而這次回來我已經十九歲。經過內蒙 — 河南 — 山西的輾轉流離，縱然仍有「千秋懷，一枝筆」的豪氣，也覺得該為稻粱謀了。抱定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決心，我在六月中旬乘上了磚廠招臨時工的大卡車。

磚廠在蘭州的最西端，距城區有三十多公里。再往西是山，山那邊是皋蘭縣，人們管那裏叫北山。北山很窮，每到青黃不接的時

節總會有人翻過山來行乞。在西北，一切與地理有關的概念都是狹長的：甘肅的版圖像一柄如意，或者一根大棒骨；蘭州是兩山一河綿延百里的帶狀城市；而我們的廠區是九公里長兩公里寬的狹長一條，東西向，也是依山傍水。那山叫鳳凰山，山上只有裸露的黃土和稀稀拉拉的駱駝刺；那水是黃河，緩緩地在廠區南邊的坡下流淌。

我被分配在七連。那時全國上下都興軍事化的編制，七連其實就是七車間。每個車間有一座大輪窰，製磚所有的工序都是圍繞着輪窰進行的，輪窰是車間的靈魂。

輪窰據説是從德國傳進來的，發明人叫霍夫曼，所以輪窰又叫霍夫曼窰。俯視輪窰是個巨大的橢圓，立剖面則是梯形，窰裏那一轉圈都是相通的，被二十四個窰門等分。進到窰裏，一股燎人的熱氣撲面而來，地面上一層綿綿的熱灰燙得人要把兩隻腳來回倒着站。

製磚的流程從掘土開始。工人們先在厚厚的土層上打眼，埋炸藥，把土炸鬆，然後用手推車把土推到製磚機的入口，在那裏按一定比例加入煤粉，用輸送帶運進攪拌機，和成泥，擠出來，就到了切坯台上。操控切坯台的通常是位姑娘，她照看着鋼絲刀把泥條整齊地切成二十一塊磚坯，一排排碼在切坯台前面的板子上。七塊板子為一車，由拉坯工人運到露天的坯架，讓等待在那裏的女工們碼放。

坯架很長，很遠，在藍天下延伸，有時一直到河邊。女工們兩人一組，由遠而近地把磚坯碼成三塊一層、七層一垛，讓它們自然晾乾。剛出機房的磚坯冒着熱氣，深棕色，表面光滑滑的，像新蒸出的食物一樣新鮮溫暖。濕坯每塊重七斤，碼坯子每次抱三塊。一台磚機日產十萬塊，如果碼坯子的女工有十人，那每人每天過手的重量就上噸。汗水浸透她們打着補丁的再生布工作服。沒有拉坯車來的時候，她們就坐在身後的草簾子垛上，毫無顧忌地大聲説笑着昨個夜裏的如何如何。那些草簾子用來遮蓋碼好的磚坯，上面還要壓一層瓦，為的是防雨。夏天碼坯子會使人想起白居易《觀刈麥》中的詩句：「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機房有時候還要組織「放高產」，從天不亮一直幹到夜半時

分，日產達到十幾二十萬塊磚坯。「放高產」雖然累但是吃得好，有羊肉泡饃，釀皮子，炸油餅，有時還會燉肉。加上那時候年輕體力好，所以也沒有太覺得吃不消。

乾透了的磚坯由裝窰工拉進窰，從下到上碼好。最底下一層的磚坯像腳一樣立着，那叫「打腿子」。拉坯的人像拿着兩本書那樣，書脊對着書脊地把磚坯拋向碼窰師傅，磚坯像兩隻蝴蝶那樣飛到師傅面前，就這樣向上一直碼到窰頂。碼窰最要緊的是腳下要有「根」，站住一個位置就只能轉身不能移動，因為碼好的磚坯像搭好的積木一樣是中空的，一腳不慎就有可能全窰皆塌。每裝到一個窰門時有個跟班的中年女工把門用碎磚砌起來，外面用泥糊好。

燒火的人居高臨下地站在窰頂，提拉風閘，從窰頂的火眼向下投煤。這是個技術活。燒窰師傅姓李，慈眉善目，天水人。我們每天從食堂買來饃饃交給他，他幫我們放到火眼上烤，烤出厚厚的脆脆的一層饃皮，那味道真能把人給香死。「打鐵、燒磚、磨豆腐」是常言說的「三大苦」。磚廠的活算得上體力勞動中的重中之重，無論男女老少一律吃五十二斤的定量，百分之七十是細糧，還有百分之三十是粗糧。我們這些新來的女工一般吃不了那麼多，就把粗糧剩下，按照二比一的比例去和農村來的合同工們換細糧。這個定量我一直吃到回北京，吃到取消糧票。糧食定量高，飯也就做的不那麼秀氣了，食堂蒸的饃饃半斤一個，沉甸甸的，橢圓形。我學着當地人的樣子，用手掰成一小塊一小塊地往嘴裏放着吃。「不可以張開大嘴去咬，饃饃怕哩！」同宿舍的小謝這樣說。她有一種泛靈論的宗教傾向。

燒好的磚，要先打開窰門晾，再由出窰工人拉出來。所謂輪窰，就是在二十四個窰門裏，一門趕一門、一圈又一圈地向前燒，從開春一直燒到立冬。

那時候講抓革命促生產。白天促生產，晚上抓革命。每晚車間都要在飯堂裏組織開會和政治學習。人們洗去一天的勞頓和灰塵，換上乾淨衣服，提着馬扎或者小木凳，互相招呼着朝飯堂走去。青

年女工們把臉洗得乾乾淨淨，換上一身簇新的再生布工作服，領口露出水紅天藍杏黃或者蘋果綠，也許是襯衫，也許只是個假領頭，手裏拿着毛綫活計，或者正在納的布鞋底。男工們最正式的衣服是黑條絨的中山裝，硬撅撅地箍在身上，領口上縫着一條已經有些發黃的白色襯領，看上去很莊重，莊重之中又有些許靦腆。

老工人都喝磚茶，茯磚。外形像磚，色澤黑褐，滋味醇厚。茯磚是產於湖廣而盛行於陝甘寧青新的重要飲品，也是這粗獷高原與婉約江南的有限聯繫。老工人們説「一日無茶氣不通，三日無茶要生病」。所以他們每天開會前必用特大號的搪瓷缸子在爐火上將茶煮沸，端着向飯堂走去。這裏的男人們也會編結毛綫，勞保手套是捨不得戴的，攢起來拆了結綫褲。於是經常看見有人在開會的時候把已經結好的一條褲腿搭在頭頸上，手裏飛快地結着另一條。開會學習其實是一件快活的事，上面坐着的人讀報紙，下面聽着的人一邊手裏忙活一邊説着家長里短，有時還抑制不住地發出歡快的笑聲。有一段時間應承讀報差事的是我，因為整個連裏只有我一個人説普通話説得好，而且念起報紙來不打磕巴。也有的時候會組織討論上面發下來的題目，比方從哪裏發下來了一些案例，讓我們發揚人民民主專政，討論如何量刑。其中一個人偷了一輛自行車，大家眾口一詞地拖着長聲喊道：「槍斃~~~！」另一個案例是叔嫂通姦，聽眾們就更快活了，齊聲高叫：「槍斃！槍斃！槍斃！」反正大家都不認識這些人，也不認為我們的意見對專政這些人會起甚麼作用。

還有唱歌。一般在會前唱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由民兵連長起頭。有一次他這樣起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預備——唱！」於是大家跟着唱。唱完這一句，卻怎麼也沒辦法再往下唱，又都不明白問題出在哪裏，反復幾次，才恍然大悟是把「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這第一句給忘了，爆發出由衷的哄笑。

革命，有時候就是一場娛樂。

時間一長，和連裏的工友們慢慢開始熟識。一個連隊有百十口子人，除去幹部，大致可以分成老工人，臨時工，合同工和學徒工這幾部分。老工人一般是在六十年代從農村來磚廠工作的，工資往往是四級，每月七十元；臨時工來自蘭州市區，一般女工是二級每月四十三塊七，男工是三級每月四十七；合同工來自附近的榆中等貧困縣，普遍是三級；學徒工則是直接從學校分配來的，現在想應該是所謂「新三屆」。學徒工的工資雖然不足二級，但在工廠裏相對是嬌生慣養的貴族，因為他們是按國家計劃招的固定工，全安排在機修、電工等技術工種。不久，廠裏成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排演全本的革命現代京劇《海港》，這些人幾乎全數進了宣傳隊，再後來又幾乎全數進了機關當幹部。我那時候的月工資是四十三塊七，我的理想是將來能够掙到七十塊。

老工人中蘭州本地人很少，大多數是從全國各地來的，按照地域形成不同的「族群」。機房的工段長 (那時候叫排長) 羅來福是安徽宿縣人。據《宿縣地區勞動人事志 (一九九一年徵求意見稿) 》的記載：由於在黃泛區中受災最重，加上淮海戰役在宿縣打了一場大仗，解放初期當地的社會就業壓力很大。一九五〇年當地政府先是組織生產自救，然後又在一九五三年請求蘭州等地的大型企業到宿縣招收了一千餘名工人，安置在一五計劃重點項目蘭煉、蘭化等基建施工和建材行業，隨之牽動了近萬名宿縣人前來依親就業和依親供養。大躍進時，宿縣勞動局再次組織了數千名移民到蘭州及以西地區支邊，之後的大饑荒中有更多的人前來投親靠友，終於形成了至少有三萬名宿縣人在蘭州 (以及河西走廊一綫) 定居的局面。我覺得羅師傅是災荒之年來蘭州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他的兒子小名叫「蘭州」，一九七八年我回北京後「蘭州」到北京來當兵還來看過我，那時候他不到二十歲，應當是一九六〇年前後出生的。

我碼坯子的師傅姓楊，甘谷人。現在想起來她當時不過三十出

頭，生着一張俏臉，那眉眼像極了影星周迅，只是沒有周迅的精靈古怪。楊師傅兩口子都在廠子裏上班，愛人是機修車間的老工人。像她們這樣兩口子都在廠裏上班的老工人一般住在家屬院。家屬院大多是睡炕的，所以她和其他住家屬宿舍的女工每天下班時經常捎帶着挾一捆破草簾子或者其他可燒的東西回去「填炕」。「填炕」在這裏不僅指動作，也指所有的可以填放在炕洞裏把炕燒熱的物質。冬日的黃昏，當夜落下帷幕的時候，小村農舍般的家屬院就籠罩在濃濃的煙霧和淡淡的哀愁之中，讓人無端生出對「歸宿」這兩個字的嚮往。在楊師傅她們的衣服上經常有「填炕」的氣味，至今我都覺得那種氣味很親切。

和我一個宿舍的小謝是蘭州人。人們議論說她的丈夫在「一打三反」中因為甚麼罪名被抓起來了，她才出來幹這個活。她的衣着很講究，下班後穿一件墨綠色的毛嗶嘰上衣和有褲綫的褲子，的確良襯衫的白領子總是豎着，顯得與眾不同。不知為甚麼她的兩個孩子都管她叫姐姐而不叫媽媽。每當想到她的時候我都會記起那個五歲的、長着一雙圓眼睛、留着娃娃頭的小姑娘從遠處向她飛奔而來，大聲地叫着「姐姐~~！」小謝是回族，她的女兒叫索非亞。

喜兒就是那個坐在切坯台後面的姑娘。「好姑娘啊！」人們都這樣說。她家在蘭州城裏，長着瓜子臉，單眼皮，眉毛和眼角微微向上挑着，臉龐上總是洋溢着笑意，「巧笑倩兮，巧目盼兮」，活脱就是她的寫照。喜兒自幼就有一個耳朵是聾的，所以和她說話要格外大聲，她也會大聲地向人問話和答話。喜兒很勤快，每天她都早早地來到機房，給機器膏油，擰鋼絲。擰鋼絲也不是件簡單的事，兩端的環套一定要擰成麻花狀，這樣才能有彈性，不容易斷。開工了，她把長辮子盤在頭上，戴一頂工作帽，腰肢像鼬鼠般靈活，神氣活現地坐在切坯台後的高椅子上，擋泥條，踩機關，掛鋼絲，眼疾手快。拉坯子的小伙子們把磚坯一車車地拉出去，又趕快拉着空車子回來，坐在架子車的支腿上捲一支煙，排隊等着拉下一車。他們看着喜兒協調而優美的動作，有時候就忘了往前走。

有個叫老未的合同工，開始每天早早地到機房來幫着喜兒擰鋼絲。起初他擰出來的鋼絲兩端不是麻花狀，而是一根纏繞在另一根上。喜兒看了一眼，笑得一雙眼睛成了月牙兒，用手在老未的背上打了一掌，叫道：「錯了呦，不是這樣！」老未其實並不老，身材很高很健碩，頭髮烏黑打鬈，濃眉下一雙眼睛的顏色很淡。「色目人」。我第一次看到他時冒出這樣的念頭。因為喜兒，工友們都玩笑地管老未叫「大春」。

有一天午飯後喜兒老半天都沒有來上工，誰也不知她去了哪裏。羅排長氣急敗壞地自己坐在切坯機後操作。我們碼了好幾車坯子時喜兒從坡底下走上來了。她走到我的坯架子旁，我看到她的臉色格外紅潤，眼睛格外明亮，她對我說：「我們，那樣，真好啊。」我至今都不知道她說的「那樣」是哪樣。不久後的一天，晚上我們在飯堂學習的時候，民兵連長帶人把老未從喜兒住的宿舍裏綁了出來，說是當時兩個人都只穿着內衣。再後來喜兒不來上班了，聽說嫁了人，而老未從機房被發配到了窰上。

三

我進廠不久就被抽出來在車間脱產搞宣傳。我的第一個作品是按照連長的要求在連隊的大門上掛上「工業學大慶」的標語。大門是用盤條焊的高大的拱門，我找了幾個廢棄的汽油桶蓋子，用黃油漆塗成黃色，再用紅油漆寫上工業學大慶，下夜班的窰上師傅們幫着我把它們固定在大門上。那時候我已經讀過很多書，思考過許多問題了。比如我知道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說法，像磚廠這樣的生產方式應該叫「工場」而不是「工廠」；我還想到過大慶模式在工業系統並不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這類思考在這裏找不到受眾，而寫大標語要比碼坯子輕鬆許多。除了寫標語我還用了很多油漆刷紅了一排房子的整整一面山牆，在上面畫了兩組很英武的工人。我的繪畫作品至今想起來都讓我無地自容。廠裏過一段時間就

會開一次大批判會，連裏就讓我寫大批判稿，批判並不認識的其他車間的某個人。發言一般是連隊的領導照我的稿子到會場念，他們經常會念錯字，好在沒有人仔細聽。

終於有一天我的好日子結束了。

那天連長到廠裏去開了會，回來後就召集了一些人關着門嘀嘀咕咕，再後來我看到脱產的學徒工、車間團支部書記小房關着門在寫大字報，他把自己的宿舍騰空，那些大字報後來就集中張貼懸掛在他的宿舍裏，密密麻麻，鋪天蓋地。也真是很難為他寫了那麼多毛筆字。那間宿舍就在我的隔壁。他們先是組織工友們去看，後來連裏的政工幹事出面把我也叫過去看。大字報的內容很聳人聽聞，嚴正追究我和某個組織的關聯，但我反倒坦然了。因為參加一個組織恐怕是要填表的，而我從來沒聽説過那個組織，更沒填過任何加入甚麼組織的表。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北京的清查「五一六」波及到我。因為北京不斷來人到廠裏找我外調，有調查清華大學徐一飛的，有調查三十五中郝仁的，還有調查學部馮寶歲的。廠裏對出了我這麼個重要人物受寵若驚，也對這些外調應接不暇，索性讓我停職寫材料，在宿舍裏關門閉窗地寫，不能隨便出門，也不能隨便會客。好在並沒有熟人到那地方去找我。也許是因為文革時我年齡還比較小對許多事情沒有更多的理解，所以記憶中的片斷往往不干政治底事。對徐一飛，我挖空心思也沒想起甚麼有揭發價值的綫索。郝仁倒是讓我想起一條，因為我聽説過他想當電影演員，於是心一橫揭發了。在那個年代，想當電影演員不能説不是罪過，橫陳在我們這些人面前的大路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他這是在對抗上山下鄉運動。

馮寶歲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是我母親解放前在貝滿讀中學時的閨中密友，後來又在北大先修班成為我父母共同的同學，再後來一起去了解放區。文革時她是學部資料室的俄文翻譯。我的父母工作都不在北京，寶歲阿姨就成了我的「在京監護人」，這在我檔案中是有記載的，如同血緣關係一樣不可否認。文革開始，寶

歲阿姨收留我住在她家，她是長輩更是我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和她的女兒劉鋼劉陽親如姐妹，對她和劉山叔叔的感情不遜於對我的父母。一九六八年十月，她被學部的另一派羈押，十一月中旬被毒打致死。劉鋼對我說，那天媽媽去學部上班就沒再回來。知情人說那些人要她脫掉毛褲，然後帶到法學所，一共有十四個人參加了對她的毆打，她的一條腿當即被打斷，她扶着牆站起來舉着毛主席語錄對那些人說「要文鬥，不要武鬥」。而在這之後，他們把一塊木板壓在她胸口，幾個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臟破裂而死。寫到這裏我的心又痛如刀割。寶歲阿姨當時的「罪名」是「五一六」，而且是「五一六」的組織者之一。因為劉山叔叔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又住在外交部宿舍，所以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有大批外交部的幹部受到她的牽連，據說符浩大使的夫人焦玲就曾經交代說馮寶歲發展她參加了「五一六」，還填了表。我對專案組坦然承認與寶歲阿姨的關係，但是再怎麼施壓我也無法提供他們需要的那些子虛烏有的證言。這是我的底綫。

坊間一直流傳說馮寶歲有兄弟姐妹六人，分別以中、華、民、國、萬、歲命名，其父是華北地區有名的大商人，在《毛澤東選集》的註釋裏都有記錄，說這些是她挨整 (一說是自殺) 的緣由。去年我在《隨筆》中讀到邵燕祥老師的一篇文章也如是說，尚未能找到機會向他澄清。馮家其實只有四個女兒，分別為馮寶中、馮寶國、馮寶萬和馮寶歲，四姐妹都參加過學生運動。寶中是浦安修的同學，後來嫁給中華民國駐瑞士使館的二秘張樹柏，隨夫出國。新中國成立後，張樹柏卸任移居香港，供職於林語堂的二女兒林太乙任總編輯的讀者文摘 (遠東) 出版公司，曾和趙元任的女兒同事。事情的發展總是很有些戲劇性的，張樹柏離開瑞士後，新中國的接收大員住進了伯爾尼的這所官邸。幾年之後，派駐這裏的一位新中國外交官喜獲麟兒，這孩子便是後來的詩人楊煉。楊煉自幼生長在那裏，直到將要讀書才離開那所官邸。寶國在日本佔領北平時期讀中學，因為總與日本學生發生衝突而被學校開除，後去上海讀了美國

人辦的聖約翰，畢業後去美國。寶萬參加革命後改名為江長風，取「乘長風破萬里浪」之意，文革開始時是北京五十六中的校長。馮家外公叫龐敦敏，龐敦敏的夫人是龐馮織文，但龐馮織文不是四姐妹的生母。寶歲在參加革命後曾經給自己起過一個沒叫起來的名字「龐大」，當有對生父的追思之意。龐敦敏是蘇州人，細菌病理學家，曾任日據時期的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著有《病原細菌學》等書。龐敦敏是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姨表兄，通音律長文史愛收藏，與俞平伯、汪逢春、朱家溍、俞振飛以及收藏大家王世襄均有過從。我小時候在寶歲阿姨家裏見到過許多有「敦敏」題款的精美摺扇，後來不知都流散到何處了。

寶歲阿姨罹難後，劉鋼去山西插隊，劉山叔叔帶着年紀尚幼的劉陽也去了外地。我一九六九年冬天回京去她家時已是人去樓空。次年，劉山叔叔作為長沙鐵道學院的招生負責人來蘭州，找到我和媽媽。那晚我們三人坐在昏黃的燈下說起寶歲阿姨的慘死，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寶歲阿姨的死因對我來說一直是個謎。她為人正直熱情，秉性單純善良，除了文革中的「站隊」，絕無與任何人為敵之可能。我曾經讀到當年學部幾派組織負責人的回憶文章，竟然沒有人提到她，那十四個有名有姓的打人者沒有受到任何追究，文革後為寶歲阿姨平反的官方悼詞中也沒有一個字提及此事。只是在關於「五一六」的資料中有這樣一條綫索：周恩來曾經在一次講話中說過「馮寶歲是壞人」。也許在那個年代，這樣一句話就足以置人於死地？卿本無辜，年僅四十歲就死於非命且屍骨無存，這在當日之中國或許並不足道，但在至親至愛的人們心中卻留下了永遠的傷痛。

「五一六」一查經年。何時不查了我已經記不清，從記錄我被批鬥時群眾發言的筆記本上看，至少延續到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但開始是為甚麼查，然後查着查着查得好好的為甚麼又不查了，我始終沒鬧明白。直到這兩年才聽廣西的錢文俊說「五一六」其實是莫須有的，當時老周想借這個名堂找出點子烏人來為文革的損失承擔責任，捎帶着把造反派作為一股持不同政見的社會力

量加以摧毀。然而不等查完，主持追查的陳伯達就被整肅，隨後又有林彪出逃。既然有他們頂雷，清查的事也就不了了之。錢兄也當過「五一六」，而且是大號的，韋國清云：錢文俊要不是「五一六」，廣西就沒有「五一六」了。

四

如今我搜盡腦海裏的詞語，怎麼也描述不出當年在磚廠時的色彩，那種貧窮，那種灰暗，那種在黃土藍天下的壓抑和掙扎。

我當年的宿舍在河岸，是坐南朝北的一排房子中最東頭的一間。宿舍的南窗對着黃河，河對岸是蘭煉蘭化的幾個高聳入雲的大煙囪，日夜不停地冒着熊熊的火焰，燦爛輝煌，有如一幅壯美的油畫。黃河在火光的輝映下緩緩地流淌，不捨晝夜。在我宿舍的門前有一棵沙棗樹，那棵沙棗樹常常無端地闖入我的夢中，讓我魂牽夢繞。沙棗是在四、五月開花，花朵小小的，鵝黃色，點綴在銀灰色的葉子裏。最難忘是沙棗花的香，那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沁人肺腑的、讓人神閑氣定的香氣。

停職寫檢查的日子結束以後，我又回到生產崗位，只是不再碼坯子，而是去了全是男工的裝窰班。那裏除了我還有一個右派，一個歷史反革命和另外一些壞人。在我之前有過一個叫任之良的山西老頭在那裏受苦，任之良是美籍科學家任之恭的二哥，一九七二年任之恭率中美關係解凍後的第一個美籍華人科學家代表團訪問中國，提出要見二哥，這才從省裏市裏到廠裏一通忙活，把任老頭解放了。

我在裝窰班裏和男工們一起拉車，一起搬磚坯，甚至碼窰，那是空前絕後從來沒有女工做過的事。我工作很努力，很少和人講話，就像一名苦行僧在懲罰自己。那年的中秋節，羅排長和他的老伴羅媽媽叫我去家裏吃飯，羅媽媽把家裏所有的糖和油全都和在面裏，蒸成月餅給我吃。那段時間我經常去羅師傅家，幫他的兒子蘭州複習功課，為他的女兒丑丑洗澡。我在他家裏碰到過北山來乞討

的人，羅媽媽把人家讓進院裏坐下，端出飯來一起吃，良善之心無以復加。在我最低沉最壓抑的日子裏，我的楊師傅專程到宿舍來看我，用她那濃濃的甘谷口音對我說：「孩子沒啥，該吃飯吃飯，該幹活幹活，咱還得活人哩。你念過書認識字，路長着哩。」燒窰的老李仍然每天幫我烤饅頭，他的婆娘，一個眉目清秀的女工，在我的班裏糊窰門，每逢做了漿水、甜胚子、灰豆子之類的吃食，就會帶上讓我一起吃。食堂的孟姐會在我的碗裏多盛一些菜。榆中的合同工兄弟們會在我拉車上坡時伸手推一把。他們不關心我曾經做過些甚麼正在想些甚麼以及我有甚麼樣的政治抱負和主張，就是覺得這個女娃淒惶。許多人給過我關愛，而他們自己生活在更加深重的苦難之中。我的師傅們家徒四壁連口箱子都沒有，他們的孩子衣衫襤褸。看管輸送帶的老張大叔被電機皮帶把一條胳膊生生地齊根絞了下來，我同宿舍的秀蠶被切坯機上的鋼絲切掉了半個手指，挖土班的一名合同工被坍塌的土方埋在下面當場喪命，這些都是我親眼所見。還有許許多多故事，血淚斑駁，不忍卒說。

已經不記得碼坯子時候都是誰早上來叫起床，但是在裝窰班的日子我記得很清楚，每天東方即白，就有一隻鳥兒在沙棗樹的枝頭啾啾地鳴囀，於是我醒來。

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隻鳥，也不知它的名字，只知它選擇了沙棗樹上的一根枝條，在那裏築巢棲身。「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我想那就是一隻鷦鷯。

我也是一隻鷦鷯。在七十年代最初的那幾年裏，磚廠就是我的一枝。這一枝在我落難的時候給了我呵護給了我寬容，使我得以有枝可依，有巢可棲。

我的蘭州，我的磚廠，我的沙棗樹，我的工友和師傅們！

五

喜兒又回來上班了，聽說她已經有了第二個孩子，日子過得越

發捉襟見肘，還時常挨丈夫的打。這次她和我住在一個宿舍，她不再坐切坯台了，被分派去碼坯。她的衣着不再潔淨平整，目光不再靈動，面色不再紅潤，衣襟上灑着些斑斑點點像是奶漬。

到窰上幹活以後，因為是高溫作業，我和其他窰上的工人一樣每月有兩斤油，兩斤糖和幾斤肉的高溫補助。我把油拿到食堂請大師傅幫我燒熟，每天吃飯的時候可以往菜裏倒一點。記得那天是個周末，我下早班回來看見喜兒正在收拾東西準備回家。我眼尖地看見她床邊的窗台上有半玻璃杯清亮亮的油，再看我的床頭，油已經只有小半瓶了。

血一下子湧上我的頭頂。

「偷！」這個罪惡的字眼一下子出現在我的腦海，我來不及想甚麼，昂起臉盯着她看，我想我那時的目光大概像刀子。喜兒的臉色變了，先是發黃再是變灰。我叫住從窗外經過的政工幹事，不由分説地對他講着。我當時的聲音一定很刺耳。

這件事雖然沒有給喜兒造成甚麼後果，但在後來的幾十年裏，一直是我心裏揮之不去的陰影和無從撫平的痛。比起在清查「五一六」中挨批鬥來，這件事才真正令我感到自己的可耻。

如果有可能，我想説：

喜兒，對不起！

二〇〇八年十月於北京天通苑寓所

青春無奈

・翟永明・

四川成都人，畢業於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曾就職於某物理研究所。一九八二年發表處女作。曾出版詩集《女人》等，同時也寫作散文、隨筆，曾獲首屆「中坤國際詩歌獎」，九八年在成都開酒吧，名「白夜」，並策劃了一系列文學、藝術、及民間影像活動。現居成都寫作。

我的整個七十年代都與我的一位朋友有關，所以，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寫七十年代，不如說是懷念一位朋友。懷念我和她幾十年前的友誼，懷念我在生長期中與她一起度過的尷尬歲月。

回顧整個七十年代，我發現並沒有甚麼值得寫的大事。四川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山高皇帝遠的盆地，啓蒙的星星之火，燒到成都來時，已經慢了半拍。成都也沒有那麼多的高幹子弟，能够通過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內部出版的白皮書和政論書籍，使那些有近水樓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禮。我的書籍的供貨渠道，是一個同學的父親。他是一個收荒匠，收了很多文革前、甚至解放前出版的書。但是那些書，大多是描寫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還有西方十八、九世紀的愛情小說。至於現代文學的掃盲，那還都是在我大學畢業之後。讀到像《今天》這樣在當時全國校園中已經廣泛流傳的先鋒文學刊物時，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後。整個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裏，除了這些不值一提的閱讀生涯，剩下的，不過都是些「女兒家情態」，更加不值一提。這也是我最初不想寫這篇文章的原因，及至動筆，我才發現，這些「女兒家情態」，也是那個年代的特殊產物，記下來，也能從中看出在一個轟轟烈烈的大時代底下，暗潮湧動。

閻莉，姑且讓我叫她閻莉吧。因為，我吃不准她會不會同意我寫她的經歷和種種屬於我們倆的陳芝麻舊事。

閻莉比我大兩歲，正在讀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當我從貴州搬回成都，搬到這家老公館時，她是院子裏的小孩中，第一個引起我注意的。閻莉個子中等，身體其實凹凸有致，但是，在那個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過，它又若隱若現，靠的是她雖不能穿高跟鞋，但猶如穿了高跟鞋一樣、昂首挺胸的步態。我那時也已開始發育，與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誠惶誠恐，如臨大敵，恨不得將自己身體上凸出來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當然，這做不到。於是，我就只能成天垂頭喪氣、聳肩縮脖地低頭走路。這養成了我日後前傾四十五度、埋頭走路的壞習慣，多年後，這習慣導致我頸椎後面，突出來一個讓誰摸一下都會嚇一大跳的骨節；由此引起的頸椎病，就不必去說它了，我有詩為證。

那些年，成長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尷尬和卑微，當然是與那個年代的風氣有關。現在的女孩聽說這樣的故事，打死都不會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進入了初中，並且發育迅猛的時候，學校裏瀰漫的是昂揚的革命鬥志和中世紀式的禁欲風氣。「發育」，是讓女生們十分懊惱但又不得不面對的事。「發育」二字，是萬萬不能說出口的，說出來就是晦詞淫字。記得有一天，上生理衛生課，正好講到了女性的生理衛生期。全班女孩的頭都恨不得鑽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說對不起。男生們倒是全都興奮異常，臉上全都繃着，嘴裏卻都在傳遞着一個如同暗號式的數字：「四十九頁」，「四十九頁」；老師則毫無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拉地將四十九頁讀了一遍。下課鈴終於響了，女生們如釋重負，男生們大失所望。現實中也是如此：我們就這樣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誠惶誠恐地度過了四十九頁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閻莉就讀的是本地中學，但我兩人都是北方人。相對於成

都人，我們長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發育領先三至四歲，這讓我們在學校裏總是受到指指點點。現在被稱為「太平機場」(成都有這樣一座小機場) 的平胸，在那時，可是讓人羨慕的身材 (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發育過早的女孩，則採取與現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後來上演的電影《小街》裏的女主角那樣，把自己的身體殘酷地包裹起來。

由於耻辱的「發育原因」，我還被剝奪了參加校宣傳隊的資格。這樣的剝奪，與「黑五類」子弟的待遇幾乎一樣。未發育的女生，挺起驕傲的、童真的胸脯和目光，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選。我還清楚地記得 (因為耻辱總是讓我們的記憶最清晰)，有一次年級裏排演《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這個節目，我從小就在大院裏，與閻莉她們練過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繮縱馬狀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練完畢，工宣隊員們在一邊嘀咕了一陣，就把我叫過去，東説西説，説了半天，意思是「出於革命需要」，這個節目中我的角色，換作別人了。為甚麼呵，我心裏無比委屈。我清楚，別的女孩絕對沒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隊員支支唔唔的理由中，在同學們閃閃爍爍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邊的外套，帶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離了現場。

那時節，江青正在搞革命樣板戲的實驗，全國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眾性革命文藝活動的高潮。在學校，每個學期都有一次匯演，由各個年級出節目，最後在全校表演且評分。有一次，我們年級準備演出朝鮮舞蹈《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在排練過程中，同學們支支唔唔地在一邊議論，閑言碎語就傳到了我的耳中。當然，傳到我耳中的話已經變形，説是我個子太高，不適合在其中表演。但是《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這個舞蹈，基本上是由我編排的，而且，我從小就受大院裏一位戰旗文工團的阿姨指點，舞姿是最正宗的。所以，把我撤下來，可能眾人都於心不忍。最後，大家一致通過由我來領舞，但我只能扮演阿媽妮。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像她

們那樣，將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處，再別一個蝴蝶結，就成了朝鮮族姑娘。我得將自己的一件白襯衣和一條裙子，改縫了半天，製作出一件「大籠大挎」(四川話) 的、朝鮮老大媽可能這樣穿，也可能不是這樣穿的「朝鮮服」。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換到後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一個腦袋來；班上排演《紅色娘子軍》時，儘管我已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常青指路」一段中，女主角吳清華的每一個動作，但是，這個角色還是被分派給了一位成都女孩。而我，則成了「編導」。

相信是同樣的原因，閻莉也沒有能被吸收為「校宣」(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儘管我倆都酷愛跳舞，並且跳得比別人都好。在那時的中學，有「班宣」、「排宣」，「連宣」；而「校宣」就像現在的「名模」一樣，是女孩們所嚮往的。它代表一種時尚，一種那個年代特殊的紅色時尚。「校宣隊員」無論男女，在學校都是令人矚目的，也是引領風潮的。在當時，「校宣隊員」這個特殊名詞，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 (儘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徵)。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興趣轉向了體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籃球，並立即發現了自己的運動天賦，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籃球女王。北方人的長處得以充分發揮，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籃球賽中，處於東方不敗的位置。

但是，發育的煩惱仍然跟隨着我們。籃球隊的女孩都發育健康，穿上球服，讓我們看起來更加成熟。每次比賽，男生都聚集在籃球架下，不懷好意地鼓着掌。這讓籃球隊的女生們畏手畏腳，很多時候，球在中場傳來傳去，大家都不願意三大步上籃。七十年代的中學女孩，沒有電影《美國美人》中那些啦啦隊女孩的驕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識和身體不聽指揮的恥辱經驗。這讓我練就了一手三米圈外準確定投的絕活。

閻莉至始至終地熱愛表演，哪怕在我們的大院裏，她也要跳舞給那些比我們小很多的女孩看。並且，她把她們都聚攏來，成立了一個宣傳隊，每天樂此不疲地排練。

我不知道我和閻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誰更成熟一點？因為，我意識到了性，並以為羞耻；而她，渾然不覺。她繼續地昂首挺胸，旁若無人，腳踩虛擬中的高跟鞋，走得風情萬種而不自知。我則小心翼翼地走路，夾着尾巴做人，對旁人的指點和議論，敏感到一種病態的地步。我總是穿一件我媽的寬大衣服，以隱藏自己的生理特徵，而閻莉，卻總是想方設法讓自己的服裝「合身」，不經意地露出身段來。比如，我總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總是單穿着一件套頭薄毛衣，就這一點點，造成了閻莉的與眾不同的「氣質」。而且，她還想法設法在當時千人一面的服飾上，製造出一點點與眾不同來。後來有一陣子，街上流行穿藍色工裝服，她總是用硬木刷把工裝服刷得透白，與別人頗不一樣。後面這個細節，在日後與賈樟柯合作劇本《二十四城記》時，我貢獻出來，用在了陳沖扮演的廠花上。

也許正是這種不同，讓我和閻莉成為了密友。與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種安全感：畢竟，我倆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體上的差異，總讓我不安，甚至養成我自卑的習性。

有那麼幾年，我們倆好得像姐妹一樣。除了白天上課，晚上睡覺之外，別的時間都膩在一起。閻莉在文化宮中學讀書，與我的學校離着兩站地。那兩年，她天天下課都到學校門口來接我，然後與我手挽手地回家。我們班的同學幾乎都認識她。那兩年，我們倆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樣，髮型也梳得一模一樣，個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樣。可以說，我們刻意要打扮成雙胞胎模樣。與閻莉在一起，我也壯了一點膽色，背也稍挺了一點，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來，模仿她的目中無人。走在大街上，我們倆是這樣的引人矚目，用現在流行的話講，就是酷斃了。

回家後，我們在閻莉的「閨房」裏廝磨相守，說「閨房」，實際上就是一個樓梯間。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剛够放一間小床和一個床頭櫃。在那時，有一個單獨的房間，太奢侈了。我們倆總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沒完沒了地聊天。

不久，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這些事情長久地困擾着我。

一天，我與閻莉去和平電影院看《紅色娘子軍》。和平電影院的售票處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電影看不容易，何況是人人皆知的電影版《紅色娘子軍》，那裏面有人見人愛的洪常青飾演者：王心剛。現在想起來，當時在我們眼裏，洪常青在電影裏的角色，與女兒國中的賈寶玉差不多，總是被女人圍着。他對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對瓊花若有若無的那麼一丁點兒曖昧 (通過王心剛的眼神顧盼和那些顧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話語，表現了出來)，使得電影版的《紅色娘子軍》，有了一點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剛成為文革時期女孩的偶像。

話說當時我和閻莉看見電影院的陣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買到電影票，我們一左一右地從人群的兩邊往窗口處擠。沒有經歷過文革中搶購的人，絕不會想像出這種狀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擠得人挨人，有人從後面撲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處的鐵欄桿，買好票的人因此也擠不出來，只得低下頭，從那人身下鑽出來。我們從小就去擠買搶購各種各樣的物品，早已有了經驗，仗着人小，從兩頭緊貼牆壁往裏鑽，是屢試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魚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時，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開去。又聽人群中喧鬧起來，後來才知道，革命群眾扭住了一個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閻莉。我還沒反應過來，閻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錄了一通口供。回來後，閻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裏傳開了。大人們如何反應，我不記得了。只記得在這幫小孩們中間，閻莉一下變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來。那時，還沒有魅力這個詞，但是，閻莉在我們這些孩子們心中，一下變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認為：她，是我們大院子裏面最漂亮的。而且，隱隱地，也覺得她與我們不一樣。不是嗎？怎麼沒有人對你們這些小孩耍流氓呵？

沒過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發生了。一天傍晚，閻莉從外面回來，走在我們大院長長的甬道中。一個住在街上的男孩，從黑暗中

竄出，攔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張紙條遞給她，又對她說了許多亂七八糟的話。那時，天並不晚，也就八點多吧，因為心慌，也就以為是深夜了，閻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後，氣喘噓噓地把紙條塞給了她媽。閻莉媽媽為了怕她再被騷擾，找到我，囑咐我以後進出都與閻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趁虛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實並不太晚，十點來鐘吧，閻莉在家裏睡覺。突然一聲大叫，把我們全都嚇醒了。叫聲從閻莉家傳出來，我們都跑了過去。原來閻莉睡得懵懵懂懂時，突然看見她的窗口上，趴着一個人。當然，肯定是一個男人，不會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別人牆上的。

這下全家人嚇壞了，閻莉也嚇壞了。她就要求我與她作伴，閻莉媽媽也動員我過來與閻莉同住。

那天之後，我晚上也住在閻莉的小屋。我們同吃同住，比平時又好了幾分。事情發展到最後，連白天睡午覺，我們都擠在閻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幾次的流氓事件發生，使得院裏的流言蜚語也多了起來。幾位居委會阿姨就在後面嘀咕，說閻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風流的。

一天中午，我媽四處找我，到閻莉家一看，我倆正躺在床上呢。我媽一看就發火了，把我拖起來就往家走，嘴裏還嚷嚷着：再也不讓我去閻莉家睡覺了。「為甚麼呵」？我想不通，也對着她嚷嚷。我媽大叫一聲：「再這樣下去，你們會成為同性戀的」。甚麼？同性戀？這個聞所未聞的詞，如電光飛石一樣擊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纏着我媽說清楚不行。我媽一看自己說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說了。

我媽媽解放前是著名的西醫醫生，也許從西醫和西方倫理角度出發，她對我和閻莉這種假雙胞胎心理，有一種警惕。閻莉母親卻是一個苦孩子出身的女軍人，她做夢也想不到世界上還有同性戀這種事情。她只是心疼寶貝女兒，所以，一直喊着叫着讓我去陪閻莉。當然，我媽也堅決不同意。

在那之後，閻莉就變成了一個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

還老給我寫信。當然，內容都是關於我們二人的「革命友誼」，充滿了海枯石爛不變心的一些誓言。並且，每次見我都眼淚漣漣的，老是央求我繼續陪她住。而我，由此也發現自己是個鐵石心腸的人，儘管有時我也想擠點眼淚出來，以證明自己的友誼，一點也不遜於她。但每次都失敗了。

現在看起來，閻莉不過是一個早熟的女孩，性意識覺醒得比我們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學，早戀有一個代名詞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誰談戀愛，誰就是流氓。當時成都的中學，每年寒暑假，都要辦一個學習班，人稱「操哥操妹學習班」。學習班成員都是學校裏那些早熟的、正在談戀愛或者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學生 (後者包括雖未談戀愛，但喜歡穿着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師和工宣隊管教的學生，一律地被稱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話裏就是流氓的意思。我後來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經在學習班裏待過，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面形象。雖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竇未開，因此，被當作正面典型，成為學習班的看守。這是因為，被辦了學習班的學生，整個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須住在學校，要有人看守，其實就是變相勞教。(現在那些早戀綱戀師生戀的孩子們有福了)。

閻莉在學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紅又專的苗子，還是年級的副排長 (當時成都中學都是軍隊編制)。閻莉的革命日記還在學校展覽過，我還親自去參觀過，雖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鬥私字一閃念的活思想。

顯而易見，閻莉的活思想是經得起檢驗的，有革命日記為證。但閻莉的潛意識是否也經得起檢驗，因為當時還沒有心理醫生，所以，無人知曉。

但是，我隱隱地覺得，閻莉的潛意識很活躍，而且，正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些潛意識在當時，不可能是針對男生，這一點，閻莉可能連想都不敢想 (想了都是女流氓，都需要辦學習班)，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潛意識的指引，把青春萌動期裏那些多餘的

激情，在對女生的「友誼」中，一點一點地消耗掉。

幸虧，很快閻莉就畢業了。按照政策，她必須下鄉。閻莉母親再怎麼疼愛女兒，也只能讓她去。閻莉下到廣漢的連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個富庶之地。若干年後，趙紫陽在四川搞改革，選擇的就是廣漢。

廣闊天地的自由

閻莉下鄉後，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滿了多愁善感的語言。除此之外，看來閻莉對她插隊的地方還很滿意，她在信中描述連山梨花溝是個花果之鄉，盛產蘋果和梨。的確，三十多年之後，從成都到廣漢修了高速公路，連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開的時候，成都人大量地湧到那兒去看梨花。

閻莉除了用洋溢着詩情畫意的文筆描寫梨花溝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請我暑假時，去她那兒玩。到後來，這些信中，漸漸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時的興趣，已從籃球轉到了詩歌，準確的說，是詩歌寫作。在剛進初中時，我就開始愛上了詩歌，最初的啓蒙就是《唐詩三百首》。到了閻莉下鄉那段時間，我已經熱火朝天地開始「原創」詩歌了。題材當然脱不了文革末期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但是，我已經開始在裏面注入一些不顯山不露水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比如，歌頌大自然之美，裏面也摻雜了一些古代山水詩的意境。

閻莉關於花果之鄉的華麗詞藻，終於也打動了我。於是，放假時，我以去花果之鄉買水果的理由，打動了我媽。那時，城裏的水果很少，且貴得驚人，而鄉下，由於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賣不出價來。我就像一個跑差價的小販似的，拎着一個編織口袋，去了廣漢。

從廣漢到連山，有四十里路。第一次去，是閻莉到車站來接的我，我們換乘了一輛破公共汽車，又搭了一段拖拉機，然後改為步

行。這一段路，後來成了我經常走的地方。我坐過汽車、三輪車，也攔路搭乘過陌生人的大卡車 (那時也不知害怕，也沒聽說有甚麼壞人要暗算你)，還跳上別人的自行車後座，行過一程。總之，就差農民趕場時推的雞公車 (一種四川獨有的獨輪車，據說就是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 沒有搭乘過了。

梨花溝是一個丘陵地區。閻莉的生產隊就在半山坡上，從山腳一路緩坡地上去，很有層次。路兩邊都是果樹，有梨樹，李樹，蘋果樹，有杏林、桔林、汽柑林、我簡直覺得到了孫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簾洞了。進到村裏，農民們正在吃晌午，他們許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飯，房子都是矮牆隔斷的。所以，他們邊吃飯邊與鄰居隔着矮牆聊天，看見閻莉和我走來，他們都與她打招呼：「家裏來人了」？閻莉說「我妹妹來了」。閻莉和我，早已不再作雙胞胎打扮，但應閻莉的要求，我們姐妹相稱。按照閻莉的主意，她是要我和她拜金蘭換帖子，正式結拜。我沒同意，覺得做作，為此與她嘔了兩天氣。

閻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個房子都被桔子樹給遮住了。與那時的知青一樣，她和另一個女孩住在老鄉家，在側廂房。與閻莉同住的女孩姓陳，我們叫她小陳。

天晚了，閻莉和小陳就在屋裏的老灶做飯。兩個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够用的大鍋，一丁點可憐的白米和玉米，在鍋底跳着，看起來連巴鍋都不够。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繩，吊着一個炊壺在灶口，燒火時吐出的火苗，一會兒就將它燒開了，真够環保。麻繩和炊壺，都被煙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為甚麼，我並沒有覺得不乾淨。炊壺裏燒出來的水，還有一股煙香味。

晚上，我們吃完飯，靠在床頭聊天。閻莉突然起身推開窗，隔壁院子裏的一枝桔樹，搖搖曳曳地伸進來，上面掛滿了紅桔。閻莉摘了幾個下來，扔給我，我吃了一驚，說：「隔壁的老鄉發現了不會罵你嗎」？閻莉撇撇嘴：「誰稀罕呵，你以為多值錢呵。」小陳告訴我，這兒的水果太多了，也運不出去。小年還好，大年簡直泛

濫成災，只能賣給附近的場鎮，賣不了多少錢。

第二天，一場懶覺，快中午了才起來吃飯。現在是果樹結果的時候，生產隊根本沒事幹。本來四川農村就是人多地少，哪來那麼多的農活呀。知青下鄉來，就是搶農民的飯碗。只是，看在每個知青都有五百塊錢安置費的份上，老鄉們也就算了，因為，五百塊錢可不是個小數字呵。大多數知青都被安置在老鄉家裏，安置費就可以剩下來給生產隊添置一些機器了。

下午，閻莉陪着我到處去轉，這兒風景宜人，民風淳樸。十里之外的人，都互相認識。

閻莉說晚上有人要來，給我們「唱黃歌」。「黃歌」在那時是有特指的——所有與愛情有關的東西，差不多都被加了一個「黃」字。愛情與下流的一步之遙，就是這個「愛」字是否出口。所以，那時的「黃歌」，其實就是現在的愛情歌曲。文革後期，不像前期那樣氣氛緊張，雖不能公開，但在知青當中，已然開始流行唱黃歌。這幾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娛樂——這又是一個讓如今的小年輕們笑掉大牙的事。

晚飯前，有人來了。此人的到來讓我吃了一驚：遠遠的，只見來人身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軍裝，這倒沒啥稀奇的，那時，人人都作此打扮；關鍵是他外面披了一件簇新的、括挺的毛呢軍大衣。他並不把他穿在身上，而是披着，像電影裏的首長一樣。來人個子不高，但胸脯挺得比閻莉還高，這讓他走起路來很有氣度，還真有些像首長的樣子。走近了一看，只見他高額，闊眼，特別是他的頭髮，不像當時的年輕人一樣，亂七八糟的豎着，而是精心地攏在後面，像一個大背頭，鋥亮鋥亮的。他手上還拎了一把二胡。二胡照說與這毛呢軍大衣配着，有些不搭調，但此人拎着，倒有點理直氣壯的和諧。總之，一眼看去，他與眾不同。

閻莉給我介紹，這是張躍進，是另外一個生產隊的知青。及至張躍進開口，又嚇了我一跳：一口純正的普通話。

張躍進自我介紹，他是徐州下來的知青，下來一年了。

為甚麼會到這麼遠的地方來落戶呢？我問他。

他說，因為早聽說四川是天府之國，父親怕他下鄉吃苦，所以托親戚把他弄到這兒來了。

一陣寒喧之後，我們開始作飯。張躍進自告奮勇炒菜，讓我們沒想到的是，張躍進的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考究。在那樣粗陋的就餐環境中，他還不忘把大葱切成一朵花，裝飾在土碗邊沿上。

洗碗時，閻莉告訴我，張躍進與她，現在都被選為公社宣傳隊員，正在準備匯演的節目。今晚，她特意請張躍進過來唱歌，是為了用黃歌「招待我」。那時，全國人民的伙食都一樣簡樸，自然不能用於「招待」。「黃歌」，那可不是人人都會唱的。

晚飯後，我們坐到了院子裏，坐在了桔樹下。所謂的「黃歌」，就是以俄羅斯民歌為主，解放前的靡靡之音為輔；也就是那些或情深意長，或低迷頹喪，唱起來讓你渾身酥軟、喪失革命鬥志的歌。這些歌，在知青當中很流行。當時的知青普遍對未來迷茫、無望，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辦。這些軟綿綿的歌曲，一下就擊中了他們。

張躍進開嗓就讓我吃了一驚，他的嗓音渾厚，低沉，他也故意把聲綫壓得很低，模仿着那種很少聽到的男低音。而且他唱得與別人不一樣，多年後，我知道了他是用的美聲唱法。

張躍進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後來，我又多次聽他唱過，知道了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三套車》、《黑眼睛的姑娘》和一些我忘了名字的俄羅斯民歌。閻莉中途也插了進去，與他一起合唱。顯然，他們早就在一起練過。閻莉以前也愛唱歌，但唱得並不太好，只是嗓音還很亮色、高亢。

歌聲在桔子樹下飄浮着，月亮這時已經升起，它在桔子樹上穿來穿去。好像桔子樹上掛的白燈籠，從枝葉間穿出來的清輝，把院子照得雪亮。我覺得好像是在另一個世界，甚麼學校呵、老師呵、同學之間的不愉快甚至愉快呵，都退得好遠好遠。

我想起那些古詩中描述的意境，大抵也就如此了。

夜更深更靜了，老鄉們都已入睡了。他們肯定不知道這是些黃歌，在他們聽來，與催眠曲差不多，絕不會吵着他們。

這時，張躍進拿出隨身帶來的二胡，說：這個時候，才能聽《空山鳥語》。我自然不知道《空山鳥語》是甚麼，此前，我除了革命歌曲，不知道世上還有其他的音樂。後來，我才從張躍進那裏知道了二胡大師劉天華，知道了《江河水》和其他的二胡獨奏曲。也是從那時起，我才了解了中國民樂。

張躍進試好弦，開弓一拉，周圍就靜了下來。我們到了一座空山 (意識中是青城山)，罕有人迹，唯聞鳥語，清風拂面，泉水洗心。然後，我們好像進入了一個鳥的世界。原來鳥們跟我們一樣，有各種語言和表達。它們也要爭論、也要憤怒，也有柔聲細語和雷霆之聲。

張躍進的琴藝如何，我不知道。但皎潔的月亮、枝繁葉密的桔子樹、高高矮矮的泥巴牆，這些舞美效果，讓他的琴藝增色不少。我不認為中國民樂團的那些首席二胡，一定能奏出這個夜裏梨花溝的《空山鳥語》。

一曲終了，張躍進意猶未盡地說，我再拉一曲吧。這次，是一首歡快激昂的曲子，張躍進拉得恣意瘋狂。頭和髮，隨着琴弓上下擺動着，整個身子都好似要隨時從板凳上飛起來似的。他的眼睛卻不時地瞟向閻莉，而後者，此時眼波閃閃，裏面不知是淚光還是月光。

那天之後，我也問過閻莉她和張躍進的關係，閻莉總是迴避，說他們之間是「革命友誼」。沒辦法，公社規定：知青絕對不許談戀愛。違反規定者，要被集中到縣裏，辦學習班。

我跟着閻莉每天去參加公社宣傳隊的排演，以至於在後來的日子裏，我與宣傳隊的人混得爛熟。宣傳隊的成員全部脫產，吃住都集中在公社。我和他們一起編排舞蹈，也幫他們寫一些對口詞，宣傳語甚麼的。兩個月後，他們將要參加各個知青點的匯演。最後，鎮上會篩選出最好的節目，送到縣上去，參加調演。到縣上去表

演，這是張躍進他們的目標。

公社宣傳隊，是由大部分知青和極少數本地農村青年組成的，用於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宣傳毛主席的革命文藝思想。具體的，就是普及八個革命樣板戲和普及那些千挑萬選、千錘百煉的革命歌曲和舞蹈。當時，學校有「校宣」，公社有「社宣」，部隊有「軍宣」，工廠有「廠宣」。總之，都是一樣的宣傳隊，都表演一樣的革命節目，都假定全國人民對這些革命節目百看不厭。的確，人們真的百看不厭，因為，沒有別的娛樂活動可供選擇。這些固定的革命節目，就像體操動作中的規定動作，人們主要是在這些動作中，看誰表演得更完美。

比如《白毛女》中大春和喜兒的雙人舞，閻莉跳過很多次。但這一次，她和一個她不喜歡的男知青共跳。她有點分男女界限，不肯把手掌全部搭在對方肩上，而是伸出兩根手指來，蜻蜓點水式地擱在男方的肩頭。由於重心不穩，她踮起腳尖時，晃了兩晃，這被張躍進看見了。

公社書記知道張躍進能歌善樂，所以，讓他擔任了宣傳隊的隊長職務。張躍進把自己定位為藝術總監，他的確也勝任此職。所以，他是宣傳隊的頂樑柱，除了任隊長之外，他是總監、編導、舞美、還是大合唱的指揮。同時，他還是一個一絲不苟的舞台監督。

看見閻莉在舞台上連晃兩下，張躍進冒火了，於是當着所有人的面，他指責閻莉有資產階級小姐情調，沒有喜兒那種純粹的無產階級感情。閻莉走到哪兒，都是那裏的寵兒，哪受過這樣的氣，當場就大哭起來，並立即罷演。我坐在一邊，心想：壞了，按閻莉的公主脾氣，肯定不會原諒張躍進。

第二天，罷演後的閻莉稱病在家。我勸她，她也不聽。我有些納悶，閻莉最愛跳喜兒這一角，也最愛在宣傳隊中享有絕對主角的感覺，難道她真的就不怕張躍進換人嗎？

早飯後，張躍進來了。我起身要走，閻莉一把拉住我，我只好坐在一邊。張躍進笑了笑，在我對面坐下。他對着我講起宣傳隊的

事，話題也自然地引到閻莉身上。因為傾訴的對象是我，所以，他毫不避諱地對閻莉大誇特誇，從人才到身材，從性格到人格，總而言之，是一個完人，除了偶爾會有點小脾氣。這些話是對着我說，我當然知道其實是對着閻莉說的。而閻莉，從剛開始的一臉怒氣，也漸漸變成春風拂面。

後面的故事可想而知，二人重修舊好，並且携手並肩戰鬥在火熱的排練場上。張躍進編節目，閻莉主演，二人聲氣相通、默契配合。現在想來，頗有點像一些大導演與他們的御用女演員之間的關係：英格瑪和麗芙•烏爾曼；伍迪•艾倫和黛安•基頓；賈樟柯和趙濤。

在梨花溝的日子，像極了一句套語：日月如梭。但是，我必得在考試前趕回成都，繼續我的中學生涯。當我回到成都，回到學校時，我頗有當年武陵人離開桃源洞，回到人間之感。那以後，學校的生活就再也不能吸引我了。

我繼續收到閻莉的來信，她在信中詳細報道宣傳隊的近況：剛剛排完了大型舞蹈《重上井崗山》，張躍進編舞，她是領舞。或者，剛剛在鎮上初演過，別的公社的節目，完全不能與他們相比。

一晃就到了年底，放寒假了，我又接到了閻莉的信。她告訴我，他們已代表連山宣傳隊，被選到縣上，就要參加縣上的新年匯演。閻莉叫我一定要去看他們在縣上的匯演。因為，宣傳隊的成員們，都已當我是他們中的一員。

又一次以買水果為由，我去了梨花溝。

我剛到，閻莉就告訴我兩天前，發生了一件事。原來張躍進在與閻莉若即若離地打了幾個月啞謎之後，決定要主動挑破那一層似乎擋在他們之間的薄紙。他寫了一封信，裏面公開地表示要與閻莉談戀愛。信中那些纏綿發燙的字眼，閻莉自然沒有告訴我，關鍵在於，閻莉居然將這封信，交給了公社領導。我一聽就火了，馬上就開始指責她。我那時已完全被西方資產階級文學「腐蝕」了心靈，同時，又對中國古典文學中才子佳人的故事着了迷。我覺得他們二

人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才子佳人，雖不成功，但也不能成仁呵。

閻莉非常委屈，也與我吵了起來，她說她收到信後很緊張，也不知道怎麼辦。同時，按照以前在學校、現在在公社所受的教育，她應該把這些充滿「資產階級語言」的信，交給領導。我覺得她這套說辭，簡直愚蠢之極。而且，我認為，她真正毀了自己與張躍進的這段關係。那時我在同齡人當中，已算博覽群書，自以為已經了解男女之間的那些事，我認為不會有人把背叛自己的人，還當成最愛的人吧？我正在狠狠地批判閻莉時，張躍進來了。聽說我在開閻莉的批鬥會，他卻笑了。然後又對着我說了一大通話 (現在，我已經知道這些話，其實是說給閻莉聽的)。大意是讓我不要怪閻莉，因為他認為閻莉很單純。她為甚麼作這樣的事，正是因為她的單純。他又說，現在社會上單純的人並不多了 (這點我可不敢苟同，事實上，那會兒的人都很單純)，所以，閻莉的單純，格外讓人珍惜。

看，根本不需要我去勸解，張躍進就已經原諒了閻莉。不但原諒，簡直就是讚許。這讓我大跌眼鏡。其時，我正在讀《牛氓》，書中「牛氓」因為一個錯誤，挨了女友一記耳光。並且，一個耳光就導致了十八年的離別。從那時起，我才知道，現實中的愛情與書中完全不一樣。

捐棄前嫌後，他們一如既往地去公社排練。公社領導因為張躍進一直很先進，偶爾犯了小錯誤，也就既往不咎。再說，在農村，男女青年都是早婚的，這些知青，在他們看來，早就該結婚了。

我在旁邊冷眼觀察，與幾個月前相比，張躍進仍然表現出對閻莉情意綿綿的樣子，而閻莉，仍然是享受着這情意綿綿卻似乎渾然不覺。我有時忍不住問她，她的回答也一如既往：我們是革命友誼。

這樣「敵進我退、敵疲我擾」的試探，進行了近一年。直到宣傳隊的演出，在全縣獲得第一名。

再一次的寒假到了，這次，我沒去梨花溝，因為閻莉回城了。原因是她與張躍進真的戀愛了。雖然她仍在信中支支唔唔，但我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就像三十年代追求自由戀愛的小說有了七十年代版：資產階級品酒師之黑狗崽和無產階級苦孩子的根紅苗正的後代，要想結合在一起，一定是千難萬難。他們的戀愛，受到了閻莉父母的堅決反對，而且，閻莉被叫回了家，要她徹底和張躍進分手。這之後的故事，又像進入了一個類似瓊瑤電影中的俗套：父母堅決反對，子女寧死不從。不同的是，這個戀愛故事的背後，不是貧富懸殊，而是階層懸殊。閻莉的父母都是革命軍人，閻莉的父親是我見到的革命軍人中，最帥的一個。高高大大、堂堂正正，大檐帽下筆挺的黃呢軍裝，使他顯得風度凜然。閻莉的母親，形貌顯然就差多了。她個子不高，五官談不上好看，也許由於身體不好，她的面容格外憔悴，佈滿了皺紋。這讓我心下有一點點為閻莉的父親遺憾。但是，閻莉的母親卻是出身純正的貧農之家，而且是童養媳，就像我們在許多訴苦大會上聽到的故事一樣，她是被八路軍救了後，參加革命的。這樣的組合，在當時，就是最純正的革命家庭了。反觀之，張躍進多年後倒是吹噓過，他父親的鼻子乃天下一絕，甚麼樣的紅酒只要聞一聞，就知道是甚麼級別的。問題是，七十年代需要這樣的鼻子嗎？無論哪一個階層，大家一概喝的都是高粱酒、大麯酒。用得着品酒師嗎？

有那麼幾年，閻莉和張躍進兩人的愛情與世俗力量展開了拉鋸戰。(在當時，屬於文藝女青年的我，對阻撓愛情的一切，都視為世俗偏見。但這一次，世俗的背景卻是革命) 在那些混合了痛苦和快樂的日子裏，梨花溝再一次成為了他倆的世外桃源。閻莉的父母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說媒、開後門、找工作等一切能够把她從農村調回成都的手段，想實現女兒與張躍進分手的目的。但是，閻莉好像中了邪似的，就是不願一個人離開。她跟父母談的條件就是：要調，就得兩個人一起調上來，都調到成都。而張躍進，也鐵了心不再回徐州了。

拉鋸戰一直持續到幾年之後，閻莉終於强過了父母。她考起了成都的一所高專，而張躍進，幾年後父親落實了政策，成了徐州著

名的無黨派民主人士。通過一些關係，張躍進最後也被調到了成都一家工廠工作。這個故事終於有了一個大團圓結局。

我最後一次見到閻莉和張躍進，是在九十年代末，我專門去拜望老朋友。他們二人在一間大約不過六十平米的房間裏，打造了一個幸福的二人世界。所有幸福家庭所必須擁有的東西，一樣都不能少。在他們極多主義的房間裏，我只能側身走動，這讓我感到有些壓抑。不過，幸福只嫌少，不嫌多。整個晚上，除了三個人在一起聊天懷舊，其餘時間，他們仍在商量，要在房內添置些甚麼新的傢具。閻莉雖然人到中年，但說話間，仍保持着當年的天真。而張躍進，仍然不斷地用「單純」來贊美她。在閻莉的成長過程中，被早熟的性意識煎熬，直到青年時代認識張躍進，她這輩子最終也只愛過這個男人。的確，她是單純的。而那個時代的所有女孩，也都如她一樣的單純。

上大學：暗渡陳倉

一九七六年，我也高中畢業了。我們是文革後恢復的第一屆高中生，許多人以為，我們就此可以考大學了。那些有上進心的同學，早就在為這個目標作準備。像我這樣渾渾噩噩混日子，成天請假往農村跑的人，絕對沒有。但事實證明，我的消極是有道理的。畢業來臨，我們知道了，政策不變，我們每個人都要面臨下鄉。

這對我並不是甚麼壞消息，可以說，在高中的最後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鄉。我沒有我的同學那種離開城市就如喪考妣般的悲痛，更沒有另一些同學那種遠大志向就此被埋沒的怨恨。

我們的排長，他僅僅比同班同學大一歲，但好像他比我們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學，所以想方設法地裝病、托人走後門，終於以重病為理由，留了下來。順便說一句，整個高中期間，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成雙入對的，只要一男一女在

一起多呆一會兒，閑言碎語馬上滿天飛。弄得大家也一見異性，就馬上作端莊相。只有我們排長，一直與副排長 (女) 公開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後，在一起談心。以「談工作」為名義，一直談到畢業後開假條之際，大家才發現他們倆談的是戀愛。而且談到最後，二人都談出病來，雙雙地留在了成都。真相大白後，一向把排長當成精神領袖的那些男生，氣得都與排長絕了交。而排長和副排長，忍辱負重幾年之後，雙雙考起了重點大學，後來，又雙雙出國去了美國。野心和愛情，加上適可而止的心機，使他們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對。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談心的日子裏，是早熟的排長啓發了副排長的愛情和上大學的野心，他們的每一次談話，都在向這個計劃奮進。這是另一段禁欲時期的愛情，其實也值得大書特書。但是，由於我高中期間經常請假去梨花溝，此中的許多細節，也就無從知曉。

我極積地爭取下鄉，不是因為我有多麼進步。梨花溝給了我最理想主義的想像，我從來就沒覺得下鄉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覺得這可比上大學有意思多了。它幾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沒覺得這中間的城鄉差別，在我看來，梨花溝的人過得並不比城裏人差。那時城裏人吃肉還要肉票，一個月一人才一斤肉票，農村人的肉吃不完，還可以賣給城裏的人呢。再說，我那時與家庭有着很大的衝突，我巴不得趕快離家出走，到廣闊天地去，那裏意味着自由。

當然，我沒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縣。比起梨花溝，我下鄉的地方乏善可陳。新都縣的農民已經富了起來，心裏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鄉的知青，他們已經看到知青後面的城市資源。這兒的知青也都各懷鬼胎，一心想着「掙表現」，為的是早點離開農村。因此，同隊的知青，也都成為了競爭的對手。

梨花溝那種與世無爭的陶淵明式的生活，在這兒，一點都沒

有。我們需要每年掙够足够的工分，才能買足第二年的糧食。為此，我每天都在算工分。早晨天沒亮，我就跟着老鄉去砍萵笋，霜凍的早晨，手指都快凍掉了。大戰紅五月時，我連着三晚沒睡覺，在抱着麥穗，走向脱麥機的一百米的路上，我就能連打兩個盹。

梨花溝知青那種大集體的感覺，在這兒，也一點也沒有。我感到沉悶和孤獨，大多數休息的時間，我都用來閱讀。後來我常常想，如果我也下鄉到梨花溝這樣的地方，我可能會像傅天林一樣，成為一個果園詩人，絕不可能在多年後，寫出《靜安莊》。

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在天安門廣場爆發了，我還記得在成都的天府廣場，也有人貼出四五運動中那些激動人心的詩詞。我在文革期間，就養成了看大字報的愛好，不是看其中的內容，是看誰的文采好。當我讀到著名的「我哭豺狼笑，揚眉劍出鞘」時，我被極大地震撼了。

四五運動被鎮壓了，我最關心的是寫出「揚眉劍出鞘」這首詩的人，後果怎樣。很快，各種小道消息傳來，説此人被槍斃了。

過了沒多久，我上了大學，那是一所工科大學。我們班的人，人口混雜，最大的年紀已有三十七八，最小的只有十五六歲；最遠的來自內蒙遼寧，最近的就是本校子弟。我們班的階層也很複雜，最多的是些高幹子弟，其中有一位還是成都市長的公子。最少的，是來自偏僻的、我都未聽説過地名的山區農民。真是我們都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了一起。

上學的第一天，老師就交待了學校的政策：上學期間不許談戀愛。違者會被處分甚至於開除。都上大學了，還不准談戀愛呵。我估計年齡大的同學都得倒吸一口冷氣。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會去掉一個最高分，再去掉一個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這個「最」字格式化，讓其成為普適真理。

大學學校裏，不可能再辦學習班了。但是，老師也還是常常對個別學生辦一些小型學習班，教育他們以學習為主。而大部分同學，考慮的都是實際問題，還有一些個人的小算盤，比如留校呵，

農村來的學生還希望學校能分配好一點的工作呵，等等。所以，大家對老師也都很尊重和服從。

我們的女生宿舍，是八個人一間房，上下鋪。桌子正中，是兩間並在一起的書桌。吃飯和看書，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個人的空間，就只有一張床。我們班外地女生佔了一大半，她們的箱子都沒地方放。

宿舍裏有兩個上海女生，她們倆的生活習慣比較相仿，人也合得來。平時，大家在一起聊天，她倆會突然改說家鄉話，我們就知道，她倆正在說甚麼不想讓我們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飯，她們也一起去。上海人很會扳着指頭過日子，她倆把各自的飯票放在一起，買飯的時候葷素相間。上海人胃口小，還可以節約一些飯票，到月底，她倆又把多出來的飯票，賣給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那時我們的生活補助費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飯票。飯票賣出去，可就變成了現金、變成了零花錢。十四元的飯票，對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癆得慌。所以，肉票也開始在男女生中間交換了。當然，有的時候交換的是現金，有的時候交換的是體力，視雙方需要和經濟程度而定。

一天，兩個上海女孩中的一個，把她的上鋪拾掇乾淨，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帳往下一放；倆人就擠在一起睡了。在中國的七十年代，人們腦子裏面從未有過同性戀這個詞，大家的意識都純真潔淨，兩個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個「戀」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個床上，那是要經得起檢驗的；二女和二男，睡到一張床上，天經地義。沒人會說半個「不」字。

同班的女孩們突然發現，這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方式。在這大學四年之中，可以有一個人陪伴你，生病了會有人照顧；上晚自習時，有人幫你佔位置；情緒不好時有人傾聽；周末有人一起去看電影；不是愛情，勝似愛情。因為，還可以公開的肩並肩甚至於手拉手 (視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 地走在一起，不會擔心老師辦學習班，不會擔心受處分，也不會擔心畢業後，影響分配。

於是，好像一場疫情，女孩們都快速地成雙配對，尋找着愛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後面越恐慌，因為別人都配對完了，自己還孤獨着，那絕對是可耻的。最後的兩三對，幾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胡亂湊合的。總算有一天，我發現全班十八個女生，一個不拉地配成了九對。我也不例外，幾乎是毫無爭議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動地將我與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還未成功的單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發現我的飯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會兒，她就從食堂打回了香噴噴的飯菜。等我吃完飯後，她幾乎是搶過我的碗來，衝到水池洗碗去了。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後，一向懶散的我，終於被「征服」了。儘管我一直不是個肉麻的人，但還是皺着眉頭，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學校裏招搖過市。不過，由於我倆都是本地人，下午下課後，就各自回家去了。所以，我的享受也就限於中午。

九對女孩配完後，總算太平無事。我後來常常想，幸虧班上女生是雙數，如果是單數的話，還不知要鬧出甚麼事來。從那時開始，班上的女生都是出雙入對的。上課時的座位也自動地調在了一起，複習時，兩個女孩頭挨頭，竊竊私語，男生想要插句話，不是那麼容易。當然，在周末的時候，也有男生邀請女生去看電影的，但一邀請就是兩個。更多的時候，鬧不清楚誰是誰的電燈泡。一天晚上下雨，一個男生主動要借雨衣給我，最後我發現，他實際上是要借給跟我在一起的女孩。還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同學「盛邀」到峨眉山旅行，到那裏之後，才發現還有一位男生同行，回來後，班裏已經「盛傳」他倆的緋聞。到後來，「亂花漸欲迷人眼」，「二人行」有時變成「三人行」或「四人行」，男生們走馬燈式地與女生「友誼」過來「友誼」過去，但始終不變的卻是兩個女孩的組合，上面這九對女孩的故事，今天的人看了，肯定以為是我編的，是為了搞效果。但事實上，這些全都是真的，裏面的故事多了，要寫，可以湊成一部長篇小說。可惜我從來不記日記，記憶力也日漸

衰退，記住的：只是這些事情的輪廓和大背景。那些軼聞趣事，全都隨風消逝了。

終於，生活和學習都翻過了七十年代這一頁，我們畢業了。在畢業和就要離開學校之際，我們班的男女組合突然發生了巨變。九對假鳳虛凰中，起碼有一半，這時公開和某位男生出雙入對；公開地和他肩並肩甚至於手拉手 (視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 地走在一起，和他在公共食堂中，同在一個飯盒裏吃飯。現在，開始能够看到他們和她們的組合：哦，原來是這樣。讓我疑惑的是，他們到底是在何時何地，使用何種手法，成功轉型？看來，我不在校的那些夜晚，在這些貌似雙胞胎們出出進進的背後，其實一直是暗潮湧動呵。而那位一度與我同坐同行的女孩，也在畢業不久後，飛快地、正常地結婚生子，與我漸離漸遠。

禁欲時期的愛情，如同戰爭時期的諜戰一樣，都有自己的一種方法，那就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禁欲時期的戀人們不用人教，全都深暗此道。

從里芬斯塔爾說起*

——劉野訪談錄

時間：2008年9月

地點：北京

採訪人：朱朱　　錄音整理：羅瑪

I

朱朱：最近我在看德國女導演里芬斯塔爾的回憶錄，在這本書裏，她的敍述儘管十分冷靜，但仍然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特別希望出人頭地的女人，因為無論她怎樣解釋，客觀事實是她主動給希特勒寫了一封信，然後才和希特勒認識。

劉野：她的藝術成就很高，但人格稍有點問題。

朱朱：蘇珊·桑塔格寫過一篇專門駁斥她的文章，但她自己的解釋是，美學是可以和意識形態徹底剝離的。

劉野：她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克》藝術成就都很高，但我懷疑她故事片是否能拍好，因為這種人，會在電影畫面的構圖、拍攝的角度等方面有所貢獻，但真正拍故事片可能不行，因為故事片關於人性要更複雜，不像體育比賽。法西斯國家的體育不一定會差的。

朱朱：事實上在里芬斯塔爾的回憶錄裏我還有一個發現，那就是她很像中國文革時期的那種鐵姑娘，意志力實在是太强了。

劉野：其實文革時期的一些藝術作品在美學上也有貢獻，那個時候的照片上那些女孩的打扮，其實挺「酷」的……

朱朱：我記得你以前說過，當時有那麼一幅畫你是把它當作色情畫來看的？

---

* 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1901–2003），德國舞蹈家、演員、導演、攝影家、作家，她的回憶錄中譯本於2007年1月由學林出版社出版。

劉野：那是我小時候，去美術館看全國美展，我記得特別清楚，裏面有一幅畫，畫的是毛主席和楊開慧年輕的時候，背景是暗的，楊開慧穿一身兒白，下面是裙子，挺着胸，胸畫得特高，當時對我來講完全是一幅色情畫，因為那時候看不到這樣性感的女性形象。法國有一個波普藝術家，根據中國文革時期的畫做了一個系列，其中有一張毛主席和楊開慧在威尼斯，就是從這類畫中借的形象。

朱朱：你說的這件事很有意思，我也有同感。之所以如此，我想首先是因為當時美術方面的印刷品非常有限，所以那幅畫會令人……另一個方面，其實文革的氛圍對孩子的影響也是有限的，對於意識形態的東西，完全是憑自己的喜好去吸收。

劉野：文革一九六六年開始，那時我兩歲，我覺得世界就是那樣了，對於一個小孩來講，也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的地方，但對我父母來講，肯定是一個特別奇怪的年代，對他們的生活構成了很大的影響。但如果小孩一生出來就面臨這些，他認為世界就是那樣，即使那麼恐怖、封閉的一個年代，他還是能從中發現青春期該發現的東西。我記得小時候看電影《列寧在十月》——那部電影老放，來來回回的放——那裏面一開始有一段跳芭蕾舞的鏡頭，我就特愛看那段，其實就是性的吸引。因為在別的地兒你看不到，女人露大腿，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列寧在十月》裏有那麼一段兒。後來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面的冬妮亞，也是青春期的偶像。

朱朱：那時往往是從這種反面的「教材」裏尋找這種東西，比如電影裏的國民黨女特務……

劉野：太性感了。穿着制服，戴着小帽子，一般都叫甚麼「瑪麗」小姐。

朱朱：我看過你比較早的一個自述，提到過門采爾的素描。

劉野：小時候，因為我喜歡畫畫，當時我爸在北京人藝工作，從圖

書館偷偷借了一些素描的書，一個是《王式廓素描》，一個是《門采爾素描》，還有一個文革前出的《素描習作選》。當時只能看到這些，門采爾，那就是大師了。那個《素描習作選》特別有意思，裏面有幾頁拿紙給糊上了。我就問我爸，這怎麼給糊上了？我爸說你別管。後來我拿燈光一照，女人體！當時我十歲左右，處於萌動期。記得毛主席說過，男女老少藝術模特，是藝術家訓練的必要的手段，是允許畫的。這個也算是當時的最高指示，要不美院根本就不敢用模特，用的時候就把毛主席那話說上。當時我就想，一定得學畫畫，你想，這是唯一能看到女人體的渠道。

朱朱：西方藝術包括現代主義藝術，你大概是甚麼年齡段接觸的？

劉野：那就得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了。當時的美術館會展出一些法國十九世紀農村風景畫甚麼的，我印象特別深，全是十九世紀現實主義的作品，但同時，我記得是左邊的廳裏貼了一些文獻資料，是介紹這些畫的背景的，其中有安格爾作品的照片，女人體，我記得那個廳裏所有的人都在看那個照片。當時我還小，特別想看，但又不敢看得時間太長，怕人說。但那些大人就無所謂了，就使勁兒地看。現在想想，當時的中國人真挺可憐的，就靠看那個印成了黑白的小照片，來滿足一點欲望和好奇。

朱朱：我也有類似的記憶，當時我住在一個小鎮上，那兒有個文化館，晚上會放一些香港的武俠片，那是八十年代，那時人們在看錄像的時候都喜歡嗑瓜子、哇啦哇啦地說話，滿屋子的烟霧，忽然那天的武俠片裏出現了一個俠女背部全裸的鏡頭，就在一剎那，全場安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只聽見呼吸的聲音。

劉野：太饑渴了。我覺得人性開始並不是靠甚麼平等、民主的意識來改變的，是靠這些更本質的東西來顛覆的。

朱朱：其實執政者很清楚這個道理，所以他們對這方面控制的尤其嚴格。

劉野：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四年我去德國，正好趕上柏林牆倒塌，當時東德的人只要你有身份證或者護照，都可以從西德的銀行裏領到一些西德馬克，這之後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妓院或者是看性錄像帶的地方去排隊。

朱朱：我在想，是不是恰恰在特別集權的、意識形態控制特別强的國家，才會有真正的色情？而相反，在那些很寬鬆、很自由的，完全開放的地方，反而沒有了色情？幾年前我去了趟泰國，去之前你會想像那種地方肯定特別色情，但你真正到了那個地方就發現，它的色情已經完全被消解了，為甚麼？因為色情在那個地方已經完全變成一個陽光下的事情，它沒有了界限，以及在那個界限上的膠着、扭曲。就像當年人們去看安格爾作品的照片……

劉野：這在當時的法國人眼裏一定很可笑，安格爾的作品印多好他們都不看，非得去看原作，他們不是去欣賞裸女，而是去欣賞藝術。

朱朱：換句話說，現在我們去盧浮宮，面對那麼多大幅的油畫原作，你已經完全看不到色情的東西了，因為你不再是通過一個窺望孔……

劉野：越壓抑自由，就越渴望自由，其實你給了他自由之後，可能他就更需要秩序。所以，我覺得壓抑是肯定要失敗的。

II

朱朱：你在德國待了多久？

劉野：前後待了四年半。我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去的，考的是柏林藝術學院，考上了就可以在那裏待下來了，還有獎學金。一九九四年畢業我就回來了。

朱朱：那段經歷對你有甚麼影響？

劉野：跟沒去過肯定是不一樣的經歷了，但對我的藝術很難講是個甚麼樣的影響。它是會使我的藝術有點不一樣，但不會使我變成一個好藝術家。能否變成一個好藝術家跟出不出國沒關係。因為，假如你是一個敏感的人，你可能看一本畫冊就全明白了，你要不敏感……你想，為甚麼所有德國學藝術的人，一天到晚的在那兒看那麼多的原作，但真正能出來的好的藝術家，跟中國的比例是一樣的？這不合邏輯。所以，能不能成為好的藝術家跟敏感度有關，跟出不出國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但它肯定是改變了我的經歷，我有四年在德國的經歷，就失去了四年在中國的經歷。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如果當時我在北京，可能會放棄畫畫。因為當時畫畫很不容易，吃不了苦的話，可能你就會幹裝修去了，幹這個相對容易，我學過設計。但在德國就幾乎沒有這可能，人家德國的設計師多棒啊！而且我又不會德語。只有畫畫，是最適合自己的一條路。無路可走，反而走出一條路來。四年，很苦，挺孤獨的。

朱朱：我記得你曾經說過，有時孤獨到對着鏡子說話。

劉野：那是北島的一首詩。我和北島八十年代就認識，大概是八三、八四年，他前妻的弟弟和我在一起工作，他和他前妻邵飛常來看我們。那個年代的聚會，都是從老鄉那兒買倆羊頭，擱一大鐵鍋裏煮，旁邊圍一圈兒人，詩人、畫家、雕塑家。我那時還比較小，潛意識裏不知道為甚麼，比較喜歡和詩人玩，朦朧詩，現代派，我願意跟他們呆着，吃完了羊，喝點兒二鍋頭，念詩，聽完了，我說：您這甚麼意思啊？不明白。但我本能的喜歡這種感覺，這種氣氛，這種人的味道。本能地喜歡這些人。一九九〇年我到了德國，那會兒挺苦的，我還在一個中國餐館打過兩天工，苦得受不了，兩天我就不幹了，我想：再這麼下去我就回國了。後來北島來了，作為一訪問學者，說是請我在這兒吃飯，當時給我出了口氣——我心裏這壓抑呀！那

個時候，哪吃得起飯館兒呀，出國後第一頓在飯館兒吃的飯，是他請的我。後來我看到他的一首詩，才知道他苦悶到甚麼程度，別的我都記不住了，就記得這一句：「對着鏡子說中文」。就是那種感覺，孤獨到……當時你身邊的中國人來來回回就那麼兩三個人，我的中文能力都退化了，德語能力又不是特別好，說中文的機會又沒有。後來我回國以後，我的中文都簡單了，這種感覺，你不那麼長時間在國外呆着，那種感覺你都不可體會。

朱朱：那個年代，對西方藝術的接觸主要還是通過畫冊，你去了國外以後，肯定看了一些美術館，那麼直接置身於西方，和你去之前對西方現代藝術的認識有甚麼不同？有甚麼樣的改變？

劉野：剛一去，美術館裏的東西一下看得太多了。那個年代，是德國藝術最蓬勃的時期，新表現主義，柏林是中心。比如安森·基佛這種藝術家，是他最火的時候。我一去沒多久，就趕上他在柏林國家畫廊的一個大型個展，其中的鐵皮飛機，視覺衝擊力也太强了，跟你以前的經歷完全不一樣，因為這種感覺你看畫冊是看不出來的。那時就想模仿這種東西，行為也做過，一下就找不着北了，這種狀況持續了一年多。後來我發現，這一年多的作品，不如我出國之前的東西，因為最原發的那些東西沒有了，顯得特別虛假。那時也會幾個人聯合起來，在電影院的走廊裏找個地方，辦個展覽甚麼的，但幾乎沒甚麼反應。我想，這不是一個出路。有一天我把所有的畫——都是很大的畫，全給毀了。當時有德國同學還說我，你還畫畫兒呢？繪畫都死亡了！我就想，怎麼辦啊？後來我一想，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就是我，就只當我不是在德國——我也並不是因為在德國才喜歡畫畫兒的，所以我該怎麼着就怎麼着。一年多以後的一天，我在畫室裏工作到很晚，忽然，我感覺回到以前在北京的狀態了。那個時候，才是我真正的開始，找到真正的感覺了。這種改變之後，參加的第一個展覽就有反饋了，就有人要

買我畫，要代理我。我覺得藝術的誠實——不是寫實——是最重要的。

朱朱：有一幅作品，畫的是柏林的景色，半空中飛着一架飛機，是不是那時畫的？

劉野：那個稍晚一點，畫的是我畫室的窗外。其實我在國內就喜歡古典繪畫，橫平豎直的那種，丟勒，凡．艾克，當時就看了很多，但當時感覺這些都不是現代藝術。後來我想通了，我喜歡怎麼幹就怎麼幹，我喜歡怎麼畫就怎麼畫。所以我覺得，藝術特別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你觀察別人不如真正地觀察自己，找到自己的那個出發點，你可以往前走，這個最重要了。而不是看世界發生了甚麼，當然世界發生了甚麼對你肯定有影響，但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發生了甚麼。

III

朱朱：尼德蘭繪畫是你接受影響的一個東西，瑪格利特我覺得也是你喜歡的一個畫家，還有蒙德里安、馬列維奇、巴爾蒂斯……你是甚麼時候開始喜歡瑪格利特的？

劉野：在國內的時候我就很喜歡了，一直到今天我都特別喜歡，他實際上是有尼德蘭的傳統，有神秘感，即使是畫一帽子也很色情。之所以喜歡這種東西，我想這是天生的。其實很多東西都很好，但是為甚麼有些藝術家喜歡這些，有些喜歡那些，這可能沒法兒解釋為甚麼，這就是天生的，它沒有甚麼道理。

朱朱：這可能就是先天性的個人氣質。

劉野：我覺得先天是最重要的，對藝術家來講，這可能就是所謂的天賦。天賦是最重要的，是唯一的最重要因素，其他都是可變的，包括所受的教育。其實當時我們受的教育都差不多，看的畫冊基本都一樣，但為甚麼對你起作用，對別人不起作用？我覺得跟先天有關係。比如巴赫或者莫扎特那個時代，並沒有那

麼多教育，他們就跟手藝人似的，但他們的音樂你現在從甚麼方面去評價，它都偉大。這就是天賦。

朱朱：維米爾也是……

劉野：維米爾我一看就喜歡。去德國之前我沒看過原作，不知道有這麼重要，到了柏林才看到，柏林有個美術館有兩幅維米爾非常精彩的畫。當時在中國最有名的是魯本斯，還有倫勃朗。可是到了德國看了倫勃朗的原作我很失望，根本就不像我想像得那麼好——你知道，當時在國內一說油畫兒，就要畫成「倫勃朗」。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有甚麼問題啊？是不是我沒看懂啊？魯本斯就更差，油漬麻花的，跟買肉的似的……當時就心存懷疑，但又不敢想人家有甚麼不好，就這麼一邊走一邊想着，慢慢走到一間荷蘭繪畫的小屋裏，一下看見維米爾了。那個時候，八十年代，在國內根本就沒甚麼人提他的名字，沒甚麼人說他，荷蘭小畫派，不重要，太小資了。可是那畫畫得太棒了！其實他技巧也不是那麼出色，畫得特笨，但那種氣息……我一到周末，就坐地鐵專門去看那幾張畫，在那兒一坐就是半小時、一小時，然後回家。那段時間就是那樣。這類作品，包括凡·艾克，我都喜歡，其實瑪格利特、維米爾，他們是一個綫索。直到今天我也沒特別喜歡倫勃朗，儘管我知道他重要，有貢獻。

朱朱：你是甚麼時候開始喜歡蒙德里安的？

劉野：蒙德里安我十五歲就開始接觸了，那個時候我學工業設計，包豪斯系統甚麼的。老師也講蒙德里安，但是當圖案講，我不知道他是畫家。工業設計講的是平面構成和立體構成，其實這個是藝術概念，但老師是當設計概念來教的，全是康定斯基的理論，比如說你設計一個餐廳，不能設計成强烈的紅色，或者黑色，否則人家沒食欲了。這些其實都是現代藝術的觀念，如果你看康定斯基就知道，他首先是講這種顏色的感情——顏色本身是有感情的那種理論，是從蒙德里安、康定斯基開始的。

我當時受了很多這樣的教育——沒當是藝術教育，是當工業設計來學的，真是陰差陽錯……其實我是在非常不自覺的情況下，受了現代主義的教育。後來到了德國，看了蒙德里安的原作，發現這個東西不是設計，就是藝術，西方殿堂裏的藝術，我一下就明白了：設計只是從他那裏得到的靈感，是因為他們才進步了。此外我還發現，蒙德里安的畫和維米爾的畫在結構上其實是完全一樣的，這兩條綫一下連起來了。如果你仔細看，他們的畫的結構和節奏，是一樣的，只不過一個是所謂具象，一個是所謂抽象。荷蘭人講的結構和基本型，像倫勃朗那條綫索就發展成梵高、德庫寧，維米爾這條綫索就發展成蒙德里安及紐曼等等，包括現在創造出米菲兔的迪克．布魯納，我沒當它是小孩插圖，他完全是抽象出來的基本型。所以我發現維米爾和蒙德里安給我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一樣的。這可能跟他們的心理傳統有關。九十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在荷蘭一個很有名的藝術家家裏吃飯，我說：對我來講，蒙德里安比畢加索重要。他說：對。因為畢加索的貢獻還是傳統的那個系統，蒙德里安的貢獻……其實走得更遠，當然包括俄國的馬列維奇。蒙德里安是一種符號，馬列維奇其實也是一樣的。但是我覺得所有這些，更多跟心理有關，而不是一個嚴格的理論論述——

朱朱：或者說沒必要把這種共通性理論化——

劉野：對，它沒有那麼準確。人是複雜的。

朱朱：或許對其他人來說不是這樣的，但對你來說就是這樣的，恰恰就接通了。

劉野：其實蒙德里安有神秘主義作為他的宗教背景，他是要跟他的神對話的，其實他並不是一個科學論者。

朱朱：他是要追求一個終極的秩序感。

劉野：對。這種秩序感在維米爾的畫裏是完全一樣的，可能沒蒙德里安意識得那麼强，但那種永恒性、靜謐感，在他們那是共通

的。還有純粹性——和倫勃朗比起來，維米爾、蒙德里安不知要純粹多少倍……

朱朱：實際上他們是給予心靈一種秩序感。

劉野：對。蒙德里安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一切秘密都在關係之中。比如說兩條綫之間的這種交叉關係，一塊兒顏色和另一塊兒顏色交界的那種關係。其實你看維米爾的畫也是一樣，他畫的那桌子、色調和那椅子之間的關係，非常精確。不像倫勃朗，他的畫裏面，人物的臉最重要，眼睛最重要，這是傳統繪畫所强調的，甚麼「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之類的。但維米爾不是，他的人物後面的地圖，可能不比人物的臉次要，其實我覺得他的畫完全是一種抽象畫兒。他的許多人物眼睛都不怎麼仔細畫，都是一概括，表情根本沒有。

朱朱：所有東西在你這兒似乎有一種綜合？你覺得你的那一幅作品真正達成了一種綜合？

劉野：終極作品還沒有畫出來，嚴格來說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張滿意的作品，都有問題。可能維米爾也不覺得他達到了。但是我覺得我的方向，從早期到現在，越來越明確了：往更純粹的方向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控制得還比較好。所以你看我早期的畫兒，雖然也有它的魅力，但不如現在純粹，純度不够。

朱朱：那個時候，還有一些使你衝動的東西。

劉野：對，想說的東西太多了。

朱朱：你的作品裏，似乎始終有一種憂傷感。

劉野：我覺得憂傷對我不是一個好東西，以後要減弱一些這種具體的感情，儘管不是那麼容易做到，但是我覺得最高等級的藝術裏，可能神秘感比憂傷感更好一些。不能太具體了。

朱朱：不過我覺得我說的這種憂傷還是挺好，因為它並不是籠罩着你的繪畫，進而泛濫成一種傷感——

劉野：傷感就很差了——

朱朱：也就是說，你的個人還是大於畫面中的這種憂傷的，或者說有種距離，是作為你情感的一個出發點。比如說你去年畫的《冬景》和最近的這幅竹子，兩者相比，那麼《冬景》裏更有憂傷的東西，而後者可能就更抽象，更構成。但恰恰是前者保留了一點憂傷，一點人性的溫暖感，使得畫面更充分，更具有……實際上，只要不陷入傷感，我覺得「憂傷」沒甚麼問題。

劉野：對，比如你喜歡的那個米歇爾．波瑞曼*，他不是興奮、激情的那種類型，說他憂傷更合適，甚至裏面帶有一種絕望的情緒。

朱朱：或者說有一種低沉的東西……

劉野：對，這種感覺挺高級的。

朱朱：有點像男低音，頻率不高，但很有穿透力，傳達的範圍很廣。事實上，他的東西並不特別突出……

劉野：甚至讓人忽略。我第一次看他的東西，大概是九三、九四年的樣子，在文獻展的小角落，像兩張草稿，其他的還有美國極簡主義的作品，特別大，視覺衝擊力特別强，當時你比較容易被那種作品吸引，而米歇爾．波瑞曼的東西需要慢慢體驗，滲透感很强，其實比利時的藝術有這種味道。

朱朱：比利時的調子特別容易產生神秘性，那個國家給人的感覺就比較暗。

劉野：陰暗，不是窮困——它是很富裕的一個地方，但我老覺得他們的藝術有一種絕望感。這是一種很高級的審美，當藝術到了很高級的階段，就充滿了一種絕望感。宋代繪畫裏有這種東西，比如宋徽宗，以及文學中最高等級的《紅樓夢》。有希望的藝術肯定是相對低級的，比如宣傳品之類。實際上人類的未來肯定是絕望，不是說中國，我是說全人類都在走向滅亡，我

* 米歇爾．波瑞曼（Michael Borremans，1963–），比利時藝術家。

們每走一步都是離滅亡更進一步，這是終極意義上的，個體也一樣，我們每走一步都是離死亡更近。當然近距離看，我們還是可以多一點感情，我們每天過得可以更高興一些，盡量的積極樂觀一些，其實我和朋友之間的相處都是盡量高興一點。所以我覺得藝術特別有意思，有時你畫一個瓶子甚至都特有激情，這也是拯救自己的一個辦法。

朱朱：你的作品裏是有很强的幻滅感。

劉野：很多人能感受到這一點，覺得我的畫跟卡通畫似的看着挺好看的，但怎麼都有點邪惡感，有點黑暗的感覺。其實我並不是有意的，只是這種無力、絕望……這就是我的世界觀吧。有一個朋友說我，你要是有小孩的話，你就不會有這種世界觀了，你就會希望下一代過得更好，你就會有希望。我說可能吧，這個誰知道？我覺得關鍵問題還不是這個，其實我覺得有孩子也會有這種絕望感。

朱朱：現實生活中你喜歡孩子嗎？

劉野：我沒有一點要孩子的欲望，每次看見朋友的孩子，我都會說「哎呀這孩子真可愛」，但每次我都會覺得自己特虛偽。其實我畫的根本不是小孩，不是可愛的兒童，有些人完全看錯了。

朱朱：張愛玲二十四歲的時候就寫過一篇文章，叫《造人》，意思是說，人不是上帝，卻一定要充當起上帝的角色來「造人」，實在有點勉為其難，而孩子未見得能給我們帶來希望，甚至更加絕望也有可能。

劉野：如果我們認為孩子能讓我們擺脱絕望，那這個世界也太簡單了，問題也太容易解決了。

朱朱：但是有意思的是，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有童稚的特徵。

劉野：如果一個藝術家的作品中出現童稚的形象，你就把他解讀成喜歡孩子，那絕對是錯誤的。你想想最偉大的兒童文學作家安

徒生自己就沒有孩子，《愛麗絲漫遊仙境》的作者卡羅爾也沒有孩子。

朱朱：我在一本西方的評論中了解到，安徒生的作品並不是為孩子寫的，他的作品中本來有很多色情的部分，只是後來被當作兒童文學，色情部分被刪除了……

劉野：其實他原本就不是為小孩寫的，小孩根本就看不懂那裏面最精妙的部分，所以在丹麥他被稱為詩人，只有在中國才叫兒童文學作家。至於我，畫畫肯定不是為小孩畫的，小孩肯定看不懂我的作品。

朱朱：儘管你的作品是具象的表達，但卻帶抽象的意味，就像我們談到性，往往是將性從具體的行為裏面抽離出來，也就是達到所謂的「意淫」，才更接近性的本質，或者說是更純粹的境界。

劉野：其實我的畫裏並沒有象徵意義，很多具象的東西是為抽象的結構安排的。比如雨傘，根本不象徵甚麼，僅僅是為構圖需要。當然，他要拿一雨傘，不能拿一文明棍，這個馬上就能決定，潛意識裏不用想。其實像瑪格利特的超現實主義也不是邏輯性的，有時候就是那麼一種感覺，畫面、結構，真正潛意識裏的。達利不是，達利是生造出來的，你能感覺到他的虛偽。比如我畫一女孩和一箱子，真不是表現旅行的，其實在我潛意識裏有一種色情意味，這種關係有點莫名其妙，一個男人或者女人，和這箱子之間潛在的邏輯，挺有意思的，也說不清楚。

朱朱：在你的《冬景》和現在的這幅竹子裏，色情似乎被移開了，更多是關於神秘性，關於心靈的秩序感。

劉野：《冬景》那張有更寬更廣的一種……宇宙感，更空無了，甚麼都不具體，但甚麼也都能感覺到。裏面的感情也越來越少，不那麼具體。

朱朱：怎麼會轉換到《冬景》這樣的作品呢？

劉野：其實當時也沒想這麼高級，我當時就想，作為一個畫家，你不能老畫人，老被人解釋成卡通甚麼的，我想我是一個畫家，而且是一個喜歡經典的畫家，那麼從繪畫本身來講，我一定要能畫人，也要能畫風景，畫靜物——我還畫了好幾張靜物呢，那個更抽象——其實出發點當時是這個，別的東西是帶出來。我覺得對繪畫本身的研究，人、風景、靜物，這三個東西，後面的兩個我還涉及的不多，所以去年在德國的展，我畫了一些純風景，純靜物。

朱朱：就好像視野所及的土地，還沒有被自己照明過，它也很神秘，對自己也是一個挑戰。

劉野：對，也是一種遊戲。

朱朱：你早期的作品還是有表現主義的東西，童年記憶的成份也是相對明確的，然後慢慢的進入了你比較經典的，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那種創作，那種色欲的、又包含抽象感的東西，我相信這些還在延續，但是從《冬景》開始，恰恰把更加抽象化的衝動或者欲望提煉出來了。

劉野：藝術本身的功能，對於我來講，我不想把它賦予政治批判的色彩，這是我比較有意識避免的。我很早就認為，作為藝術家，一方面是個人化特別重要，還有一個就是藝術應該超越它作為批判工具的功能。藝術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幫助你挖掘更深層的情感和神秘感，這點適合任何國家，包括中國。不是說我們在一個非民主國家就沒有這個權利，就只能批判，不能挖掘內心。在西方人的眼裏，中國人老是被當作政治動物，老問你是不是持不同政見者，而不看你究竟畫得怎麼樣。我是持不同政見者你就說我畫得好，我不是你就說我不好？能不能把這兩件事分開？而且我覺得政治本身它就低於藝術，我憑甚麼去關心它？我有我的政治觀點，這跟我的藝術沒關係。

朱朱：他們把中國人和中國藝術割裂開了，比如他們看中國古代的藝術，他們就會去欣賞裏面的美，裏面的高級的東西，而一到

當代，他們就認為你必須是政治現實的表達，這顯然構成一種歧視。

劉野：我在德國的時候，這種感覺特別强烈。記得我上學的第二年，德國人想給我們在柏林的外國人辦展覽，儘管當時我也很想參加展覽——因為當時展覽的機會不多，但是這樣的展覽我明確表示不參加。你要是一個正常的展覽我參加，你是一個專門給外國人辦的我不參加，我既不需要你們歧視我，也不需要你們照顧我。我賣不了畫我刷碗去，我用不着你給我「照顧」。這是一種應該爭取的權利。

朱朱：西方人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這種錯覺，跟中國當代藝術本身的問題有關，因為它本身不够强大，而其中比較有力量的部分，恰恰是政治現實的部分。這同時也跟西方人的選擇有關，他們選擇了這個部分，然後把它拎到國際的舞台上，使它放大，使它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代表。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還有一個問題，或者說有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當代的中國藝術家，還沒有真正做到那樣一個高度，就是憑我的語言，憑我的繪畫性，就能改變你的看法，使你反過來接受我的影響。在這方面我覺得日本的藝術，包括它的建築、電影，就具備了一定的能力，能够反過來影響世界。

劉野：我覺得不用着急，慢慢會的，事實上已經開始了，比如徐累、洪磊這樣的藝術家，他們都是這個方向上的。以後會不一樣的。其實從我自己的藝術來看，我剛開始回來他們都很奇怪，現在好多了……我一九九四年回來，當時在北京辦展覽已經有點影響了，但是當時人們的注意力完全是在那一類作品上頭。並不是說我那時的畫比現在差多少，但那種情緒完全是被忽略的。也不是說我現在比那時畫得好多少，只能說是感情、注意力在偏離。現在已經好多了。而那時候，我的這種東西展覽不需要，它看着完全文不對題，沒有一個語言環境。

朱朱：實際上，大家都已經一致的厭倦革命現實主義了，但對現實

主義的需要還在持續，這種局面也在慢慢改變。不僅是藝術家那裏，我覺得觀眾也是一樣，這個很重要，它是一個基礎。

劉野：社會，其實是社會接受了這些。所以我覺得美國極簡主義挺偉大的，我倒不是覺得那些畫家能力有多强——當時極簡主義是一流行，你只要站對了隊，你就能成為大師——而是我覺得他們的觀眾特別棒，那些極簡主義藝術家在美國當時能成為英雄，像紐曼、羅斯科那些人，和美國的觀眾有關，不是說所有的美國人，而是當時美國確實有一批社會精英，對這種藝術有感覺，這個是一個基礎。我們的觀眾是否能具備這樣的品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覺得藝術並不僅僅是藝術家的事，完全是跟觀眾一起在創造。

《今天》訂閱單．2008年度

優惠訂價US$/ 一年

	平郵	空郵	
個人訂戶	36	52	前期雜誌
機構訂戶	—	64	每本10元

前期雜誌補訂優惠：每期10美元。美國以外每期14美元。

I would like to subscribe to the *Today Literary Magazine,*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to TODAY for

☐ 1 Year ☐ 2 Years ☐ 3 Years ☐ Back Issue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Email: _____

Cheques payable to *Today Literary Magazine*

P. O. Box 3384
Iowa City，IA 52244-3384
U.S.A.

☐Cheque $_____(Payable to *Today Literary Magazine*)

☐Please charge my: ☐ VISA ☐ Master Card ☐ Amex

Card No.: _____Exp. Date: _____

Signature: _____(for charge orders only)

Date: _____